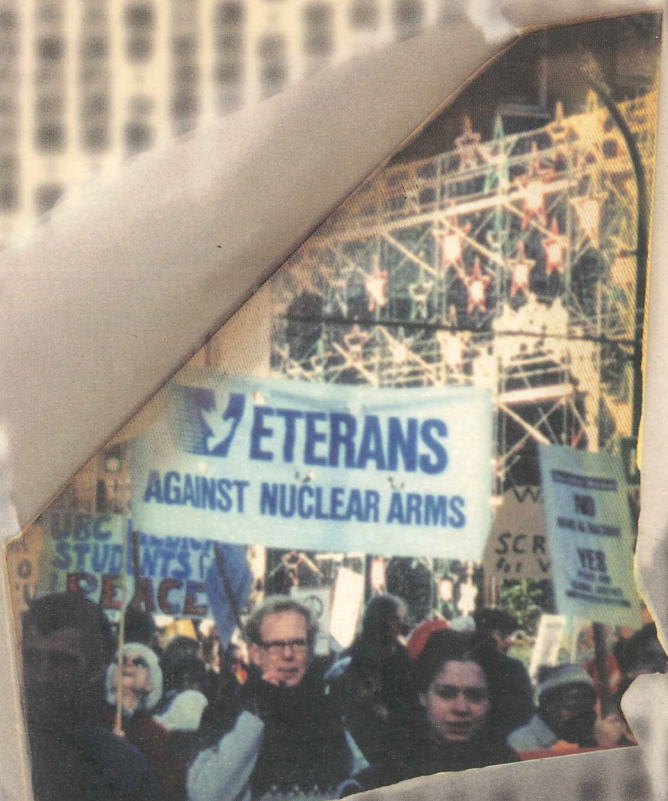


社會運動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 何明修 著



何明修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歷／美國紐約大學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者

現職／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封面照片：2001年11月於溫哥華的反戰遊行
(Ran Plett攝)

社會運動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 何明修 著



 三民書局

91年度教育類
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序

近幾年來，老當益壯的 Charles Tilly 在哥倫比亞大學每週進行《抗爭政治》的工作坊，每次固定都有來自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門的成員參與，從剛入門的博士班研究生到著作等身的資深學者，幾乎所有大紐約地區的社會運動研究者都到齊了。從 2004 到 2005 年間，在這個工作坊發表的文章主題包括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荷蘭的國家統一、紐約市的福利改革、阿根廷的婦女運動、南非的民主化、土耳其的階級鬥爭、太平天國的地方統治等。這樣豐富而多元的議題內容顯示，社會運動的觀點開始被用來解釋全世界的政治社會變遷。在工作坊中，Tilly 最常評論的方式是，「你的研究涉及了三種研究問題，每一種問題都有許多文獻。我可以列舉一些書單，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想談這個三種問題」。每隔幾個星期，Tilly 就會發給參與者更新版的研究書單（例如社會運動與民主化），上頭有他對於最近出版研究作品的短評。有一次，我問他如何有時間讀那麼多的最新作品，他無奈地說，「沒有辦法呀，就讀快一點」。

的確，社會運動研究是一個迅速成長的學術領域，每年都有引人入勝的成果出版。在英語世界中，主流的社會學刊物刊登越來越多的相關研究作品，專門探討社會運動的期刊也陸續出現，例如《社會運動研究》(*Social Movement Studies*)、《動員》(*Mobilization*)，學術出版社也開始推出一系列社會運動研究的專刊（例如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的《社會運動、抗議與抗爭》(*Social Movement, Protest, and Contention*)、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系列)。臺灣的學術界也扣合這個潮流，任意翻閱一本國內的社會學期刊，都可以發現相當可觀的社會運動研究作品。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以社會運動的觀點，試圖勾勒出臺灣近幾十年來的變遷。

有證據顯示，社會運動研究的成長並不是短暫的流行，而是一股長期



的趨勢。作為一種有意識地改造社會的集體力量，社會運動是現代性(modernity)的產物。一旦人們開始發現以往堅信不疑的教條是偶然的、人為的，生活方式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的結果，而不是需要加以膜拜的神聖傳統，那麼凡是人類所建立的東西，也是可以被人類所挑戰與揚棄的。追根究柢，社會運動是立基於一種強大的樂觀信念，在舊神祇偶像傾倒之際，人類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除自己所加諸的桎梏。馬克思曾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中，「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這句話很精確地點出了社會運動的歷史起點，正是由於舊體制喪失了號召力，人們才開始更冷靜地看待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以及他們想要達成的理想。就這一點而言，社會運動參與者是堅決的反宿命論者，他們熱切地相信自己的行動可以帶來有意義的改變。

保守主義者往往利用一種人性的弱點：許多人無法以世俗的語言來論證他們所信仰的價值，因此被迫要將自己所遵守的道德風俗神聖化，超自然的理由成為最方便使用的藉口。私有財產、種族隔離、一夫一妻制、異性戀不都是被宣稱為「神聖的」？儘管這些社會制度都是被一系列的現代法律與國家權力所維繫。現代性意味著反思性，也就是說，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超然地批判與改變。現代性普及化結果之一即是社會運動的盛行，挑戰種種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基於這些理由，英國社會學大師 Anthony Giddens 指出，社會運動對社會研究具有特殊意義。正是由於社會運動不斷地指出我們生活的問題，性別、環境、族群、身體才成為社會學家所關切的新興研究議題。

這是一本導論性質的書，社會運動被視為一種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當代社會現象，加以觀察、分析與解釋。知識對象與實踐對象是不同的，本書的目的在於提供各種可以用來考察社會運動的觀點，這些知識並不一定能夠有助於社會運動的動員。讀者將會發現，由於近來研究的大量累積，各種詮釋途徑分別賦與社會運動不同的知識圖像。社會運動可以被視為一種理性的工具行動，其目的在於以非常態的手段來追求一群人的集體利益。社會運動也有可能是一種文化領域的意義建構，它開創了新價值與規範，



進而引導我們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社會運動同時也是集體情緒的抒發，透過各種儀式性的表演，展現出參與者對於某種道德願景的效忠。社會運動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社會運動包括了手段與目的之功利主義算計，也具有文化表現的作用。換言之，社會運動本身就是一種複合的現象，同時具有諸多異質性的元素，也因此，需要各式各樣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討。

晚近以來，英語世界的社會運動研究呈現出諸多知識觀點的創新，其迅速的發展令人眼花撩亂，經常不容易釐清某一位研究者的立場。就以史丹佛大學的 Doug McAdam 為例，他在 1982 年出版的《政治過程與黑人抗爭的發展》中，提出了頗具影響力的政治過程論，正式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反映政治機會的現象 (McAdam 1982)。在 1988 年的《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中，他的研究焦點轉向個體，探討運動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與社會運動的關連 (McAdam 1988)。到了 90 年代，他開始注意社會運動的文化面向，尤其是運動者如何建構出一套具有動員力量的論述，以及如何以高度表演性質的行動來達到政治目的 (McAdam 1994, 1996b; Friedman and McAdam 1992)。晚近以來，他所探討的問題更涉及了時間 (McAdam and Sewell 2001)、情緒 (Aminzade and McAdam 2001) 與網絡 (McAdam 2003)。同樣地，紐約大學的 Jeff Goodwin 經常被認為是當前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研究大將。他深刻地批判主流研究者存有結構主義偏見，因而忽略了社會運動的文化意涵 (Goodwin and Jasper 1999)。他的作品探討了社會運動中的性愛關係 (Goodwin 1997)、情緒 (Goodwin, Jasper and Polletta 2001) 等以往不被重視的元素。然而，2001 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比較革命研究》，卻採取了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途徑 (Goodwin 2001)。這些例子並不是特例，而是當前社會運動研究常見的現象。隨著各種理論概念創新的速度加快，研究者也被迫要不斷地採取新的觀點，探討社會運動的不同面向。

在此，我們面臨一個研究觀點的抉擇兩難。一種可能是堅持某一種理論典範的預設（例如理性選擇理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儘可能地將各種社會運動的面向納入其探討的範圍，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排除了若干議題的討論。另一種可能則是先不預設社會運動的本質，而是以各種的經



驗現象出發，從而導入諸多的理論討論。這種策略固然能夠容納更多議題的討論，其代價則是理論上的折衷主義。本書比較接近後一種策略，採取綜合取向的寫作方式。筆者認為，理論概念應該是用來幫助研究者觀看事物，而不是限制研究者，使其忽略了某一類的經驗現象，或是將其視為次要的、附屬的。舉例而言，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有可能認為，文化現象只是次級的，真正的行動動機是來自於個體的理性判斷。相對地，激進的文化論者則是提出對立的主張，所有的利益與理性都是特定文化的產物。在此，如果我們只是選擇了其中一種觀點來觀看社會運動，事先就排除某些面向的討論，那麼所得到的將會是十分窄化的圖像。實際上，正是由於社會運動本身即是一種複合的現象，同時包括了理性與非理性、文化與非文化的面向，因此，我們才需要各種的組織理論、文化理論、行動理論、網絡理論來加以理解。本書希望提供一系列的概念工具箱，協助釐清不同的社會運動面向。就這個意義而言，不同的理論即是不同探照燈，它使得我們看清楚了某些事物，同時也忽略了其他的事物。因此，與其費心打造一盞最強大的探照燈，不如採取「小即是美」的策略，就讓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分析概念同時並存，一同指引出社會運動的諸多風貌。

此外，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筆者儘可能地引用臺灣社會運動的研究成果，讓這些抽象的概論與理論融入本土的參照點。在臺灣，社會學的本土化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在某種程度上，本土化已成為從業人員的共識。謝國雄曾指出，「作為一個研究臺灣社會的『臺灣』社會學家，最大的願望是回答『臺灣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理所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研究者需要從本土的經驗資料建立概念、發展理論，而不只是停留在運用外國的理論來解釋本土的經驗現象。事實上，就如同其他領域的發展一樣，臺灣的社會運動研究仍處於套用理論的階段，鮮少有研究者能夠用本土的資料來挑戰某一種學說，更遑論建立新的理論。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後進國，理論典範的依賴固然悲哀，但並不是宿命。就如同工業發展過程有所謂的「後進者的優勢」，本土研究者可以直接借用最先進的研究成果，降低長期嘗試與錯誤的成本。基於這種信念，本書冀望能夠達到外國理論與本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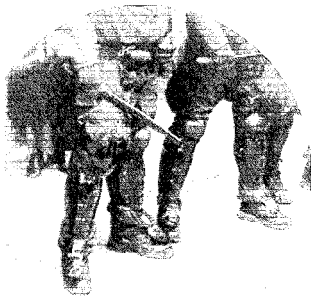
驗的對話，進而有助於社會運動研究的本土化。

作為一位新進的社會學研究人員，筆者從未想過要寫一本社會運動的導論書籍，十分感謝三民書局惠賜這份難得的機會。好友林宗弘、余振華、許家馨、張鐵志、游秉陶、黃于玲、鄭力軒對於草稿諸多指正，筆者受益匪淺。助理陳麗如、蔡佳憶、張國偉、蕭長展同學的編輯協助，一併致謝。本書大部分的章節是在美國紐約完成的，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 (Fulbright Scholarship) 與臺灣教育部公費提供了筆者在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進修的機會，因此得以參與 Tilly 教授所主持哥大工作坊，並當面向 Goodwin 教授請益。在紐約不僅可接觸社會運動的重量級學者，結識海外臺灣民主運動人士，更能夠直接觀察許多豐富而活躍的社會運動場景。最後，更要感謝妻子淑鈴這一段日子以來的心靈陪伴與知識對話。伶巧聰慧的她解答了我的許多難題，沒有她的支持，這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

何明修

2005年2月28日

於紐約森林小丘



社會運動概論

目次

序

第一章 導論：

從抵抗到社會運動

- 一、什麼是社會運動 2
- 二、社會運動的現代性 8
- 三、壓迫、抵抗與社會運動 12

第二章 社會學理論與社會運動

- 一、理論的用途 18
- 二、古典社會學理論 20
- 三、現代社會學理論 38
- 四、結 論 64

第三章 個體與集體之間：

認同、生命歷程與社會運動

- 一、個體與集體的連結 68
- 二、認同政治：從差異到承認 70
- 三、運動認同 75
- 四、個體生命歷程與集體行動的辯證 81
- 五、結 論 88

第四章 組織與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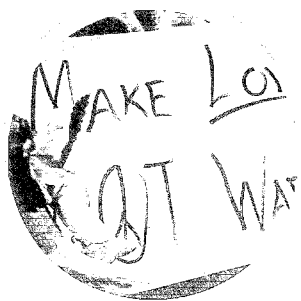
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

- | | |
|----------------------|-----|
| 一、有組織的集體行動 | 92 |
| 二、社會運動組織：競爭與合作 | 93 |
| 三、社會運動的組織形態：科層組織及其批判 | 97 |
| 四、事先存在的網絡 | 104 |
| 五、詳述網絡的作用：聯繫的強度與種類 | 106 |
| 六、結 論 | 114 |

第五章 政治環境：

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 | | |
|------------------------|-----|
| 一、政治的重新發現 | 116 |
| 二、政治體制的有選擇性開放 | 117 |
| 三、國家的重新發現：集體行動的歷史條件 | 119 |
| 四、從資源到機會：資源動員論的演進 | 123 |
| 五、新政治的舊政治基礎：歐洲的新社會運動研究 | 128 |
| 六、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運用與批判 | 131 |
| 七、結論：政治機會結構與「小思考的策略」 | 147 |





第六章 構框：

社會運動的意義創造

- 一、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 150
- 二、Snow 等人的構框理論：互動論的基本
預設 154
- 三、策略性構框 161
- 四、組織間的構框過程 165
- 五、策略理性的限制：過度志願論的危險 168
- 六、結 論 172

第七章 情緒、儀式、宗教與社會運動

- 一、社會運動的「常態化」之後 176
- 二、常態政治及其不滿 178
- 三、情緒、儀式、宗教與集體行動的關係 185
- 四、結 論 196

第八章 社會運動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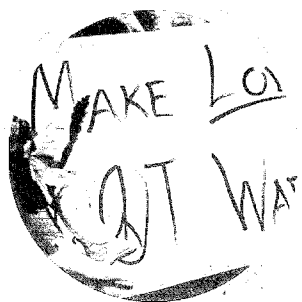
- 一、從社會抗爭到政治改革 200
- 二、社會動員與政治中介 201
- 三、社會運動與執政者的互動 207
- 四、社會運動與反制運動 212
- 五、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 217
- 六、結 論 222

圖片出處 224

參考書目

- 一、中文書目 225
- 二、英文書目 228

索引 265



第一章

導論：

從抵抗到社會運動





一、什麼是社會運動

對於某些人而言，社會運動一詞常喚起政治動盪的不安想像：一群激動的暴民佔據街頭，擾亂了日常生活秩序，形成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對於另外一群人而言，社會運動是不得已而必要的，因為他們有太多的冤屈與苦悶無法伸張，在現有的體制下走投無路，只能放手一搏，試試看自己的運氣。一般而言，厭惡社會運動的人通常擁有社會運動參與者所缺乏的地位、權力與財富。一方面，他們掌握太多的既得利益，經不起社會動盪的衝擊，另一方面，有時他們所享有的優渥生活正是立基於對於其他人的剝奪之上。相對地，對於一無所有的人而言，他們毫無所失，「至多只是失去身上的枷鎖」（馬克思語）。

社會運動這兩個面向並不是沒有關連的，事實上，正是因為社會運動帶來了某些人的恐懼，它才成為另外一群人的希望寄託。社會運動是具有爭議性的，原因在於它涉及實際資源與權力的分配。在此，資源可以有形的（財富）或無形的（聲望），權力可以是制度化的（政府決策），也有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性別關係）。無論如何，資源與權力的分配通常是零和戲局，一方之所失即是另一方之所得。在這種情況下，優勢群體自然會傾力維持既有的體制，例如資本家希望勞工乖乖地拿薪水，男人希望女人扮演馴化的賢妻良母，統治族群有意識地污名化被統治族群的語言、風俗等文化特徵。然而被統治者會漸漸發現，現存的遊戲規則並不如統治者所宣稱的公平，繼續遵守這套行為規範只會永恆化不平等的現狀，因此他們開始拒絕扮演原先習以為常的角色，擾亂現有的秩序，提出他們的集體挑戰，例如罷工、遊行、靜坐等行動。一旦統治者認為這種不順從的代價太高，他們才會被迫讓步，同意修改被質疑的規則。因此，對於既有的社會秩序而言，社會運動總是代表一種不安定的元素，參與者的共同目的即是改變不利其本身的現狀。

然而，社會運動的基本戲局並不是這麼簡單。一般而言，沒有統治者



會愚笨到「整碗捧去」，獨佔所有的好處，使得自身的特權毫無掩飾地暴露出來。社會統治需要一套美麗的謊言，讓被統治者相信「愛拚才會贏」，認為只要憑藉著個體的努力，就有出頭天的機會。少數的被統治者也面臨了參與共謀的誘惑，只要他們願意背叛自己所屬的群體，就有機會獲得統治者所施捨的些許恩惠。因此，被統治者的團結是個變項，「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破壞了他們的內聚力，阻撓了社會運動的產生。此外，被統治者的群體特性也是重要的關鍵。如果他們是處於孤立狀態，沒有內部的溝通管道，或者異議的代價太高，例如壓制性的環境帶來參與抗爭的高度風險，個人的不滿很難匯集起來，至多只會產生一些零星的擾亂，而非持續性的集體行動。

在上述的說明中，筆者試圖勾勒出一個社會運動的初步輪廓。簡而言之，社會運動是一種持續性的集體挑戰，由一群彼此團結的人民所發動，共同目的在於改變現狀 (Tarrow 1994: 3-4)。

從這個定義來看，反對派舉行政治集會、要全面改選「萬年國會」、工人爭取年終獎金進行的「集體休假」、婦女發動反性騷擾的大遊行、反核漁民封鎖海港阻礙核電機組的運送、同志群體抗議政治人物的污名化這些現象，當然可以算是社會運動。同樣地，在臺灣的教改與反教改的爭議中，我們也可看到了兩種社會運動的相互抗衡。然而，定義的最大用處並不在於告訴我們什麼是屬於社會運動，相反地，它往往界定出什麼現象不屬於社會運動。

首先，宗教信仰有時可以強化被壓迫者的反抗認同，宗教組織可以提供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精神與物質資源(見第七章)，但宗教並不是社會運動。新興宗教的領導人可能認為，心性的修行可以達到改造社會的使命，信仰所揭示的境界是美好社會的未來願景，強烈的信徒團結可以促成熱情的社會參與。的確，宗教與社會運動有太多相似之處；信徒與社會運動參與者都是處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他們同樣熱切地希望別人能接受自己的信念，有時甚至拒絕接受異議。正是基於這個理由，最堅決反對宗教的共產主義運動也經常被其批判者描述為一種宗教，同樣是有先知(馬克思、恩



7 格斯、列寧)、教義(歷史唯物論)、背教者(史達林)、正統與異端的鬥爭(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教會(共產黨)、逐出教會(開除黨籍)、原罪(私有財產)、末世論預言(共產社會)等等。儘管如此，大部分的宗教並沒有對於當前的社會秩序形成持續性的集體挑戰，他們的世界觀通常缺乏社會衝突的元素。宗教信仰都需要假設某種的神聖性，並透過若干超自然力量來支撐，就這一點而言，它與高度世俗化的社會運動存在極大的差異。因此即使是所謂新興宗教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例如種種強調靈修的新世紀(new age)宗教，也不是社會運動(另一種觀點，見楊弘任 1996)。

2 其次，非民主政權通常會採取一系列的由上而下的社會動員，以達成若干宣示的政策目標。這些社會動員經常被稱為運動，例如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新生活運動、排隊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是為了維繫現代化過程中被挑戰的國家道德權威(王志弘 2004)，帶有高度的權威主義性格，因此自然不是真正的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在共產黨統治下，由上而下的社會動員通常被宣稱為階級鬥爭的延續，例如中國的反右運動(1957)、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1976)。這些運動意圖某種革命目標，清算階級敵人，因此造成社會秩序極大的衝擊。由於這些社會動員帶來政治控制鬆動，某些特定群體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發動屬於他們自己的抗爭，批鬥他們所厭惡的對象(Perry and Li 1997)。即便如此，這些暴力的社會動員形式也不是社會運動，原因在於其動力並不是來自於基層的團結。事實上，這些動員的後果經常是瓦解人民之間的信任，反而壓縮了社會運動的發展空間。

3 最後，臺灣近年來出現的柯賜海、白米炸彈客、反臺獨炸彈客等特殊政治現象，當然也不是屬於社會運動研究的範圍。儘管他們有明確的訴求(如流浪狗問題)，他們的抗議也持續地挑戰社會秩序，但是他們的舉動仍是高度個體化的，沒有建立群體連結的實際作為，更遑論將其意圖提升為共同目的。

4 換言之，社會運動是結合了「集體挑戰」、「共同目的」、「團結」與「持續性」等元素所產生的現象。在此，定義社會運動純粹是為了分析的便利



性，能夠將一些經驗上分離的現象區隔出來，採取同一套的概念語言來加以分析。分析的區隔使得某些現象的共同性獲得彰顯，可以從其中歸納出產生作用的相同過程與普遍機制。理所當然地，分析的區隔界線是人為設定的，而不是事物的本質，因此任何一種定義都帶有特定的意涵。

首先，社會運動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社會運動是一群邊緣化群體的一種政治手段，他們採取體制外的策略，以獲取統治菁英的讓步。對於挑戰群體而言，拒絕體制所容許的管道是重要的，因為現存的體制一方面產生了不平等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同時剝奪了他們發聲的管道。社會運動即是弱勢群體的政治參與管道，就如同優勢群體靠著人情關係、關說、遊說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因此，即便社會運動帶有體制外的性格，它的目標仍是指向現存的政治體制。

承認社會運動的政治性，意味著社會運動與政黨、利益團體等現象可以相提並論，同樣都是一種利益匯集的政治行動。在早期的學術研究中，社會運動是與風潮 (fad)、恐慌 (panic)、神祕崇拜 (cult) 等現象，一同被歸類為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r)。然而，集體行為帶有行為主義的意義，所謂的行爲是刺激後果的直接反應，而不是慎思熟慮、有責任感的行動。很顯然，集體行為的觀點忽略了社會運動的政治性格，而將其窄化成為某種病態的心理現象。

其次，社會運動是一種工具性的行動。更確切地說，社會運動是為了達成某種外在的集體要求，一旦這個目的達成了，社會運動就可以功成身退，光榮謝幕。用 Alberoni (1984) 的話來說，社會運動永遠是介於兩種社會的狀態之間，一邊是具有創造性的起初狀態 (nascent state)，另一邊則是固定的日常—制度狀態 (everyday-institutional state)。作為一種改造社會的集體力量，社會運動是起源於起初狀態，但是就目標而言，它卻企求達成日常—制度狀態。就這個意義而言，社會運動的成功即是社會運動的揚棄，有了新的權力與文化承認，社會運動自然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這種工具性的強調，並非否定社會運動所訴求的價值往往帶有高度的理想性，或是它所追求的願景具有崇高的吸引力。運動議題愈能喚起參與



者的熱情，就愈能引發強大的動員風潮，並且更容易搏取旁觀者的同情。社會運動試圖搭建通往美好未來的橋樑，但是沒有必要將橋樑本身視為理想國，賦與過度神聖化的想像。

如果這樣的推論是可以接受的，那麼必須承認的是，社會運動追求的目標仍可以透過其他手段來達成。舉一個虛構的例子，在 1985 年前後，臺灣首次出現了質疑核能發電的聲浪，學者、政治人物紛紛提出反對的意見，導致核四案被行政院裁示暫時擱置（何明修 2001a: 121-123）。假設在那個時期不幸地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核災，產生實際的傷亡，那麼政府有可能被迫永久中止核四計劃，並且提早將其他核電廠除役。如果故事是這樣發展，臺灣將直接躍過後續二十年的反核運動，直接進入非核家園的階段。從這個想像的劇情來看，災難的悲劇也有可能實現反核運動所追求的目標^①。因此，撇開運動所追求的終極價值，社會運動永遠只是為了達成特定狀態的手段，它的意義也僅止於此。

最後，既然社會運動是具有政治性與工具性，那麼就不能排除某種可能性，即社會優勢群體也可能動員一群彼此團結的群眾，以持續性集體挑戰的方式，共同追求保守的政治目的。簡單地說，社會運動的形式也可以被用來強化某種社會支配，而不是挑戰不平等的現狀。基於這個理由，社會運動一詞應該被視為描述性的概念，而不是規範性的概念。描述性概念可以用來分析諸多具有相似特性的經驗現象，指認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因果機制，能夠用來分析、解釋各種立場不同的社會運動發展。相對地，規範性概念沒有分析的效用，研究者可以武斷地挑選他們贊同的社會運動，而捨棄其他不苟同的現象。

^① 這個虛構的例子並不是用來證明臺灣反核運動的失敗。事實上，近二十年來的反核運動雖然仍未實現其目標，但是透過強力的動員，非核電廠周遭的居民開始注意到核電的威脅，每年一度的反核遊行也成為許多環境運動者的第一堂課，啟蒙了許多的學生、家庭主婦、專業人士踏進社會運動的行列，甚至影響了更深遠的政治民主化，即使這並不是反核運動者原先所料想的，也不是「災難一停建」劇情所能達到的效果。



很不幸地，由於社會運動本身具有政治爭議性，大部分的社會運動研究者也存在價值偏好，因此，即使是一流的學者，有時也難免採取規範性的定義，不當地預先排除了一些需要討論的現象。舉例而言，Touraine (1977; 1988) 的作品無疑是社會運動研究重要的里程碑，他揭示了社會運動在當代社會中的關鍵角色。Touraine 強調社會運動能創造意義，帶來新的文化觀念。然而，他卻將文化創造視為社會運動的必要成分，因而將一些沒有宣稱新價值的運動貶為單純的鬥爭或衝突。例如他 (1986) 認為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工會運動，不再試圖積極改造經濟與社會結構，而只是消極地保衛既有的利益，因此只能算是利益團體活動，而不是社會運動。誠如 Rucht (1991b: 372) 指出，如此單方面側重社會運動的創新性格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這樣狹義的定義將會排除了更多相似現象的討論，窄化了社會運動分析的適用範圍。

同樣地，Cohen and Arato (1994) 的理論是市民社會研究的經典。他們指出，社會運動是當代市民社會重要的組織，以自主的結社原則對抗國家與資本的介入。然而，他們只在一個註腳中提到，晚近以來新右派運動「以市民社會自主性為名，卻捍衛傳統主義的生活世界，反對進一步的現代化。新保守主義所啟發的運動，試圖保衛經濟（財產權），以對抗國家干預與平等主義的改革」(ibid.: 716n)。言下之意即是說，只有支持現代化與平等主義的運動才算是社會運動，才算是市民社會的代表。就這個面向而言，他們的市民社會概念並無法用來解釋新右派運動，換句話說，他們的理論只是為了他們所認同的新社會運動量身訂作的。

因此，社會運動必須要被視為一種中性的政治參與形式，有可能被用來追求各種不同的價值，即便是那些令人厭惡的價值。研究者不須強迫自己處理完全違背自己價值判斷的社會運動，但這並不代表社會運動的概念就得被嚴格設限為狹義的規範性概念。如此一來，只會使得社會運動的概念被賦與過多不切實際的道德期待，反而缺乏分析性的效力。



二、社會運動的現代性

Tilly (2004: 3-4) 指出，社會運動的形式包含了下列的三種元素：(1)運動 (campaign)：有組織地、公開地向權威提出集體宣稱 (collective claims)；(2)社會運動劇碼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採用若干特定的政治行動形式，例如組織特定目標的協會、舉行公開會議、遊行、守夜、集會、請願、發傳單等；(3)公開展現參與者的價值 (worthiness)、一致 (unity)、數目 (number) 與信念 (commitment)，可簡稱為 WUNC 表現 (ibid.: 3-4)。在此，Tilly 所列舉的三種元素都具有特定的歷史脈絡意義，直到西方的現代性成熟之後，才開始逐漸成形。

首先，Tilly 所說的運動相當接近上一節所提到的共同目的。從人類社會建立正式的政治組織以來，被統治者就不斷地向統治權威提出要求，無論是關於物質的榨取、人力的徵調，或是風俗、信仰、習慣的改變。歷史上形形色色的起義、暴動、叛變，也可以被視為一群人共同目的之展現，而且這個共同目的是直接違背統治者的期望。西方中世紀的宗教異議、農民叛變遠比近代的社會運動更為劇烈，涉及了更強大的暴力手段和參與者的狂熱，鎮壓也更為殘暴。儘管如此，現代激進政治的特色並不在於手段或狂熱，而是在於訴求一套嶄新的政治綱領：使參與者相信徹底改造社會的可能性。

根據 Walzer (1968: 1-21) 的研究，現代的激進政治是特殊的時代產物，它預設了一套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當事者對於政治局勢的客觀超然評估，以及如何達成預想狀態的策略。革命家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不能混淆未來的願景與當下的現實。就如同培根 (Francis Bacon) 所說的，「要征



圖 1-1 在激進的宗教意識形態下，英國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發動革命，推翻了司鐸王朝。



服自然，首先要成為她的學生」；同樣地，要改造社會，首先也要理解當前的社會局勢，藉以提出「該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的問題。現代的激進政治，必然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政治，試圖完全摧毀當事者已經無法接受的世界，並且根據想像中的藍圖重新塑造。在激進政治的知識想像中，政治有目的性，是要用來實現新浮現的共同目的。就這個意義而言，革命是現代世界的產物，因為它所設想的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變遷，而不再只是舊有統治關係的微調。意識型態的出現，意味現代政治活動愈來愈具有反思性，被壓迫者的集體宣稱有可能基於地域、族群、階級、宗教，甚至是各式各樣的文化認同。因此，社會運動也成為抒發這些宣稱的共同管道。

其次，社會運動劇碼的概念意味著：有一些行動的類型被明顯地標誌為抗議，因此，任何想要發動社會運動的群體都採取這種鮮明的行動，以彰顯集體的意圖。然而在以往，異議的表達是附著在既有的公共儀式之下，不滿的群眾只能惡意地佔用節慶的時機，故意顛覆儀式表演的內容，嘲笑奚落達官顯要。他們所缺乏的是一種自主的語言，以精確地表達他們的心聲。Thompson (1974) 分析工業化之前的群眾行為，他發現抗爭通常帶有濃厚平民文化 (plebian culture) 的特性。抗爭的參與者是匿名的，他們沒有意圖表明自己的身分，而只是以迅速的直接行動攻擊他們所厭惡的官員、稅吏、商人。這個時期的抗爭通常缺乏嚴密規劃，憤怒的群眾只能利用既有的節慶，用暴力宣洩他們的不滿。

依附在舊有的文化傳統下，社會抗議的表面是高度受限的。一方面，抗議者必須等待節慶的到來，才有行動的可能；另一方面，既有的儀式也限制了抗議的議題，例如在以社區為中心的儀式中，就無法表達跨區域的訴求。可以這樣說，社會運動劇碼相當程度解決了抗議行動的交易成本，使得反對群體能更有效地推動他們的集體挑戰。因此，社會的現代化帶來了人群的集中、溝通媒介的普及、以及更便利的交通，這些因素也使得抗議活動得以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

最後，參與者的價值 (worthiness)、一致 (unity)、數目 (number) 與信念 (commitment)，就是展現他們的團結，這些特性的展現，不外乎是一種權力



的宣示。無論在哪一個時代，數目眾多、眾志成城的人民，都能對統治者造成威脅。然而，現代社會中，人民的團結形態卻出現了關鍵性的質變。在過去，當人民的生活方式面臨資本主義衝擊時，其抗爭是訴求於傳統文化，用舊有的道德觀念來譴責新的壓迫 (Calhoun 1982)。因此，道德經濟 (moral economy) 的素樸理念常存在於搶糧暴動 (food riot)、強迫拍賣、驅逐商人等十八世紀常見的抗爭。在道德經濟的觀念下，經濟物質是為了滿足在地人民的生計，其生產與分配不應該盲目地順從市場法則 (Thompson 1971)。然而，當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的理念出現之後，意識型態取代了傳統文化，號召了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民團結方式。因此，反對資本主義的抗爭不再侷限於個別的傳統社區、職業行會，而可能發展為全國性的，甚至是國際性的社會運動。也由於意識型態發揮作用，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不再限於直接的受害者，非受害者也可能基於理念的認同，共同加入抗爭的行列。因此，現代性容許了更多元的人群組合方式，也凸顯了團結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因此，如同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大眾媒體、核心家庭等現代社會的基本制度，社會運動也具有深刻的時代性格。就實際的歷史發展而言，Tilly (2004: 16-37) 指出，西方的社會運動是在十八世紀中期逐漸結晶化，開始產生比較明顯的固定特徵。在 1860 年代，英國的 John Wilkes 和他的支持群眾在倫敦街頭鬧事，要求真正落實人民的自由；在同時，美洲大陸的 Samuel Adams 與其他志士在波士頓集會，共同反對橫徵暴斂的英國政府。這兩起抗議均採取了公眾集會、遊行、請願等劇碼，以集體的訴求來動員群眾，也都以人民的名義向統治者挑戰，共同開啟了最早的社會運動。

在接下來的兩百多年內，社會運動的形式開始被更多的群體所採用。就空間分布而言，社會運動也逐步向歐美以外擴散，甚至形成了跨國性的運動。在這段漫長的期間，社會運動出現以下三個面向的發展。

1. 首先，社會運動開始成為一種普遍而常態的政治現象。在十九世紀，許多社會改革是以社會運動的形式出現，例如社會主義、民族獨立、廢除奴隸制度、爭取男性普選權。另一方面，保守派試圖抗拒社會變遷，他們



也發現社會運動是十分有用的武器。因此，除了改革派的社會運動以外，十九世紀也出現了排外運動、反猶太運動、宗教復興運動等等，這些保守的訴求一樣能夠獲得群眾的青睞。到了二十世紀，這種「右派對於社會運動形式的佔用」(Tilly 2004: 89) 更是明顯。法西斯主義份子不只在義大利、德國、日本取得了政權，法西斯的領導者崇拜、口號、制服、群眾組織更是全世界各國仰慕者所致力仿效的。換言之，社會運動成為了中性的承載器，即同樣一套共同目的、團體與持續性集體挑戰的組合，可以用來實現各種的主張，無論它們是進步的、反動的、或者說是難以歸類的。

其次，社會運動的制度化，促成了更多議題的政治化。社會運動日益成為一種政治生活的基本單位 (module)，這個事實顯示了一點，社會運動是有用處的，也因此才激發出普遍性的學習與佔用。相對於選舉與遊說，社會運動的政治參與成本較低，所需要的技術門檻也較低。更重要的，成功的社會運動並不一定需要龐大的群眾基礎，人多固然好辦事，但是巧妙的策略、有利的時機、創新的組織方式，更有助於社會運動發揮其影響。因此，社會運動的形式有助於政治議題的多元化發展，容許更多的群體形成。舉例而言，二十世紀後半的女性主義者提出了著名口號，「個人的即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她們強調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只存在於正式領域中，日常生活中的性別關係也是受到權力的形塑。無疑地，這句口號是當代婦女運動的最重要創見。從這個觀點出發，女性主義開創出一系列的社會運動議題，例如反對性騷擾、家庭暴力、要求同工同酬、合法墮胎權、公共托兒服務等等。這也就是說，婦女運動其實是眾多議題的組合。作為一種有創意的政治參與形式，社會運動提供了女性主義者多元的管道，能夠不斷地開創新的議題。

最後，就長期而言，政治體制總是成功地消解社會運動的衝擊，使得它的影響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威權政體嚴格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原因在於即使是一場非政治的社會運動，也可能導致政權變天；相對地，在民主政體下，社會運動即使再暴力，至多造成生命財產的局部損失，但是執政者卻可以高枕無憂地繼續掌權 (Waddington 1998)。在當代民主中，



社會抗議的合法化也意味著抗議者要遵守一些規定。因此，儘管抗議本身仍是擾亂我們的日常生活，遊行就是佔據街道阻礙交通，集會吸引人潮，製造垃圾；但是最重要的，抗議成為是可以被預測的，贊成者、反對者或甚至是沒有意見的人，都知道抗議大概會如何結束。對於執政者而言，抗議在某個程度上也是可以被忽略的。這並不是說，社會運動變成純粹無用的武器，無論如何，這種制度化的趨勢，使得社會運動通往最終目標的道路，變得更為漫長而曲折。

三、壓迫、抵抗與社會運動

大致上而言，社會運動起源於壓迫。但是並非所有的壓迫都會形成社會運動，更重要的是，沒有社會運動也並非意味著沒有壓迫的存在。從壓迫到社會運動，需要一連串的主、客觀條件配合，才能促成彼此的團結與共同目的浮現。事實上，大部分的被壓迫者都缺乏這些有利條件，他們沒有採取公然反抗的選項，只能偷偷摸摸地採取 Scott (1985) 所謂「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

日常抵抗是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弱者策略，其目的並不是推翻壓迫性的體制，而是試著讓他們在現有體制下的損失降到最低，以維持他們的生存 (Scott 1985: 301)。抵抗之所以是日常的，原因在於這些生存策略是高度依附於生活情境之下。被統治者沒有脫離統治情境的可能性，他們被迫要與壓迫者直接周旋。換言之，弱者缺乏另一個獨立的行動場域，例如工會、市民社會、公共論壇等，無法公開地表達對於現有體制的不滿。任何一種統治都需要依靠統治者的監督，但是監督永遠有其看不見的死角，在其中被壓迫者可以遊刃有餘地進行日常抵抗。Scott (1985) 最早在七〇年代的馬來西亞農村發現了這項抵抗的祕密。當時，綠色革命帶來了農村階級結構的分化，獲利的富農開始違背原先的村落道德約束，以更不合理的方式來剝削比他們貧困的鄰人。儘管村落內沒有爆發公開的階級鬥爭，貧農的抵抗卻是無所不在的。他們到處散發惡毒的謠言，摧毀富農的名譽，或更直



接地偷竊富農的不義之財。因此，表面上富農仍是村落內的領導人，他們受到普遍的尊敬，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地位與財富卻一直備受挑戰。

△ Scott (1990) 後來以更有系統性的方式，來探討抵抗的諸多形式。抵抗被視為一種具有高度戲劇表演性的藝術；在統治者面前，弱者必須隱藏自己的不滿，表現出統治者喜歡看到的卑躬屈膝，才能確保在統治者看不見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來討回局部的公道。統治者是高度掠奪性的，往往是竭澤而漁，在消滅自己之前先消滅了被統治者。因此，要使得抵抗有可能，偽裝與欺騙的手法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抵抗者也要儘可能地維持公開與隱藏兩個領域的區隔性，尤其要避免來自於內部的背叛，將抵抗的祕密透露到統治者。

△ 進一步來看，抵抗的藝術可以稱為一種實踐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亦即是口耳相傳的做事方法 (Scott 1998: 311)。實踐知識是高度附著在具體的實踐情境之中，沒有辦法被規則化，也無法在沒有脈絡的情況下傳授。深厚的實踐知識展現，成為一種知道如何靈活運用的竅門 (knack)，能夠在有限資源的情境下，獲得最有利的結局。Scott (1998) 認為，統治的最極致想像是將複雜的社會關係簡單化，成為有規則的秩序排列。一旦從統治者的視野來看，社會關係具有高度的可讀性 (legibility)，可以直接一覽無遺，那麼由上而下的社會工程改造 (social engineering) 將變得更為容易。在 Scott 看來，現代主義的都市規劃、布爾什維克的農村集體化都具有這樣的帝國主義野心，試圖徹底改造既有的人際關係與生活方式。面對這種情況，實踐知識有助於抵抗這樣的統治政策。

△ 簡單地說，在無法採取社會運動的前提之下，抵抗是一種弱者存活的伎倆。抵抗沒有意圖要推翻壓迫體制，但是不可否認地，無所不在的抵抗迫使統治者付出更多的代價，也使得統治秩序的維繫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常抵抗可以視為社會運動的預演，一種未經過協調的彩排。一旦時機變得有利了，被壓迫者會運用他們累積的實踐知識，私底下的抵抗轉化為公然的反抗，社會運動的號角也正式響起了。

更進一步來說，從抵抗到社會運動，被壓迫群體需要經歷下列的過程：



1. 建立個體之間的聯繫

△△ 抵抗是純粹以個體的存活為目的；相對地，社會運動則是要改變群體的命運。被壓迫者要建立內部的團結，形成一股集體力量。在形塑個體之間的聯繫過程中，認同促成一個強大的群體觀念，將自身與他人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共同的生命歷程背景使得同一個世代擁有相近的觀點，更容易集結成社會運動（第三章）。

2. 形成運動組織與網絡

抵抗是高度個體化的藝術，但是社會運動卻需要共同的協調。為了持續地挑戰更強大的對手，社會運動需要匯集資源，形成運動組織作為指揮中樞。另一方面，被壓迫者之間是否存在事先的人際網絡也是另一項關鍵。

△ 孤立化的個體只能憑藉高度的抵抗意志才能生存，但是如果有綿密的網絡，將有助於提升彼此的內聚力與訊息傳遞（第四章）。

3. 掌握外部的政治機會

抵抗需要認清局勢，確切遵守游擊戰的準則「敵進我退、敵退我擾」。社會運動對於政治環境的敏感度要求更高，菁英聯盟的不穩定、政治盟友的存在、執政者的鎮壓意願都是需要考慮的環境變項。成功的社會運動往往是善用既有政治機會結構所釋放的空間，以取得更有利的議價籌碼（第五章）。

4. 建構運動的世界觀

△△ 抵抗者活在一個無情無義的世界，抵抗是求生的本能，沒有倫理學上對與錯的問題。相對地，社會運動需要指控當前體制的不義，提出解決方案，並且指出未來世界的圖像。社會運動需要建構新的意義，邀請參與者共同加入這個集體志業。要理解社會運動的意義創造過程，構框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第六章）。



5. 利用非理性的力量

抵抗必得要奸詐狡猾，隨時隨地保持清醒的理智。相對地，社會運動需要的是熱情的信念，如此才能喚起激昂的參與。社會運動不是反理性的 (irrational)，但非理性的 (non-rational) 元素卻有助於社會運動發展。相對於狹隘的理性主義觀點，情緒的運作並不一定必然是違背手段與目的之算計。情緒的力量是有規則可以依循，有時成為理性行動的強大心理動力。因此，與其將這些現象貶為「反理性的」，不如說它們是不同於理性，因此是「非理性的」。情緒的解放帶來勝利的信心，抗爭行動的儀式化表演強化了參與者的認同。有些時候，被壓迫者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成為抗爭的武器，將虔誠的信徒轉化成無畏的戰士（第七章）。

6. 促成社會變遷的後果

抵抗者不期待壓迫的消失，他們早就學會了適應體制，而不是改變體制。相反地，點燃社會運動的火把是基於對未來的期待，希望集體努力能夠帶來變遷的結果。在邁向願景的道路上，動員形式、政治條件、與菁英的互動共同決定了社會運動所能改變的幅度。另一方面，反制運動的出現則是使得社會運動面臨了更嚴峻的考驗（第八章）。

上述的過程也是本書的編排架構，筆者希望以這樣的寫作方式來呈現社會運動的冒險之旅。在旅行開始之前，一些知識裝備的準備工作也許對於入門者而言是有必要的。正如凱因斯所說，「死去經濟學家的觀念仍在決定活人的思考」，一般人與社會學家如何觀看社會運動，其實也是受到既有的社會學理論影響。因此，如果先能釐清古典與當代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將有助於後續的討論。第二章主要是處理不同社會學理論如何看待社會運動這個現象，以及它們又是啟發了何種分析圖像。

最後，在本書中，「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或多或少被視為「社會運動」的同義詞，都是指涉一種體制外的政治參與。在一般的學術著作中，集體行動所指涉的範圍更廣。尤其是在理性選擇學派使用下，生產者



的聯合壟斷、共同規範的建立等涉及個體之間的協調都被視為集體行動。本書不採取這些寬鬆的定義，原因在於這種用法將會稀釋社會運動的特殊意涵。另一方面，所謂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 是以往經常用來形容社會運動的辭彙。傳統的集體行為學派主張，社會運動是一種個體心理不平衡的集體表現。但近三十年來，這樣心理學的強調已經不再被接受，學者採取更政治的、理性的觀點，來詮釋社會運動的意義。因此，除非是特指社會心理學的傳統，本書不使用集體行為一詞。

第二章

社會學理論與社會運動





一、理論的用途

社會學理論中，有極大的部分是在於討論社會本體論 (social ontology) 的問題。

簡單地說，本體論的問題在於探討何為社會存在 (social being)，到底什麼才是社會生活中最真實的存在，個體抑或是集體？民族主義者要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他們很顯然認定民族的集體命運超越了個體成員的存在。相對地，經濟學家則認為具有行為決定能力的個體才是最真實的，超越個體層次以上的現象都是個體行為的後果。要回答社會存在的問題，必須提出一個完整的知識圖像，以說明我們所處的社會到底是何種樣態，個體與集體之間又是何種關係。舉例來說，一個社會本體論可能主張社會不外乎是某種超越個體、對於個體具有強制力與影響力的制度綜合，儘管表面上看來是個別行動者決定自己的命運，但實際上他們的選擇早就被高度限制。社會之所以產生變遷，原因在於舊的制度產生了內部的緊張與矛盾，逐漸由新的制度所取代。就這種方法論上的實在論 (realism) 或集體主義而言，社會運動的出現反映了某種社會制度的危機，如果這項危機是結構性的，那麼社會運動很有可能成功推動新的制度產生。

相反地，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主張任何超越個體層級的社會組織都是虛構的，真正能發揮作用的只有具有意圖與決策能力的個體。這種本體論觀點認為所謂的結構不需要被賦與過度的實體化想法，它們只不過是一組限制。結構並沒有剝奪行動者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至多只是使得某些行動選項具有高度風險與代價。任何行動都要被視為當事者成本效益分析的後果，而不是受制於結構本身的決定。因此，社會運動應被視為個體決策的總合結果，亦即是相當數目的行動者共同認知到他們的潛在利益，並且相信運動的回報將超過參與所付出的代價。

此外，另一種的本體論立場認為社會生活是由一張意義之網 (web of meanings) 所交織而成，社會行動即是不斷地詮釋、生產、傳達、表演、甚



至是破壞與挑戰這些既有的意義。我們社會總是被各種文化意義所包裝與中介的，不可能直接找到某種機械式的規則或是最基本的組成份子。因此，社會運動應該被當成一種創造意義的行動，反對者有創意地挪用了傳統文化資源，進而挑戰了原先的角色安排與互動方式。

上述的三種本體論立場，分別呈現了當前政治社會分析的三大傳統，亦即是結構、理性與文化 (Lichbach and Zuckerman 1997)。由於這些研究傳統，假定了不同的社會圖像，因此也分別得到了不同的社會運動觀點。所以，一旦忽略了社會運動理論背後的本體論預設，不同理論之間的爭議就有可能淪為「見樹不見林」，無法直接觸及最核心的部分。

事實上，回顧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史，可以發現許多的理論創新並不是來自於經驗層次的發現，而是引進新的理論典範。舉例而言，McCarthy and Zald (1987a) 出版於 1977 年的作品顛覆了以往集體行為論的預設，正式將社會運動定義為一種資源動員的過程。在這一篇資源動員論的奠基之作中，作者並沒有呈現新的經驗證據，而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決策理論得到概念化靈感。因此，他們把社會運動組織當成某一種的企業家，總是主動尋找潛在的顧客（支持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就如同現實的市場經濟充滿了企業之間的競爭，社會運動組織之間的關係也充滿緊張，他們需要以新的動員策略來號召支持者。同樣地，Cohen (1985) 批判了資源動員論的狹隘理性預設，強調文化認同在動員過程中的關鍵性位置。在這一篇經典性文章中，Cohen 完全是採取文獻批判的方式，指出資源動員論所未能釐清的若干問題，最後引用哈柏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來強調認同形塑的關鍵性。因此，不同取向的社會學理論提出了相異的社會圖像，也因此，社會運動研究者的爭執往往涉及了典範之間的競爭，而不只是經驗現象的解讀。有鑑於晚近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迅速成長，各種理論典範的交流與綜合成為當前發展的重心之一，理解社會學理論所可能帶來的貢獻與限制無疑十分必要。

本章將處理古典社會學理論的馬克思、韋伯、涂爾幹、托克維爾，以及現代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微觀社會學、理性選擇、後馬克思主義，分



別探討其核心的理論內容與對於社會運動研究的啟發。

二、古典社會學理論

誠如 Giddens (1986: 4-5) 所指出的，社會學起源於十九世紀歐洲知識界回應雙重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危機。工業革命解放了人類的物質生產力，同時創造出巨大的財富與貧困。在工業社會中，經濟權力開始取代舊的政治特權，階級鬥爭也成為社會對抗的主軸。其次，民主革命產生了身分平等的公民，他們共同面對一個統一而有組織的政治權威。一旦統治的正當性不能再訴諸於超自然、神聖的神話，任何的社會秩序都仰賴人為的力量來維繫。凡是人為建立的東西，也是可以被人為的力量所摧毀，因此現代政治秩序開啟了各種社會衝突的可能性。

古典社會學家見證了社會的鉅變，各種的集體行動紛紛出現，有些要求捍衛舊有的秩序，有些則是激烈地要求改變現狀，更有些烏托邦思潮企圖構思另類文明的可能性。一個古典社會學處理的共同主題即是過渡時期的危機，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面臨不可化解的內部矛盾，歷史正處於邁向另一種社會形構的陣痛階段。涂爾幹關心當代社會的道德整合，認為傳統宗教已經不能再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新的集體意識卻仍未能浮現。悲觀的韋伯強調無情的理性化趨勢，喪失終極價值的社會充滿了各種的利益對抗，也將使所有的人類被囚禁在鐵的牢籠。謹慎的托克維爾則重視平等化的趨勢，他深信未來的挑戰在於如何同時維繫平等與自由的雙重價值。整體而言，這四位古典社會學家都發現現代社會所釋放出來的巨大動員能量，未來的命運即是取決於這些集體行動的發展。

(一)馬克思：階級運動的分析

1.階級運動的古典模型

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而言，馬克思最早提供了一套理解集體行動的模型，



亦即是他的階級鬥爭說。在某個意義下，《共產黨宣言》即是階級運動的理論陳述，而《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分析 1848 年革命的作品則是階級運動的經驗研究。

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解答人類歷史演進的線索在於直接生產者如何喪失了他們的生產成果，換言之，不同方式的剩餘價值佔有形塑出不同的歷史階段。階級關係是起源於生產工具的不平均分配，經濟資源的壟斷導致了政治上的支配關係。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於永久化既有的生產關係，使得他們可以維持剩餘價值佔有，相對地，被統治階級則是企求改變，扭轉他們被剝削的處境。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提升、經濟的危機等種種的社會變遷因素會改變階級關係，使得被統治者有能力發動具有挑戰性的階級運動。成功的階級運動即是一場社會革命，而革命不外乎是「歷史的火車頭」(Marx and Engels 1972: I, 474)，將導入新的歷史階段。

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工人階級運動，他關切資本主義是否有可能透過集體行動而被推翻，帶來一種更平等的生產方式。從他的著作中，可以梳理幾個影響階級運動的因素。首先，階級成員是否共同具有相近的社會處境，因而產生一致性的階級利益。在早期資本主義，不同部門的工人是處於競爭狀態，例如傳統工匠排斥沒有技術的工人；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機器使勞動的差別愈來愈小，使工資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利益和生活狀態也愈來愈趨於一致」(ibid.: I, 260)。其次，階級成員之間的溝通與組織聯繫也會影響其集體行動的潛力。馬克思認為，工廠制度聚集了大規模的工人，有助於他們的反抗行動。因此，「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Marx 1975: I, 552)。相較於工人，農民的分散特性與鄉村地區的交通不便均強化了其隔離性，他們缺乏全國性的聯繫，所以「沒有形成一個階級」。也因此，馬克思以「一袋馬鈴薯」來形容法國的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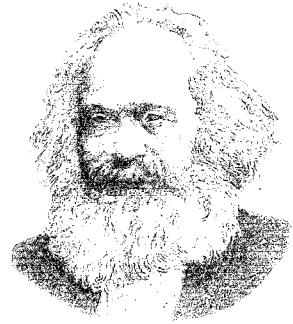


圖 2-1 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儘管他們具有高度的類似性，但是卻無法集結成一股共同的力量 (Marx and Engels 1972: I, 693)。

此外，馬克思也發展出一套階級意識的理論，來理解階級成員是否享有共同的觀念，認知到彼此一致的利益。如果工人沒有察覺自己與雇主的對立，他們是處於錯誤意識的影響之下，意識型態使得他們誤認了社會現實，因此抑制了階級意識的形成。直到工人具有真正的階級意識，才可能採取革命行動，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階級利益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根本矛盾，無法透過社會改革方式來加以消解。有了階級意識，「在己」階級 (class in itself) 才會轉化成為「為己」階級 (class for itself)，階級鬥爭才正式揭開。

△ 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馬克思指出了階級運動的結構起源，並且明確地指出利益、組織、意識是決定階級運動的基本要素。放在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上來看，馬克思的觀點已經具備資源動員論的雛形，十分接近 Tilly (1978: 54-55) 所提出的動員模型。到了二十世紀中期，馬克思所揭示的階級運動分析已經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2. 階級運動的文化與理性選擇

△ 首先，英國史學家 E. P. Thompson 強調階級形成的文化面向，開創了文化馬克思主義潮流。在十九世紀英國工人運動史的分析中，Thompson 強調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反對將階級形成的過程視為工業化邏輯的函數，彷彿工人的出現只是工廠制度的直接後果。對於 Thompson 而言，階級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客觀存在，階級意識也不是階級情境的主觀反應。事實上，「階級意識是這些『階級』經驗在文化層次的處理方式：體現在傳統、價值系統與制度形式」(Thompson 1963: 9)。因此，在解釋英國憲章派運動的興起時，Thompson 特別重視傳統的工匠文化、政治激進主義、美以美教會、階級社區等諸文化資源的影響。因此，英國歷史上最首要的階級運動，不外乎是這些文化傳統的激盪與混合，共同形成對於資本主義強而有力的批判。



Thompson 拒絕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在己階級與為己階級的區分，因為他認為不可能存在沒有階級意識的階級。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重視傳統文化的形塑力量，不同地區的階級運動必然帶有其「民族的一人民的」(national-popular) 特色。這個觀點展現在後續的許多探討階級形成的作品中，研究者試圖掌握某種有助於階級意識形成的文化資源，例如激進政治哲學、共和主義等 (Aminzade 1993a, Calhoun 1982, Katznelson 1986, Montgomery 1993, Sewell 1980)。

其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另一項發展即是結合了理性選擇的傳統，形成所謂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分析馬克思主義重視個體有意圖的行動，認為所謂的結構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本身並不具有強制力，只不過限制了若干的行動選項。因此，社會變遷的結果應該被視為諸多行動者的共同選擇，以及其互動所產生的非意圖後果 (Wright 1995)。其中，Adam Przeworski 運用了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探討階級形成與階級運動的發展。

就如同文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Przeworski (1985: 66) 反對將階級視為一種純粹客觀的存在。然而，Przeworski 不採取文化的解釋途徑，而是從個別行動者的處境來看，每個工人都有一連串相互重疊或是彼此對抗的身分認同，包括性別、種族、宗教等。此外，共同的階級利益也不同于工人們的個別利益。因此，一旦他們具有了階級意識，原因只有可能是他們選擇這種自我認定的方式，而不是採取其他的標籤 (ibid.: 95)。因此，從來就沒有工人是先天註定要認同自己是工人階級，並且將他與他的老闆設想為一種階級關係。那麼是何種原因促成了他們選擇工人階級的認同？Przeworski 強調外在組織的動員因素，在歷史上，只有透過工人運動政黨的組織工作，階級運動才可能出現。如果沒有工人運動政黨的動員，每個工人將會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其個別利益，其結果絕不會是一股強大的階級運動。換言之，沒有階級政黨，就沒有階級 (Przeworski 1995: 177)。

在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方面，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也重視個體的選擇。他們試圖釐清這個歷史悖論：為何一個在十九世紀宣稱要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到了二十世紀卻轉向維持、擁護資本主義？Przeworski and



Sprague (1986) 認為解答的關鍵即在於工人階級政黨的雙重選擇。首先，隨著選舉民主的開放，左派政黨面臨了參與或不參與選舉的抉擇，一旦採取「通往社會主義的議會路線」，激烈的革命辭彙就勢必要收斂，並且遵守選舉的遊戲規則。其次，無論是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純粹工人階級的選民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五十，這意味著左派政黨要取得執政，必得要設法先取得其他階級成員的支持。如此一來，社會主義的色彩必得要淡化，原先訴求的「工人」選民變成了「受僱者」；「生產工具國有化」的主張也被修正為較模糊的「生產社會化」。因此，透過這雙重的選擇，左派政黨被徹底馴化，而不再帶領歐洲工人邁向社會主義。

簡而言之，馬克思提供了一套分析階級運動的古典模型。階級意識、意識型態、階級組織、革命等基本概念能夠被擴充使用，進而理解非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文化與理性是兩種對立的解釋典範，當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運動分析能夠同時發展這兩種取向，這個事實呈現了社會學理論的豐富，能持續為社會運動研究帶來新的啟發。

(二) 韋伯：國家、科層化與地位團體

韋伯經常被視為「布爾喬亞的馬克思」(bourgeois Marx)，原因在於他並沒有排斥階級分析，反而是將馬克思的分析方法運用於其他領域。韋伯曾指出，「歷史唯物論的詮釋不是一部可以任意召喚的計程車，不會停留在革命推動者之前」(Weber 1948: 125)，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也是可以用馬克思所揭示的方法加以分析。在二十世紀初，結構功能論重視韋伯的意義、行動與價值理論，將其詮釋成為共識論的先驅，彷彿韋伯認為一套共享的價值觀念可以維繫社會秩序的和諧；相對於此，七〇年代之後的學術討論則更重視韋伯的政治與歷史著作，強調其衝突論的色彩 (Collins 1985: 81)。事實上，學者發現，韋伯分析 1905 年俄國革命的作品時 (Weber 1995)，所重視的乃是在一定資本主義發展下的階級動員潛力，以及其所可能帶來的政治作用。因此，在許多方面是可以與馬克思對於法國革命的分析對話與互補 (Beetham 1985: 202-204; Scaff and Arnold 1985)。



對於社會運動的研究而言，韋伯社會學的主要貢獻在於國家、科層化與地位團體的理論。

1. 國家

首先，韋伯提出了著名的國家定義，亦即一種「強制性的政治組織，其持續性運作，行政人員成功地維持正當使用武力以維護秩序的宣稱」(Weber 1978a: 54)。韋伯反對以實質的目的來定義國家，因為國家組織即是為了維持某一種支配秩序，而不是為了實現任何的政治理念，無論它宣稱是代表了某一種神祇、民族、人民、政治思想的體現。從歷史來看，國家組織只有在現代社會才真正發展完備，其過程乃是由統治君王所推動，逐步地剝奪了地方諸侯與達官貴人的政治地位，進而集中化了行政與財政的權力 (Weber 1948: 82)。用當代社會學的話來說，韋伯的理論包含了國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 的命題，即主張國家能超出統治階級，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國家自主性並不意味著國家組織的中立性或公平性。在其政治分析中，韋伯注意到國家官僚具有其自身的利益，他們為了鞏固其自身的特權，經常透過若干的國家政策進行階級鬥爭。舉例而言，韋伯認為德國容克貴族 (Junker) 的長期政治壟斷造成資產階級的政治不成熟，他們無法將其既有的經濟力量轉化成為強大的政治權力 (Weber 1989: 203-205)。同樣地，俄國官僚為了保障其特權，也顛覆了 1905 年的憲政改革宣示，阻礙了俄國走向自由主義的道路 (Weber 1995: 174-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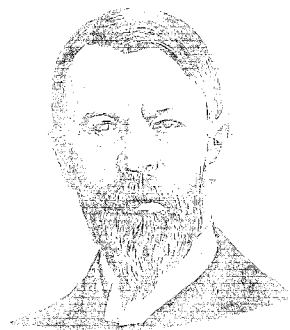


圖 2-2 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雖然有這些深刻的分析，韋伯並沒有以有系統的方式來探討國家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在《經濟與社會》中，韋伯主要是討論國家的形式要件與定義，國家官僚被視為理性化的代表，能夠因應高度複雜的行政事務。如此一來，反而造成一種可能的誤讀，國家官僚是超越社會利益以上，不帶有政治的色彩 (Beetham 1985: 65)。事實上，韋伯的分析提供了晚近國家中



心論的理論源頭，亦即是一種注意國家行動如何結構化社會衝突的分析途徑 (Skocpol 1985)。換言之，國家並不只是各式各樣社會勢力相互競逐的競技場；相對地，國家組織的形式、政治權力的施行，都影響了社會衝突產生的形式、時機與後果。

Reinhard Bendix 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是從韋伯社會學的立場出發，分析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權威轉變。Bendix 發現，公民權 (citizenship) 的逐步擴展，是與國家組織成長同時並行的歷史趨勢，共同重新定義了人民與政治權威的關係。公民權不只涉及了各種權利的組合，而且也包括了人民對於政府的義務。因此，社會抗議雖然表面上是為了爭取新的權利，但是實際上也是重新定義了人民與國家的關係。Bendix 強調，權利的賦與涉及了統治策略、歷史條件，而不只是單純為了回應社會抗議的後果 (Bendix 1988: 211-212)。舉例而言，最早賦與英國工人階級選舉權的是保守黨首相 Disraeli，最早在德國實施社會保險的是 Bismarck。這兩項公民權的擴張都不是來自於工人運動的推動，而是由於統治者的政治考量。此外，由於國家組織是現代化的產物，Bendix 也認為以權利為訴求對象的社會抗議在中世紀是不存在的。如果政治權威仍未獲得統一，沒有單一的統治者，就不可能以人民之名來向共同的統治者施壓。因此，前現代的人民抗爭只有可能是下列的形式：如以宗教為名的千禧年運動 (millenarian movement)、劫富濟貧的社會盜匪 (social banditry)、或是訴諸於仁慈統治者意識型態的人民正當性運動 (populist legitimatism) (Bendix 1964: 52-57)。這些形形色色的前現代抗爭，都不是來自於被統治者向統治者要求某種普遍性的權利。

Bendix 繼承了韋伯的學術關切，將國家建立 (nation-building) 的歷史過程視為當代政治生活最重要的變遷趨勢。在這個過程中，社會運動的形式也因此產生變化，開始成為向國家當局要求公民權的運動。儘管如此，Bendix 認為社會運動的影響是有限的，各種公民權的賦與也不能被解讀為社會運動的直接後果。舉例而言，在 Bendix 看來，十九世紀的革命社會主義不能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根本性的矛盾，而只是反映了工人因受到政治排除所產生的行動。因此，一旦政治民主建立了，工人階級有了政治參與權，



就轉向體制內的社會改革，不再採取暴力革命的路線 (ibid.: 88–89)。

2. 科層化

其次，科層化是韋伯支配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在韋伯看來，朝向正式組織化的趨勢是普遍性的，表現在經濟、軍事、法律、宗教等領域。在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行政管理的事務越來越由專業的國家官僚所負責，原先的中國文人、中世紀教士等業餘人士不再是必要的，而他們的非專業性格也無法擔當日益複雜的管理事務；另一方面，當前的民主政治是立基於選舉的遊戲規則，因此有組織的政黨也成為權力競逐的主要參與者。對於韋伯而言，科層化固然提升了組織的適應力，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僵化。在各個領域中，韋伯都看見了科層化的負面效應。舉例而言，古代資本主義的衰退即是由於國家組織的成長，隨著帝國的疆域擴大，科層體制抑制了私人利潤的追求 (Weber 1988: 64–65)。此外，韋伯也認為當時德國政治領導者之所以缺乏責任感，也是由於國家官僚獨大的結果。決策者總是可以躲避在官僚體制的背後，不需要承擔政策成敗的責任 (Weber 1978a: 1403–1405)。在階級運動方面，情況也是如此。韋伯駁斥社會主義人士的宣稱，資本主義一旦被推翻了，工人階級並不會真正獲利，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只帶來「官員的專政，而不是工人的專政」(Weber 1978b: 260)。換言之，社會主義者忽略了一點，社會主義運動組織本身也是一種領導者與追隨者的支配關係，他們一旦取得了政權，這套支配關係將會更加鞏固而不是消除。因此，在所謂的階級革命之後，工人階級仍是受制於一群統治者，而不是完全的自由。

韋伯的科層化命題被 Michels (1962) 發展成為一套解釋為何階級運動無法達成其革命目標的理論。Michels 分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演進，他發現隨著運動日益成長，組織卻趨向保守化，一個宣稱要挑戰現狀的政黨，反而忙著強化內部的權威關係。簡單地說，Michels 指出任何社會運動所面臨的困境：要發動強大的運動無疑需要組織與領導，但是組織化的趨勢卻強化了不平等的現狀 (ibid.: 364–365)。在早期，Michels 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受到社會運動研究者的重視。舉例而言，Lipset 在其工會運動的研究中，大致上同意 Michels 的觀察，但是他強調如果領導菁英是處於競爭狀態，寡頭化就不是必然的結局 (Lipset 1962: 36; 1981: 435-436, 亦見 Stepan-Norris (1997)、Stepan-Norris and Zeitlin (1996) 的延伸研究)。

3. 地位團體

最後，地位團體理論也值得社會運動研究者參考。韋伯認為，政治社群內部至少有兩種不同層次的不平等結構。階級是起源於經濟生產關係，涉及了物質資源與生命機會的不平等分配；地位則是指涉社會秩序，亦即是社會聲望的分配 (Weber 1978a: 302-307)。社會評價並不是金錢所能夠購買得到的，作為一種有限的社會資源，它是由少數人透過繼承、教育、生活風格等方式壟斷。社會衝突所圍繞的利益分配問題應該被放置在更廣闊的視野，鬥爭的焦點不只是有形的經濟利益，更是涉及了聲望、道德、生活文化等「精神利益」。因此，「受雇者的階級位置依賴於他們在勞動市場的機會；他們的地位位置依賴於他們在商品市場的位置」(Mills 1951: 241)。地位團體的核心面向即是在於「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亦即不同團體對於特定的報酬與特權的限制，以排除其他團體的分享 (Parkin 1982: 100)。韋伯承認，在當代資本主義中，階級關係是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越來越多優勢階級試圖將其經濟權力轉化為社會聲望，以晉升為某種地位的壟斷者。同時，舊有的地位團體是否能持續其生活風格也受制於經濟能力的左右 (Weber 1978a: 935)。儘管如此，韋伯仍是強調地位差別具有其持續性，並沒有因為政治地位平等化的趨勢而消失，社會聲望的分配仍是少數人的特權。

新韋伯主義者 Parkin 認為，剝削概念被賦與經濟主義的解讀，使得馬克思主義學者忽略了其他非經濟資源的剝削現實。對於 Parkin 而言，社會封閉的邏輯可以擴大來看待。經濟剝削其實是來自於社會封閉的基礎，透過某種制度性的安排，使得某一階級的勞動成果分享被排除 (Parkin 1979: 46)。同樣地，Turner (1988: 63) 認為地位概念仍是具有當代的相關性，因為



追求「文化的、法律的、政治的特權」之地位衝突持續上演中。

在五、六〇年代，韋伯的地位團體理論經常被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參與和支持，其中主要有三種相近的觀點。首先，Lenski (1954) 強調地位體系不只是涉及階層化的不平等，同時也涉及了多面向社會位置安排。他提出地位結晶化 (status crystallization) 的概念，強調個人在財富、職業評價、教育等領域上經常具有一致性，例如低度地位的結晶化就容易培養出自由主義的政治態度。因此，黑人醫生與猶太教授比較願意支持種族平等與社會福利等政策。第二種地位不一致論 (status inconsistency) 的觀點，正好與 Lenski (1954) 相對立，主張個人地位的不一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緊張與相對剝奪感，因此舊中產階級、貧窮白人等群體形成了支持極右翼勢力的社會壓力 (Bell 1960: 103-123; Eitzen 1970; Rush 1967; Lipset and Raab 1978)。最後，第三種理論假定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對於過去封閉性的文化價值產生極大的壓力，若干即將喪失既有特權與優勢聲望的群體有可能採取反對現代化的抗議。因此，地位保衛 (status defense) 成為了極端保守派的共同反應，試圖阻擋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衝擊 (Scott 1985)。

早期的地位政治研究在七〇年代受到很大的批判。在方法論上，地位不一致論根本無法預設集體行動的方向，即集體行動到底是朝向政治自由主義或右翼激進主義，並沒有最後的定論。再者，研究者透過總體資料所建構出來的不一致現象，是否真的對當事者構成相當的心理衝擊，進而引導出集體行動，這仍是一個未獲證明的命題 (Meyer and Hammond 1971: 98)。再其次，後續的研究者發現，就算地位不一致會導致認知不協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等心理緊張，也不必然會產生集體行動。早期的地位政治研究過於依賴心理學的預設，使得他們將集體行動視為純粹的表現性，即個人發洩內心壓力的結果，而未考慮到意識型態的導向 (McAdam 1982: 8, 10-11)。由於這些嚴厲的批判，地位的概念逐漸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消失，學者也不再從地位結構的壟斷性格來分析抗議的起源。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韋伯的地位團體理論已經不再適用社會運動的研究？筆者認為，有鑑於當前文化政治的高度顯著性，許多社會運動的產生，



都是為了重新定義一套生活方式或是價值觀，因此地位的集體爭奪仍是時常可見的現象。事實上，許多中產階級氣息濃厚的社會運動，例如動物保護、禁煙、教育改革等議題，地位的概念仍是具有相當的解釋效力。在此，一個可發展的取向即是避免從不可靠的心理學預設來探討地位政治，而是採取文化分析的途徑，如此一來，地位社會運動的研究將可以被放置在更穩固的方法論基礎上。

(三) 涂爾幹：失範或團結？

1. 涂爾幹作為失範的理論家

對於多數當前的社會運動研究者而言，涂爾幹似乎並不是一個值得借鏡的理論典範。主要的原因在於，涂爾幹被視為是集體行為理論的始祖，因此一旦集體行為理論被社會運動研究者推翻了，涂爾幹的社會學也就跟著垮臺。

首先，許多資源動員論學者將涂爾幹的觀點簡化成解組模型 (breakdown model)，認為集體行動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的崩潰。在涂爾幹的自殺行為研究中，這種觀點似乎可以找到論證的根據。所謂的利己型自殺 (egoistic suicide) 即是起源於社會整合的失敗，使得個人喪失了超越個人層次的關懷，退縮到純粹的自我之中。涂爾幹形容這種狀態的嚴重後果是，個人只剩下了「某種變化不定的幻影，一思考即消失，沒有任何行動的目標」(Durkheim 1951: 213)。相對地，資源動員論者主張團結模型 (solidarity model) 才能夠正確地解釋集體行動的起源，因為社會運動是透過組織網絡進行動員，而不是一群臨時湊合的暴民 (Tilly 1981: 95-108; Useem 1980)。



圖 2-3 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另一方面，集體行為理論也常借助所謂的相對剝奪感 (relative deprivation) 以解釋參與者的動機。根據 Davies (1962) 的說法，相對剝奪感起源於實際回報與預期回報的落差，一旦這個落差在短期間內急劇擴大，革命就容易發生。基於同樣的理由，Huntington (1968: 41) 認定現代化過程是不穩定的。現代化激發出上升的期待，但是執政者卻不一定能夠滿足這些期待，因此，「如果說，窮國看起來是不穩定的，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貧窮的，而是因為他們想要努力成為富有的」。很顯然，涂爾幹所謂的失範型自殺 (anomic suicide) 又提供了這個命題的理論基礎。所謂的失範狀態即是社會約束力的不足，造成個人行為缺乏道德的指引，流為任意的欲望發洩。涂爾幹指出，在現代經濟形態下，個人的財富與生活水準經常出現暴起暴落的現象，因此舊有的道德力量往往無法適時發揮作用，失範型自殺也就跟著出現 (Durkheim 1951: 252)。

涂爾幹曾明確指出，利己型自殺與失範型自殺是晚近以來常見的類型，因為更細緻的社會分工意味著社會整合與約束的減弱。這樣看起來，涂爾幹的確是啟發了後來集體行為理論，將社會運動貶為某種不理性的情緒發洩。然而，這種詮釋是值得存疑，因為它忽略了涂爾幹從未將社會運動與自殺歸屬於同一性質的社會事實，而可以適用同一套的分析方式。涂爾幹指責「無政府主義者、唯美派、神祕主義者、社會主義革命派」，原因並不是在於他們批判社會，而是因為他們只是病態社會的反映，「對於現存秩序的單獨憎恨厭惡，想要摧毀與逃避現實的單獨渴望」(ibid.: 370)。與其說這些現象是集體行動，不如說是個別的心理狀態。因此，主張將偏差行為視為某種集體行動的並不是涂爾幹，而是那些受到結構功能論影響的集體行為理論學者。

2. 涂爾幹作為社會團結的理論家

誠如 Collins (1985: 194) 所指出的，涂爾幹留給後世的學術遺產並不是單一的，而是有兩種支脈，一是探討社會秩序的鉅觀學派，其二則是探討儀式互動的微觀學派。前者的繼承者之一即是結構功能論，因此後人理解



涂爾幹常是透過結構功能論先驅派森思的詮釋，但事實上，涂爾幹的遺產並沒有被結構功能論所完全繼承。另一種運用涂爾幹理論於社會運動研究的方式並不是從《自殺論》出發，而是從《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得到啟發。Tirykian (1988: 44) 曾提到這本著作可以被當成政治社會學來解讀，這也就是說，初民社會建構其神聖性的方式亦即是政治權力的分配法則。Hunt (1988: 39) 亦指出，涂爾幹用來分析初民宗教的概念是有其當代的政治意涵。由於涂爾幹研究的對象是澳洲的土著民族，他們只有簡單的社會形態，因此他傾向於強調宗教的整合功能。但是從更廣大的角度來看，他所謂的神聖性其實也是一種產生「衝突、變遷與暴力的潛在領域」，換言之，宗教信仰建構社會秩序的方式，也是與社會運動形成的過程十分類似。

在涂爾幹的宗教社會學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即是社會團結是如何被維繫，他的解釋即是情緒與儀式。涂爾幹認為，集體情緒 (collective sentiments) 是一種社會事實。在公共的集會中，共同的興奮、憤怒或憐憫就是一種強而有力的社會潮流，驅使個人聽從其使喚 (Durkheim 1982: 52-53)。在分析澳洲土著進行宗教儀式的作品中，涂爾幹提出了「集體亢奮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以解釋為何共同參與的儀式能夠促成團結感。乍看之下，許多初民社會的儀式是沒有意義的，放縱的感官享樂或是肢體殘害，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的理性。但涂爾幹強調，儀式的神奇作用即是在於共同經歷的亢奮情緒，是所有社區成員一起分享的。正是由於這種集體情緒的擴散力，「崇拜的真正功能是喚起崇拜者某種心靈狀態，具有道德的力量與信心」 (Durkheim 1915: 431)。此外，不只正面的情緒狀況能夠促進社會的道德整合，負面的集體悲傷也具有團結人心的作用。在分析原始的追悼儀式時，涂爾幹強調，悲傷的共同表現並不能歸諸於參與者的內心狀態，實際上，悲傷是一種集體責任與義務。面對共同的損失，社會團體更需要一起集會，以產生新的團結能量。因此，「家族如果容許成員死亡卻沒有人哭泣，就是顯示它缺乏道德一致性與內聚力，它不盡其責任、放棄了自身的存在」(ibid.: 446)。簡而言之，對於涂爾幹而言，社會的維繫在於它是個道德共同體，同時也是個「情緒共同體」 (emotional community) (Maffesoli 1996: 9-30)。



涂爾幹指出，任何的宗教都包含了信仰與儀式兩種元素，其共同的作用在於規範世俗與神聖之間的關係。然而，他反對一種「唯心論」的觀點，認為信仰與教義是宗教的最重要核心，而儀式只不過是外顯的後果 (Collins 1982: 32)。從社會功能的分析來看，宗教的作用並不是在於觀念上教導了信徒，而是在於要求所有的教會成員採取共同的行動。涂爾幹指出，某些宗教能減少自殺的傾向，並「不是因為它以一種特有的論述來宣揚對於人格的尊重，而是因為宗教本身就形成了一個社會……能夠維持一個足夠密集的集體生活」(Durkheim 1951: 169)。宗教之所以發揮團結的作用，固然是基於所有成員都有相同的信仰，但是更重要的在於一起進行儀式。宗教的力量「並不只是我們思考而已，更不可或缺的在於我們將自身放置於(宗教的)行動領域」(Durkheim 1915: 464)。從這個角度來看，儀式不只是信仰的外在表現——並不是因為有了信仰，才產生儀式出來；相反地，正是透過了共同參與的儀式，信仰才發揮作用。

涂爾幹並沒有關於集體行動的專門著作，但是這不意謂他的社會學概念無助於這個領域的研究。從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的零散評論中，我們可以整理出一種基於社會團結的集體行動模型。

就大革命的起源而言，涂爾幹認為所謂的「1789年原則」(the principles of 1789)，即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並不只是一種空洞的政治價值。革命理念反映了十八世紀以來社會的某些需要，其本身就應該被視為一種社會事實 (Durkheim 1973: 36)。革命前的法國社會面臨了現代化過程中的雙重壓力：一方面，個體逐漸從機械連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個人的自主性開始成為一種公認的價值，朝向一種所謂的「道德個人主義」；另一方面，當時法國出現了一種民族復興 (national renewal) 的要求，希望能強化國家內部的統一，人際之間的社會交往能夠全面開展，不受到封建主義的特權、等級制度、地方自治等限制。涂爾幹分析盧梭的政治哲學著作，認為他的思想最能體現十八世紀的雙重壓力。一方面，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主張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的，由於個人志願的契約前提，集體生活才能出現。另一方面，盧梭也感受到當時法國對於自我意識的追求。他提出了總意志 (gen-



eral will) 的概念，強調集體生活的最高權威是所有人共同參與的，但是又不能化約為個體意志的總合 (Durkheim 1961: 259)。因此，在涂爾幹觀點中，進行革命的行動主體即是作為一個團體的法國社會。在面對舊體制的衰敗與現代個體化的壓力下，革命成為了重振民族團結的新契機，其目的就在於重建一個新的道德權威，以成為未來集體生活的準則。

法國大革命固然是一種反教會特權的世俗行動，但是涂爾幹強調其本身仍帶有濃厚的宗教性格。革命者公開提倡自由、理性、民族等價值，並且舉行政治慶典與儀式來神聖化這些革命理念。對於涂爾幹而言，這就是一種強化集體團結的社會機制，要求法國公民共同為新生的共和體制慶生，並且分享整個民族復興的情緒。從某些角度來看，法國大革命的節慶與澳洲土著的宗教儀式是十分相近的，都是「社會將自身設定為神明，或是創造神明」(Durkheim 1915: 244)。這即是說，革命運動也需要強化參與者對於共同價值效忠，並且採取公共儀式的方式將革命信仰展現出來。涂爾幹著眼的面向是革命行動如何提振社會團體的團結，如何創造出一個神聖化的法國民族理念，以別於過去分崩離析的舊體制。革命時期的法國要求公民從事無私奉獻、英雄主義、愛國情操，以共同為新生的法國而努力。換句話說，革命作為一種集體行動需要利他主義與道德認同，如此才能展現出龐大的社會力量。

在晚近，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開始轉向涂爾幹，揚棄過去以馬克思主義為主的分析策略，不再只是將研究焦點片面鎖定於階級、經濟利益、革命組織等面向。新的革命史學家重視文化因素、宗教儀式與集體認同，分析這些元素如何建構出集體行動的動力 (Furet 1981; Hunt 1984; Ozouf 1988)。新一代的研究者承繼了這位法國社會學大師的學術關切，並且開展出涂爾幹學派的集體行動研究。同樣地，社會運動研究者也開始反省以往過度理性主義的預設，將情緒、儀式與宗教的元素帶入集體行動的研究 (見第七章)。無疑地，這種「非理性」(non-rational) 的轉向從涂爾幹的社會學中得到更多的啟發。



(四)托克維爾：平等化及其不滿

托克維爾通常並不被認為是社會學的創始者，他沒有提供一幅基本的社會構成圖像。所有被公認為社會學始祖的大師，都需要說明社會學知識是如何以科學的方式來建立與取得，但是托克維爾的著作卻沒有處理這種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問題。儘管如此，托克維爾仍提出一套具有說服力的社會變遷理論，將平等化 (leveling) 視為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其次，在《美國的民主》與《舊制度大革命》兩部重要著作中，托克維爾也開創了比較革命的研究傳統。

對於托克維爾而言，舊體制的最大特色即是維繫身分的不平等，地位的差異展現在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分配。Poggi (1972: 8-9) 認為，等級國家 (Ständestaat) 的概念可以用來理解托克維爾所謂的舊體制。簡單地說，等級國家名義上是由統一的最高統治者統治，但其實際的管理職能卻是由一系列相互重疊的團體所執行，例如行會、城市、教會、大學等團體，都具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不受君王的直接管轄，貴族與教士也享有地位上的種種特權。托克維爾沒有對於傳統社會採取過度浪漫化的想像，因為在舊體制中各種部門之間的利益爭奪也是十分激烈的，所有的等級團體都試圖為自己取得更多的特權，而且不惜以犧牲其他團體為代價。

平等化作為一種社會變遷的趨勢展現於各個不同的領域，托克維爾認為工商業的發達、科學文化的開拓、戰爭形態的演進、各種技術發明、宗教改革等都拉近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 (Tocqueville 1991: 5-7)。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演變成一種強大的歷史潮流，衝擊了傳統社會的等級劃分，民主革命正是起源於這種舊體制與平等化趨勢的矛盾。托克維爾指出，「撇開造成人類社會大動亂的次要原因不談，你幾乎總能看到不平等在這裡作祟。這就是說，不是窮人想奪取富人的財產，就是富人想要束縛窮人」 (ibid.: 799)。換言之，不平等導致了所有社會成員之間的心理怨懟，革命的暴力就在這種不滿的情緒中表現出來。

除了心理面向分析，托克維爾更提供了一套革命的政治分析。就長期



而言，國家權力的集中化逐步消除了君王與人民之間的中介團體，種下了政治不穩定的因子。一旦在人民之上只有國家組織，所有的不滿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發洩的對象 (Tocqueville 1991: 854–857; 1994: 2–4)。每個群體都想要獲得政府的支持，用公權力來維繫他們的權益，因此，一旦他們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了，政府也成為了指控的對象。在此，托克維爾的考察已與 Tilly 所謂的「政治全國化」(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相近，同樣注意到國家形成對於集體行動的形塑。

托克維爾也指出若干造成革命局勢的短期因素，因此可以進一步探討集體行動的時機因素。首先，他提出這樣的觀察，革命是發生於物質生活最繁榮的情境，而不是最不可忍受的時期，「人們耐心地忍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有人出主意要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Tocqueville 1994: 171)。在此，托克維爾實際上已經預示了後來的相對剝奪理論。其次，托克維爾也發現，舊政權也要為革命的產生負責，因為革命並不是由於政府的保守與被動，反而是發生在執政者開始採取改革政策，從而消除了舊體制的社會正當性時。在他看來，路易十六與其大臣的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礙大革命的重重障礙，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樣才能動手進行革命」(ibid.: 181)。如果說統治者可以因為他們自己的需要，修改以往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那麼又是如何讓人民對於既有的政治制度產生信任？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 Skocpol 的比較革命研究，她指出，農業官僚國家的改革政策引發了優勢階級的反抗，因而引發了革命的局勢 (Skocpol 1979: 99)。最後，托克維爾主張，上層階級之間的鬥爭是革命的最重要關鍵，有可能因此間接促成了被排除階級的政治參與。他指出，「貴族有時為了反對王權，有時為了從對手中奪權，而把政治大權交給了人民。更為常見的是，國王為貶抑貴族而讓國內的下屬階級參與了政府」(Tocqueville 1991: 5)。用晚近的術語來說，托克維爾的分析著重集體行動的政治機會，他明確地指出，統治菁英的內鬥有助於革命的產生。總之，基於上述的理由，Tarrow (1996a: 45) 稱托克維爾是「國家與社會運動關連性的第一位現代觀察者」，也因此，其國家中心論 (statist) 的預設成為後來政治



機會研究者的共同出發點。

除了啟發後來的政治過程研究，托克維爾還有一項有趣的觀察。對他而言，真正對政治具有影響力的是平等化與國家集權的趨勢，而不是革命，這兩股潮流固然在某種特定的局勢下促成了革命，但在革命停息之後，仍持續地發揮作用。長遠來看，革命只是整個社會變遷中的一個戲劇性插曲，以巨大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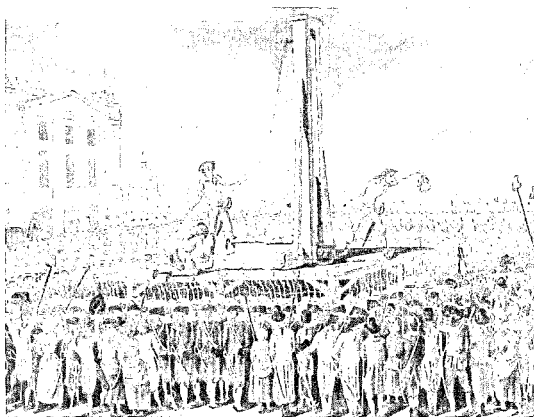


圖 2-4 法國大革命時處死路易十六的情景。

代價與動盪來展現出這兩股力量的動員潛能，但是就其本身而言，革命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托克維爾指出：

即使它（革命）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地會坍塌，這裡早些，那裡晚些；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痠瘁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將需要自身一點一滴、長期間才能成就的事業，在一夕之間完成 (Tocqueville 1994: 29)。

換言之，社會變遷自然有其方向性，革命只是某種急劇暴發的過渡現象。馬克思認為革命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相對地，托克維爾卻主張革命不但不是歷史的火車頭，反而只是歷史的偶然產物。Hirschman (1991: 47-48) 指出，托克維爾的革命分析為反動派提出了「無用論」(futility thesis)，任何的社會改革行動都是徒勞無功的，到頭來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都是非人為的，或者只是反映結構本身的趨勢。在社會運動研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即是如何構思社會變遷與集體行動的關係。社會運動之所以受到注意，因為它經常帶來實際的制度改變，進而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此，托克維爾的革命研究實際上蘊含了一個非革命性的觀點：集體行動是徒勞無



功的；即使它看起來發揮作用，真正的原因仍是在於推動集體行動的歷史力量，而不是集體行動本身。無論如何，托克維爾對於革命的質疑是由後續的研究者所繼承，尤其是那些受到功能論影響的現代化論者，他們也傾向於將集體行動定位為過渡性的、不具有任何的影響力。

三、現代社會學理論

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而言，現代社會學理論也一樣具有高度的啟發性。相較於古典社會學家的歷史處境，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在西方是相對地穩定，因此，將焦點放在現代社會的理論學者較少將革命當成其理論建構的參考座標。儘管如此，上個世紀歐美社會仍見證了幾波廣大的動員風潮，從三〇年代的工潮、六〇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七〇年代的文化抗爭運動，一直到世紀末的反全球化運動。因此，解釋社會運動的興起與作用，也是現代社會學的核心任務之一。在這一節中，筆者將處理結構功能論、微觀社會學、理性選擇、新社會運動等理論，分別討論其對於社會運動研究的影響。

(一)結構功能論

1. 作為系統的社會

結構功能論將社會視為一個行動系統 (action system)，亦即是一套維持穩定的人類社會行動的制度組合。儘管外界的條件不斷地在改變，大部分的生物需要維持身體內部的溫度在一定的範圍內。同樣地，社會也需要保持內部的恆定狀態 (homeostasis)，以適應外在環境的各種變化。為了達成恆定狀態，系統與環境的邊界要保持，系統需要有自我調控的能力，維持比環境更穩定的情境。因此，社會的持續存在是立基於若干前提之上，用功能論的話來說，社會需要滿足若干的功能要件 (functional requisites)。結構功能論者派森思認為，社會必須滿足的功能要件包括適應 (adaptation)、



目標達成 (goal attainment)、整合 (integration)、潛在 (latency) 等四個項目，亦即是說，一個穩定的行動系統需要同時滿足維持與外在環境的互動與交換 (適應)、動員內部的資源以追求某個集體目標 (目標達成)、在不斷地分化過程中保持內部元素的相互關連 (整合)、並維持共同遵守的價值與規範 (潛在)。簡單地說，社會不外乎是一個功能整合與互補的均衡系統。

結構功能論者認為，這些功能要件分別是由不同的行動系統面向所滿足，因此，就分析而言，社會即是由行為有機體 (behavioral organism)、社會系統、人格系統與文化系統所組成。這些功能系統是有階層性的，換言之，上層的系統通常較穩定，而且能夠控制下層的系統。儲存既有的價值與規範的文化系統具有優位性，能夠決定人格養成與互動方式。某個時期內，社會組織的複雜與分化程度都是取決於相應的文化觀念。舉例而言，如果沒有新教徒的工作倫理，家庭與經濟的分化無法獲得道德上的支持，也因此無法進一步制度化。因此，構成社會演化最重要的指標即是價值的普遍化 (value generalization)，或者是說，一套能夠容納更廣大人群的文化規定。就這個意義而言，文化設定了社會演化的步伐，而結構功能論也是某種形式下的文化決定論。

2. 功能論的集體行動觀

派森思試圖整合不同的古典社會學取向，他將涂爾幹的功能分析、韋伯的詮釋社會學、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演化論綜合成為一套新的學說，以解答現代的社會秩序是如何維持。事實上，正是由於對社會秩序問題的關切，結構功能論常忽略社會衝突，以及其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作用。因此，結構功能論學者將集體行動視為社會秩序的否定，社會運動即是價值與規範的喪失、角色整合的失敗、偏差的人格。換言之，普遍的集體行動意味著一種社會的病態，或者說是社會秩序的崩解。更進一步來說，結構功能論學者通常主張下列的三種命題。

第一，集體行動是來自於失敗的社會整合。在結構功能論看來，文化系統的作用在於透過社會化與社會控制的方式，形成可預期的人格與角色



互動。然而，一旦社會化與社會控制的機制失靈了，既有的文化不再能導引行動，反體制的行為就會產生。一般而言，快速的社會變遷會使得社會秩序的維繫更加困難，在舊有價值規範失效的情況下，新的功能替代項又沒有及時形成，社會互動會處於不確定的情境下。因此，在派森思看來，六〇年代的大學生抗議是源自於快速的高等教育擴充，使得校園的社會化機制無法及時發揮作用。派森思認為，高等教育是晚近以來新浮現的人格養成階段，其作用在於使得學生學習認知理性的運用、內化成就動機、接受功能分化的權威，這些社會化成果都是扮演成功的現代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六〇年代的學運展現了校園社會化的失敗，直接挑戰了既有價值：學生要求認知理性要為政治服務，而不是只為了純粹學術研究；他們反對大學教育的菁英性格，主張更全面性的社會參與；他們否定教師的權威，要求校園的民主化 (Parsons and Platt 1970)。簡單地說，派森思認為學生運動是來自於校園體制的危機，使得新進的學生沒有能夠順利接受一套符合當代社會需求的文化觀念。

第二，集體行動反映了心理的緊張。結構功能論學者認為，一旦社會整合失敗了，行動將會缺乏準則依據，脫序違法的行為更容易產生。社會結構的不均衡引發了個人人格的緊張，激發出具有攻擊性的行為出現。Kornhauser (1959) 主張，社會的現代化迅速地拆解了舊有的社會連繫，新的穩定社會關係卻是很緩慢地建立。現代化促成了群眾社會 (mass society) 的現象，個人呈現高度的原子化 (atomized) 狀態，不再被整合進入某個社會組織。因此，原子化的心理後果即是高度的焦慮與疏離感，也因此提供了參與極權主義運動的動機。派森思也以同樣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法西斯主義會在現代社會興起。他強調法西斯主義其實是一種群眾運動，而不只是某些少數菁英的陰謀。在派森思看來，工業化與現代經濟生活的不穩定導致了人格結構的緊張，這種心理不安全感無法被社會整合機制所吸收，從而導致了極端政治行為的產生 (Parsons 1954: 124-129)。

第三，集體行動是過渡性的，不會帶來新的社會演化。結構功能論認為，社會演化是表現在更複雜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更高層次的文化整合。



整個社會變遷過程是有方向性的，亦即是朝向更分化、適應力更強的目標前進。結構功能論主張，這種過程並不是人為的、或有意識的，而是社會演化邏輯的直接後果。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將社會抗爭視為孕育下一個社會形態的生產陣痛，也是社會發展必經的道路，那麼結構功能論則把社會抗爭看成疾病所導致的呻吟^①。就如病人的呻吟是為了避免痛苦，而不是治療疾病的方法，結構功能論也認為社會抗爭是無助於社會演化的。因此，集體行動本身是一種偏差行為，一旦違背了社會的常規，這些作為通常只是短暫的失序現象，不可能對整個社會體制產生重大的影響。Smelser 對於十九世紀英國棉織工人的抗爭研究就反映了這種觀點，他基本上認為，工人的不滿是反映工業化過程中家庭與經濟的分離，這個過程使得工人離開傳統的家戶生產，進入現代的工廠體制。在一開始，傳統工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結構分化，他們仍懷念以往的經濟體制。因此，Smelser 強調，早期工人的抗爭只不過是心理不適應所產生的幻想、攻擊與焦慮，「只有在這些爆炸性的元素被控制住之後」，更積極的社會分化與演進才是有可能的 (Smelser 1959: 406)。同樣地，派森思認為六〇年代的新左派抗議，並不能否定美國是最先進的社會演化模式。在他看來，民權運動所要求的種族平等、學生運動要求的自由，都符合美國的主流文化，這些運動只不過是以美國的價值來挑戰美國的現實，因此，爭議的焦點只是在於社會制度的改良幅度是否合理 (Parsons 1991: 260–261)。這也意味著，這些社會抗爭只是暫時的現象，不會導致革命性的變遷。

綜合上述的說明，結構功能論提供了許多觀念素材，可用來強化集體行為理論的看法。在五、六〇年代，這曾經是主流社會學界的共同立場。無疑地，這套觀點帶有保守主義的偏見，社會運動被視為社會不均衡的反映，無法帶來新的社會秩序；它是來自於病態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理性思考或是價值追求。隨著集體行為論在社會運動研究的沒落，以及結構功能論在社會學理論界的失勢，大部分的學者已經不再採信這種解釋方式。可

① 事實上，將階級鬥爭視為社會病態的表現，而不是社會發展必然的代價，是來自於涂爾幹 (Durkheim 1958: 7)。



以這樣說，興起於七〇年代的資源動員論，最大的貢獻即是推翻了結構功能論對於集體行動的解釋。饒富趣味的是，儘管結構功能論在學界中失寵了，但是這套理論的論點卻常出現在許多指責社會抗爭的政府官員言論中。政府官員不是常說群眾抗爭是盲目無知的，只是製造無謂的社會成本？就這一點而言，結構功能論儘管有深奧的理論基礎，但它對於集體行動的看法，仍是反映了保守派對於社會抗議的反感。

Johnson (1966) 注意到這些問題，因此試圖將衝突論與結構功能論接合，提出一套革命的解釋途徑。基本上，他認為革命是產生於社會不均衡狀態 (social disequilibrium)，即價值體系與分工體系不再一致，因此秩序的維持越來越依靠純粹的武力，而不是正當的權力運作。Johnson (1966: 34) 強調，社會秩序維持並不是只憑藉著派森思所謂的規範共識，而是有必然的強制性。換言之，共同的文化觀念固然可以有助於政治安定，國家的武力威脅仍是必要的手段。另一方面，結構功能論也不當地將社會衝突視為社會化的失敗，將社會抗爭當成為偏差行為。事實上，社會系統需要不斷地適應環境，進行生產活動，這些物質資源的分配本身就on容易引發社會衝突 (ibid.: 35-36)。從這個角度來看，革命行動即是一種重新調合 (resynchronize) 價值體系與分工體系的努力，試圖建立一套新的社會均衡。如此一來，Johnson 雖然仍維持功能論的語言，但是他的分析架構其實已經是接近了馬克思主義。結構功能論認為社會抗爭來自失敗的社會整合與心理緊張，相對地，Johnson 則認為社會系統有可能陷入內部矛盾，而革命行動也是一種理性的行動。就這個意義而言，Johnson 的研究結論已經超出結構功能論。

(二) 微觀社會學

微觀社會學所關切的焦點是社會互動，亦即是由自我與他人所共同面對的種種社會情境。他人其實也是另一個自我 (alter ego)，同樣具有自我意識，能夠進行意義的生產與接受的活動。鉅觀社會學理論（例如結構功能論或馬克思主義）通常將某種穩定的社會結構（例如文化系統或生產方式）



視為社會秩序的保障；相對於此，微觀社會學家主張，個別的社會行動者具有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能力。在他們看來，社會生活不外乎是一系列的情境互動，參與者具有創意與反思性，因為他們總是能夠隨時開啟一個新的情境，或是改變原有的情境。事實上，社會情境的多樣性與可變性也證明了行動者的自主性，他們並不是 Harold Garfinkel 所謂的文化笨蛋 (cultural dupe)，只是被既有的文化觀念所束縛。

微觀社會學家重視意義與文化的面向，因為任何社會情境都是建立在參與者相互理解的前提下。如果沒有這些必要的相互分享知識，或者說是 W. I. Thomas 所謂的情境定義 (definition of situation) (註釋)，那麼社會生活就不可能產生。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搶匪沒有威脅到受害者，使他們感到真實的恐懼，任何搶劫都不可能成功。但是儘管暴力元素是需要的，搶匪也需要與他們的受害者建立共享的情境定義，讓後者知道這是一個搶劫的現場，也因此才意識到自己所受到的威脅。換言之，威脅具有高度的強制性，但是也同樣涉及了意義的共享。可以想見，如果搶匪無法有效地傳遞自己的訊息，受害者也不會知道自己的處境，他們有可能採取各式各樣的順從或抵抗反應，但是絕對不會乖乖地繳出自己的錢包。

就理論脈絡而言，微觀社會學包括了符號互動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會現象學 (social phenomenology)、俗民方法論 (ethnomethodology)、社會戲劇學 (social dramaturgy) 等。儘管這些理論各有不同的哲學預設，他們的實質論點卻有相當程度的重疊。總體來說，這些理論都相信情境的重要性、行動者的自主性、意義的必要性，也因此共同挑戰了五、六〇年代當道的結構功能論。更重要地，他們都將人際互動視為最首要的考察對象，彌補了傳統社會學理論對於鉅觀的結構與組織之偏好，進而開創出新的研究問題。

儘管如此，最初微觀社會學者都不關切社會運動現象。無論是符號互動論的 Charles Horton Cooley、George Herbert Mead，社會學現象學的 Alfred Schultz、Thomas Luckmann，俗民方法論的 Garfinkel、Aaron Cicourel，社會戲劇學的 Erving Goffman 等人，都沒有分析社會運動的作品。有兩個



理由可以解釋這個現象。首先，從馬克思到結構功能論，集體行動都是被放在社會變遷的角度來審視；然而，早期的微觀社會學者缺乏歷史視野，他們傾向於將自己所觀察的日常社會生活去脈絡化，視為某種普遍性的、無時間的基本現象。舉例而言，Schultz and Luckmann (1973: 3) 如此定義他們研究的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在常識態度中，清醒且正常的成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實領域」。換言之，微觀社會學者與他們所要挑戰的結構功能論一樣，都假定某種常態的社會秩序是普遍的與穩定的，不受到歷史變遷所影響。如此一來，這種消毒過後的日常生活觀當然沒有不滿與怨恨，也不可能在其中發現集體行動的痕跡。事實上，日常生活的研究並不必然排斥歷史，Henri Lefebvre 即是著名的例子。Lefebvre (1984) 的歷史分析指出，當代的生活之所以展現出平常無奇、散文式 (prosaic) 的風格，是一種現代性的現象，也是商品經濟與官僚化的總合後果，使得日常生活呈現高度的例行化。

微觀社會學者忽略集體行動的第二個理由在於缺乏權力的視野。在 Goffman 的細膩觀察下，日常生活即是一連串的即興表演，自我總是戴著各種不同的面具與其他人互動。無疑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Goffman 1959) 有許多深刻的觀察，但是在他所舉出的諸多例子中，例如售貨小姐稱讚顧客的服飾選擇，中產階級在訪客來訪前清掃家庭等，都是涉及了社會支配與其所引發的適應或是抵抗。很顯然，Goffman 的理論興趣在於理解行動者如何掌握這些微妙的互動規則，換言之，權力與抵抗被視為既定的，權力所造成的社會互動扭曲也是不需要討論的。

同樣地，Garfinkel (1967) 提出了著名的（或者是說惡名昭彰的）破壞性實驗 (breaching experiment)，他要求學生特意採取一些非預期的舉止，使得互動的另一方感到錯愕、不知所措。這種實驗的目的在於證明兩點：第一，社會互動是在一些未明言的背景預設之下所進行的，第二，一旦互動情境變得不確定，行動者有能力進行解釋，自行填補新的背景預設。然而，Garfinkel 所沒有討論的是，破壞性實驗經常挑戰了權力的日常運作，引發社會支配的局部危機。就以他自己的例子來說明，Garfinkel 要求柏克萊的



社會學系學生在家用餐時，完全遵照餐桌禮儀，保持拘謹的應對進退。可以預期地，這樣的舉動引發家長的憤怒與不解，他們認為自己的小孩彷彿將他們當成外人。家長們提出了各種的可能解釋，他們的子女有可能是生病了，心情不好，但是他們當然沒有猜到這是一個社會學的家庭作業。Garfinkel 關心的是人們如何有技巧地使用這些背景預設，但他忽略了種種的社會支配結構如何定義了這些背景預設，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迫使所有參與者都要服從這一套規則。因此，破壞性實驗不只是蓄意違背了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預設，也衝擊到社會支配結構的規則；意即，將父母視為外人，也挑戰了既有的家長權威。

因此，由於缺乏歷史視野與權力關照，早期微觀社會學並沒有分析集體行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微觀社會學者所開發出來的概念不能進一步被運用，甚至是彌補既有研究途徑之不足。事實上，以往的古典社會學理論與結構功能論對於社會運動的解釋，都是採取鉅觀結構取向，缺乏人際互動層次的分析。一旦要描述結構對於個體的影響時，許多研究者自然而然採取化約論的立場，無論是心理學化約論（結構矛盾導致心理緊張），或是經濟化約論（階級結構決定階級意識）。不過，即使有此瑕疵，微觀社會學理論對社會運動研究仍十分有助益。

接下來，本小節將要處理三種受到微觀社會學所啟發的分析途徑。

1. 新興規範論

首先是所謂的新興規範論 (theory of emergent norm)。根據符號互動論主張，人類是使用有意義的符號互動。透過這些符號的表達與理解，社會行動才具有意義的導向。Turner and Killian (1957) 將這個符號互動論的命題應用於集體行為的研究。他們認為，所有的群體行為可以區分為有固定規則可遵循的組織行為，以及依賴於新興規範的集體行為 (ibid.: 12)。所謂的新興規範，是指一種能引導群眾的依據，其作用在於取代了原先日常生活的互動規範，能夠在緊急的情況下提供行動參考。從規範的角度來看，集體行為不必然非理性的、情緒性的，因為即使是處於非常態的狀態下，



群眾行為仍是受到規範的引導 (ibid.: 16)。Turner and Killian (1957) 認為，集體行為的集結即是新興規範的結晶化過程。在一開始，突如其來的危機使得原有的情境定義失效，既有的規範無法再充當行動的指引。個體的反應充滿了焦躁不安，缺乏安全感，謠言與各種情緒傳染是這個時期的特色。到了後來，新的情境定義逐漸浮現，群眾的內部凝聚力受到強化，共同的規範也開始要求成員採取一致性的行動。新興規範的最極致發展則是符號化 (symbolization)，某個對象被視為集體不滿的具體代表，因此能夠激發出強烈的動員能量，因此，一旦巴斯底 (Bastille) 監獄成為法國王權壓迫的象徵，也就成為革命群眾攻擊的目標 (ibid.: 122)。

2. 抵抗、社會運動的戲劇學模型

其次，儘管 Goffman 本人對於政治權力缺乏分析，他的戲劇學模型仍可以用來理解集體行動如何從既有的支配情境中產生。Benford (1992) 指出，社會支配必然意味著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角色區隔，因此，社會抗議的出現也就代表被支配者開始學習一種新的角色，並且要求改變原有的互動規則。Gamson (1985) 在一篇評論性的文章就提到，Goffman 的理論遺產具有政治社會學意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微觀動員與反對意識的形成過程。

Scott (1990) 即是這種戲劇學分析的最佳代表，他的細膩分析挑戰了我們對於支配的素樸理解。就如同 Goffman 所指出，社會表演涉及了公開的前臺 (front stage) 與看不見的后臺 (back stage)，Scott (1990) 強調任何社會支配也具有兩面性：在支配者視線所及的範圍，被支配者被迫表現出恭敬臣服的樣子；然而一旦處於支配者所看不見的角落，被支配者卻採取隱蔽腳本 (hidden transcript) 的策略，試圖避免更多損失，或是為自己贏得更自由的空間。Scott (1990: 18) 認為，統治者通常相信從屬者的公開表演，以為這即是現存的社會秩序，也是應有的社會關係。但是他們忽略了從屬者無所不在的日常抵抗，不斷地在私底下挑戰支配體制的極限。因此，一旦研究者缺乏戲劇學的視野，誤將語言行為上的順從當成由衷的心悅誠服，那麼也等於是犯了與統治者一樣的盲點。因此，社會抗議的出現不應該被



視為不滿的突然爆發，而是以往被隱藏的日常抵抗公然登上舞臺，低下階級對於權威的嘲弄、對於規則的違背不再躲躲藏藏，而且受到鼓勵與讚賞。也因此，社會研究者與統治菁英常誤以為抗議風潮是突如其來的、無法解釋的，原因正在於他們忽略了原先就普遍存在的日常抵抗 (ibid.: 224)。

在 Gusfield (1963, 1981) 的著作中，社會戲劇學的模型被用來解釋涉及文化鬥爭的集體行動。他以新韋伯主義的地位政治觀點研究美國禁酒運動，亦即是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由舊中產階級與教會人士所發起的運動，曾經在一段期間內使得美國境內的酒精製造、販售與使用成為非法的行為。Gusfield 指出支持禁酒運動的社會群體是來自於面臨地位危機的鄉村舊中產階級，試圖提倡保守的文化觀念，來維持自身的道德優越性。然而，Gusfield 不採取以往新韋伯學者的心理化約論，認為這種抗議是來自於不平衡心理狀態。Gusfield (1963: 19) 將這一類型的抗議稱為表現性運動 (expressive movement)，因為它不涉及直接的物質利益，而是攸關社會聲望的重分配。事實上，禁酒作為一種文化議題是具有高度的符號性意義，飲酒的普及化衝擊了舊美國的世界觀與統治秩序，使得遵守傳統道德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受到挑戰。因此，禁止酒精的製造與販賣 (Gusfield 1963: 166–169)，或是禁止酒後駕車 (Gusfield 1981: 175–181)，都是一種高度表演性格的社會運動，目的在於肯定某一套的文化價值，維持某個群體的社會聲望。

3. 社會運動的建構論

微觀社會學重視意義的人為性格，而不是將其視為某種本質結構的反映。晚近以來，學者也開始注意社會運動如何創造新的意義，而不再將集體行動視為某種深層心態或意識型態的直接後果。這些研究經常宣稱採取社會建構論的理論取向 (Johnston, Laraña and Gusfield 1994; Johnston and Klandermans 1995)，但是就社會學理論史而言，他們往往是借用了微觀社會學的若干洞見，並且試著將其運用於社會運動的分析。Gamson (1992) 分析日常會話中的公共輿論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Gamson 指出，一般民眾並不是盲目地接受媒體所告知的訊息，相反地，他們會加上自己的經驗與俗



民智慧，形成個人能夠接受的意見。事實上，即使是同一個議題也可能具有多種的詮釋可能，或者說是同時適用於不同的主題 (themes)。Gamson (1992: 163-164) 進一步發現，議題的親近性 (proximity) 並非取決於它是否直接涉及物質利益，而在於當事者是否能梳理出一套整合的詮釋策略，儘可能地將所有已知的事物放在共同的觀點下。Gamson 認為，一旦當事者的認知開始具有不義、行動者與認同等三個必要元素，亦即是說，他們認為現狀是不符合正義的標準，察覺到共同的努力能夠帶來改變，彼此之間具有相同的想法，那麼參與社會運動的政治意識即是成熟。此外，微觀社會學的另一項啟發即是 Goffman (1974) 的框架 (frame) 概念。框架是指行動者所採取的一套觀看方式，用來釐清他們所處的社會情境。在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中，框架成為十分重要的基本詞彙，第六章將要專門討論這個概念的內容。

總之，微觀社會學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理論參與，尤其是對於分析人際互動與意義建構層次上的集體行動。如今新興規範論儘管顯得過時了，其他的微觀社會學研究取向對於社會運動仍具有相當的分析洞見。

(三) 理性選擇理論

1. 利益與理性

在古典社會學興起之前，功利主義是解釋社會學現象的主要學說。經濟學家強調，物質資源的稀缺性 (scarcity) 是構成社會生活的前提。人們的欲望與需求總是超越了當下的狀態，意圖追求更多的滿足。但是稀缺性並不會導致社會解體，因為個體是理性的，能夠認知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並且採取相應的行動。經由神奇的市場機制，個體的利益與群體的利益達成調解，社會秩序也獲得了保障。誠如 Turner and Rojek (2001) 所指出的，社會學的傳統並不是以稀缺性為出發點，古典社會學家重視社會團結 (solidarity) 的問題，試圖解釋人類如何透過各種文化的力量，來建構共同體的認同。功利主義的解釋途徑一向不是社會學的主流，甚至可以說，古典社



會學學說都是建立在反功利主義的前提之上 (Nisbet 1966)。這即是說，幾乎早期的社會學都認為自利動機是無法解釋社會生活的起源。因此，社會契約論主張社會的出現是來自於個體之間的協調，相對於此，涂爾幹強調契約的非契約基礎；韋伯強調工具理性行動只是諸多行動類型之一；在馬克思看來，各個階級的自利行動將導致社會革命，而不是穩定的秩序。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社會學，功利主義卻獲得了可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社會學的解釋必須是簡約而有條理的，社會學的研究是需要累積性的，而不是不斷地進行各種理論典範的革命。理性選擇理論開始在各種研究領域流行，試圖將各種社會現象解釋成為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根據 Boudon (2003: 3-4) 的整理，這一套理論是建立在以下的諸多預設：

(1)個體主義：社會現象是個體決定、行動、態度的後果。

(2)理解：行動是可以被理解的。

(3)理性：行動是來自於個體心中的理由。

(4)結果論 (consequentialism)：理由是來自於行動者對於其行動結果的預測。

(5)利己主義：行動者只關心行動對於他們自身的後果。

(6)極大化：行動者能夠分辨不同行動路線的成本效益，並且選擇最理想的平衡。

這些預設都符合古典的功利主義模型。然而理性選擇理論學者卻揚棄了「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 的假定，承認個體的理性行為有可能帶來集體不理性，而非總是處於一種最理想的狀態。Hardin (1968) 以著名的「共有地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的觀念來說明這個現象。他提出這樣的寓言故事：在一個享有共同草地的村落中，每個牧羊人極大化個人利益的方式即是儘可能地飼養更多的羊群，增加自己的收入。因為共同草地是免費的，也沒有公共權威分配個別牧羊人的使用權限，因此，不善用牧草或是飼養很少的羊群，等於是將自己的權利奉送給其他人。在這個情況下，每個牧羊人都會增加自己的牧草使用，集體作用的結果卻是過度放牧，導



致共有地的破壞，所有的羊群無草可吃。因此，十分諷刺地，個別牧羊人的理性計算，卻引發了不理性的共同損失。

在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中，奧森的著作 (Olson 1965) 代表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他之前，研究者認為集體行動極容易發生，因為現代化的過程解除了舊有的約束，而新的規範卻仍未產生，在這種情況下，自我利益的追求往往導致了脫軌的行為。早先的研究者著眼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社會衝突，尤其是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於自由民主體制的衝擊，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被視為艱鉅的任務，反之，社會運動則是普遍的現象。在奧森之後，我們對於集體行動的圖像徹底地改變了。後續的研究者開始了解，群眾不滿、受挫經驗、民怨 (grievance)、未實現的期待、相對剝奪感等現象，不一定能導致抗議行為的產生。事實上，面對不利的生命機會分配，大多數的人民仍是選擇了默默承受，而不是挺身而出。集體行動並不是自然而然的現象，社會控制的力量遠比想像中更為強大。因此，一旦社會運動果真形成了，研究者的任務則是在於尋找另一股外來的社會力，解釋為它為何能夠成功地抵消社會秩序的保守力量，使得民眾採取體制外的抗爭行為。

基本上來說，奧森是採取功利主義的理論預設，認為社會行動是源自於個人利益的追求。但是他並不同意這種解釋可以適用於集體行動，也就是說，共同的行動是直接來自追求共同的利益。相反地，「理性、自利的個人不會為了共同的或團體的利益而採取行動」(Olson 1965: 2)，因為集體行動所追求的公共財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無法排除沒有付出代價者的享用。

奧森的論證策略是將利益計算的邏輯推演至極致。因為參與共同的行動是需要花費代價的，所以參與或不參與的決定就是涉及了個人的成本效益分析。在通常的情況下，參與所要付出的代價是遠大於所獲得的成果，因此，不參與成為一種正常而符合理性期待的結果。其次，團體規模 (group size)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奧森認為，適用於小團體的情況並不適用大團體，數量的差異導致了性質的差異。凡是更多人所共同面對的利益，越是難以協調出一致的行動。在規模越大的團體中，個體能從集體財中所獲得的好



處越少，因而越不願意參與集體行動，因此，大規模團體的集體財供給是沒有效率的，或是次佳狀態 (suboptimality) (ibid.: 29)。在小團體中，成員可以容易地協調與聯繫，產生一致的共識；反之，大團體共識的成形是更為形式化的，更需要花成本溝通。因此，團體規模越大，組織的成本就越大 (ibid.: 46-7)。如此就產生了搭便車 (free rider) 的現象，進一步使得其他成員不想要貢獻自己的力量，共同的利益更難找到的支持者。

2. 集體行動作為一種囚犯兩難

賽局理論 (game theory) 的學者 (例如 Hardin (1995))，試圖以傳統的囚犯兩難 (prisoners' dilemma) 來解釋集體行動的困境。典型的囚犯兩難可用下列的表格來呈現：

表 2-1 古典的囚犯兩難

		乙	
		不認罪	認罪
甲	不認罪	甲被判 1 年，乙被判 1 年	甲被判 5 年，乙被判 0 年
	認罪	甲被判 0 年，乙被判 5 年	甲被判 3 年，乙被判 3 年

囚犯兩難的模型是假設兩位嫌疑犯被逮捕之後，隔離審訊下所面臨的抉擇。由於缺乏其他證據，兩位嫌疑犯的口供將成為判決的唯一依據。基本上，每個嫌疑犯只有認罪或不認罪的兩種可能，無論是選擇了那一種情況，他們的命運卻取決於另外一位難友的決定而定。換言之，個體的選擇是獨立的，但是集體的後果卻是相互依賴的。如果甲不認罪，而且乙也不認罪，那麼甲乙都將被判 1 年；但是如果乙卻選擇了認罪，他即是所謂的污點證人，享有「窩裡反」的保障，因此乙將會被判無罪，甲則因為缺乏悔意被判更嚴厲的 5 年。如果甲的選擇是認罪，而乙也是認罪，兩人都將會被判 3 年；如果乙是選擇不認罪，那麼則該由甲享受「窩裡反」的好處。

在這種情況下，甲乙兩人如果能夠相信兄弟義氣，共同矢口否認，那麼最後的結果將會是對於集體最有利的情況。然而，問題正在於如果其中



有一人招了，那麼不認罪的傢伙就倒楣了。儘管甲乙兩人的平時私交甚篤，他們注意到這個現實，可以出賣對方以獲得對自己更有利的結局。對於甲、乙而言，他們都有理由猜測對方會選擇認罪的策略，認為對方想要當污點證人。因此，理性選擇論主張，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認罪，也就是右下角的格子。如此一來，甲乙兩人選擇的共同結果，亦即是合計 6 年，並不是對於集體而言最有利的結局。

古典的囚犯兩難也可以用來解釋集體行動的困境。同樣地，甲、乙的決定都是各自獨立的，無法預知對方的意圖。然而，奧森的理論改變了整個賽局的參數設定。參與是要付出代價的，因此，成功集體行動的淨回報等於新獲得的福利減去付出的成本。在此，我們假設成功的集體行動所帶來的集體財是 10 單位，甲乙兩人將分別獲得 5 單位的好處。參與所要花費的總成本是 6 單位，有可能是一人支付 6 單位，或者是兩人各付出 3 單位。如果甲乙兩人都一起參與，兩人將分別獲得 2 單位淨回報；如果甲不參與，只有乙一個人獨立負擔，那麼甲將不勞而獲得 5 單位，而乙所得到的（5 單位）卻是少於他所支付的成本（6 單位），因此他的回報是 -1 單位。如果甲乙都沒有參與，那麼兩人沒有付出，也沒有收穫。下表是呈現甲乙兩人面臨是否要參與集體行動時所面臨的抉擇：

表 2-2 作為囚犯兩難的集體行動

		乙	
		參與	不參與
甲	參與	甲得 2 單位，乙得 2 單位	甲得 -1 單位，乙得 5 單位
	不參與	甲得 5 單位，乙得 -1 單位	甲得 0 單位，乙得 0 單位

對於甲個人而言，最佳的情況是搭便車，即是由乙完全來貢獻參與的成本，自己卻不參與。即使甲有心想要參與，他心中也有可能猜想乙想要搭便車，如果這樣的話，結果將會是犧牲了自己，照亮了別人。綜合來說，個體理性的考慮導致了右下角的結果，亦即是一種次佳狀態，而不是左上角的情境。換言之，集體行動是不太可能從自利的動機產生。



因此，以理性自利的原則出發，奧森挑戰了素樸的常識觀點，他不認為團體利益是來自於個人利益的累積，因此，集體行動的出現是困難與少見的現象。個人的理性計算也往往導致集體的不理性結果，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將個人的自利行動導向集體的福祉提升，自家各掃門前雪的結果，就是忽略了公益。面對這種集體行動的困境，奧森也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他指出，在一些沒有組織代表的潛在團體 (latent group) 之中，可以透過強制入會與選擇性誘因 (selective incentive) 的方式，來化解這項難題 (Olson 1965: 134)。強制的手段將成本分擔轉化為無法逃避的義務，剝奪了群體成員的選擇權利。所謂的選擇性誘因是貢獻者才能獨享的好處，而不像是集體財那樣，無法具有區辨性。奧森分析美國工會的實際運作，他指出有強大議價能力的工會通常是強制性地要求成員加入，貢獻其應繳納的會費。工會也常舉行一些聚餐、出遊等活動，為會員謀取其他方面的福利。很顯然，這種解決方法仍是因循個人自利的邏輯，增加個人參與的收穫或是不參與所面對的代價，以提升基層的參與比率。然而，這些符合個體理性計算的解答仍有其侷限，只適用於相對較為制度化的壓力團體，因為他們可輕易達成強制入會與提供選擇性誘因，對於社會運動而言則不盡然。誠如學者所指出的，「與企業界、社交俱樂部、黑手黨等相比較，社會運動組織在提供選擇性誘因方面是處於競爭的不利位置」(Fireman and Gamson 1979: 12)。社會運動組織本身就是一種志願結社，而且是代表弱勢、被邊緣化的利益，又如何可能採取這樣的策略？因此，強制與選擇性誘因都不是可行的社會運動策略。

3. 奧森困境的解決

奧森從功利主義的前提，推論出集體行動困境的結論。如果他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社會運動應該是很不容易產生的，但是六〇年代當時盛行的種種社會抗議卻很難令人接受這種說法。Hirschman (1982: 78-79) 很諷刺地指出，奧森之所以受到重視，原因在於他所談論的事是被當時的社會現實所否定的。因此，一旦社會抗議的風潮減弱，人們又從他的作品獲得



令人安慰的解答，六〇年代的社會運動彷彿原本就不應該發生。可以這樣說，奧森的理論引發了一系列社會運動研究學者的辯論，試圖解答奧森所遺留下的難題。大致上來說，後續的討論主要有兩種形態。第一種回應是完全拒絕奧森的理論，認為理性選擇的模式過度簡化了社會運動的參與。第二種策略則是接受奧森的前提，但是修正其中的若干假設，以解釋集體行動的出現。

首先，許多學者無法接受奧森的功利主義假設，他們認為個人自利並不是促成運動參與的主要動機 (Fireman and Gamson 1979; Ferree 1992)。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主張，當代主要的社會抗議並不是為了要求重分配利益，而是為了建立新的文化價值。因此，非物質性的認同建構才是社會運動的主要動力 (見第三章)。情緒社會學者注重社會生活中的非認知性元素。在他們看來，社會運動的出現與其說是利益的匯集，不如說是自尊、驕傲、憤怒等積極性情感的動員 (見第七章)。此外，學者也提出了團結誘因 (collective incentive) 的概念。在強烈整合的社群之中，成員會將自己的集體參與視為報酬，而不是一種要承受的代價 (McAdam 1982: 45-46)。Hirschman 更進一步主張，公共參與本身有時就是一種樂趣，能帶來心靈的滿足與自我的充實，因此不能算是成本 (Hirschman 1982: 89)。簡單地說，這些解答拒絕了奧森的集體行動圖像，他們共同認為理性選擇是一種錯誤的理論導引，無助於分析社會運動的起源。

其次，即使在理性選擇的理論典範下，許多研究者也沒有接受奧森的悲觀結論，他們承認在自利前提下，集體行動仍有可能產生。就這一點而言，Lichbach (1994) 提供了十分有意義的分析整理。在 Lichbach 看來，既有研究文獻至少有 24 種解決奧森難題的方式，可以大致歸類為四大取向類型。首先，市場取向的途徑假定真實的社會存在是個體，社會秩序是未經設計的 (unplanned)，而是來自於個體交易行動的後果。市場取向的解答包括增加福利、減少成本、增加成功的機率、使用對於成本的資訊不足等，以提升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動機。其次，社區取向的途徑主張超越個體層次的社會存在，但是同樣認為社會秩序是自然的，而不是人為的後果。因



此，透過共有知識確保共同的參與、訴求共同價值以克服個體的自利，是符合社區取向的解答。第三，契約取向的途徑接受個體主義的本體論預設，但是認為社會秩序是人為的，亦即是共同約定的後果，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契約取向的解答認為個體可以透過共同協商，來確保每個人都貢獻自己的心力，其方式包括自治組織、交換與相互協定。最後，層級的觀念強調社會組織對於個體的優位性，而社會秩序是來自於人為的建立。層級取向的解決方式包括外來的動員者、重新組織個體、強制加諸協定、監督背叛者等。

Lichbach 的分析綜合指出許多值得參考的面向。首先，奧森所指認出的集體行動困境並不是無法克服的障礙，同樣是理性選擇的學者指出了諸多的解答方式。其次，沒有一種解答是萬靈丹。Lichbach (1994: 23) 指出，每一種取向事先預設了其他取向的解答。就理論而言，契約的存在條件在於市場，否則交易的個體無法取得相互的彼此同意。同樣的，穩定的市場交易則是需要社區的共同價值與階層的強制力。總結來說，建構社會秩序與集體行動的知識圖像是需要多種的觀念性元素。就實際的經驗事實而言，現實的社會運動總是成功地動用了各種解決途徑的綜合，領導者會試圖訴求共同價值，建立組織，強調不參與的嚴重後果 (ibid.: 25-26)。因此，從 Lichbach 的討論可以有這樣的結論：集體行動的理性選擇分析是可以與制度分析、文化分析形成某種的互補，而不是完全對立的。

最後，除了上述的兩種探討方式，理性選擇派的學者也激發出有趣的內部辯論，其爭議焦點即在於什麼才是理性選擇理論？Muller and Opp (1986) 分析美國與德國的社會運動參與調查，他們主張社會抗議的參與動機無法用私人利益來解釋。他們發現，追求公共利益是比較重要的誘因，而且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參與抗議的個體計算。換言之，許多社會運動參與者都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決策是著眼於更廣大的群體利益，而不只是自己本身而已。這種基於價值理念的考慮也可以成為軟性誘因 (soft incentive)，能夠用來解答許多並非直接涉及參與者本身利益的社會運動，例如和平運動 (Opp 1986)。不過，1987 年 Klosko 在《美國政治學評論》挑起辯論，他



強調，即使 Muller and Opp (1986) 的經驗推論是有效的，其理論前提與研究結論也是不合理性選擇理論的。理性選擇理論主張，正是因為每一個個體對於集體行動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個體的理性考慮才會導致搭便車現象，如果 Muller and Opp 的受訪者認為他們自己個人貢獻是有影響力的，而且是符合成本效用的計算，那麼他們的社會運動參與並不是理性的選擇，而是錯誤的認知，也不符合自我利益。Muller and Opp 在回應中指出，Klosko 的質疑只涉及了定義性的問題，亦即是關切公眾利益是否可以算是一種自我利益。事實上，理性選擇理論並不需要採取狹義的自利判準，只要行動者所採取的手段（參與社會抗議）與目的（關切公眾利益）一致，那麼就可以承認他們是理性的（見 Klosko, Muller and Opp 1987）。

Klosko 是站在正統理性選擇的立場，採取嚴格理論預設，拒絕 Muller and Opp 的研究結論；Muller and Opp 則認為如果理性選擇不能採取更寬鬆的理性與利益定義，將無法解釋集體行動的現象。他們主張需要承認這種可能性，個體有可能將群體利益視為最首要考慮，並且因此採取相應的行動。另一方面，Oliver (1984) 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Muller and Opp 的論點。在一項美國社區運動的調查中，她發現積極參與者通常抱持比較悲觀的看法，認為一般大眾都比較自私，因此更需要少數人的主動投入。這也就是說，搭便車的現象有可能被反省與被批判，至少對於某種積極參與者而言。在某些情況下，搭便車不但不是集體行動的障礙，反而會激發出更強烈的參與意志。因此，Muller and Opp (1986) 與 Oliver (1984) 都指出了反思性自我的重要性。正統的理性選擇主張，個體會設想他人的搭便車心態因此拒絕參與；但是在某種情況下，個體反而正是因為同樣的設想而強化了自己的參與。

總結來說，自從奧森提出集體行動的難題之後，理性選擇的學者試圖以各種方式來解答這個知識上的困惑：為何理論上集體行動是不容易產生的，但是現實上社會運動卻是無所不在的？上述的討論試圖指出這一點：奧森的難題並不是無法克服的障礙。要使得理性選擇更能夠發揮其理論解釋效力，更廣闊的制度、文化、反思性自我必須被帶入分析。唯有如此，



理性選擇理論才能更坦然面對社會運動，並且提出有意義的詮釋，而不再只是一味地強調集體行動的不可能性。

(四)新社會運動理論

六〇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抗議事件，重新引起大西洋兩岸學者對於社會運動的重視。研究者開始試圖尋找一種新的分析途徑，思考抗議活動背後的社會學意義。在美國，傳承於結構功能論的集體行為理論受到嚴厲挑戰，新一代的研究開創了資源動員論的分析途徑；在歐洲，研究者則是重新檢討古典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試圖放棄過時的階級中心論，但是同時保有資本主義的鉅觀分析 (Tarrow 1989b: 57)。可以說，新社會運動理論即是起源於歐洲馬克思主義的內部批判，新左派知識份子試圖提出一套解釋晚近資本主義社會抗議的參考座標。概括分析，新社會運動理論主張：
(1)晚近的社會抗議可以歸結為社會結構變遷的作用；(2)新的社會矛盾取代了階級對立；晚近的社會抗議帶來(3)新的價值與文化以及(4)新的集體行動參與方式。

1. 新的社會結構

新社會運動理論者總是將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放在一起來思考，他們強調社會運動是現代社會變遷的源頭。在現代性出現之前，並沒有社會運動，原因在於前現代的抗議很少自覺地要改變既有的社會規則。相對於此，「在現代社會中，社會運動正好位於變遷產生的位置。因此，它們首度能夠扮演社會創造的歷史角色」(Eder 1982: 10)。基於相同的理由，Alain Touraine 用「歷史性」(historicity) 這個概念來描述社會運動本身所具有的改造能量，能夠從舊社會的母體中孕育新社會的胚胎。歷史性的概念指出了一個事實，社會運動並不只是它表面所呈現的那樣，而是不斷地產生矛盾與辯證發展的關鍵。針對社會運動與變遷的密切關連，Touraine 的學生 Alberto Melucci 進一步指出，社會運動具有社會預言的性格，往往是一種針對未來狀況的集體投射：「他們事先宣布正在成形的事物」(Melucci 1996: 1)。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工業無產階級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新興社會力量，另一方面，也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宣告社會主義的到來。同樣地，對於新社會運動研究者而言，社會運動一方面起源於社會矛盾，亦即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也是促成社會變遷的推手。因此，這些研究者有必要提出一套鉅觀的結構理論，來分析新社會運動的出現原因。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是，為何古典的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政治民主運動逐漸喪失動員能量，甚至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新興的婦女、環境、和平等議題卻從走出少數知識菁英的關懷，成為集體參與的公眾議題？一句話，新社會運動如何取代了舊社會運動。

就這一點而言，André Gorz 所提出的「告別工人階級」，基本上是所有新社會運動理論者的共同看法。Gorz 認為，在後工業社會年代，進步運動不再附著於傳統的工業無產階級，不再試圖以一種經濟體制來取代資本主義。越來越多人的工作是間歇性的，或是在勞動力市場中被低估的，這些所謂的「後工業新無產階級」將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新一波的左派運動將不再是不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對抗，而是要限制經濟邏輯對於人們生活的侵佔，並且重新從工作以外的領域建構生命的意義 (Gorz 1982: 84-9)。

對於 Touraine 而言，解答問題的關鍵在於後工業社會的興起，知識生產越來越成為社會的主軸，因而取代了過去經濟生產過程中的勞資對立。文化成為社會衝突的主要場所，經濟衝突反而成為次要的。因此，Touraine 認為無產階級不再是扮演馬克思所預期的革命角色。他強調，隨著生產性工人的相對減少，工會的參與率也逐漸降低。統合主義的趨勢也使得工會與國家部門之間產生了更緊密的結合，工會不再是一股體制外的未馴化勢力 (Touraine 1986)。相對地，學生、新中產階級取代之工業無產階級，成為後工業社會的運動主力份子，原因正在於他們直接涉及了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掌握後工業化社會自我生產的關鍵。因此，對於 Touraine 而言，新時代的階級鬥爭不再是涉及剩餘價值佔有的生產領域，而是存在於「工作以外的生活」，或者說是「消費」的領域 (Touraine 1977: 163-163)。

Jürgen Habermas 也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晚近資本主義的演變。



他指出，晚近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國家介入經濟體系，為了避免資本積累的危機惡化，國家透過社會福利政策改變了市場分配的結果。如此一來，階級對立不再是晚近資本主義的組織原則，社會矛盾的主軸也從經濟體系轉移到社會文化體系，因此出現了所謂的「正當性危機」。人們開始發現有的物質分配規則是受到人為力量的影響，而不是來自於自然而然的市場邏輯，因此，他們更有理由質疑現有的分配是否符合正義的原則。對於 Habermas 而言，經濟財富是可以透過政府規劃創造出來，但是文化的意義卻是一種無法被管理與生產的資源。主政者為了說服公民接受現有的秩序安排，他們經常利用傳統的文化觀念，或是假藉現代科學的權威。因此，文化本身成為爭議性的，導致「一些過去被歸為私領域的生活面向之政治化」(Habermas 1975: 72)。Habermas 認為，正當性危機就是表現在傳統價值受到質疑，新的群眾參與開始出現時。

簡而言之，新社會運動論最主要的理論宣稱就是新舊社會運動的差異，不同的集體行動模式反映了社會變遷的軌跡。無論是後工業社會理論、或是晚近資本主義理論，都宣告工人運動的終結，並且期待從文化領域看到新的抗議風潮。

2. 新的政治對抗軸線

從政治傾向來看，新社會運動經常被稱為「左派反威權的」(left-libertarian)，一方面他們是左派的，不相信市場與資本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反威權的，反對官僚對於個人生活的控制，要求直接民主與社群的自主性 (Kitschelt 1990: 180)。從這個角度來看，新社會運動與老左派共同分享某種程度的價值親切性，尤其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不信任。然而，新政治並不一定能在既有的政治市場之中找到代言人。一旦社會面臨了增加就業或環境保護的政策兩難情境，新政治的主張並不一定獲得體制內左派的全力背書，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新社會運動直接挑戰了老左派的社會民主信念，認為資本主義是可以被改革的。就以核能發電的問題而言，七〇年代歐洲社會民主黨積極擁抱這項新科技，認為核能可以解決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



衰退，卻忽略了核能對環境的危害，使得新社會運動與政黨之間的政治聯盟充滿緊張的關係。因此，等到反核運動成為一股沛然的社會力量，幾乎是主流的左右派政黨都支持核能發電 (Wagner 1994: 30)。此外，由於對直接參與的重視，新社會運動認為傳統政黨與工會的官僚化組織方式是社會控制的一環，而不是通過社會解放的道路。

Offe (1984) 認為晚近資本主義最大的改變在於國家的介入，造成行政管理組織的高度分化與複雜化。在福利國家體制中，權力不再位於某一個高不可攀的控制高地，相反地，人民可以透過武力奪權或是選舉勝利，直接取得權力，並且利用權力來改造社會。因此，新的反抗基地是在於民間社會，用 Keane (1984: 31) 的話來說，「議會路線」不能再被視為首要的，不再是佔據社會主義大業的核心舞臺」。因此，新社會運動刻意疏離現代的政治部門，改以另一種方式來從事政治。

另一方面，新社會運動的出現也代表了戰後社會分歧結構 (structure of social cleavage) 的進一步改變。七〇年代以前的政治對抗是以重分配政治為軸線：保守派要求保護個人經濟自由，維護市場自由運作；激進派則是要公平分享社會勞動的果實，以社會正義限制商品化的邏輯。位於政治光譜中間的主流政黨則是試圖以經濟成長來作為政治宣傳的最大公約數。新政治以體制外社會運動的形態出現，而且持續地向主流政治提出強而有力的挑戰，這個事實就代表了，體制內政黨與常態政治的吸納能力正在消退之中 (Offe 1990: 233)。誠如 Kriesi (1999) 所指出的，九〇年代的歐洲不再只存在經濟自由與社會正義的主要對抗軸線。在新右派運動（例如仇外、反移民的種族主義）中，可以發現不少的低下階級與失業工人參與，同樣地，若干教育程度高、收入多的專業人士也傾向於支持新左派運動，例如綠黨與環境運動。這些現象共同顯示了一點，新政治的社會基礎與舊有的社會分歧格格不入，憑藉其廣泛的社會動員，一個新的政治勢力版圖正在重新劃定。



3. 新的文化價值

Touraine (1985: 78) 強調，「社會運動之所以激起熱情，正是由於行動者是由他們的文化導向所界定的」，換言之，社會運動提出一套新的價值範疇，預先宣佈未來社會的圖像。因此，沒有理念層次的導向，社會運動就不存在。一個應該追問的問題即是，新社會運動到底要追求何種文化價值？

關於這個問題，批判理論的學者提出最完整的說明，他們均認為新社會運動的使命在於實現未完成的現代性，保衛現代化的溝通理性以防止系統力量的介入與扭曲 (Eder 1982: 11; Kriesi 1988a: 356; Rucht 1988: 316)。無疑地，這個看法是來自於 Habermas 對於現代社會的診斷，也就是所謂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 的命題。在他看來，由於社會演化的開展，系統得到了免於規範節制的運作自由，使生活世界的自由溝通受到限制，語言的媒介被非語言媒介所替代。因此，許多生活的事務決定越來越不是眾人共識的結果，而是純粹的功能要求。系統施加結構暴力於生活世界之上，使生活世界喪失了自主性。造成這種畸型發展的兩種系統媒介就是貨幣與權力，分別體現在自由市場與現代國家官僚，當前的生活世界是在兩者間的夾縫中求生存，溝通理性的基礎則一步步被侵蝕 (何明修 2001b)。基於這個理由，這些研究者強調，社會運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參與，拒絕生活周遭的各個層面被納入管理，使得人民不再有發言與決定的權利。透過更草根的政治參與，自主性與團結的價值被提出來了，他們所要對抗的則是國家部門的危機管理 (crisis management) 模式，即國家將和平、環境、性別、人權等議題去政治化，成為行政管理的事項 (Cohen 1982)。

需要強調的是，批判理論的學者並沒有為所有的新社會運動背書，事實上，他們對於若干「激進的」基本教義立場抱持著保留的態度。Habermas 認為新政治議題是抗議異化的生活世界，意圖重建一個免於資本主義支配的自主性生活。但是他對於新社會運動解放潛能仍相當保留，因為它們仍具有一些反普遍主義的元素，與溝通理性的預設相衝突 (Habermas 1987:



391-396)。同樣地，Touraine 也批判西方生態運動中的浪漫主義傾向，試圖回到一個「前基督教的、泛靈論的自然化」，其結果無疑是導致「一種綠色基本教義主義」(Touraine 1999: 49-50)，將自然賦與某種神秘的想像，進而貶低了人類的理性價值。很顯然，在晚近的新社會運動浪潮之中，有若干價值取向並不是溝通行動理論所能掌握或是接受的。就以環境運動而言，運動者固然是要保衛社區的自主性，反對權力與資本的任意侵入。他們批判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科技理性，但是其目的並不一定要重新恢復某種現代性中的價值，例如 Habermas 所謂的溝通理性。事實上，與其說新社會運動是在保衛某種固有的理念，不如說他們是在建構一種新的價值觀。

4. 新的集體行動參與

舊社會運動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試圖取得權力的制高點，以推動民族解放，或是建立社會主義。在舊社會運動的圖像中，社會體系的內部有個權力核心，外頭則是有統治階級所設下的重重關卡。因此，要實現運動目標就要佔據這個權力核心，驅趕舊有的統治集團；要取得權力，社會運動就要組織起來，匯集人力與資源以形成一股更龐大的社會力量。無疑地，舊社會運動所形成的工會、政治團體、政黨就是這種邏輯下的產物。然而，從新政治的角度來看，這種策略將會面臨重重的困難。一方面，為什麼要建構一個內部充滿支配關係的組織，來挑戰外在的支配結構？難道這種路線不會面臨「手段與目的之悖論」，爭取自由的手段反而造成了新的奴役？新社會運動反對科層化的組織模型，拒絕領導者與追隨者的角色制度化，要求普遍而直接的參與。因此，「訴諸於自發性、反威權主義、反對層級」即是當前集體行動的主要形式 (Melucci 1996: 103)。

其次，舊社會運動將批判的焦點放在結構性的議題，他們揚言改造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威權統治，但是卻忽略了其他更為微觀的、日常的議題。免於公害污染的生活品質、免於核武威脅的安全、沒有性別歧視的工作場所，這些訴求都是日常生活時時接觸的議題，也是新社會運動的抗爭訴求。隨著批判的焦點轉移，新社會運動所追求的也不再是徹底的政經結



構改造，或是某種的公民權，而是將日常生活進一步民主化 (Melucci 1988: 247)。Offe (1984: 173) 就曾強調，新社會運動拒絕政黨政治的邏輯，而採取議題式的抗爭策略。對於這些學者而言，新政治的策略轉向並不是一種退步。新社會運動尊重既有的制度邊界，不挑戰資本主義民主的正當性，但是他們仍是從事某種意義下的根本改造，這也是為何學者將這一類型的社會運動稱之為「自我設限的激進主義」(self-limited radicalism) (Cohen and Arato 1994)。

新社會運動將日常生活視為社會衝突的場域，他們善於利用文化與媒體的力量，來壯大自己的聲勢。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代表一種新浮現的社會參與形式，運動者不再只是進行政治動員或是群眾組織，而是可以體現在生活方式的選擇。於是，認同的形塑就成為了新社會運動的核心議題之一。對於認同的問題，新社會運動學者十分堅持這一點，他們認為運動不能只被當作一種純粹的政治性現象，只是追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或是權利的賦與。在這種政治中心論的觀點下，文化往往被化約成為動員的工具。這些學者強調，文化改造本身往往就是運動的目標 (Melucci 1994: 107)。因此，生態運動者不只是一要修正放任資本積累的國家政策，更是要形塑一套實用的生態倫理，希望能落在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的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認同本身就是新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最受重視的社會參與方式。換言之，新社會運動強調的是認同建構，而不是在於政治策略 (Cohen 1985)。

相對於其他研究社會運動的理論，新社會運動理論帶有強烈的規範性格。研究者所關切的問題不只是一要如何適切地理解晚近的社會抗議風潮，在某個意義下，他們也期待新社會運動能夠扮演集體行動者的角色，在晚近資本主義中取代工人階級，繼續推動社會解放的大業。就這一點而言，單純評估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經驗效力雖然是必要的，也是我們所關切的，但不可否認地也是單面向的，甚至是不公平的。

在一開始的時候，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確帶來知識上的挑戰，尤其是對於資源動員論所主導的美國社會運動研究而言。新社會運動所強調的鉅觀



視野、文化分析、集體認同，都十分具有啟發性。到了八〇年代晚期，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洞見逐漸被學界所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整合新社會運動理論與資源動員論的對立，提出一套能夠兼顧策略與意義的分析途徑 (Klandermans, Kriesi and Tarrow 1988; Rucht 1991a)。事實上，九〇年代之後，社會運動研究的文化轉向（見第六章）以及對於認同的重視（見第三章），都可以說是受到新社會運動的刺激。不過，儘管有這些理論上的吸引力，新社會運動理論本身在實證經驗的可靠性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就歐洲的婦女、生態、和平運動而言，這些學者過度誇大新政治與舊有的階級政治、議會政治的疏離。換言之，晚近以來的社會抗議是否有別於以往的模式，在類型上自成一格 (*sui generis*)，需要另一套的分析方式，仍是大有問題的（見第五章）。

更重要的，新社會運動學者所強調的認同、自主性、文化取向等特徵，並不是晚近才有的產物。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Calhoun (1993) 批判新社會運動理論過於強調晚近社會運動的創新性格，並且不當簡化了以往的社會抗議。他指出，十九世紀初的各種民族主義、宗教復興、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神祕主義等運動都各具有豐富的特色，而不只是單純的政治現象。因此，Calhoun 十分諷刺地稱這些運動為「十九世紀初的新社會運動」，言下之意就是，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說法經不起歷史的考證。

無論如何，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確是開啟了社會運動研究的新方向，也迫使主流研究者更重視文化議題的重要性，而不再只是受限於傳統的資源動員論。就這一點而言，新社會運動的理論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四、結 論

臺灣的社會學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每個經驗研究的領域都有其「理論」，亦即是一套描述或預設現象之關係的陳述，因此，沒有必要獨立存在一門所謂的社會學理論。因此，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就是集體行為論、資源動員論、新社會運動論、政治過程論、構框理論等，沒有必要再去了解



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等人說了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古典社會學的著作頂多可以被當成社會思想史的教材，充滿了各種過時的、被否定的命題。即使這些古典社會學家提出了若干值得參考的東西，更簡潔與更實用的版本也可以在晚近的教科書中找到。無疑地，這種看法透露了若干經驗主義的偏見，認為社會學研究的重點在於透過經驗研究找出變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透過邏輯分析找出概念之間的關係。

然而，這種「社會學理論無用論」的看法卻是有必要商榷的。過度的經驗主義忽略了理論的層級性格，將其化約成為一組可以產生研究假設的概念性陳述。因此，不同理論就是提示了不同的研究假設，可以被研究者任意組合拼湊，而不需要注意理論的預設與脈絡。很顯然，多變項分析的作品經常是採取這種理論觀，某一種理論可以被簡化成為幾個變項，並且可用統計回歸與模型比較，來尋找出其因果關係。事實上，這種觀點只看到了社會學理論的冰山一角，亦即是直接處理實質問題的層級，而忽略了更基本的面向。

這一章回顧了古典與現代的社會學理論，其目的在於更清楚地梳理出理論的結構性格，以及它們與社會運動研究的關連性。從上述的整理可知，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仍是持續地受惠於理論典範的創新，進而開展出不同的分析途徑。簡單地說，好的社會學理論能夠提供靈感，幫助研究者使用，甚至是創造特定的分析概念，將經驗資料系統性地整理出來。相對地，特定的社會研究分析途徑比較像是現成的操作手冊，按部就班地提醒研究者要注意到哪些經驗資料，以及各變項之間的關係。然而，即使一般操作手冊都有「問題解答」的項目，設計再精良的操作手冊也不可能完全料想到使用者所面臨的各種疑難雜症，因此不能免俗地要提供客戶服務電話，以轉介處理更複雜的案例。因此，一旦個別的社會運動分析途徑遇到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時，社會學理論層次的思考將能夠提供更妥善的解決。

第三章

個體與集體之間：

認同、生命歷程與社會運動





一、個體與集體的連結

從常識來看，大多數人的滿足是來自於他們的私人生活，成功的生涯，聲望與財富的累積，親情與友情的支持，欲望的實現等等。很少人會將生活的意義寄託在某一種超個體理念，或是將自己的存在價值附屬於某個集體之下。自由主義預設了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既然社會是滿足個體的生活便利而存在的，集體只不過具有工具性的價值，其本身並不是目的。經濟學家將個體視為效用極大化的理性人，他們只有儘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資源來換取自己偏好的滿足。至於個體的偏好是如何形成的，經濟學家通常保持沉默。個體的癖好與品味是沒有辦法解釋的，偏好即是諸多個體特殊性的總合。因此，研究者只需要在意個體偏好的後果，不必探討起源過程。無論如何，主流常識頌揚私領域的價值，個體的幸福即是來自於私生活的圓滿。

無疑地，對私領域的關注並不利於社會運動的產生。從純粹私人的角度來看，積極的公共領域行動是有問題的，當事者不是好出風頭，就是懷抱其他不可見人的意圖。另一方面，公共關注也是帶有高度風險的，過於熱心的參與者有可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威權統治者寧願他們面對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子民，而不是具公德心的公民。儘管威權主義會訴諸於某種響亮的道德宣稱，但是很少統治者會認真地將道德與政治接合，因為這樣容易封閉了被統治者追求他們瑣碎私人利益的機會，也拆解了威權政權維繫的社會安全瓣。在過去臺灣的威權體制下，特權、關說、走後門、送紅包、拉關係、包娼包賭、官官相護是被默許的現象，也成為普遍的社會運作法則，但是要批評這些現象卻會受到極大的制裁。換言之，威權統治者喜好犬儒主義，畏懼理想主義。

事實上，正如 Hirschman (1982) 所指出，純粹的私領域也會有其不滿。很少人會是符合功利主義的模型，總是處於欲求不滿的狀態；事實上，私人欲望的滿足往往帶來幻滅與厭膩，失望的感受阻止了更具有野心的欲望。



面臨這種情況，私人關注有可能進一步轉化為自我反思，轉向更具有意義的集體參與。私領域的滿足是一系列的工具性行動，最終的目標很容易無限向後延伸，例如打工是為了繳學費，唸書是為了找好工作，工作是為了買房子，買房子是為了結婚等等。純粹私生活的匱乏原因之一即是這種手段與目的之辯證，造成終極目標本身的遺忘與喪失。相對於此，公共參與的最大特徵就在於行動本身即是一種回報，而不必等到最終目標的落實。投身於某一項公共議題帶來心靈的充實，個體與集體的緊密結合也是一種自我實現。Hirschman 將私人利益與公共參與關切視為同樣重要的兩種行動類型，其週期性的擺盪構成了社會運動風潮的興衰。

這一章將要探討促成公共參與的兩個因素，亦即是認同與生命歷程。簡單地說，認同即是「一種個體與更廣大的共同體、範疇、實踐與制度的認知性、道德性與情感性的連結」(Polletta and Jasper 2001: 285)。因此，認同即是一種想像中的關係，將想像者與另外一群人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個共同的「我們」觀念。必須說明的是，認同只存在於意識層次，這也就是說，無意識的認同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認同也預設了選擇性的強調與忽略，在無限多種的身分特徵之中（無論這些特徵是被賦與的或取得的），如性別、階級、學歷等，我們只關切某些面向，只將某些人視為是與我們相同的。換言之，認同是人為的，而不是先天註定的，用學術的話來說，認同就是社會建構的後果。儘管如此，這不代表認同是虛幻的，或者說沒有作用的。相反地，晚近以來的政治爭議越來越是象徵性的，涉及文化意義的使用，而不只是實際的經濟資源分配問題。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認同所釋放出來的強大動員力量，使得個體自願奉獻給一個更廣大的集體。

有鑑於認同概念在近來政治生活與社會運動的重要性，這一章要分別處理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 與 運動認同 (movement identity) 的問題。認同政治是各種社會差異動員所引發的政治效應，在這一章中，筆者主張用承認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的概念加以理解。認同政治是屬於比較晚近的現象，相對地，運動認同則是各種社會運動所需必備的元素。只有



當個體在觀念上，將自己視為一個更廣大群體的成員之一，社會運動的訴求才有號召力。認同固然是觀念性的力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認同只需要透過象徵溝通就可達成。事實上，只有當認同與既有社會網絡、制度、文化傳統相結合，認同才能發揮運動動員的效果。

其次，社會運動也有其生命歷程 (biographic) 面向。一方面，個人生命史的一些特徵影響他們對某一項運動的參與意願，例如在六〇年代之後，青年、高學歷、新中產階級成為各種新興社會抗議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入的運動參與也會改變個人後續一系列找工作、擇偶、信仰、消費、居住、子女教育的抉擇，換言之，社會運動也會改變某些參與者的生活。Mills (1996: 35) 指出，歷史與生命歷程之關係一直是古典社會家的核心關切。作為一種創造歷史的力量，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對象，能幫助我們理解集體行動各種細微的個體起源，以及它們如何深刻地改造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二、認同政治：從差異到承認

認同是晚近以來流行的概念，無論是作為社會科學界的專用術語或是日常生活中的用語。在國外，教育、族群與移民、性別、宗教、科技等一系列的晚近政治爭議都被視為是認同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 的表現。在臺灣，原住民、外勞、同志、外籍配偶與其子女、娼妓等特定群體也逐步為自己發聲。離開看不見的陰暗角落，這些以往被邊緣化群體的動員，不只呈現了當代社會不可化約的多元性，同時也挑戰了主流文化對於常態的界定。他們共同質疑主流社會對他們貼上「偏差的」與「次等的」標籤，要求各種生活方式都應有其正當地位。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各種社會運動的發展也進一步強化了差異的重要性。美國的族群運動在六〇年代中期之前主要是採取民權的訴求，要求改善少數族群的政治經濟地位，以達到融入主流社會的目標。到了六〇年代後期，激進的黑權 (black power) 路線浮現，武裝自衛取代了非暴力直接行



動的傳統，分離主義的策略放棄了族群融合的目標。同樣地，婦女運動也從以往的平權訴求轉向更激進的父權體制批判，激進婦運路線主張女性要徹底揚棄婚姻與家庭的體制。因此，「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只有拒絕進入主流社會的遊戲規則，才能帶來女性的解放。在環境哲學方面，深層生態學 (deep ecology) 批判了功利主義取向的保育觀，反對「因為對人類有利，才需要環境保護」的論點。新的生態學思想強調生物界內的眾生平等 (biospheric equality)，任何生命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蓋亞理論 (Gaia theory) 進一步挑戰了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地球是養育萬物的大地之母，而不只是被動的自然界。九〇年代興起的「酷兒族」(queer nation)，集合了同性戀、肢體殘障者、非主流性癖好者、變性裝扮者等群體，他們將原先帶有貶義的「古怪」(queer) 一詞，轉化成為正面的認同，不符合主流規範的身體不再是需要被掩飾的缺陷，反而可用於公開展現，成為自信與驕傲的源頭。

各種認同政治的浮現凸顯了差異性的當代政治意涵。在以往，社會運動代表一種弱勢群體融入主流社會的企圖。進步、理性、寬容等普遍主義的價值觀是被肯定的，問題只是在於這些理念被統治群體所扭曲，沒有真正地被落實。因此，選擇性的正義不是正義，社會運動要求的不外乎是貨真價實的同—性原則。相對地，晚近以來，不少社會運動開始質疑這些普遍主義的價值觀，因為它們並不意味著潛在的解放，反而是社會壓迫的源頭。從更激進的角度來看，即使是包容性再高的規範仍是設定某些區分的判準，使得若干特定的群體被排除在外。因此，激進的認同政治即是一種差異性的政治^①，強調社會差異性是無所不在的，同時也是不可化約的。

① 在此容易造成語意上的混淆。某些學者反對使用“politics of identity”的標籤，而是採用“politics of difference”名稱，原因在於他們所認為的“politics of identity”是試圖消弭差異性，具有同化色彩的「同—性政治」，例如 Young (1990) 即是如此。需要強調的是，筆者所謂的認同政治即是差異性的政治，因為其動員基礎正是來自於各種不同的認同。更進一步來說，哲學意義的同—性即是邏輯上蘊涵了差異性，沒有差別的同一性是無法想像的。因此，本文仍是以認同政治來稱呼這



認同政治論者主張，當代社會生活是呈現去中心化的狀態，沒有一個權力的制高點導致各種壓迫現象的產生。Young (1990: ch. 1) 認為，社會壓迫有許多種面貌，包括了剝削、邊緣化、無權力、文化帝國主義與暴力等面向。沒有一種壓迫關係是最本質的，或具有邏輯上的優位性。舉例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剝削是其他壓迫的來源，因此，只需取消私有財產的制度，一切的不平等都將喪失了物質基礎。從差異政治的角度來看，採取普遍主義策略的社會運動會帶來同質化的壓力，在解除某一項壓迫之前，反而強化了既有的另一項壓迫。這即是說，沒有一種所謂的普遍性主體，工人、學生、新階級、第三世界、都市邊緣人都是處於特定的壓迫關係，他們的解放也只有局部性的意義。就如同 Laclau (1994: 4-5) 所指出的，認同政治的興起意味著普遍性主體開始退位，特殊主義成為社會運動的主導力量。

在晚近認同政治的發展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是運動論述的高度反思性。由於運動參與者多半擁有高等教育背景及相當程度的文化資本，能夠汲取最新的文化思潮，並且將運動的實踐論述化。另一方面，也由於認同政治的研究者也往往是運動的積極份子，他們也將學院論述導入了運動的場域。因此，一個總合的結果即是認同政治本身的高度論述化性格，以及相對低度組織化的實踐。新的政治認同形塑是涉及了一連串的文字、象徵符號、媒體形象的操作，而不是組織化的政治參與。

正是由於這種強烈的論述性格，認同政治的實踐可說是受到種種後現代思潮的啟發。根據 Lyotard (1984: xxiv) 的說法，後現代可以被定義為對於西方後設敘事 (meta-narratives) 的不信任。傳統的後設敘事肯定了科學作為唯一正當的知識，排除了其他類型的語言使用。在後現代的情境中，理性的壟斷被打破了，每一種局部性的語言戲局 (language games) 都有同樣的地位。後馬克思主義者批判了各種形式的階級化約論。在 Laclau and Mouffe (1994) 看來，社會空間中的多元主體位置是由論述所形塑的，不具任何先驗性的保證或是超歷史的本質。參與社會對抗的主角也不再是些新形態的社會運動。



級，而是由許多社會角色所組成的。因此，相對於過去的無產階級革命模式，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新時代社會主義的關鍵正是在於激進的民主，它要求更進一步地深化民主制度，同時避免差異性被強制地同質化，或是被邊緣化。

越是到晚近，認同政治儼然成為進步政治的最新典範，頑強的差異性成為一種社會抵抗的實踐，拒絕同化即是一種新興的社會運動。認同政治揭露了傳統進步運動的盲點，即在追求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弱勢群體往往被迫放棄他們的特殊文化，接受某種具有壓迫性的規範。為了獲得平等的權利，早期的婦女運動被迫淡化處理種種「女性特質」，強調女性一樣具有傳統上被定義為男性獨有的能力。少數的事業成功女性成為被標榜的對象，其他更廣大的婦女被貶為有缺陷的存在。為了獲得法律上的同等對待，同性戀運動被迫展現「健康清新」的現象，同志就是「正常人」，他們過「正常的生活」，一樣工作、談戀愛、從事各種休閒活動。在常態化的同志圖像背後，其他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同志找不到他們的位置。更重要的，同性戀對於當前性別社會化、婚姻家庭、性別刻板印象的衝擊被忽略了。簡而言之，頌揚差異性的認同政治批判了以往進步論述的安逸與自滿意得，從而引導出更多元的社會運動。

然而，激進的認同政治無情地批判普遍主義的價值，毫無保留地歌頌愉悅的差異性，同樣會導致政治實踐上的無能和困境。一旦種種的社會差異被當作不可共量的，甚至是不可跨越的鴻溝，就排除了任何有意義對話的可能性。在後現代的觀點下，超越社會位置的局部性被宣布為不可能達成的事業，任何宣稱普遍性的言論都應加以懷疑。誠如 Harvey (1993: 53) 所指出的，如此一來，正義觀念成為眾多看法的一種，沒有其客觀性或效力，也喪失譴責或是指控不義的機會。

同樣地，未被檢視的社會差異性也有可能是社會壓迫的源頭，而不是帶來解放。認同政治論者重視各種文化的內在價值，他們批判主流社會的同化論述。然而，這種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的論述在近年來也常被右翼人士所利用，他們宣稱維持宗教主導的學校課程、主張種族優越



論、強化傳統家庭價值也是一種需要被尊重的特殊文化。反對现代化的反制運動（見第七章）有可能以差異性為名，持續維持既有的社會壓迫現實。面對這種現象，後現代取向的認同政治論者並沒有進一步區分壓迫性的差異與解放性的差異。換言之，一旦拋棄了普遍性的標準，我們要如何批判種族隔離制度所宣稱的「分離但是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最後，認同政治論者宣稱各種差異性認同的等值，合理的社會應該是儘可能地容許異質性的元素和平共存。認同政治論者在肯定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同時，也有可能同質化了群體之內的差異性。Young (1990) 從群體差異的前提出發，得到了以群體代議 (group representation) 來取代地域民主的結論。原因在於她認為，現有的地域民主制度具有同質化的趨勢，使得少數群體的聲音在競逐主流民意的過程中消失。因此，只有先承認群體之間的先天差異，才能真保障群體的生存空間。然而，這樣的群體代表提議不正是試圖消滅群體之內的差異，恆久化群體之間的差異？

在認同政治的實踐上，徹底的分離主義被認為是肯定差異性的運動路線，是相對於主流同化路線的激進選擇。就以女同性戀女性主義 (lesbian feminism) 而言，一旦女同性戀被抬舉成為女性主義的最高價值，其他異性戀、雙性戀的婦女就被剝奪了參與的機會 (Phelan 1993; Ryan 1989)。在美國，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參與者通常是白人中產階級，因此女同性戀作為一種「政治正確」的標籤，無異是邊緣化了工人階級與其他種族的女性主義者 (Eder, Staggenborg and Sudderth 1995; Taylor and Rupp 1993)。根據 Gamson (1995) 的研究，舊金山的「酷兒運動」也面臨了同樣的實踐困境。酷兒認同反對傳統同志運動的平權路線，他們要求自己與主流社會的差異被肯定，而不是被忽略。儘管有這種強悍的分離主義，在實際上，酷兒認同的號召也只包括了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人，而也由於這個認同，這些群體的差異性被低調處理，彷彿他們是面臨完全相同的壓迫處境。

簡單地說，追求純然差異性的認同政治陷入了理論與實踐的困境。追根究柢，這個困境是來自於現代性對於每個個體的挑戰。一旦從傳統的世界觀解放出來，現代人必得要重新尋找一個關於自我的定義，去發現一群



與自己相同的個體。在這個形塑認同的過程中，個體必然高估了我群的同質性，誇大了群體之間的差異性。誠如 Connolly (1991: 67) 所指出的，這種困境即是在於，「擁有一個真實的認同就是忽略差異性，認真面對差異性就是放棄了真實認同的許諾」。

在此，一種解決認同政治困境的途徑即是，放棄將差異性本身視為進步運動的終極目標。各種弱勢群體的動員與特殊認同的形塑，並不是純粹為了在公共領域呈現其差異性，事實上，他們的集體行動是為了追求承認 (recognition)，要求被其他群體接納為一個平等而有尊嚴的他者。從這個承認政治的角度來看，反抗的認同是來自於拒絕承認的社會壓迫，使得某些群體的身分被污名化，被排除在合乎道德的對待態度以外 (Honneth 1995: 163)。追求承認的認同政治可以免於同質化某種群體內的差異，而將注意力轉向導致壓迫的外在社會 (Fraser 2001: 24-25)。因此，差異性本身並不是關鍵。如此一來，追求解放的群體可以同時利用普遍主義策略，例如反對歧視、追求同等待遇、以及特殊主義的策略，例如強化群體內聚力，選擇性強調群體的榮耀等。

三、運動認同

認同政治是相對而言晚近的現象，許多社會群體開始強調他們的特殊性，拒絕被主流社會所同化，要求集體的文化承認。與認同政治相對立的即是 Fraser (2001) 所謂的重分配政治，亦即是一種改變物質資源配置方式的集體企圖。傳統狹義的政治觀只涉及了資源的分配問題，「誰獲得了什麼」(who gets what) 一向是傳統政治學討論的核心議題。因此，認同政治的另一個意義即是凸顯了當代文化議題的顯著性，能夠形成新的政治對抗軸線。

在此，運動認同是泛指任何社會運動都需要經歷的一個階段，亦即是如何強化一群人的共同認知，激發出共同參與的意願。無論社會運動的目標是為了爭取文化承認或是資源重分配，認同都是必要的元素，因為只有透過我群與他群的邊界劃定，才能區分出社會運動的主體與對手。



在最初，認同的重要性是由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所發現。認同的形塑可以解答一個資源動員論所沒有提出的問題：到底集體的行動者是如何形成的？基本上，資源動員論學者大致上相信，利益的一致性即是抗爭群體形成的潛在因素，組織動員與溝通網絡（見第四章）則是實現這些潛能的主要原因。然而，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認為，資源動員論對利益的論證是不充分的，光是利益並無法支撐需要齊力協心的集體行動。因此，在集體行動出現之前，需要一套認同建構的過程，以強化抗爭群體的內聚力。為了使得爭取共同利益的工具性行動產生可能，群體內的溝通行動是必要的（Cohen 1985; Pizzorno 1978; Offe and Wiesenthal 1980）。換言之，動員過程不只是涉及客觀資源的安排，也是行動者進行主觀的評估與決策。因此，資源動員論預設了一套未明言的認同理論。

△△ 社會運動的集體認同即是一群人由互動中產生的共享意義，這些觀念性元素促成他們採取一致性行動的導向，共同認定他們所要爭取的目標，以及對抗的另一個群體。Melucci (1989: 35) 指出，認同建構並不是遵循著利益計算的邏輯。利益的誘惑無法改變某人對於自己的界定，更遑論投身於群體的共同事業。事實上，擁有共同的認同意味著相互扶持，有時甚至是要違背個體的利益，以達成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目標。因此，可以這樣說，認同的力量在於設定可以共同行動的主體，使得他們察覺到彼此共享的利益以及集體行動的可能。

基於這個理由，Cohen and Arato (1994: 548–555) 認為晚近以來的社會運動不能被化約為純粹的策略性行動，而是從事一種所謂的雙重政治 (dual politics)。在市民社會層次中，社會運動採取文化溝通行動，形塑集體認同，從而催生一套民主的、平等的、團結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這些聚集起來的力量也會作用於政治體制，他們形成常設的組織，尋求政黨支持，遊說政策決定等。

成熟的運動認同是相對穩定的，並不會隨著時間任意改變。除了促成運動的參與，強烈的認同也使得個體的參與者樂於在日常生活實現他們的理念。因此，環境人士隨身攜帶環保餐具，從事綠色消費；女性主義者改



變他們的日常用語、家務分工方式以及對感情生活的態度等。就這個意義而言，認同才能使得行動者具有行動能力，他們不只是被動地反映環境，而是積極地改造他們所處的生活世界 (Melucci 1996: 71-73)。

儘管如此，即使再強大的運動認同仍是來自於一種學習過程，而不是由先天的身分所決定的。從事後的結果來看，認同的形成就是自我重新發現，使得運動的參與者認知到自己感受到昨非今是，積極擁抱一個更新的角色規定。新社會運動理論強調，認同是經由共同的協商 (negotiation) 所創造出來的。只有置身於一個溝通的情境之中，個體的認同才能由共享的意義脈絡中產生。個人認同是反思性 (reflectivity) 的結果，而不是原初既定的本質 (Cohen and Arato 1994: 377-378)。透過公共的對話，參與者分享一組共同的我群意識 (we-ness)，從而劃分群體的外在邊界。

簡而言之，新社會運動理論者發現運動認同的重要性，可以用它來更妥善地處理社會運動主體的形成過程。由於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的鼓吹，認同概念成為社會運動研究的通行詞彙。最重要的，認同概念凸顯了社會運動的文化面向，而這一點正好是美國的資源動員論最薄弱的部分。後來的研究者汲取了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洞見，陸續發展出更新的分析概念進一步剖析運動認同的諸多面向。舉例而言，構框理論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創造，呈現出一種觀看外在事物的認知方式 (見第六章)。同樣地，情緒面向的分析則彌補了認同概念對於非理性元素的忽視 (見第七章)。

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固然開拓了運動認同的探討途徑，也大致上釐清了認同的形塑過程，但是他們也留下一些爭議性的問題，反而誤導了後續的研究。首先，在新社會運動理論看來，認同建構是特屬於西方六〇年代之後所出現的生態、和平、青年、性別等運動。新社會運動之所以是新的，正是由於他們與傳統的勞工運動有所區別。新社會運動是文化取向的，是追求更自主的集體認同；舊社會運動則是物質主義的，要求經濟資源的重分配。套用 Fraser 的話來說，新社會運動不當地區分了重分配政治與承認政治，誤以為只在後者才需要建構認同。Calhoun (1993) 進一步指出，這種觀點過度簡化了階級運動，彷彿工人階級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就會自動形



成一致的階級認同，而不需要中介的溝通過程。事實上，即使所謂的「舊」社會運動，也是需要相同的認同形塑過程。

為了強調認同的獨立性，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所設想的認同形塑是不涉及利益的，沒有引發衝突的。誠如上一節的說明，認同總是與差異相連結在一起的，當某人接受了一項認同，同時也表示他拒絕了另一項的對立認同。事實上，越是在晚近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中，認同政治引發一連串社會運動的內部鬥爭與路線爭議越多。誠如 Goldberg (2003) 所指出的，認同形塑可以被視為一種分類鬥爭 (classificatory struggle)，這也就是說，認同不只是純粹的觀念性事物，同時也是攸關象徵性資源分配的衝突。舉例而言，當婦女運動強調女性要認同自己作為女性，一個涉及實際利益的鬥爭即是性別本身的社會意涵，女性的身分應該獲得更多的資源與權力。換言之，認同形塑固然是涉及觀念性元素的重新組合，但是沒有必要賦與認同過度觀念論 (idealistic) 的解釋，彷彿認同的建立就是完全與物質利益無關。實際上，認同政治也是一種物質利益的重分配政治，提出一種嶄新的認同，就是意味著該群體應該取得更多的資源。

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似乎也預設了一種真空的社會情境，彷彿認同形塑只需要透過對話、協商等溝通過程就可以完成。Cohen and Arato (1994) 認為市民社會即是建構集體認同的場域，而言談倫理學 (discursive ethics) 則是描述了認同形成的理性過程 (何明修 2001b)。然而，空泛的市民社會概念並無法掌握複雜的運動認同起源，言談倫理學更是純粹學院知識份子的貧乏想像，真實世界的認同並不是依據這套抽象的遊戲規則。就某個意義而言，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所觀察的個案多是晚近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是透過鬆散的網絡連結，因此容許內部多元聲音的辯論以及相對上較自發的認同形塑。因此，Melucci (1985: 798) 就認為，社會運動的概念容易造成過度實體化的想像，彷彿社會運動就是一個固定的、邊界分明的實體。Melucci 認為，應該改用運動網絡或運動領域來描述這一群參與者的關係。但是，這樣的討論卻是忽略了更基層的社會條件。舉例而言，參與晚近新興社會運動的份子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中產階級，這些生命歷程



背景的高度重疊難道不會有助於形成共識？同一個世代的成長背景提供了集體認同形塑的預設，使得共識更容易達成；換言之，新社會運動理論所忽略的，即是促成認同形塑的社會條件。

Tilly (2002: 33-34) 進一步指出，片面強調認同的觀念面向容易導致一種「現象學個體主義」(phenomenological individualism) 的謬誤。現象學個體主義認為，認同的內容即是存在於個體的意識之內，可以由任何當事者修改或創新，而免於社會關係的干擾。認同被化約為純粹個體稟性 (disposition) 的產物，而不是附著於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中。一旦認同被視為個體的自由創造，研究者只能描述運動認同的形成過程，而無法進行因果解釋。為了避免這種分析的困境，Tilly (2002: 47-48) 主張，認同的研究需要回歸到社會關係的基礎上，避免將認同視為純然內在於個體的產物。從這個觀點來看，認同形塑是社會關係的組合。採取新的認同就是建立一套新的社會關係，重新認定自己是屬於那一個群體。

因此，一旦採取了關係論取向的認同觀，運動認同的研究並不一定要與組織的分析脫勾。研究者不需要為了證明認同的關鍵性，被迫採取一種不切實際的觀念論立場，否定物質利益與制度的作用，如能梳理出認同與利益之間的相互作用，將是對學術更有貢獻的研究。

從上述的觀點來看，強烈的運動認同並不只依賴參與者內在的信念，而是需要附著在具體的制度安排，才能夠維繫我群與他群的社會邊界。只憑藉個體的意志，違背主流社會文化的運動認同是很難持續的，因為家人、朋友、同事的網絡會不斷施加同化的壓力，迫使當事者放棄自己的運動信念。舉例而言，有研究指出，美國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能夠長期維持分離主義的運動認同，關鍵在於她們成功地發展出一套另類的社區機構，能夠串連起運動同志的日常活動，透過彼此的互動不斷地強化認同 (Taylor and Whittier 1992)。一旦這些日常網絡消失了，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個體認同將不足以支撐運動的團結，容易導致運動社群的分裂與相互不信任 (Franzen 1993)。熱情的運動積極份子通常相信理念的說服力量，他們認為只要能夠成功地傳播理念，就可以達到動員的效果。然而實際上，認同的



形塑必須附著於既有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的有無、強弱與性質都會影響了認同的形態 (Gould 1995: 13-23)。因此，一旦參與者處於矛盾的社會位置，例如同時擁有抗爭群體與支配群體的人際網絡，可以預期地，他們的集體認同將處於分裂的狀態，對於運動的參與逐漸失去熱忱 (White 2001)。

外在的政治氣氛有可能改變運動社群內部的關係，也因此會產生對於認同的影響。一旦受到外界的質疑，社運組織經常被迫要與某些激進的立場劃清界限，重新定義運動的自我認同，排除某些極端的成員，以換取公眾的接受 (Gamson 1997)。在其他情況下，運動認同的窄化則是來自於運動成員的政治評估。在六〇年代中期以後，某些黑人運動組織逐漸相信體制內的改革不可能實現，他們開始排斥白人民權人士的參與，採取分離主義的激進認同 (Robnett 2002)。

最後，強大的運動認同往往需要其他文化傳統的支持，不可能無中生有。新社會運動論者太過強調運動認同的創新性格，彷彿運動參與者都沒有背負著各種傳統包袱，能夠自主地選擇最滿意的認同。社會運動的產生固然需要參與者新的自我認定，但是如果運動領導者能夠適切地選擇性採用既有的文化資源，使得運動能夠獲得舊有傳統的精神支持，而又免於其束縛，那麼將更容易釋放出廣大的動員能量。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除了對於官僚腐敗的厭惡以外，促使學生勇於公然抵抗共產黨政府戒嚴令的力量，部分也是因為政府指責學生運動是「反革命」的，讓這些自覺為知識份子的中國新一代菁英感到受辱，因而產生義憤填膺的情緒，也激發出強烈的參與意志 (Calhoun 1994: 38)。這種菁英主義的文化價值是具有雙重的性格：一方面，知識份子的榮譽提供了學生抗拒坦克車與機關槍的勇氣；另一方面，這種榮譽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集體認知之上，因此學生嘲笑他們所瞧不起的工人階級，他們認為這個運動需要工人來參與 (Walder and Gong 1993)，以及將解放軍軍人視為「沒有水準的鄉下人」 (Perry 1994)。十分類似地，Einwohner (2003) 研究指出，從純粹的成敗機會來計算，1943年華沙的猶太人起義是不理性的，結果證明抵抗納粹軍隊的生還率是零。但是促成猶太人起義的動機在於族群尊嚴，與其面臨被遣送



到集中營的命運，他們寧願選擇光榮戰死，也不願馴服地任人宰割。因此，猶太人的歷史記憶成為武裝抗暴行動的最主要支柱，集體行動的認同是來自於更深遠的、對自己文化的效忠。

總之，上述的討論試圖釐清運動認同的諸多面向。大致而言，新社會運動理論提供了初步的圖像，認同即是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文化層次連結。儘管如此，要進一步理解運動認同的作用，制度、社會關係以及文化傳統都需要被納入考慮。

四、個體生命歷程與集體行動的辯證

並不是每個群體都對社會運動有相同的參與意願，某些群體是抗爭現場的常客，另外有些群體則通常不會與抗爭聯想在一起。在以往，資源動員論學者將資源投入視為促成社會運動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可支配時間 (discretionary time) 的有無，成為影響社會運動參與的關鍵，例如有寒、暑假自由時間的大學生，工作時間較彈性的專業人士，就成為六〇年代之後各種社會抗議的主力部隊 (McCarthy and Zald 1987 b: 355-357)。這也可以解釋臺灣地方環境抗爭的一個明顯現象：為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家？尤其是引發長期圍堵的新竹水源里反對李長榮化工 (高清波 1997)、後勁反中油五輕 (王明輝 1989) 等案件中，只有這些有閒暇的阿公阿嬤，才能夠風雨無阻地長期駐守圍堵現場。同樣的理由也可以解釋美國家庭主婦在反對有害廢棄物運動的重要地位。家庭主婦是社區生活的靈魂人物，接送小孩上下學、購物等工作，讓她們有時間和機會與其他社區居民緊密地串連在一起，因而成為運動的活躍份子 (Szasz 1994)。

儘管如此，資源的有無仍不能完全解釋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個別差異。一方面，資源是受生命歷程因素的影響，一般而言，年紀輕、未婚、沒有子女的人，有比較多的可支配時間投入社會運動 (Wiltfang and McAdam 1991)。因此，生命歷程的背景無疑地是更為根本的關鍵，決定了當事者所具有的資源多寡以及形式為何。McAdam 等人即是以「生命歷程的可及性」



(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 的概念，來理解個體特質對於參與社會運動的影響。另一方面，資源的存在並不直接代表參與的意願，資源動員論只從社會資源的增加來解釋運動的出現，忽略了觀念性元素對於運動所發揮的作用。例如，具有同樣的生命歷程背景，意味著在相同的時代氛圍中成長，經歷相同的歷史事件衝擊，容易養成相似的世界觀，有助於運動認同的形成。誠如 Mannheim (1936) 所指出，世代 (generation) 的政治意涵在於，成長時期的共同經歷容易形成特定的政治觀點，成為共享的時代精神。

McAdam (1988) 研究 1964 年的自由之夏 (Freedom Summer)。這個運動是美國北方大學生利用暑假時期，深入南方幫助黑人選民登記。自由之夏運動最大的特徵之一，即是運動參與本身的高度危險性，許多運動份子的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南方反動白人的威脅。McAdam (1988: 11-24) 指出，只有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才能夠支撐這樣強大的理想主義動員。這一群戰後嬰兒潮世代 (baby boomers) 面臨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高峰，即使高等教育迅速擴充，大學畢業生大幅增加，他們也不需擔心就業問題。在優渥的物質條件下，他們養成了高度的樂觀主義，相信個人的努力可以改造命運。原先他們天真地相信美國政治體制所宣稱的價值，但後來卻發現了赤裸裸的種族壓迫，激發了他們的良心，因而熱情地參與民權運動。McAdam (1988: 41-53) 進一步分析這些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背景，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是來自於北方的菁英學校與中上階級家庭，暑假不需要打工賺學費，因此有閒暇可以投入理想主義的實踐。

自由之夏的故事顯示，即使在最無私的社會運動中，物質條件的存在仍是必要的。誠如 Bourdieu (1984: 55) 精闢的見解，「經濟權力首先即是一種與經濟所需保持距離的權力」。只有在沒有利己的社會壓力下，崇高的利他動機才有可能實現。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 46-49) 的研究指出，巴黎的大學生比法國外省的大學生更願意認同自己是屬於左派，也更傾向從事異議運動。在巴黎，大學生多數來自於富有階級，他們與家人共同居住，也接受家庭的經濟支助，很少在外頭打工。正是由於這些社會特權，巴黎大學生才能與他們的社會起源保持距離。巴黎大學生的滿足並不是從課業



成就而來，而是在於課業外的政治辯論。與外省的大學生相比較，巴黎大學生擁更多的知識資源，如眾多的圖書館、博物館和教授。相對地，鄉下的大學生則更依賴學校的課程，很少有機會挑戰教授的權威，因而缺乏參與運動的動機。

在臺灣的學生運動中也可看到類似現象。研究者指出，相對於其他大學，臺大學生的高度參與學運是顯著的現象，整個學運甚至可以概分為臺大幫與非臺大幫兩股勢力（何榮幸 2001；鄧丕雲 1993；Wright 1999）。一般的解釋強調臺大的自由學風、批判傳統等知識性因素。然而，不可否認地，通常臺大學生的家庭背景比一般大學生優渥，在沒有賺學費的壓力，以及畢業後不愁沒工作的情況下，參與運動的代價自然大幅降低，這可說明為何許多學運份子出身於臺大。

另外，臺灣婦女運動的發展也與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背景有極大關係。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的女性大多具有兩個共同的社會背景，她們大多接受文學院的訓練，而且幾乎都是留美的。根據王雅各（1999: 59-62）的說法，這種「文學院式婦運」，使得臺灣婦運的發展充滿了中產階級的性格。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重男輕女的觀念下，能夠讓女兒唸非師範院校的高等教育，家庭環境應在小康之上。同樣地，臺灣最早的女同性戀團體也是由年輕的高學歷人士所發起，根據趙彥寧（2001: 56）的說法，「組成者的知識階級與象徵資本屬性從未受到質疑」。

從這個角度來看，被支配者的最大悲哀並不只是他們處於邊緣化的社會處境，被剝削了美好生活的機會。更重要地，被支配者也缺乏構思另一種社會圖像的知識工具，他們被鎖死在封閉的世界之中，看不到超越的可能性。換言之，物質的剝削也就意味著被剝削者只能忙於物質生活的汲取，他們缺乏能夠支撐社會抗議的生命歷程資源，也因此更難改變他們的共同命運。

此外，自由之夏的另一項啟示即是，社會運動風潮是有世代的共同經驗為基礎。可以這樣說，沒有美國戰後成功繁榮的資本主義，就沒有六〇年代毫無畏懼的理想主義。在臺灣，促成八〇年代種種社會運動出現的原



因之一，即是七〇年代後期逐漸成長的返國服務留學生。這些回國的留學生當中，以大學教授、知識份子的身分參與或支持不同類型的社會改革，且在大學校園之間引起一股學生參與社會改革的風潮（王甫昌 1999: 530-531）。Lynch (2002-2003) 進一步指出，這些留學生在國外接觸到的是一種民主的「全球文化」

(global culture)，他們理解到民主可以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因此，等到他們回臺灣之後，這種新學到的政治文化就推動了強大的民主與獨立運動。同樣地，在解嚴之前，臺灣的反核運動主要是由幾位留美歸國的教授（例如林俊義、張國龍等）所倡導。從他們的生命歷程背景來看，這些反核教授幾乎都是在七〇年代留學出國，正好遇到美國反核運動的興起，發生於 1979 年的三哩島 (Three Mile Island) 事件是促成他們開始質疑核能發電的關鍵事件 (Ho 2003a: 689)。

優勢的家庭背景、樂觀主義的世界觀、先進文化的接觸，這些生命歷程因素均有助於社會運動的產生。從另一方面來看，參與者生命歷程背景的差異也會影響社會運動的路線發展。Whittier (1997) 研究美國婦女運動為何會走上激進女性主義的路線，發現其中一個關鍵即是比較晚進入運動領域的世代沒有前一代的學運經歷，她們傾向於將性別解放視為最首要的目標，而不將婦運放置於更高的新左派意識形態之下。因此，造成社會運動激進化的原因並不一定是由於運動路線的移轉，而是因為參與者生態的改變，由另一群世界觀完全不同的世代取得了主導權。

根據 Gitlin (1980: 127-145) 的研究，美國學運組織 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也歷經了類似的變化。在六〇年代初期，SDS 是一小群有共同左派意識的學生團體，他們在各個校園進行宣傳與動員。突如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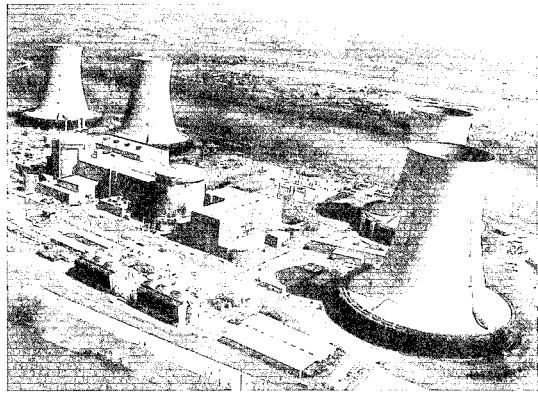


圖 3-1 三哩島核電廠發生外洩事件後二天，在天空中仍可偵測到輻射反應。



的媒體知名度，使得 SDS 成為新聞的熱門焦點，也吸引了許多不同背景的學生參與。六〇年代中期陸續加入的學生缺乏共同的意識型態，他們被 SDS 的媒體形象所吸引，傾向於相信激進的口號與行動，而不是紮實的社會分析。如此一來，SDS 在六〇年代後期走上了恐怖主義與暴力的邊緣化道路，成為無所不在的炸彈客，引起社會反感，再也無法發揮改造社會的作用。十分類似地，范雲 (2003b: 152) 指出，以 1994 年為分水嶺，前期的婦女運動參與者擁有較優勢的階級與教育背景，因此採取社會服務、立法遊說與文化宣傳的運動策略；而晚近的參與者則由於其成長過程受到各種社會運動的影響，較願意採草根動員的策略。

相對於其他更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模式，例如政黨與遊說團體，社會運動組織的邊界較為模糊，更需要參與者的理念認同。因此，參與者的組成十分重要，他們共同的生命歷程背景經常是具有影響性，他們習以為常的世界觀也決定了社會運動的走向。臺灣在經歷九〇年代初期的學運風潮之後，各大學的改革性社團日益萎縮。即使學運仍零星可見，但已不再關注政治性議題，相對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生活議題的抗議，例如要求校園停放機車、反對取締盜版 MP3 軟體、解除宿舍不准異性過夜的禁令、抗議網際網路的高價格與低品質等問題。這些議題能夠引發集體行動，顯示新一代大學生對抗議的意願與能力並沒有減弱，但是不可否認地，他們也越來越喪失超越校園與私生活以外世界的關切，他們的抗議也不再帶有強烈的公共性格。無論是讚賞還是哀悼這種發展趨勢，如果能理解近十年來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改變，包括「臺灣社會不合理的政經結構已大幅改良、學生自我實現的管道逐漸多元、社會價值崇尚短線操作與急功近利、政黨惡鬥與政局混亂更令人沮喪失望」（何榮幸 2001: 74）等等因素，有助於解釋大學生的集體轉向。換言之，當他們不再感受到校園內存有政黨體制的種種不當壓制，又如何引發對政治性議題的關切？

個體的生命歷程背景影響了社會運動的產生以及其取向，同樣地，密集的運動經驗有可能在參與者的生命歷程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記，甚至是決定了往後一系列的生涯發展。對於某些人來說，影響他們一輩子最重要



的關鍵可能是某位貴人、某一本有啟發性的書、某個宗教神祕經驗等，同樣地，對於另外一群人而言，某次社會運動的經驗也許更為刻骨銘心。

社會運動的參與有可能帶來自我概念的轉變 (Kiecolt 2000)。一種可能是參與者認同階序的調整，使得某一種認同晉升到更主導的位置，因而貶低了原先的主要認同。歐洲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引發出新一波的婦女運動即是明顯的例子。對於許多女性學運份子而言，新左派的意識型態雖然表面上宣稱追求解放，但是實際上卻是複製了父權主義的性別支配。在學生運動中，女性參與者被分配到文書、後勤的次要工作。在運動組織中，性別議題的討論是被壓制與邊緣化的。因此，到了七〇年代，婦運脫離了新左派的共同框架，追求純粹的性別認同。另一種自我概念的轉變，是在既有的認同上建構新的意義。經由運動的參與，以往被貼上負面標籤的身分特徵或是生活方式，反而可能成為群體驕傲的來源。舉例而言，在臺灣以往的國營事業中，現場的操作人員被認為是「做工仔」，這是一個過去一向被看不起的稱呼，這個標籤意味薪水差、沒尊嚴，只能任由上級主管所指揮。因此在八〇年代末期興起的國營事業工會運動中，一個最能打動人心的口號就是「工人要有尊嚴」，這顯示工人開始將一個被歧視的字眼轉變成為正面的、肯定的認同（何明修 2004a）。

Lichterman (1996) 的研究指出了另一種社會運動與個體生命歷程的連結。在他看來，美國六〇年代社會運動風潮遺留下了一種個人化的政治 (personalized politics)，這些運動積極份子在他們的生活領域中實現他們的理念。對於他們而言，個人化的政治即是一種尋求生命意義的方式，他們只能在一系列的運動活動中實現更圓滿的自我。這個政治參與需要的是強烈的認同，而不是組織網絡，其成功的判準是心理滿足感，而不是外在的報酬，因此更能夠維繫長期的運動參與。對於 Lichterman (1996) 而言，八〇年代末期的美國社區環境運動，例如各種反有害廢棄物的抗議，即是展現了這種個人化的政治實踐。一群運動份子試圖在他們的生活周遭，追尋運動參與的意義。

在特殊的情況下，運動理念也會深刻地烙印在參與者的日常生活中。



Gitlin (1987: 72-77) 指出，美國五〇年代的反共風潮摧毀了社會主義的運動組織，但是卻沒有根除左翼的勢力。面臨極不友善的政治環境，美國的左派份子形成了一個互動緊密的生活世界，他們的醫生、律師、朋友都是信仰社會主義的圈內人，他們的小孩從小就被教導學會懷疑媒體、教師、政治人物的說法。舉例而言，一位社會主義家庭的子女很深刻地記得，當他告訴父母，學校老師在上課時提到「我們失去了中國」，他的父母則是告訴他，「不，我們支持的那一邊勝利了」（指共產黨在 1949 年擊退國民黨，取得中國政權）。換言之，成長於左翼家庭的小孩是包著紅色尿布長大的 (red-diaper babies)，他們長大後促成了六〇年代的抗爭風潮。

同樣的觀點也呼應了 Katzenstein (1990) 對於同時期美國婦女運動的觀察。儘管八〇年代被認為是保守主義當道的時期，先前婦女運動所種下的種籽卻開始在美國政治制度內萌芽。即使在一向保守的天主教教會與軍方，女性要求性別平等的聲音也開始獲得重視。相對於主流婦女運動採取正面攻擊，直接挑戰父權社會，Katzenstein 將這種形式的運動稱為「非干擾式的動員」(unobtrusive mobilization)，原因在於她們是接受制度的存在，而後再從制度中挑戰其中的性別壓迫。同樣地，這種非干擾式的動員也意味著一種社會運動的生命歷程遺產。在積極的運動參與之後，當事者回到了在她們所處的個別工作與生活領域，並且在其中實現自己的運動認同。

一般而言，要確切梳理出社會運動參與所造成的生命歷程影響，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分辨影響是來自於參與經驗，還是意識型態或其他因素，在方法論上就有其挑戰性。其次，要能找到關鍵性運動參與事件，並且明顯區分出參與者與未參與者兩個群體，也有其難度。對於這個難題，McAdam (1988: 199-240; 1989) 對自由之夏的研究頗具啟發性。他找出了兩群人，一群是有實際參與自由之夏的人，另一群是報名後卻臨時沒有出現的人。他發現這兩群人呈現顯著的差異，實際的參與者會強化個體的運動認同，以及帶來另類的生命選擇。他們傾向於在日後涉入更多的抗議議題，而且有工作狀況不穩定、晚婚等特徵。其中不少參與者為了維持他們的運動信仰，甚至犧牲了個人的生涯發展機會。



McAdam 的研究證明實際參與運動所帶來的生命歷程影響。在同時，他也試圖反駁一個常見的反動論述，亦即是六〇年代的社會運動只是青澀幼稚的反叛，後來興起的保守主義才是成熟圓潤的智慧。六〇年代之後，美國的文化象徵從充滿反抗性的嬉皮 (hippies)，轉變成為拜金主義的雅痞 (yuppies)，似乎是證實了這種論述。很顯然，「浪子回頭」的故事相當符合主流社會的敘事法則：有什麼比背教者本身更能證明某一種教義的謬誤？事實上，這種反動論述也隱藏了一種更惡毒的詮釋，把運動份子的參與動機解釋為純粹為了個人生涯 (careerist)，即社會運動只是他們地位晉升的工具，一旦不再有利用價值，就可以隨手拋棄。在臺灣，由於一些前學運份子踏足政治界，有少數甚至是直接進入政府體制，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因此某些有心人士更是振振有詞，企圖將「學運世代」貼上機會主義者的標籤。這種論調所忽略的即是，臺灣的「學運世代」不能被化約為檯面上的幾位明星級人物，成千上萬位曾參與過 1990 年三月學運的成員，都算是學運世代，而學運世代的未完成故事也應該由他們的生命來撰寫。

個體生命歷程與集體歷史的緊密糾結，是社會運動研究的旨趣之一。要促成社會運動的起步，必須要有若干生命歷程背景的參與者，另一方面，社會運動本身也會改變參與者後續的生命歷程發展。一旦我們能夠理解到這種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相互辯證，理性選擇論的個體主義預設就是不攻自破。很顯然地，集體並不是個體的機械累加總合。經歷了共同的動員過程，一個更緊密的集體浮現，同時也使個體獲得全新的自我。

五、結 論

法國文學家斯湯達爾 (Henri-Marie Beyle Stendhal) 認為，美是幸福的承諾 (*promesse du bonheur*)。同樣的說法也可以用於社會運動，能夠激發出強烈參與熱忱的關鍵不外乎是美好生活的願景。對於未來的期待說服了個體，使他們願意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投身於某一種集體志業。

這一章處理認同與生命歷程的問題，這兩個概念都涉及了個體與集體



之間的互動過程。認同是一種想像性力量，使得想像主體將自己與另外一群人視為命運共同體。認同在既有的社會關係之外，描繪出另一幅社會關係的圖像：某些未曾見過面的人被認為是與我們十分親近的，相反地，某些在我們身邊的人則被當成外人，甚至是要反抗的對象。當代的認同政治凸顯了自我的多元想像可能性，個人的每一種身分特徵幾乎都可以用來劃出社會抗爭的軸線。另一方面，認同政治的出現強化了差異的政治意涵，揭露了社會同質化的壓迫性。相對於某些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本章認為純粹的差異性政治只會導致理論上與實踐上的困境。一方面，差異性本身就蘊涵了同一性，強調群體之間的本質性差異，只會抑制了群體內的差異性。另一方面，在缺乏普遍主義的原則（例如正義）情況下，差異性有可能淪為一種反動勢力的修辭，用來捍衛他們的特權。因此，一種理解當代認同政治的方式，在於將它視為一群人共同追求集體承認，獲取未獲伸張的道德肯定。如此一來，認同政治可被視為一種反壓迫運動的延伸，可以同時使用差異性與同一性的策略。

任何成功的社會運動都需要參與者最低限度的默契，他們必得要相信彼此面臨相同的處境，需要共同一致的行動，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建立集體認同是社會運動必要的環節。不過必須強調的是，認同是觀念性的建構，但這不意味認同是超越利益以上。認同設定了一套想像的社會秩序，在其中被壓迫者的地位與自尊獲得肯定，這種觀念化的過程就是涉及了象徵利益的重新評估，也是一套運動組織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認同的建立不是憑空想像的，彷彿利用觀念性元素就能在純淨的社會真空中進行。現實的運動認同必須透過人際網絡傳遞，會受到政治氣候影響，也受制於既有的傳統文化。只有當這些物質因素被考慮進來，我們才能完整地理解社會運動的認同建構。

最後，關於生命歷程的問題。社會運動是諸多個體的集合，除了共同的運動認同以外，參與者之間也可能享有一致的養成背景、成長環境、時代氛圍等個體生命史特徵。共同的生命歷程因素可促成某一種社會運動產生，同樣地，相異的生命歷程因素則有可能導致社運組織內部的鬥爭，甚

相近的個體 { 共同生命史 (利益)



至演變成路線的爭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要求參與者親身投入運動，而不只是貢獻外在的資源，如捐錢了事。因此，社會運動比其他形式的集體行動更容易改造參與者的自我，使得他們走向另一種生命選擇。在社會運動之中，個體生命歷程與集體歷史是交織混雜的，也因此形成一個引人入勝的研究議題。

第四章

組織與網絡： 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





一、有組織的集體行動

Granovetter (1978: 1430) 指出，以往大部分的文獻都採取一個假定：參與集體行動的成員彼此都是陌生人，缺乏橫向的聯繫。集體行為理論主張，社會秩序的解體造成社會控制的減弱以及個人的心理緊張，群眾運動就是一種疏導攻擊性情緒與不滿的表現。Hoffer (1951) 認為，只有在社會上一無所有的人，才會投身於政治狂熱主義。他們的個體是如此貧瘠，迫使他們擁抱一個更廣大的集體理念。缺乏社會資源的個體是處於原子化 (atomized) 的狀態，他們只有孤伶伶的自我，沒有能夠產生意義的人際關係，也因此，他們才會獻身於一個攻擊現狀的群眾運動。

另一方面，理性選擇理論是採取截然不同的理性主義預設，但是其社會圖像卻與集體行為理論相類似，把集體行動的參與者當作獨立的個體。搭便車的現象之所以產生，原因在於個體無法確知其他人的決定，使得彼此之間無法協調。決策的獨立性與結果的相互依賴，使得集體行動難以產生。因此，理性選擇理論與集體行為理論產生了某種的互補性，前者認為理性的個體不會參加群眾運動，後者主張不理性的個體才是群眾運動的主力份子。儘管表面上兩者存在著理性主義觀點的差異，其實兩者都沒有質疑個體主義的預設。

自從資源動員理論出現之後，這種陌生人的假設被廣泛地批判。晚近的研究者認為，在缺乏社會關係的支持下，個體層次的不滿只會帶來心理壓抑與幻想，至多只是暴力取向的偏差行為，但是不會產生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參與。更重要的是，只有透過社會關係的聯繫，個體才會體認到彼此共同的處境，進而認知到個體的不幸是來自於集體的壓迫。透過社會關係，人們可以確認共同參與的立場和風險的分擔，因此也提高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也是一組社會關係的重新組合，而不是社會關係的斷裂。

這一章將要處理社會運動內部的社會關係。根據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3) 的定義，這種促成集體行動參與的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即是動員結構。大致來說，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可以分為社會運動組織，以及事先存在的人際網絡 (pre-existing interpersonal network)。

社會運動組織的重新發現是資源動員論的一大貢獻。資源動員論指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並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涉及領導與追隨的預先分工。在每一次抗爭之前，社會運動組織必得負責籌劃諸多事宜，例如動員群眾、宣傳理念、組織領導架構。無疑地，組織其實是社會運動的靈魂中樞。組織的成立標誌著運動的開展，同樣地，組織的解體則是代表運動的沒落。分析社會運動組織的運作原理，例如組織與環境的關係，組織正式化的得失，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運動的走向。

同事、朋友、同學等關係，都是有助於社會運動動員的潛在人際網絡。McAdam (2003: 285) 指出，網絡的重要性是社會運動研究中最能獲得證實的結構之一。社會運動都是召募一群彼此認識的人，在一個既有的社會情境中發生，而且是透過現存的管道傳播的。社會運動依附著既有的網絡，這個事實也指出了一點，要求改變社會的集體行動也起源於既有的社會結構，而不是無中生有。烏托邦的思想可能只在哲學家的頭腦中孕育，然而烏托邦的社會運動則需要具體的結構附著性。因此，研究社會運動的網絡起源，也等於是討論社會結構的辯證，一方面它維持了某一種形態的壓迫關係，另一方面則為自身埋下了反抗與變遷的種子。

二、社會運動組織：競爭與合作

McCarthy and Zald (1987a: 20–23) 認為，促成或抵抗某一種社會變遷趨勢的想法只是一種潛在的意願，並不一定能夠發揮政治影響力。就如同政黨體制可將各種社會部門的利益匯集，形成能夠影響政策的民意；社會運動組織也發揮同樣的功能，將各種潛在的意願集合起來，並且充當他們的代言人。資源動員論強調意願與組織的關係。一方面，缺乏組織的意願等於是看不見的。當每個社區居民都感到治安敗壞，生活品質惡化，但是卻



沒有人將這些意見組織起來，形成具體的行動，那麼這些不滿也等於是實際上不存在一樣。另一方面，組織並不只是被動地反映某些既有的意願，組織有可能採取主動，積極地定義民怨，進而形塑出可被他們代言的意願。資源動員論接受某種企業經營的模式，主張社會運動組織對於參與群眾的主動性，透過組織領導，社會運動才能夠產生。因此，社會運動組織的出現是要歸功於所謂的「議題企業家」(issue entrepreneurs)。只有當他們將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處境，重新建構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新的集體參與空間才被正式開啟 (Schonfeld, Meier and Griffin 1979)。

資源動員論以經濟學的方式來思考社會運動，在這個類比下，社會運動組織就如同個別的公司 (firm)，他們忙著向消費者公眾推銷自己的理念產品。在資本主義之下，同一種產品通常有多家公司共同競爭，同一家公司也可能同時經營不同的產品市場，所以，社會運動產業 (social movement industry) 的概念代表同一個議題領域上的社運組織之總合，而所有社會運動產業的總合則可以稱為社會運動部門 (social movement sector)。就如同經濟領域有商業週期的榮枯變化，整個社會運動部門的規模也是反映了傳播技術、政治氣氛、國民收入等因素的變化。

在常識看法之下，追求相近目標的組織應該會齊心協力、相互合作，然而在實際上，社會運動組織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面，社會運動組織有可能相互競逐媒體注意與象徵性的領導權，而且仰賴相同來源的資源供給。不同的社會運動組織有時願意放棄彼此的立場差異，形成特定議題的聯盟組織；但在多數時候，路線的爭議會形成嚴重的派系傾軋，排除任何合作的可能。

造成社會運動組織競爭的原因之一，在於他們對資源的依賴。從人口生態學 (population ecology) 的角度來看，任何組織的數量反映了外在環境的資源供給量。一旦環境變得不利，例如政府打壓社會運動、公眾對於社會運動的認同減弱、捐款與參與的意願降低，那麼資源競爭的壓力將會提高。因此，組織密度的因素直接影響了社運組織的存活率，如果環境變得更有敵意，資源取得能力較弱的社運組織就會面臨了被淘汰的威脅



(Minkoff 1994)。

在資源競逐過程中，一種常見的社運組織策略即是提出更為局部化的運動路線，只針對某些特定議題進行宣傳。對於任何組織而言，尋找適切的生存利基 (niche) 是能夠站穩腳步的第一步。McCarthy and Zald (1987a: 35) 指出，「如果某個社會運動產業競爭更激烈，新的社運組織將會採取更窄化的目標與策略」。舉例而言，美國的環境運動在歷經了長期的動員之後，已經成功地喚起一般大眾的環境意識。在同時，隨著整個環境運動產業的成長，各個環境團體的運動策略也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有些團體側重國會遊說，有些則是以直接行動為主。即使在相似的保育主張中，海洋生物、森林、鳥類、河川等不同的領域也產生各式各樣的分工，形成對單一議題的關切 (Dunlap and Mertig 1992)。

此外，為了開創組織的利基，社運組織也試圖發展出獨樹一幟的抗爭方式，使得公眾可以一眼就辨認出他們的風格。國際環境組織，例如綠色和平 (Greenpeace) 與地球第一! (Earth First!) 在八〇年代以來，大量採取戲劇化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阻止核武試爆或原油開採。這些「細心算計的違法行動」(calculated law-breaking) 不只造成被抗議對象的困擾，同時也為主事組織帶來亮麗的媒體宣傳以及豐碩的捐款 (Rucht 1995)。



圖 4-1 在一場名為 Socialist Spanish government 的抗爭中，綠色和平組織的成員懸吊在西班牙 Burgas 市核電廠的鐵門上，封閉其主要通道。(2004 年 10 月 19 日，Pedro Armestre 攝)

在以往，社會運動組織的路線爭議通常被視為意識型態的分歧。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改革或革命、修正主義或教條主義的辯論從來沒有停息過 (Sassoon 1996)。然而，從社會運動的組織要求來看，影響路線分歧的更根本原因有可能被掩飾起來了，真正的解答其實在於資源的有限性，造成組織之間的競爭。誠如 Zald and McCarthy (1987: 168-169) 所觀察



的，彼此衝突最激烈的社運組織往往是意識型態最相近的，而不是立場迥異的，因為意識型態相近的社運組織資源供給重疊性太高，容易引發共食性的競爭。舉個本土的例子來說明，臺灣所有的工運團體都主張產業民主、反對民營化、解除成立工會的限制、擴大勞基法的適用範圍等有利於工人的訴求。然而，臺灣勞工陣線、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勞動黨等主要團體的共同合作卻十分罕見，彼此的關係是冷淡的，有時甚至充滿不信任與對抗（林瑩秋 1995）。統獨立場、政黨傾向、運動路線（組織工人階級政黨或與既有政黨合作）之分歧，都是常被用來解釋的因素。然而不能忽略的是，這些工運團體的衝突是具有物質基礎的，通常是涉及了各個產業工會與產業總工會的地盤爭奪。對於各個工運團體而言，工會具有廣大的會員群眾，能夠提供經費捐款與動員網絡。工會的會務人員職位可以充當工運團體幹部的棲身之處，會刊則是發揮輿論影響的管道，因此工會成為各個工運團體爭奪的戰場。

儘管有資源上的互斥性，社運組織也有可能發展出實質的合作關係。在非正式管道中，不同社運組織之間的人員交流、訊息傳遞、設備支援是常見的。除了這些私底下的交流，聯盟性的社會運動是最值得探討的現象。

一般而言，社會運動的聯盟是議題取向的，通常只是針對單一事件或訴求而發動，社運組織的合作關係也具有高度的條件性與局部性。聯盟運動的最明顯效益即是提升議題的能見度，更多社運組織的支持連署形成不容忽視的力量，意味著事態的嚴重性，能夠獲得媒體與執政者更多的注意。此外，聯盟運動匯集了眾多組織的力量，可以進行所謂的「中層動員」(mesomobilization)，亦即是協調與整合其他組織的「微觀動員」(micromobilization)，形成濃密而相互交織的動員網絡，促使更多人的參與 (Gerhards and Rucht 1992: 558-559)。在成功的聯盟運動中，溫和與激進的運動策略可以同時採用，由不同的組成團體分工負責 (Stoecker 1993: 177-178)，分別扮演黑臉與白臉。簡單地說，聯盟運動即是社運組織的資源匯集，以期達到更廣大的動員效果。

需要說明的是，聯盟運動也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不同社運組織成員



與領導人互有重疊性、執政者的誘導、彼此可進行任務分工等，都是促成聯盟的重要因素 (Zald and McCarthy 1987: 171)。對於不同性質的社運組織，參與聯盟運動的成本效益計算也有所差異。大型而科層化的社運組織本身的資源較為豐富，更有能力支應聯盟運動組織的需要。然而，這些組織也通常有自己事先排定的活動議程，而且他們的決策方式是需要透過上級的認可，沒有辦法完全投入聯盟運動。相反地，資源匱乏的組織比較有參與的熱情，因為他們只能透過這種方式來發揮影響力。不過，他們也會擔心聯盟運動被強勢的成員組織所把持，自己淪為跑龍套的附庸 (Staggenborg 1986)。另外，聯盟運動也帶來了同化的壓力，迫使各個成員組織必須暫時放棄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議題或策略。在美國七〇年代爭取性別平權的運動中，為了爭取大部分選民的認同，婦女運動聯盟組織就試圖壓制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女同性戀的聲音，避免被保守派貼上負面的標籤。理所當然的，這種聯盟運動的策略後續引發了一連串的内部爭議 (Mansbridge 1986: 131)。

因此，無論社運組織的關係是競爭或合作，資源的持續而穩定的供給是組織生存的最重要關鍵。即使在最需要理念認同的社會運動中，社運組織也需要將意識型態追隨者轉化成為會員，從他們身上汲取必要的資源，例如會費與義務工作時間，否則無法匯集成為一股集體力量。

三、社會運動的組織形態：科層組織及其批判

社運組織的形態是另一項資源動員論所提出來的問題。在以往，組織的討論深受 Michels (1962) 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理論所影響。Michels 基本上主張，社會運動需要進行組織的專業化，有明確的階層分工與領導統御，才有辦法追求集體目標。只有科層化的組織才能因應複雜而多樣的事務，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處理集體行動的協調問題。但是組織的發展也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組織為求生存，可能迫不得已犧牲運動的目標。社運組織內部的角色分化也使得內部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被複製與持久化。簡單地說，追求民主的社會運動需要組織的力量，但是組織會帶來寡頭化的效應，因此，社會運動不可能導致所企求的民主化目標。

儘管李丁讚、林文源(2003)的研究並沒有提到寡頭鐵律，但是他們對於臺灣環境運動的發展其實有相近的結論。李丁讚、林文源主張，九〇年代的臺灣環境運動經歷了一個明顯的「組織化」階段，使得「組織技術」逐漸取代了民眾的直接參與。環境運動逐漸由專業的中產階級所主導，他們的文化品味與文化資本不同於低下階級，因此產生抑制草根參與的結果。

資源動員論試圖證明，Michels 所設想的寡頭鐵律劇本並不是社運組織發展必然的結果。McCarthy and Zald (1987b) 指出，美國六〇年代社會運動的興盛是由於專業社會運動企業家的介入，他們成功地獲得了良心擁護者 (conscious constituencies) 的支持。抗爭風潮並不是來自於被壓迫群眾由下而上的動員，而是透過外來資源與組織的導入。資源動員論學者認為，社運組織的發展並不會遏制社會運動的風潮，反而會促成更多的運動參與。進一步來看，科層化組織至少包括了兩個面向，首先是專業化，亦即專職人員取代志願工作者的趨勢，其次則是正式化，即組織運作的規章化與命令的階層化。Zald and Ash (1987: 130–131) 就指出，寡頭化只可能發生於某一種類型的社會運動，尤其是那些依賴物質誘因而來鼓勵參與的社運組織，例如工人運動組織訴求工人階級的福祉，也是以工人階級大眾作為主要的參與者。一旦社運組織的資源是來自於沒有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良心擁護者，專業化反而成為社會運動的助力。

資源動員論重視專業化與正式化的社運組織，他們認為這種組織趨勢可以解決 Olson (1965) 所指出的集體行動困境。既然社會運動的直接受益者沒有發起與參與的意願，外來的專業人士與資源提供正好適時地克服了這個難題，使得社會運動得以起步。因此，科層化的組織被視為促成社會運動的關鍵，專業人士所具有的能力被認為遠比被壓迫者的民怨更為重要 (Freeman 1973; Marx and Uscem 1971; Tierney 1982)。

資源動員論對於社會運動組織性格的強調，基本上是為了反駁先前集



體行為理論的觀點。因此，他們試圖證明社會運動不能化約為群眾行為，集體行動的參與是具有領導者與追隨者的結構化關係。然而，這種觀點的矯枉過正，使得當代社會運動的專業化與正式化程度被高估，科層化組織的動員能力也被過度誇大。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現今鉅型組織主導的社會下，社會運動的組織形態仍呈現了多元化的樣態。專業化與正式化只是社會運動的一種組織方式，而且並不見得是最有效的一種。在此，有幾個理由可以說明。

首先，能夠維持科層組織的運作，必須要有一定規模的資源累積，但是並非所有的社會運動議題都能夠達到這種資源門檻。Gerlach (1999: 85-90) 指出，大部分社運組織是呈現環節的 (segmentary)、多重中心的 (polycentric)、網狀的 (reticulate) 組織形態。環節的組織是由許多並非完全整合的次團體所構成，彼此的關係鬆散。多重中心的組織缺乏穩定的領導，經常是處於領導權的競爭狀態。網狀的組織代表著一種不嚴密的網絡，而不是層級分明的命令與執行關係。很顯然，資源不足是造成這種組織去中心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Freeman (1979) 對於七〇年代美國婦女運動兩股流派所做的比較，也呈現了資源供給因素的差異。舊派的婦女運動是以全國婦女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為代表，主要從事法律遊說的工作。舊派的婦運組織擁有較豐富的具體資源（例如金錢、空間與知名度）與社會地位，傾向於以專業化的方式來運作。相對地，新派的婦運投身於在地化的實踐，建立許多為女性服務的社區機構。雖然缺乏具體資源與社會地位，新派的婦運卻獲得較多有熱忱的參與者支持，願意投入時間義務協助，因此能夠形塑出廣泛的參與網絡。這個例子指出，資源種類的不同，也會影響社運組織正式化與專業化的程度。

其次，對於許多社會運動參與者而言，科層化的組織違背了他們的運動理念。六〇年代所開啟的種種社會批判思潮之一，即是對於科層體制的反省。資本與權力的集中固然是要挑戰的對象，但是傳統的政黨、工會與其他群眾運動組織，也是具有高度的科層化，同樣帶來新的支配。新左派



的社會運動重視參與式民主的價值，強調過程與結果一樣重要，沒有必要為了達到一個民主的遙遠目標，而採用非民主的手段。他們認為，為了推翻一個壓制性的政權，卻得建立一個壓制性的革命組織，這是沒有道理的說法。因此，在許多新社會運動中，領導者的輪替、以共識而非投票來進行決策、密集的小組會議成為明顯的特徵，其目的即是在於儘可能地維持所有運動者的參與。歐洲的綠色政黨發展體現了這種參與式民主的理念，因此，他們展現出一種異於主流政黨的運作邏輯，他們注意支持者的意識型態，遠勝於掌握更多的選票 (Kitschelt 1989)。

最後，儘管科層化的社運組織有種種缺陷，但不可否認地，它能夠存活較久，因此有利於長程的運動策略規劃。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科層化組織是萬能的，能夠滿足社會運動招募、動員、宣傳、抗爭、談判等多重的任務。事實上，組織的穩定性往往犧牲了彈性。Freeman (1973) 指出，雖然新派的婦女運動經常陷入「缺乏結構的暴虐」(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冗長的會議最後經常是議而不決，意識型態的內鬥也消耗了砲口一致對外的能量，但是正由於她們容許多元的參與，才能開發出許多日常生活領域的性別政治議題，以及富有創意的動員方式。Staggenborg (1989) 的同樣研究美國婦運，她發現科層化的婦運組織受制於例行化的議程安排，無法開發新議題的動員。要推動新一波的抗爭運動，社運組織的決策必須更為迅速、資源調度需要更為靈活，而且主事者要願意承擔風險。不幸地，這些都不屬於科層化社運組織的特性。

對於科層化組織的效率崇拜容易誇大其作用，忽略了其他形態社運組織的貢獻。Morris (1984: 139-173) 指出，某些與主流社會脫離，而且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運動中途之家」(movement halfway houses)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正由於他們的參與人數有限，因而形成一個緊密連結、自由討論的小群體，容易傳遞運動的批判理念。美國二十世紀初期和平運動所遺留下的組織，例如高地人民學校 (Highlander Folk School)、和解之友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南方會議教育基金 (Southern Council Education Fund) 等，都為日後的民權運動打下重要的基礎。在臺灣，長老教會在 1982 年引



進了加拿大的基督教城鄉宣道會 (Urban Rural Mission, 簡稱 URM), 訓練了上千位的臺灣學員, 許多人後來都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幹部。同樣地, 慈林教育基金會自 1993 年起也舉行了七屆的「社會發展研修班」, 提供了社運人士交流的重要管道。在更晚近, 許多教育改革運動者與社區運動者投入各地的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的組織形態可以說是另一種的運動中途之家, 能讓運動幹部獲得棲身之處, 設計另類的啟蒙性課程, 深入在地網絡, 開展出新一波的運動動員。

值得一提的是, Meyer and Tarrow (1998) 指出一個現象, 晚近的社會運動已經相當程度的制度化, 但是社運組織卻不見得因此成長。多數社運組織只能維持少數核心的受薪專職人員, 大部分的參與者則是所謂的「專業的業餘者」(professional amateurism)。這些熱心的運動份子有較多的可支配時間、社會關係、抗爭經驗等有助於運動的「可攜式社會資本」(moveable social capital)。如此一來, 社會運動的成長並不一定要寄望於組織的擴大, 動員網絡的廣泛性遠比社運組織的科層化更為重要。

因此, 社會運動的專業化與正式化應該被視為一個組織變項, 反映了運動理念、資源供給與政治環境的交錯影響。在臺灣, 社會運動組織的科層化程度是較為薄弱的。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社運組織往往留不住運動人才, 許多運動幹部寧願投身於政黨, 以選舉來實踐他們的參與熱情, 而不是留在社運界奮戰 (范雲 2003a)。在經費方面, 典型的臺灣社運組織也是經常捉襟見肘, 不時陷入財務困境之中。根據蕭新煌 (1997: 19-26) 在九〇年代中期的調查, 七成以上的環境運動組織會員數不超過 200 人, 能夠突破 1,000 人門檻的團體只有 8 個。近七成的團體每年動用不到新臺幣三百萬元的預算, 超過一千萬元的團體也只有 7 個。除了環境運動組織, 臺灣的工運組織也面臨了相似的困窘處境。根據邱毓斌 (2004: 23) 的資料, 臺灣的工會聯合組織財務收入不足, 導致專職會務人員與會員比例過低。在地方產業總工會方面, 最理想的例子是 1 : 6,000, 在全國性工會聯合會方面, 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 1 : 10,000。與英國的平均比例 1 : 3,500 和香港的 1 : 4,342 相較, 臺灣的工會運動可以說是先天營養不足、後天發育不良。很顯



然，臺灣的環境團體與工會組織規模都不大，在有限的財力與人力下，要發展成為組織健全的專業化團體自然十分困難。

顧忠華 (2003: 9) 回顧臺灣的環境運動與婦女運動，他發現社會運動的「機構化」趨勢。隨著解嚴後的結社空間大幅開啟，社會運動組織也開始提供專業服務，處理愈來愈複雜的經營事務。因此，社會運動組織出現了轉向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趨勢。需要說明的是，臺灣社會運動的「機構化」轉向仍比其他民間社會部門，例如宗教團體、專業團體更為薄弱。舉例而言，基金會是目前最穩固的非政府組織形態，原因在於基金會是財團法人，需要以一筆固定經費作為運作根據。在臺灣的社會運動中，採取基金會形態的社運組織包括了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1980 年)、新環境基金會 (1987 年)、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1989 年)、人本教育基金會 (1989 年) 等。與其他社團法人的組織相比較，這些社運取向的基金會運作較為穩定，容許長期的社會參與。然而，根據蕭新煌 (1999) 的調查，臺灣的基金會宗旨主要是從事社會福利、學術研究、社會教育、文化藝術、助學、國際文化交流等目標，相對地，社會運動取向的基金會所佔的比例不到 4%。這個事實顯示，臺灣的社會運動是所有非政府組織中制度化相當低的一環。

不可否認地，影響臺灣社運組織形態最大的因素是政治環境。在 1987 年解嚴之前，結社空間受到政府嚴格的管制。原則上，政治性團體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為了有利於威權國家的控制，雖然非政治性的團體可以成立，但同一性質的團體，一個地區只以一個為限。在這種情況下，社運組織通常採用雜誌社的名義登記，以獲得合法的地位。比較明顯的例子包括婦女新知雜誌社 (1982 年) (周碧娥、姜蘭虹 1990: 85)、新環境雜誌社 (1985 年) (何明修 2001a: 123)。就這一點而言，八〇年代的社會運動是繼承了七〇年代黨外運動的傳統，亦即是以雜誌社名義，來進行運動的組織與理念的宣傳，例如《臺灣政論》、《美麗島》、《夏潮》。《美麗島》雜誌社在創刊時更宣稱是「沒有黨名的黨」。

人民團體法在 1989 年 1 月通過。這個法律關係著公民結社自由的開放。在當初立法過程中，最大的爭議在於規範政黨的條例，因為一旦這個



法案通過了，就代表臺灣正式解除了黨禁。對於攸關社會運動發展的社會團體則很少討論，這造成了一種奇特的結果，政黨（即政治團體）的成立是採報備制（第 46 條），而社會團體卻要官方許可（第 8 條）。儘管結社自由被恢復了，但是卻新增了許多程序規定，不利於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首先，人團法明訂任何團體都應採取理監事制（第 17 條），並且要向官方呈報名單。理監事制表面上是內部民主，防止任何人獨佔權力，但是這種組織架構卻不適用於小規模的社運團體，因為，「大家玩內部選舉玩得不亦樂乎，完全忘記社會運動是戰鬥性的集體行動，不是辦同樂會」（賀端蕃 1993: 5）。

其次，人民團體分為全國、省、縣市三級，一直到九〇年代末期的精省之前，只有隸屬於臺灣省的團體才能冠上臺灣兩字。有一些重要的社運團體堅持以臺灣而非中華民國為名稱開頭，但是一直無法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有些社運團體是聯盟性的組織，由各地方分會所組成，但因總會沒有被許可，各分會就不能以某組織分會的名義申請成立。舉例而言，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因為一直未獲中央承認其名稱，所以各地方分會被迫以宜蘭縣、臺北縣等環保聯盟名義登記。一直到 1995 年，環保聯盟才向民進黨執政的臺北市政府登記，其正式名稱也成為不倫不類的「臺北市臺灣環境保護聯盟」。

最後，由於社會團體是採取許可制，主事官員的權限就相當龐大。誠如顧忠華、陳惠馨 (2002) 指出的，人團法充滿了威權管制的色彩，政府先後以「行政命令方式發布『加強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等等，為理當屬於團體自治的範疇加上種種行政管制與束縛」。舉例而言，一些採取「工作陣」、「陣線」等名義的社運組織在登記時就受到官員為難，要求他們改為「協會」或「社」的名稱。因此，臺灣勞工陣線的官方登記名稱是「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事實上，由於人團法體制的封閉性，再加上以往臺灣社會運動具有高度的反體制性格，因此，許多團體不願意、或認為沒有必要向官方登記。



到了九〇年代中期，才陸續有些已經運作已久的社運組織開始向政府立案，其中為確保穩定的資金來源是辦理登記的主要動機，例如為了開立能夠減稅的收據，或是能與官方合辦活動等。因此，臺灣社運組織的資源不足與低度制度化，部分原因是長期政治力壓制的結果。

總之，專業化與正式化的組織能夠維繫較長期的運動參與，但專業化與正式化並不是運動發展的萬靈丹。無論是在國外或臺灣，社會運動的組織形態反映了多種環境因素的作用，並非只有一種最有效的組織策略。

四、事先存在的網絡

另一項對於科層化組織的批判在於，社會運動的動員經常是依循著既有的人際網絡，社運組織只涵蓋了其中非常有限的部分。在許多情況下，社會運動組織只是為了因應某些特殊事件的臨時性編組，組織之間的邊界是模糊不清的，容許成員跨組織的參與。學者用「社會運動共同體」(Staggenborg 1998) 或「社會運動家族」(della Porta and Rucht 1995) 來稱呼這種動員網絡，一個明確的意涵即是，社會運動並不能化約為社運組織的運作。

在以往，歐洲新社會運動的興起有多種解釋，包括新知識階級出現、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政治體制吸納能力的下降等。但這些因素至多只能說明社會結構產生的推力，卻沒有處理真正使得運動參與成為可能的關鍵。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面向即是由社運組織、教會、工會、政黨所交織而成的動員網絡，能夠持續地激發出參與的動機 (Kriesi 1988b; Diani and Lodi 1988; Maguire 1995)。同樣地，在美國黑人人民權運動的研究中，研究者批判了菁英論的解釋過度相信外來的資源匯入，才能引發成功的抗爭風潮。事實上，即使美國黑人是處於被支配、被邊緣化的社會位置，他們仍擁有「自有的資源」(indigenous resources)，例如黑人教會與黑人大學的網絡，在運動初期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必要的動員管道 (McAdam 1982: 25-31)。

基本上來說，任何的社會結構都促成了某種形式的人群分類，以及人



際交往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既有的家族、鄰里、朋友、教友、同事、同學關係都是重要的人際網絡，可以提供社會運動的動員管道。社會運動無法在脫離現實的真空情境中產生，而是循著既有的人際關係，以滾雪球的接力方式一個人拉一個人，形成點、線、面的廣大動員。從這個角度來看，濃密的社會網絡有助於集體行動的參與，相對地，集體行為理論所設想的原子化狀態反而無法激發參與的動機。

無疑地，即使規模再龐大的社運組織也無法觸及所有的動員網絡，要促成更全面性的運動參與，社運組織也要借用其成員的私人管道，將動員的訊息傳遞給更多的人。透過事先存在的動員網絡，草根群眾更有可能發動自主性的抗議。社會運動不一定要以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為起點，而是可以依附原先的網絡基礎，透過這些既有的溝通媒介，集體行動的成本也降低了。因此，學者以群眾的動員網絡來預測、解釋集體行動的起源。Tilly 引用組織社會學的觀點，特別指出兩種考察的面向：首先是人群是否屬於同一種「範疇」(category)，其次則是他們之間是否存在非個人的關係，即「網絡」。因此，他將組織定義為「範網」(catnet)，組織的力量就在於範疇乘以網絡 (Tilly 1978: 63)。很顯然地，如果組織的包容性 (inclusiveness) 越大，那麼它能引發的動員力道也就越大。用他的例子來說明，印刷工會分會 (高範疇、高網絡) 就是比所有的巴西人 (高範疇、低網絡) 或朋友 (低範疇、高網絡)，更容易結合個體與集體的利益，形成集體行動。

因此，科層化的社運組織並不是社會運動的起點，比較常見的情況反而是，這些組織是抗爭的產物 (Marx and McAdam 1994: 73)。Oberschall 指出抗議事件常是由於先前參與運動的團體所發動的，一旦新的運動出現了，先前團體成員則立即成為運動份子。Oberschall 稱這種現象為「集團招募」(bloc recruitment) (Oberschall 1993: 24)。因此，追溯社會運動的起源即是要特別注意抗爭群體的內部網絡，「只要運動是根植於既有的組織，佔用他們的集體認同，搭便車的問題就容易克服」(Friedman and McAdam 1992: 163)。

事先存在的網絡是附著在日常的社會關係中，而不是被社運組織所創造出來的。因此面臨不利的政治氣氛，日常網絡能夠儲存已經累積的抗爭



能量，為了下一波的抗爭風潮從事準備工作。運動份子暫時擱下公開的行動，他們之間的友情網絡維繫共同的運動認同。也由於動員網絡是附著於日常生活，形成一種去中心化的微觀傳播管道，執政者不容易切割處理，只能針對反抗份子進行打壓。誠如 Morris (1984: 75) 所指出，社運組織會隱藏其動員網絡，特意將其抗議活動呈現為「自發性的」，以避免統治者的壓制。在美國八〇年代保守派反撲的政治格局下，激進婦運人士就以設立強暴危機中心、受暴婦女收容所、書店、出版社、餐廳、靈性成長團體等另類機構的方式，以維繫參與者的網絡 (Taylor and Rupp 1993: 38)。

威權國家通常高度限制人民的結社自由，增加公共領域參與的難度，因此很難形成自主的社會運動動員網絡。在政治列寧主義 (political Leninism) 體制下，共產黨組織滲透並且壟斷了公民與政治權威之間的管道，使得政治異議份子經常在行動前就被壓制。在這種情況下，哈維爾 (Václav Havel) 所謂的「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 才具有特殊意涵。正是由於統治者用一連串的謊言來定義政治生活的內容，長期以來的政治動員迫使公民要不斷地表達對於當權者的忠誠。因此，公然地表達對於政治的冷感反而具有政治的批判性格。私領域的自主性成為是重要的，它提供了免於被統治者監控的自由空間，也代表了人民對於真實生活的渴望 (Havel 1988)。在此，一份關於 1989 年 10 月萊比錫 (Leipzig) 政治抗議的研究是值得參考的 (Opp and Gern 1993)。研究者指出，在這場導致東德共產政權垮臺的運動中，異議團體並沒有發揮動員作用，真正促成 16 萬人參與抗議的原因，是來自於自發性的朋友管道。這個例子展示了既有的人際網絡之政治意涵，一旦威權體制下的公民開始呼朋引伴，所釋放出來的抗爭衝擊是十分驚人的。

五、詳述網絡的作用：聯繫的強度與種類

社會運動研究的網絡轉向並不是這個領域的獨特發展，而是順應著整個社會學的典範轉移。在社會學理論中，美國學者開始構思鉅觀結構與微



觀行動的連結，他們發現了中層 (meso-level) 分析的重要性。例如八〇年代興起的新經濟社會學，相當重視行動的社會鑲嵌性 (social embeddedness)，認為網絡的因素可以解釋許多經濟領域的創新行為。在政策研究的領域，學者也發現政策網絡 (policy network) 的重要性，政策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往往決定了政策創新的可能性。最後，網絡分析的方法論革新，包括一系列的概念定義、測量與模式化、分析軟體的突破等，也使得社會學更有辦法處理複雜的網絡關係。

人際網絡的重新發現是晚近社會運動研究的重要成果。一旦社會學家能夠證明，越是緊密連結的群體，越能夠發動集體行動，傳統的集體行為理論就被否定了，因為社會運動的出現不再意味著社會秩序的瓦解、社會控制的喪失，而是代表一種既有群體社會關係的政治展現。儘管如此，也有學者開始質疑人際網絡的解釋效力。如果說人際網絡是早於動員之前就存在的，要如何解釋社會運動的突然產生？如果說動員網絡是附著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那麼網絡就是無所不在的。但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東西，又要如何結合成社會運動？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會同意，自由空間的存在有利於被壓迫者的結合，但是它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卻仍未被解答 (Polletta 1999)。

舉個例子來說明，della Porta (1988: 160) 指出，義大利極左派恐怖份子的招募是透過日常網絡來進行的。在 46.6% 的個案中，招募者與被招募者是朋友關係，只有 12.3% 的個案是兩者事先不認識。但這個解釋是令人存疑的，因為恐怖組織的招募者可能有更多的朋友是沒有加入革命行列的。如此簡化的網絡分析沒有辦法告訴我們，參與恐怖組織的朋友與不參與恐怖組織的朋友有何差異。

因此，在目前的社會運動研究中，只試圖證明動員網絡的存在是不足的，真正的知識挑戰在於詳細說明網絡所能夠產生的作用 (McAdam and Paulsen 1993; Passey 2003)。在此，我們可以從 McAdam (1982) 關於民權運動的研究中梳理出網絡的兩種作用。首先，McAdam 指出，網絡具有溝通的功能，能夠傳遞訊息，協助「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的出現。透



過自主的溝通網絡，個體比較有可能接受外來的訊息，理解改變現狀的可能 (ibid.: 50)。其次，網絡也提供了所謂的「團結誘因」(solidarity incentive)。在強烈整合的社群之中，成員會把自己的集體參與當作實際的報酬，而不是一種要承受的代價。如此一來，團結誘因的存在解決了奧森的搭便車困境 (ibid.: 45-6)。因此，網絡功能至少有兩種，亦即是溝通與團結的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溝通性的網絡並不一定與團結性的網絡重疊。這亦即是說，某些可以發揮良好訊息傳遞功能的社會聯繫，並不一定能夠帶來強化團結的作用，反之，某些維繫群體緊密關係的網絡往往是不具有告知性的。一般而言，能夠促成團結的網絡是附屬於某個界線分明的群體，這也意味著網絡所連結的個體是帶有多度的同質性。同質性強的群體通常會帶來同化的道德壓力，個體被鼓勵接受一套共同享有的看法，異議或是認知的不順從，將會面臨嚴重的制裁。因此團結的網絡很難帶來新的訊息，而且會產生團體迷信 (groupthink) 的負面效果。相對地，在溝通性的網絡中，傳播的價值在於能夠打破群體界限，將異質性的個體連結起來。由於新的訊息通常產生於群體之外，因此跨群體網絡的溝通功能遠勝於群體內網絡。

簡單地說，上述的跨群體網絡與群體內網絡即是 Granovetter (1973) 所調的弱聯繫 (weak tie) 與強聯繫 (strong tie)。社會關係的強弱程度涉及了參與個體的投入成本，弱聯繫是異質性組合，通常具有高度的工具性，而強聯繫則是同質性的組合，往往涉及了情感的投入。在以往，強聯繫被認為是比較有作用的，因為它連接了具有相同屬性、相互認同的人群；自從 Granovetter 的翻案文章之後，弱聯繫獲得了社會學家的高度重視，被認為是創新與力量的來源。相對地，強聯繫不能發揮與外界溝通的作用，而且個人能夠擁有的強聯繫數目是有限的，因此其助益也是受限的。為了證明弱聯繫的力量，Granovetter (1973: 1373-1376) 比較了兩個波士頓社區運動。西城 (West End) 與查爾士城 (Charlestown) 都是面臨都市更新威脅的工人階級社區，西城缺乏正式組織，居民之間有朋友、家族的強聯繫，沒有同事的弱聯繫，無法組織強大的反對運動；相對地，查爾士城居民則是有弱聯繫，能夠取得社區以外的支持協助，因此能避免自己社區被摧毀。



Tarrow (1994: 48–61) 用弱聯繫的概念來分析十八、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運動。自從印刷革命之後，具有啟蒙思想的報章雜誌與書刊將歐洲的讀者串連起來，他們共同接受理性主義世俗化的哲學態度，對於專制王權強烈批判。Tarrow 認為，正是由於這種弱聯繫才能架構跨區域、跨階級的認同，形成強大的革命潮流。相對地，相同階級成員的強聯繫有可能導致階級內部團結，但是卻無法取得其他階級成員的支持。

Tarrow 的歷史說明呈現了網絡的溝通功能與團結功能的差異，弱聯繫有助於跨群體的資訊流動，而強聯繫則是強化群體內部的凝聚力。對於社會運動而言，兩種聯繫都是必要的，弱聯繫可以幫助取得外界的資源，而強聯繫有助於提升抗爭群體的團結。因此，當社會運動研究者以某一種人際網絡當解釋項時，他們有義務要說明聯繫的強弱程度，以及所產生的作用。

在此，有必要說明強聯繫的意義。弱聯繫通常是具有高度的工具性，它可以幫助個體有效率地找到外在的資源，相對地，強聯繫通常是涉及情感投入，將個體與所屬的群體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在許多群體中，強聯繫是透過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儀式來維持。對於社會運動而言，情感、宗教、儀式等，這些強聯繫依靠的媒介也是促成參與的重要關鍵（見第七章）。進一步來說，群體身分資格也不是一種可以任意轉移的外在資源，強聯繫也意味著一定程度的道德義務。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個體所屬的群體面臨危機時，他們是很難有不參與的選項^❶。當美國民權運動成功地建構在黑人教會的強聯繫之上，參與抗議活動也就成為「上教堂的角色延長」（Jasper 1997: 38）。同樣地，在臺灣的勞工運動中，一旦工人之間的兄弟義氣形成了，不參與工會抗爭的決定是受到道德譴責的（何明修 2003c: 41）。因此，

❶ Zhao (1998: 1511) 分析 1989 年中國的民主運動，他指出，由於校園空間的設計，學生的日常生活被壓縮在十分狹小的空間。一旦抗議風潮產生了，不參與的學生受到宿舍室友、同學的道德壓力。他認為，網絡的存在並不能說明這種強化團結的作用，因此需要採取生態學的解釋。很明顯地，Zhao (1998) 只將網絡理解為弱聯繫，忽略了強聯繫也是另一種動員網絡。



強聯繫與弱聯繫都是以不同方式促成社會運動的產生，一個更平衡的觀點應該注意到它們不同方式的貢獻。

必須留意的是，某些類型的社會網絡不但無助於社會運動，而且反而會阻礙集體行動。舉例而言，侍從主義是一套恩主與追隨者之間不對稱的交換網絡，這套既有的網絡本身並不利於集體行動。Gould (1996) 指出，在國家集權化的過程中，與地方有高度聯結的恩主有可能被中央政府收編，會參與抗爭行動的菁英通常是缺乏地方聯結，或者是因為他們的聯結有可能被中央政府的介入而危及。這個道理可以用來說明日本地方政治與環境抗爭的關係。根據 Broadbent (2003) 的研究，日本的地方頭人 (boss) 與自民黨政治人物有密切的侍從交換關係，在工業開發過程中，地方頭人容易獲得個人利益，因此他們通常會阻撓地方反對運動的產生。然而，如果地方頭人與保守的政治機器產生分歧，他們所擁有的地緣與血緣網絡往往有助於環境抗爭運動。

在臺灣的地方環境抗爭中，地方派系政治的影響也是不一致的。垃圾場與焚化爐的設置之所以經常引發激烈的地方反彈，其中一個原因即是這些設施並無法為地方頭人帶來可以分配的利益，因此，容易引發派系網絡的動員，形成全面性的反抗運動。相對地，在工業開發的個案中，廠商的回饋、承包、人事任用都可能用來攏絡地方頭人，達成化解地方派系反對的作用。在反核四廠的貢寮（鄭淑麗 1995）與反中油五輕案的後勁（呂欣怡 1992），地位較鞏固的地方領導人（鄉長、里長與市議員）都採取有條件支持的態度，反對派的勢力則以自救會為核心。

社會運動的網絡分析也必須說明為何動員是集中於某些網絡，而不是其他類型的網絡。對於大部分經歷社會化的社會成員而言，日常生活總是提供我們各種各樣的社會聯繫，但是並不是每一種網絡都會產生等值的動員效果。在此，Gould (1993) 對於 1871 年巴黎公社起義的分析是值得參考的。公社在以往被視為工人的階級運動，但是其動員基礎卻沒有被妥善解釋。由於當時有大量的移民工人，行會組織並沒有辦法完全吸納整個工人階級，工人的生活重心是在職業混雜的社區。因此，促成階級革命的是濃



密的鄰里網絡，而不是工人階級的職業組織。

同樣地，當研究者證明了某一種網絡的動員效果，一個緊接而來的問題即是，這些網絡也帶來了何種限制。上述的說明指出強聯繫的道德色彩，有可能激發出強而有力的團結。道德整合促成群體內的凝聚力，也有可能傷害跨群體的聯盟，換言之，過度的在地認同是會阻礙更廣大的運動認同浮現。舉例而言，臺灣工人階級的動員是根基於廠房內的班組織，然而，強烈的班整合卻會阻礙全廠或階級認同，如果沒有其他意識型態或階級文化的力量支持，工運的抗爭格局將被侷限在十分狹窄的基礎上（何明修 2003c: 49–51；趙剛 1995: 145）。同樣地，八〇年代美國愛滋病患運動也面臨了類似的困境。男同性戀是愛滋病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最早參與的群體。為了獲取公眾的重視，運動者強調愛滋病的普遍危險性，同性戀並非唯一的受害者，但是在實際的動員上，他們卻很難取得非同志成員的參加。因此，運動面臨了肯定或否定愛滋病與同性戀關聯的兩難：如果強調愛滋病對於同志群體的傷害，那麼就不容易獲得其他人的同情與支持；如果否定兩者的關係，就不容易獲得最有可能被動員的同志群體之參與（Gamson 1989）。從這些例子可知，既定的社會結構容許某種集體行動的產生，同時也封閉其他類型的可能性。

在此，也許可以簡單地處理網際網路對於社會運動的衝擊。自從電腦網絡發明以來，這項新穎的溝通科技的政治效應一開始就受到注意。許多評論者都指出若干著名的歷史個例，例如三〇年代的德國納粹利用電影、廣播來進行意識型態動員，六〇年代電視的普及化，使得政治人物開始注意自己鏡頭前的形象。然而，相對於電影、廣播與電視，網際網路的特點在於即時性、去中心化的分布以及多向溝通的可能性。對於社會運動而言，這些特徵深遠地影響了其動員的形態。一方面，由於網路所構成的虛擬世界成為我們的生活重心，許多新興的抗議運動即是圍繞在網路上所發生的事。例如在 2005 年 3 月，臺灣網路留言版所散布的「某大學研究生劈腿事件」，引發了網友間密集的討論，甚至引發抗議惡性渲染的媒體。另一方面，也由於網路的強大溝通作用，越來越多的社會運動動員是透過網路所進行。



在此，筆者只針對網路作為一種動員網絡來加以討論。很明顯地，網路的普及化也影響了既有的人際關係。一旦越來越多人的朋友是網路上認識的，而不再是鄰居、同學、同事、同鄉等既有的關係，越來越多人的訊息來源是來自於網站、電子報、部落格(blog)，而不再是看電視、讀報章雜誌、口耳相傳，社會運動組織自然必得要學會使用這項新興的科技。因此，社會運動組織紛紛架設自己的專屬網站，發行電子報，希望能接觸更廣泛的公眾。相同政治傾向的積極份子則透過專門的部落格相會，討論他們所共同關切的公共事務。誠如臺灣的網路運動先鋒陳豐偉所指出：

網路產業它還是有迷人的地方，好比說智邦生活館^②它現在只有 10 個員工，可是它服務的網友可以上百萬，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槓桿，就是推動槓桿的另外一邊其實力量很小，但是你如果能夠影響這 10 個人，你就可以透過這 10 個人去影響那一百萬的會員……^③

換言之，促成社會運動走上網路世界的動力，正在於這種低成本、但是卻效果龐大的溝通作用。在民主國家的選舉時期，各陣營的候選人也希望利用網路的力量，來動員更多的選票。在南韓 2003 年的總統大選，盧武鉉勝選的原因之一即是成功地使用了網路的媒介，取得絕大多數的年輕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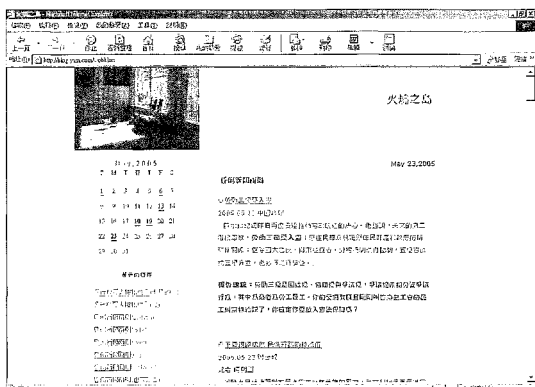


圖 4-2 一個部落格網站「火燒之島」的首頁。部落格具有線上即時修改、編輯與發表的特性，現在已成為流行的個人網路新聞臺。(圖片提供：<http://blog.yam.com/wobblies>)

② 一家發行網路電子報的公司。

③ 引自文化研究學會，文化批判論壇〈尋找社會運動的新空間——網路、小眾消費市場、社區？〉(2002/1/15)。見 http://140.112.191.178/csa/journal/11/journal_forum_10.htm#Chen。



民支持。在 2003–2004 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中，Howard Dean 也是以網路動員的方式，在初期取得了聲勢的領先。在後來 2004 年底的大選中，民主黨與共和黨也在網路上廝殺，部落格一詞成為爆紅的政治詞彙。其中，親民主黨的自由派組織「前進」(MoveOn) 更成功地以網路進行動員、募款，甚至是探討草根運動的動員策略。「前進」的專職人員不超過十個人，但是他們卻有超過二百萬的會員，而成為民主黨內最強大的募款機器（張鐵志 2004b）。

在威權國家中，由於去中心化的特色，網路的訊息傳遞也往往能夠突破統治者所設下的新聞控制與封鎖。為了抑止網路所帶來的挑戰，中國政府成立了網路公安部門，定期掃蕩「反動網站」、過濾境外的訊息流入。儘管如此，互聯網的使用者仍可以透過代理伺服器、文件加密、解碼軟體等方式取得官方媒體的漏網新聞。海外的民運人士、人權團體、法輪功也經常使用網路將批判當局的消息傳遞到中國境內。

儘管如此，網際網路的動員效果仍不應該被過度高估。在晚近一篇對於臺灣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研究中，研究者發現，「網路扮演的仍是配角；透過網絡發聲、造勢、宣傳的社運為數頗眾，然而單靠網絡不足以成事，網下的抗爭活動才是社運事件的主角與重頭戲」（林鶴玲、鄭陸霖 2001：147）。用本章的術語來說，網路所提供的是一種弱聯繫，能夠幫助運動參與者取得即時而且全面性的訊息。對於政治立場相近，但是缺乏空間相鄰性的人而言，網路提供了串連的可能性，並且使得他們凝聚成一個有活動力的團體。然而，只憑網路本身，是無法產生強聯繫所具有的信任作用。網路所提供的情境並無法產生社會團結，其關鍵正在於它缺乏集體性格，沒有面對面互動所產生的情感投入。因此，在網路上抗議某件與網路有關的事件，例如以大量討論文章的方式批評某個電子留言版的不當規定，可能是很輕而易舉的事。但是要使得這些網友在真實空間集會，共同參與一項攸關真實世界議題的抗爭行動，Olson 所指出的集體行動困境仍是存在的。



六、結 論

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即是組織與網絡的總合。長期以來，這些問題是直接屬於社會學的核心研究議題，一種定義社會學的方式就是將其視為研究社會關係的科學。相對地，其他社會運動研究概念的血統就不是那麼「純正」，構框與認同的議題涉及心理學的討論，而政治機會結構也受到政治學的影響。因此，動員結構的探討一直在社會學佔有一席之地，研究文獻也有相當程度的累積。

在資源動員論看來，社會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涉及了資源整合、領導分工、談判協商的組織過程。即使是追求高度理想化的訴求，社運組織的生存仍難以掙脫物質環境的束縛。組織是貪婪的，總是試圖累積更多的資源，而在有限的資源下，組織的利益也不一定等同於運動的利益。因此，同一個運動議題的社運組織比較有可能處於競爭狀態，聯盟運動也需要許多物質條件的配合。社運組織的科層化程度，亦即是正式化與專業化，是受制於諸多條件的影響。科層化組織能夠維繫較長期的運動參與，但是卻往往缺乏彈性與創新性格，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社運組織形態。

事先存在人際網絡的概念點出了社會結構的開放性。要求改變社會的運動並不是完全地脫離既有的社會結構，在許多時候，反而是利用現存的管道進行成員召募與理念傳播。因此，正是由於人際網絡的潛在顛覆性，威權統治者才會對於自發性結社感到恐懼，需要以種種的壓制策略來造成個體的原子化。另一方面，在晚近以來，網絡的動員效果已普遍受到學界承認。進一步的研究工作應該更詳盡地釐清網絡的訊息溝通與強化團結作用。社會聯繫有強弱與種類的差異，這些特質又是如何形塑不同的動員潛力，則需要更清楚的剖析。

第五章

政治環境：

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一、政治的重新發現

在一本 1994 年出版的集體行動教科書中，Marx and McAdam 提到：

幾乎近二十年來的研究作品都基於這種未明言的圖像：社會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形式，由那些缺乏必要影響力的群體所發動，他們無法透過「適當的政治管道」(proper political channels) 追求其目標 (Marx and McAdam 1994: 83)。

在五、六〇年代，社會心理學取向的研究是佔主導的地位，強調集體行動是來自於各種異常心理狀態。從這種觀點來看，社會運動並不是一種「政治現象」，或者說，它本身並不是涉及了權力與資源的重新分配，而只不過是個體情緒的集體抒發。相對於此，晚近研究者強調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的關連性，反對將社會運動化約成為個體心理現象。採取這樣的政治解讀，社會運動的圖像也將有所不同：在起源上，社會運動是來自於既有權力關係的不對稱，迫使某些被邊緣化群體採取體制外的抗爭活動。在過程上，社會運動是持續與制度化的權力擁有者進行互動，透過施壓、討價還價、聯盟、對抗等形式，爭取群體的利益。就結果而言，社會運動是否能實現其目標是受制於一連串政治條件的組合，並不一定只是涉及了社運團體本身的實力。在這一類的研究作品中，一個經常使用的概念即是政治機會結構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亦即是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與其對於集體行動者所帶來的限制與助益。因此，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經常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起源、過程與結果。

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最早是在七〇年代浮現，逐漸在八〇、九〇年代進入社會運動研究的核心議題。從邊陲到主流的演變過程中，若干意想不到的狀況卻產生了。由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廣泛使用，卻也造成另一種

① 本章改寫自〈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刊》(何明修 2004c)。



的結果，彷彿任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外部因素都可以被放在這個概念之中。模糊的邊界、不確定的內容成分使得政治機會結構似乎成為了解釋一切的萬能鑰匙，反而稀釋了其分析上的效用。

本章試圖釐清這些關於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性問題，並且提出一套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架構。這一章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探討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形成過程，主要是介紹這種觀點如何從不同研究領域中形成與匯流。此外，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與資源動員論的關係到底為何，也是要探討的焦點之一。第二部分則是要釐清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內容，適用範圍、方法論、理論位階等相關的議題。

二、政治體制的有選擇性開放

政治機會結構一詞是來自於 Peter Eisinger (1973) 一篇探討美國都市種族抗議的文章。對於種族群體而言，不同的都市形成了相異的政治環境，影響他們實現其利益的可能性。Eisinger 將一般通稱的政治環境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他進一步發現所謂的「抗議的諷論」(paradox of protest)，種族抗議的出現是與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形成一種曲線的關係。換言之，在極端開放與極端封閉的條件下，抗議是不容易產生的，相對地，最容易形成種族抗議的都市往往是具有開放性與封閉性元素的混合。針對這個發現，Eisinger 是如此解釋：開放性即是都市政體的回應性，如果政治機會結構理論上已完全開放，就沒有必要採取抗議手段來實現其目標，任何新興議題都會很快地被吸收進入體制內的管道；反之，如果政治機會結構是處於絕對的封閉狀態，抗議則沒有產生的可能性，因為任何集體行動都無法改變統治者的決定 (Eisinger 1973: 12)。

對於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而言，Eisinger (1971, 1973, 1974) 的貢獻有兩點：一方面他首先界定了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另一方面，他將政治體制的問題帶進集體研究的討論，並且明確地指出，抗議只在特定政治脈絡之中才會產生。從這個觀點來看，抗議其實是一種政治行動，是以一種體制



外的方式來競逐體制內的權力分配。就這一點而言，同樣是研究民權運動的 Wilson (1961) 與 Lipsky (1968)，提出較為明確的概念分析。首先，Wilson 與 Lipsky 都指出，抗議活動往往是來自於「弱勢者」(the powerless)，他們缺乏體制內的資源，無法以正常方式來爭取他們的利益。因此，抗議即是弱勢者所運用的政治資源，也就是在沒有政治影響力的情況下所創造出來的政治影響力²²。其次，抗議其實是一種議價 (bargaining) 的過程，挑戰者所爭取的回報是來自於被挑戰者的讓步。抗議不是全然的道德說服，也不可能是武力強制，所以被挑戰者的回應總是計算得失後的結果 (Wilson 1961: 291, 294)。最後，抗議作為新創造的政治資源，其實涉及了各種誘因 (inducement) 的採用。對於抗議對象，挑戰者通常使用負面誘因，使前者感受不讓步所要承受的損失 (Wilson 1961: 292)；對於旁觀公眾，挑戰者則使用正面誘因，促使他們關切這個議題，甚至是直接介入衝突，達成向被挑戰者間接施壓的作用 (Lipsky 1968: 1145)。

無論是「抗議的諄論」或「抗議作為弱勢者資源」，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預設，即政治體制並不是隨時都保持一致性的開放程度。對於某些群體

²² Eisinger (1974: 601-4) 反對將抗議與弱勢狀態 (the powerlessness) 連結在一起。他強調抗議並不是「異常的」(extraordinary)，而是政治體制中常見的行動類型。根據調查研究，他指出：(1)美國黑人通常支持民權運動、(2)黑人抗議參與者比黑人非參與者的社經地位較高、(3)黑人抗議參與者比黑人非參與者更有社區連結，來證明抗議其實是「常態的」(normal)、「不可或缺的」(integral)。Eisinger 認為他的發現是可以駁斥 Wilson 與 Lipsky 的說法，因為抗議並不必然與弱勢狀態有關係。在筆者看來，Eisinger 在此的論證有若干混淆。第一，Eisinger 其實要論證的是抗議的理性基礎，就這一點而言，Wilson 與 Lipsky 並不會反對。在當時資源動員論仍只是起步的階段，Eisinger 以更早的集體行為理論觀點來看 Wilson 與 Lipsky，使得他誤認所謂的弱勢狀態即是社會心理學家所謂的失範狀態。第二，Eisinger 的意圖之一是要證明，完全的弱勢狀態是無法產生抗議行動。就這一點，Lipsky (1968: 1144) 也有說明。後者指出，極度的缺乏資源其實不可能產生集體行動，因此，定義弱勢狀態時是採取相對的觀點，而不是絕對的標準。總而言之，除了 Eisinger (1974) 這一篇文章的混淆以外，筆者並沒有發現 Wilson, Lipsky, Eisinger 等人之間根本性的矛盾。



而言，既有的遊戲規則排除了他們實現利益的可能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才要採取非傳統的行動，來爭取其福利。無疑地，都市政治學者的發現是回應了當時對於多元主義模型的批判風潮。基本上，多元主義者認為政治權力是廣泛地分散於各個社會群體，沒有任群體恆久佔據權力的核心。自從六〇年代以降，學者開始質疑多元主義所描述的美國政治圖像，他們強調任何政治組織都不是中性的媒介，如實地反映了各個群體的要求。事實上，政治組織是總是偏好某些利益群體，使得其他利益喪失了被代表、被討論的空間，這種情況是 Schattschneider (1960) 所謂的「偏差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在既有的體制下，權力的運作不只是為了取得決策的參與機會，更重要的是在於它能夠成功地將「非決策」(non-decision) 制度化，使得某些議題根本沒有被注意，從而排除了反對者的參與 (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在此，對於後續的研究而言，批判多元主義的預設是重要的。因為如果多元主義的描述是正確的，任何社會群體都分享一定程度的政治權力，他們必然有辦法透過體制內參與、協商與妥協，以獲得某些利益。在沒有任何群體壟斷權力核心的前提下，採取抗議的決定就顯然是不理性的，不是反映了意識型態的堅持，就是只為了抒發心理緊張。在多元主義的問題框架之中，政治機會總是存在的，社會利益並不需要以抗議的方式來呈現。因此，一旦政治體制被證明是有選擇性的開放，或者說是排除了「弱勢者」的參與空間，那麼關於抗議的政治條件就成為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用 Nettl (1968) 的話來說，如果國家是個變項，而不是常項，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即是它如何影響集體行動的產生。

三、國家的重新發現：集體行動的歷史條件

在一篇著名的文獻回顧中，Goldstone 指出二十世紀的革命研究經歷了三個世代的演變。第一代的研究者是以描述的方式來探討革命，比較缺乏理論的指引。第二代的研究者主要是運用三種理論，即認知心理學（如



Davies、Gurr)、結構功能論 (Johnson、Smelser)、政治學的利益政治 (Huntington)^⑤。至於七〇年代中期以後的第三代研究者 (Eisenstadt、Skocpol、Trimberger、Paige)、Goldstone 稱他們為結構取向的，一方面更重視個案的歷史分析，另一方面也強調整體觀點的重要性。Goldstone 指出，第三代研究者的一個共同特性在於重視國家的目標與結構。以往研究者傾向於將國家視為不同利益部門的戰場，第三代研究者則認為國家形式是會形塑出不同利益衝突的可能性，因此，在若干國家危機中，革命行動是容易產生的 (Goldstone 1980: 435)。換言之，Goldstone 指出，一個當時重要的理論發現即是，集體行動的產生是與特定的國家制度息息相關的。

在 Skocpol 的《國家與社會革命》(1979) 中，她批評傳統的研究過於採信革命者的觀點，將革命視為純粹的有意圖行動，而革命危機則是來自於革命者的挑戰。Skocpol 強調，國家並不能被化約為不同階級利益的表現，而是要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國家具有自身的利益，因此相對於社會上的主導階級，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國、俄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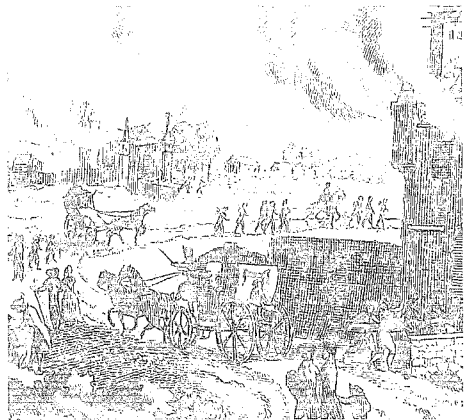


圖 5-1 農民攻擊城堡。法國農民大革命爆發後，紛紛投入反抗貴族的行列，燒毀領主的檔案資料，促使國民會議廢除貴族的封建特權。

^⑤ 在這一篇文章中，Goldstone 將 Tilly 歸類於第二代的研究，而不是第三代的研究。Goldstone 的認定是基於兩個理由：(1) Tilly 將革命局勢定義為「多重主權」(multiple sovereignty)，與政治學者相近，(2) Tilly 是以都市化、工業化等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來看革命的發生，這也是與六〇年代的主流相近 (Goldstone 1980: 429)。在此，筆者的看法是，Goldstone 傾向於忽略 Tilly 在七〇年代的研究架構轉變，原先他所抱持的現代化理論的概念（如都市化、工業化），逐漸由馬克思主義的架構（即無產化與國家建立）所取代 (Hunt 1984: 252)。再且，Goldstone 也忽略了 Tilly 對於同屬於第二代研究的認知心理學與結構功能論之批判。因此，筆者認為成熟時期的 Tilly 是比較傾向第三代的研究取向。



國革命的發生具有相似的背景：面臨國際軍事競爭的農業官僚帝國，開始推動由上而下的現代化政策，反而引發了國家部門內部的菁英衝突，只有在這個關鍵時刻，革命者的企圖才發揮了作用，推翻了舊政權 (Skocpol 1979: 99)。Skocpol 後來將這種研究取向稱為「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view) (1985: 4-5)，或是「政體中心論」(polity-centered view) (1992: 569)。對於集體行動的政治過程研究而言，「國家中心論」或「政體中心論」明確指出，革命只有在特定的政治條件之下才會形成。Skocpol 對於革命志願論 (voluntarism) 的嚴厲批判，更是彰顯了客觀條件的重要性。無論革命者如何看待自身的意圖，革命行動只有在國家危機發生之後才是有作用的。

自從七〇年代以來，Tilly 的歷史研究主要涉及兩個核心議題，即西方社會結構的長期變遷與集體行動形式的演進 (Tilly 1981: xi, 1990: ix)。在結構的長期變遷方面，Tilly 關切的焦點包括了都市化、無產化、市場經濟興起與現代國家的形成。在分析集體行動的歷史演進時，Tilly 則是注意到前述的鉅觀變遷如何影響人民從事抗爭政治的方式。在此，本文無法逐一討論 Tilly 廣泛的學術興趣，只能針對政治結構變遷與集體行動之關連性進行介紹。

對於 Tilly 而言，現代國家的形成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變遷。現代國家預設了政治權力的集中化，逐步削減地方諸侯、城市自治權與農村自足經濟。國家的建構者為了因應國際局勢，需要維持國內的治安，並且從國內人民身上汲取資源，以建立軍事力量 (Tilly 1975a, 1985)。Tilly 指出，權力集中化的過程以下列的不同方式影響了集體行動的形式。首先，為了提高政府稅收，君王與資本家聯手推動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過去區域性的交易障礙。城市的行會經濟與農村的自給自足都受到無情的打壓。因此，Tilly 指出糧食暴動 (food riot) 即是歐洲現代化過程中最常見的抗爭形式，亦即是地方人民共同對抗中央權力入侵 (Tilly 1975b)。其次，根據中央權威的建立過程，Tilly 提出了競爭性 (competitive)、回應性 (reactive)、積極性 (proactive) 三種抗爭形式的長期演變。在政府權力未深入地方社會之前，常見的社會衝突是涉及不同區域之間的利益衝突，形成競爭性抗爭。



在第二個階段中，政府權力的入侵受到地方人民的反對，形成回應性抗爭。到了最後，民族國家的格局確定形成，人民才轉向政府要求新權利的制定與保護，積極性抗爭才真正出現 (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 260–2; Tilly 1978: 143–9)。第三，隨著現代國家的成功建立，人民抗爭對象也開始轉向中央政府，並且是訴諸於某種普遍性的意識型態，Tilly 將這種發展趨勢稱之為抗爭的「全國化」(nationalization)，也正是在這個脈絡之下，當代社會運動才與以前的種種抗爭形成強烈的對比 (Tilly 1984, 1997)。

除了長期歷史趨勢的討論，Tilly 更進一步提出一套「政體模型」(polity model) 的分析架構，並且將集體行動定位於挑戰者與政府的持續互動。在既定的政治格局下，若干的「政體成員」(polity member) 享有「對於政府控制資源之例行的與低成本的進路」，相對地，挑戰者必得使用集體行動方式才能佔用這些官方資源 (Tilly 1978: 52)。Tilly 進一步指出，對挑戰者而言，各種政治條件有可能分別形成機會或威脅（或說是負面的機會），影響其實現抗爭宣稱的可能性。政府本身經常是機會的來源，至少有三種回應挑戰的可能性：(1)採取鎮壓 (repression)，即提高參與抗爭的成本；(2)協助 (facilitation)，即降低參與抗爭的成本；(3)容忍 (tolerance)，即不採取鎮壓或協助的行動。Tilly 強調，政府的鎮壓與協助通常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針對不同抗爭議題，或是針對同一件抗爭案的不同面。無論如何，協助通常會帶來機會的提升，從而使得集體行動更容易發生 (ibid.: 100–135)。

簡而言之，無論是 Skocpol 的政體中心論或是 Tilly 的政體模型，都是將國家結構重新帶入集體行動的分析之中。Skocpol 指出了在何種政治條件下，革命行動才會獲得成功。Tilly 一方面則是指出政治結構變遷對於集體行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將挑戰者與機會的問題整合進入一更廣泛的分析圖像之中。如果說 Lipsky, Wilson, Eisinger 是處理地方政府與種族抗爭的關係，基本上是屬於都市政治學的領域，那麼 Skocpol 與 Tilly 的研究則是經常被認為是所謂的歷史社會學。很顯然，這兩個不同的學術領域產生了共同的匯流，新的研究取向即是重視集體行動與政治體制之間的互動。



四、從資源到機會：資源動員論的演進

七〇年代興起的研究典範是資源動員論，強調集體行動是源自於理性的利益追求，是透過資源匯集與組織運作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在理論立場上，資源動員論與政治機會結構理論一樣反對社會心理學的解釋，認為集體行動的本質是政治的與理性的，而不能被化約為心理狀態的表現。然而，正是由於這些主張的相似性，使得許多研究者根本上認定兩種理論是同一套說法。舉例而言，Tilly 經常被認為是資源動員論的一份子，原因在於他在《從動員到革命》一書中，不只是提出了政體模型，也另外提出了一套關於利益、組織的動員模型 (Tilly 1978: 56)。同樣地，Wilson 與 Lip-sky 也由於將抗議視為弱勢者的資源，也一併被視為是資源動員論的先驅。這種現象反映了資源動員論的成功，它已經不只是一種研究取向，而是社會運動研究的共同預設，而且可以不斷地吸收其他理論途徑的觀點 (Zald 1991: 353)。對於本文所關切的議題，筆者認為有必要探討資源動員論與政治機會結構的關係，以釐清資源與機會的概念差異。

根據 McCarthy 與 Zald 的說法，資源動員論反對採取傳統的「民心論」(“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pproach)，將社會運動限定為由基層的人民所發起。民心論的分析方法是探討為何人民會產生不滿，再從不滿來解釋集體行動的出現 (McCarthy and Zald 1987a: 338-340)。相對地，McCarthy 與 Zald 認為美國六〇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經歷了專業化的轉向，社會運動不再是由草根群眾所發起與主導，而是由專業改革者所領導。資源動員論探討的起點並不是人民的不滿，事實上，不滿總是無所不在的，但是並沒有總是因此而直接導致集體行動。如此一來，分析的重點並不是在於人民是否想要改變現狀，而是是否有能力改變現狀。McCarthy 與 Zald 強調，不滿其實是可以由議題企業家 (issue entrepreneurs) 所定義的，因此，資源的匯入才導致了不滿，而不是不滿引發資源的匯入 (McCarthy and Zald 1987b: 18)。



McCarthy 與 Zald 相信，晚近社會變遷提高了流向社會運動部門的資源，造成社會運動的興盛發展。這些變遷趨勢包括：(1)社會富裕化，使得總體的可支配資源 (discretionary resources) 增加，其中有一部分收入是流向社會運動部門，而不只是為了純粹的個人物質滿足 (ibid.: 27–28)；(2)高等教育擴張與專業人士的成長，這兩種趨勢都使得一部分人口具有高度彈性的工作時間表，可以將更多的時間投入社會運動的參與 (McCarthy and Zald 1987a: 355–357)；(3)專業改革者的出現，公部門的政府機關或私人的基金會提供越來越多知識份子就業的機會，他們很有可能將自己所掌握的資源投入社會運動，成為所謂的「職業利他者」(occupational altruist) (Zald and McCarthy 1975: 358)；(4)政府福利計劃的投入，隨著公部門社會福利經費的成長，社運組織越有可能以社會工作的名義取得這些資源，並且用來從事動員活動 (McCarthy and Zald 1987a: 360–361)；(5)新傳播技術的出現，社運團體開始依賴電視廣告、郵寄廣告等傳播科技，向分散的支持者宣傳理念並且爭取支持，避免因缺乏緊密的動員基礎結構而帶來動員的困境 (McCarthy 1987: 59–61)。

從這些論證可知，資源動員論對於社會運動的持續發展是抱持樂觀的態度，其原因在於支持社會運動的資源是呈現成長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資源增加趨勢中，並不一定是與政治體制有關。即使(3)、(4)是涉及了國家行動的改變，但是在 McCarthy 與 Zald 的解讀之下，這是代表一種長期趨勢，而不是週期性的變化。就這一點而言，早期資源動員論並沒有預設 Skocpol 的政體中心論或 Tilly 的政體模型，也沒有剖析政府對於社會訴求的選擇性回應，國家沒有被視為一個影響社會衝突的制高點，這與後來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具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事實上，資源動員論的基本預設在很多面向上都反映了美式民主的習慣，即政治權力是趨向分散的。美國的政黨是低度組織化的，利益中介與匯集的功能較為薄弱，社運組織的動員經常是越過政治中介機制，直接向國會或行政部門施壓。簡而言之，政治面向的探討在傳統的資源動員論中是被壓抑的 (Meyer 1990: 7, 1993: 162–163; Mayer 1991: 50–58)。也由於這個原因，美國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



者對於資源動員論大致上採取質疑的態度，他們更拒絕使用這個名稱來描述自己的理論立場 (McAdam 1982: 20–35; Jenkins and Eckert 1986; Piven and Cloward 1992)。

另一方面，Perrow (1979) 有個值得參考的說法。他區分出兩種「資源動員論」，其中「第一種資源動員論」(RM1) 包括 Oberschall、Tilly、Gamson 等人，而「第二種資源動員論」(RM2) 則包括 McCarthy 與 Zald。RM1 將抗議視為「以『非常態』的方式進行常態政治」，社會運動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格，換言之，抗爭即是以其他方式來從事政治 (politics by other means)。相對地，RM2 則是較為狹義，特指 McCarthy 與 Zald 所提出來的社會運動專業化理論，而且是專門指涉美國六〇年代的局勢，亦即，社會運動越來越是外來的專業知識份子所領導 (Perrow 1979: 199–202)。事實上，如果放在後來的理論發展脈絡來看，Perrow 所謂的 RM1 即是後來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而 RM2 即是早期的資源動員論。在早期，兩種觀點都共同挑戰集體行為理論的心理預設，並且都重視理性的行動基礎，因此，Perrow 都是以「資源動員論」來稱呼這兩種途徑。

事實上，McAdam (1996a: 26) 指出，早期政治機會結構的學者為了要使這個概念普及化，他們經常將機會視為另一種社會運動的資源，以配合主流資源動員論的觀點^④。不幸地，這種權宜之計導致若干概念不清，使得後來反對政治機會結構分析的學者更是振振有詞。

根據資源動員論的說法，資源是泛指各種有利於運動動員的各種條件。早期資源動員論的學者似乎將資源的概念視為既定的，不需要進一步解釋。舉例而言，在 McCarthy 與 Zald 於 1977 年提出的文章中，他們提到資源匯集的重要性，但是卻只是將貨幣與勞力兩項因素放入括號中 (McCarthy and

^④ 同樣的理論發展與概念精緻化也可以在臺灣的社會運動研究中發現。張茂桂 (1989) 是探討八〇年代社會抗議風潮的先驅性經典作品。其中，張茂桂大致上採取了資源動員論的觀點與術語，來解釋政治轉化如何為集體行動製造機會 (ibid.: 89–109)。到了九〇年代，張茂桂 (1994: 45–49) 則是進一步剖析資源動員論與政治機會的關係。



Zald 1987b: 18), 並沒有更多的說明。Freeman (1979: 174–175) 則提供更細膩的分類, 將資源分為有形的、專業的、地位的與非特定的。儘管如此, 正如有些批評者所指出, 資源動員論甚至連最基本的概念 (即資源) 都沒有嚴格定義, 在實際的研究作品中, 資源經常泛指一切有助於運動動員的東西 (McAdam 1982: 32; Kitschelt 1991: 336)。在這種情況下, 早期政治機會結構研究者將機會理解成為一種資源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此, 為了使得資源概念有更準確的判準, 也為了區分資源與機會, 筆者認為可以援用「國家—社會」的架構進一步釐清這兩個概念。無論是人力、財力、知名度、組織網絡、空間、理念、社會關係等因素, 資源的概念都是指涉來自於社會層次的條件, 是透過結社原則而創造出來的。相對地, 政治機會的定義則是以政體為中心, 亦即是涉及了當前國家權力的實施與不實施。要發動社會運動, 社運組織需要匯集資源, 無論是從外部爭取或是由當事者自行貢獻。相對地, 儘管社運組織雖然在某種程度之內可以試圖改變不利的政治機會結構, 但他們很少能夠將政治機會佔為己有。另一方面, 在若干情況下, 資源與機會是相互影響的, 擁有某些資源即是開啟了若干政治機會, 例如有專家學者參與的社運組織, 較能夠有可能與官員直接溝通。儘管如此, 資源與機會仍是分析上明顯有別的概念, 因為擁有專家學者的資源仍有可能導致其他動員效果, 例如較容易獲得公信力與媒體報導, 而這些作用並不是來自於與官員直接溝通的政治機會。

在 McAdam (1982) 的美國民權運動研究中, 資源與機會的區分是顯而易見的。McAdam 指出工業化與都市化等社會變遷的過程, 並不是直接促成抗議的原因, 而是因為這些結構變遷改變了既有的權力關係, 一方面使得挑戰者享有更優勢的議價空間, 另一方面則是提高了執政者採取鎮壓的成本。社會運動的出現是反映了政治機會的擴張, 使得挑戰者更能夠採取抗議的手段, 同樣地, 當政治機會開始收縮時, 社會運動則是處於衰退狀態。McAdam 將這種政治生活中的權力關係總合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 他強調許多足以撼動既有政治生態的因素, 例如戰爭、國際政治局勢、失業、人口變遷等, 都有可能改變既有的政治機會結構, 因此, 不可能列舉所有



影響政治機會結構的因素 (ibid.: 41)。在 McAdam 的分析中，1961–1965 年間是民權運動的極盛時期，政治機會結構的擴張表現於：(1) 黑人選票的重要性成長，逼使民主黨政府採取支持民權運動的行動；(2) 冷戰所帶來的國際壓力，使得執政者要回應國際社會對於美國種族不平等的批評；(3) 種族成為最顯著的議題，使得民權團體獲得北方自由派白人的支持 (ibid.: 156–163)。在 1966–1970 年間，政治機會結構逐漸收縮使得民權運動面臨越來越不利的環境，其中包括了(1) 反動派的動員造成了黑人選票的大幅消失，最後將保守派尼克森拱上總統寶座；(2) 越戰等其他議題的出現，使得公眾對種族問題的關切下降 (ibid.: 192–201)。

McAdam 也批判資源動員論對於外來菁英的樂觀期待，他認為運動的資源並不一定要來自於直接當事者以外。他強調民權運動中自有組織資源 (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的重要性，黑人教會、黑人大學與民權組織都在動員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ibid.: 29–32, 125–42)。McAdam 比較黑人抗議與基金會、慈善團體捐款的時間，他發現菁英的支持總是在抗議動員之後才出現的，而不是促成抗議的主因 (ibid.: 122–4)。

McAdam 對於資源動員論的另一項批判則是在於它忽略了民怨 (grievance) 的重要性。傳統的資源動員論拒絕將集體行動視為心理狀態的後果，他們以物質資源的問題來取代了內在心理的探討。因此，不滿是被假定為普遍存在的，只有當外在資源匯入時，抗爭才有可能出現。在 McAdam 看來，民怨的出現也涉及了集體定義的過程，一旦政治機會結構開啟了，從屬者也更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並且相信有能力改變現狀。換言之，所謂的「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也是動員過程中一個必要的環節，其本身也是受到政治過程的影響 (ibid.: 35)。

McAdam 的理論化企圖心龐大，他試圖提出了一套解釋社會運動興起的模型。他將政治機會結構、自有組織資源、認知解放三項要素組合成為所謂的「政治過程論」(political process theory)。在 McAdam 看來，這一套解釋架構可以用來取代「古典模型」(即各種的集體行為理論)、「資源動員模型」，成為未來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導向。根據 McAdam (1982: 40–41) 的



說法，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是從 Lipsky、Eisinger 的研究作品而來。很明顯地，McAdam 關於自有組織資源與認知解放的概念，是分別由資源動員論與集體行動理論的整理與批判加工而來的。因此，政治過程論的名稱雖然是來自於 Tilly，但是卻是一個理論上的綜合模型 (ibid.: 36)。

儘管如此，在批評者看來，政治過程論是一種恆定的模式 (invariant model)，妄想處理所有的社會運動個案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29)。實際上，從後來的研究發展來看，McAdam 所指出的三項因素並非教條，而是在理論上更精緻化的發展與探討。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7: 152–159) 即主張，政治機會、動員結構、構框過程 (framing process) 三個主要分析概念可以互補，共同形成一組研究社會抗爭的整合型典範。同樣地，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1–17) 也有類似的說法。後者認為政治機會、動員結構、策略性構框 (strategic framing) 可以綜合成為一種比較社會運動的研究架構。換言之，儘管政治過程論的名稱並沒有被普遍使用，但是其理論的基本要素卻獲得進一步的探討與發展，因此，值得將這個要素單獨抽離出來，進行文獻回顧與分析。

五、新政治的舊政治基礎： 歐洲的新社會運動研究

長期以來，歐洲六〇年代以後新社會運動（即生態運動、和平運動、女性運動）的研究，都是受到所謂的新社會運動理論的主導。簡單地說，這些研究者宣稱由於先進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新時代的社會運動在政治對抗軸線、文化價值、參與者、動員形式、運動策略都與過去的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呈現相當大的差異。然而，許多研究者無法接受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解讀，他們認為，一個合理的理論除了指出新社會運動的「意義」以外，更要能解釋其發展的軌跡 (Koopmans 1999: 98)。此外，研究者也質疑，新社會運動過於關切應然的問題，而無法處理經驗層次的分析 (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and Giugni 1995: 239)。



首先，研究歐洲新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儘管社運組織表面上宣稱超越政黨，但是為了發揮其政治影響力，許多社運組織都與既有的政黨勢力進行聯盟合作 (Dalton 1994, 1995; Koopmans 1995; Maguire 1995)。其次，也有研究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並不是脫離舊有的工會或政黨團體，他們其實是來自於一個更廣大的動員網絡之中，成員具有高度的重疊性 (Rochon 1990; Klandermans 1990)。為了強調新社會運動所具有的創新性格，研究者通常強調這些運動與既有政治體制的疏離，他們拒絕採取既有的政治行動劇碼。誠然，晚近以來的新政治 (new politics) 越來越是涉及日常生活的議題，抗議的首要對象也不再是政府。然而，正是由於缺乏對於社會運動與國家的分析，新社會運動理論無法處理新舊政治之間的連結，甚至是忽略了其若干共通性。這些批評意見共同指向了一個可以探索的問題，亦即歐洲的新社會運動是在何種的政治條件下產生，又是造成了何種的政治影響。對於這個問題，Kitschelt (1986) 與 Tarrow (1989a) 的研究最值得重視。

Kitschelt (1986) 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篇十分濃縮，但卻富有高度啟發性的期刊論文，他試圖以政治機會結構的差異來分析法國、西德、美國、瑞典的反核運動。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⑤（例如美國與瑞典）促使反核運動採取同化性策略 (assimilative strategy)，儘可能地以體制內管道來表達反對；相對地，在封閉的政治機會結構（例如法國與西德）下，反核運動則是採取對抗性的策略 (confrontational strategy)，在決策管道以外進行抗議活動。基本上，Kitschelt 參考 Eisinger 的觀點，以政治體制的開放性來定義政

^⑤ 實際上，Kitschelt 認為，政治機會結構基本上可以區分為投入與產出的兩個面向，前者是涉及了開放與封閉程度的問題，影響了社會運動的策略取向；而後者則涉及了國家行動力的強弱問題，決定了社會運動的實際影響。Kitschelt 認為既定的政治條件不只影響運動的過程，更決定了運動的結果。Tarrow (1989b: 82) 指出，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最好只包括社會運動可以控制的資源，而避免將國家行動力納入。筆者同樣主張，需要區分影響社會運動動員的條件以及影響社會運動結果的條件 (何明修 2002a)。為了行文方便起見，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只討論 Kitschelt 所謂的政治投入結構。



治機會結構。在實際的操作化層次，Kitschelt 以下列的四個面向來界定政治機會結構，(1)政黨數目：越是多黨制的國家，越傾向容許新興利益的政治表達；(2)立法機構相對於行政機構的獨立性：如果獨立性越高，越容易使得新訴求受到國會的支持；(3)利益中介的模型：多元主義的模型使得異議更容易表達，而統合主義則是傾向於抑制新興議題；(4)要求匯集的管道：如果政治體制容許議題形塑的空間，則是越具有開放性。

Tarrow (1989a) 關於義大利六〇、七〇年代新左派運動的研究，最重要的貢獻是將政治機會結構與抗議週期連結在一起。在他看來，抗議活動的頻率通常呈現拋物線的分布，反映了政治機會結構的開啟與再度收縮。在抗議週期上升的階段，抗議行動一開始是缺乏組織的，但是抗議戰術卻不斷創新，運動的詮釋框架也是迅速擴散。到了抗議週期的後段，社運組織已經成形，運動創新的步調開始減慢，不同組織之間面臨強大的競爭壓力，派系傾軋成為嚴重的問題，邊緣組織的暴力化與溫和訴求的制度化同時並行。Tarrow 認為所謂的政治機會結構並不是只有單一的面向，而是包含了許多變項的組合。根據他的整理 (Tarrow 1989a: 22–23, 1989b: 34–36, 1994: 86–89, 1996a: 54–56)，政治機會結構主要以下列四種面向呈現：(1)政治管道的存在：既有的政治局勢越是提供人民參與決定的空間，機會則是越開放；(2)不穩定的政治聯盟：政治局勢越是動盪，越能夠提供挑戰者運作的空間；(3)有影響力的盟友：社會運動需要外來資源的匯入，政治盟友的出現有助於運動的動員；(4)菁英的分裂：如果執政者無法採取一致的行動來回應外在要求，即是為挑戰者開啟了一扇機會之窗。

Kitschelt (1986) 與 Tarrow (1989a) 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前者是共時性的跨區域比較研究，而後者則是貫時性的動態研究。歐洲新社會運動的研究，都指出了美國新社會運動理論的不足，進而探討這些新政治的舊政治基礎。換言之，即使到了六〇年代，人民抗爭的主題有所改變，但是集體行動仍是一種與政治菁英的策略性互動，並且受到各式各樣的政治機會所影響。相對於以往的研究，這些研究作品更深入地剖析國家組織的內部成分，與其對於集體行動所造成的影響^⑥。此外，這些研究也充滿



了高度理論化的意圖，試圖提出政治機會結構的普遍定義。然而，這種定義是否是有可能的，或是有必要的？筆者是持保留的態度，在第六小節將會再回到這個問題探討。

六、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運用與批判

回顧了九〇年代之前的研究作品，在此有必要為政治機會結構提出一個概念性的定義。政治機會結構是指一組以國家組織為中心的變項組合，對於集體行動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可能性，並且提高或降低了運動動員所需要花費的成本。政治機會之所以形成結構，乃是由於在既定的政治脈絡中，這些變項的組合是具有相對上的一致性，並且對於集體行動產生大致上相近似的作用方向。更進一步來說，構成政治機會結構的面向包括了政治管道的存在、菁英體制的穩定性、政治聯盟者的存在、國家的鎮壓能力與傾向等。這個定義主要是綜合歸納上述的 Eisinger (1973)、Tilly (1978)、Tarrow (1997a)、Kitschelt (1986)、Piven and Cloward (1977)、McAdam (1982) 而來的。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些作品中，研究者都沒有提出嚴格的概念性定義。Eisinger (1973) 是用政治機會結構來泛指不同地方政府的開放性差異，或是他所謂的「政治環境」。另一方面，Tarrow (1989a) 與 McAdam (1982) 則是以列舉來代替定義。至少在九〇年代中期之前，學者似乎沒有想要更精緻地處理這個概念。就以 Tarrow 為例，他在較早的作品中 (1988b, 1989a, 1989b)，都沒有定義政治機會結構，而直接將這個概念視為不言自明的，一直到了九〇年代中期的作品 (1994: 85, 1996a: 54)，才有這樣的觀念定義^⑦。

⑥ 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and Giugni (1995: 241–242, 283n) 指出，相對於美國的研究作品，歐洲研究者更重視國家組織，採取更為結構主義的取向。他們也指出，雖然在革命的社會學研究中，Tilly, Skocpol 等人重視國家，但是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這個觀念仍未完全發揮。

⑦ 儘管如此，Tarrow 對政治機會結構的定義仍是不一致的，他在 1994 年的定義強



Tarrow 對政治機會結構的定義有下列的特徵：以國家為中心、將機會視為一種客觀條件、重視社會運動作為一種與執政菁英的策略性互動。到了九〇年代以後，並非所有研究者都能夠接受這種觀點，在實際操作上，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在接下來的部分，本節將逐一討論若干政治機會結構的爭議，並且試圖整理出一種可行的研究策略。

(一)政治機會結構是研究那一種社會運動？

從早期的 Wilson (1961)、Lipsky (1968)、Eisinger (1973) 的研究以來，學者傾向以政治關係角度來觀看社會運動。社會運動不同於一般利益政治，並不是因為前者不是理性地追求利益，而是缺乏政治權力，迫使他們要採取體制外的抗議手段。因此，研究者常以「弱勢」(the powerlessness) (Wilson 1961; Lipsky 1968; Jenkins and Perrow 1977)、「挑戰者」(Tilly 1978; Gamson 1975: 14–18) 等概念來界定社會運動的政治位置。Marx and McAdam (1994: 110) 更進一步指出，如果社會群體是以「適當管道」以外的方式來追求利益，就是符合了社會運動的定義。在此，學者顯然有高度的共識，他們對於所研究的社會運動抱持著一種共同圖像：社會運動是起源於既有體制的 unfair，並且要求改變現狀的集體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角色是重要的，一方面，國家本身有可能是被抗議的對象，民眾向其要求改變權力的運作方式；另一方面，國家也有可能被運動者視為是一種槓桿工具，用來改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 (Quadagno 1992)。Jasper (1997: 7) 將這一種以國家為主要抗議對象的社會運動稱為公民權運動 (citizenship movement)，因為它們都是向政府施壓要求權利的擴充，以容納更廣大的社會群體。然而，在此的問題在於，難道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是公民權運動，可以適用於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嗎？

到了九〇年代，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者對於政治機會結構的批判開始出現。從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角度出發，Melucci (1994: 107–109) 批評這一類

調政治機會結構是一種「誘因」(incentive)，而 1996 年的定義則視其為一種「訊號」(signal)，兩者存在顯著的差異。



研究即是政治化約論，因為研究者只側重社會運動與政治、權力、國家的互動關係，而忽略了社會運動對於當代文化意義與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構。Melucci 擔心，這種狹義的政治分析會使得晚近社會運動的特殊性消失，成為利益政治的延長，而文化創新、認同形塑、日常生活的民主化等運動目標都被研究者視而未見。批評者也舉出各式各樣的「後公民權運動」(post-citizenship movement)，例如動物權運動、新宗教運動、自助運動，來質疑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效力。他們強調這些運動根本不是想要與國家打交道，政治機會對於這些運動者而言是沒有影響的。更進一步而言，既然研究者是以政治關係來界定社會運動的位置（例如弱勢、挑戰者等），這種分析途徑就是側重某一種的社會運動類型，而不是宣稱某種普遍性的架構 (Jasper 1997: 7-9;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4-36)。

事實上，這些批評有許多是受到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啟發，尤其是對於文化的重視。Jasper 指出，後公民權運動並不是為了要爭奪某種政治資源與權力，而且主要的參與者都是中產階級，而不是某些被排除的邊緣團體。這一類型的運動並沒有以國家為導向，所以沒有受到政治機會結構的影響。因此，更簡單地說，文化論者所提的質疑在於：

- (1) 在所有的社會運動現象中，是否存在一種共同目標與性質？
- (2) 所有的社會運動是否都適用於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

關於(1)，從很早以來，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就認為資源動員論不能解釋所有的現象，他們反對以常態的利益政治模型來套用於各種的社會運動。Touraine (1988: 125) 就曾指出，「社會運動是某種普遍意義與社會圖像的承載者，不能只被局限於抗議、宣稱與改革的狹小世界之內」。因此，對於 Touraine 而言，社會運動不能被簡化為一般的衝突，它的特殊性正在於強烈的文化取向。Cohen 與 Arato 有相近的說法。他們強調社會運動採取一種所謂的**雙重策略** (dual strategy)，一方面在民間社會內部由溝通行動建立共識，培養進步而批判的認同；另一方面，以集體的力量向國家部門施壓 (Cohen 1982, 1983, 1985; Cohen and Arato 1994: 492-563)。Cohen 與 Arato 強調社會運動不只是策略性的資源動員，更是一種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換言



之，無論採用新社會運動或後公民權運動的名稱，這些研究者都宣稱有另一種社會運動類型的存在，其目標即是改造文化，而不是為了爭取某種資源或權力。

事實上，就社會運動目標的多樣性這個命題而言，政治機會結構學者也會同意這個說法。Rucht (1990: 162-166) 就曾指出，晚近歐美社會運動可以分為工具性的 (instrumental) 與表達性的 (expressive) 行動邏輯。工具性運動的主要策略是權力取向的 (power-oriented)，關切國家的決策過程，並且試圖進行權力的重新分配。相對地，表達性運動則是採取認同取向 (identity-oriented) 的，將焦點放在文化符碼、角色行為、自我實現等生活面向。同樣地，Koopmans (1999: 98) 也承認，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格，所謂的次文化 (subcultural) 運動與反抗文化 (countercultural) 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因此，(1)並不是真正的爭議重點，研究政治機會結構的學者可以欣然接受運動目標的多樣性，而不會妨害他們的理論性宣稱。問題的核心反而是在於(2)，如果政治機會結構只能分析某些特定的社會運動，那麼其理論效力則是十分有限的。

在此，一個解答(2)爭議的方法在於檢討政治機會結構學者如何定義社會運動。根本的問題在於：他們對社會運動的定義是否過於狹窄，因而無法處理所有可能的經驗現象？根據 Tarrow (1994: 4) 的定義，「社會運動是由具有共同目的與彼此團結的人民所發動的集體挑戰，持續地與菁英、對手和權威從事互動」。這個定義十分重視社會關係，把人民與其對抗者的互動當成核心。就這一點而言，即使是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也是涉及了社會關係的重新建構，新認同的形塑過程也不能自外於社會對抗的格局。越到了後來，學者對於社會關係的重視更加明顯，他們強調社會運動即是一種互動關係，而不是某種獨立的實體 (Tarrow 1996b: 874; McAdam and Tarrow 2000: 149;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72-74)。

不過，上述的定義並沒有說明清楚政治體制的角色，所謂的「菁英、對手與權威」只是為了試圖容納所有可能的抗爭對象。越到了晚近，McAdam, Tarrow 與 Tilly 等人試圖提出一套可以包含集體行動、革命、社



會運動的「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模型。所謂的抗爭政治即是(1)「關於抗爭，亦即對於他人提出涉及利益的宣稱」，(2)「至少互動中的一方（包括第三者）是政府」(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6: 17)。他們在 2001 年的著作中，對於國家的角色有更進一步的釐清，即「政府至少是一個宣稱提出者、宣稱的對象，或是與宣稱有關的一方」(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5)。換言之，政治機會結構並不是只分析挑戰政府政策的社會運動。由於現代國家組織形態的出現，在這種政治權力與資源的高度集中化前提下，社會衝突的軸線總是涉及了政府權力的實行與不實行，無論其關係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因此，即使是追求文化解放的社會運動，也會受到政治機會結構的影響。舉例而言，研究拉丁美洲生態與女性運動的學者也指出，由於長期以來的威權統治，在民主運動的潮流下，拉丁美洲的「新」社會運動仍是具有許多「舊」社會運動的特徵，包括高度政治化的參與、政黨認同與草根群眾基礎 (Mainwaring and Viola 1984; Foweraker 1997)。在 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and Giugni (1995: 165–169) 的研究中，歐洲的同性戀運動不只是慾望與認同的追求，同時也涉及了一種政治過程。透過對於不同國家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Kriesi 等人可以解釋為何動員的密集程度與策略呈現各國的差異性。同樣地，Perry (2001) 也指出這樣奇特的現象：當前中國政府盡力疏導愛國主義的抗議，一定程度上寬容工人與農民的集體上訪^⑧，但是卻對於最不具有政治色彩的法輪功學員，採取嚴厲打壓的政策。Perry 認為原因在於，特有的政治條件使得共產黨政府無法容忍具有廣大社會基礎的宗教團體 (ibid.: 171)。法輪功的故事也啟示這一點，即使最個人化、心靈取向的新宗教運動，也面臨了既有政治機會結構的限制。

針對(2)的問題，本文認為，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重視互動關係與國家的角色，因此可以提出一套具普遍性的參考架構。反對者經常指出，政治機會結構學者多半研究政治味較重的社會運動，因此這套理論是為了這一類型的社會運動量身設計，是有選擇上的偏見 (Jasper 1997: 35; Goodwin

⑧ 中國的集體上訪即是臺灣的請願、陳情。



and Jasper 1999: 35)。然而，這並不能代表所謂的後公民權運動不能進行政治過程的研究，相反地，這個未開發的領域反而是政治機會結構研究下一步發展的契機。總之，如果能夠妥善運用，這個概念將能夠發揮十分有用的分析效力，尤其是針對於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的互動面向。

(二) 國家中心論與政治機會結構的核心成分

前面提到，政治機會結構的發現是與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息息相關，事實上從一開始，這個研究途徑所構想的政治即是狹義性的指涉，只涉及了制度化的政治部門，亦即國家組織。一直到九〇年代之前，無論是在 Lipsky, Eisinger, Wilson 的都市抗議研究、Tilly 的歐洲抗爭史研究、Skocpol 的革命研究、McAdam, Piven and Cloward 的美國民權運動研究、Kitschelt, Tarrow 的歐洲新社會運動研究，都是遵循這個未明言的設定。但是一直到了 1996 年的一篇文章中，Tarrow (1996a: 45) 才正式將這種觀點稱為國家中心論 (statist)，並且視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為其理論先驅⁹。

然而，誠如 Connolly (1983) 所指出，許多政治學的基本概念本質上都是充滿爭議的 (essentially contested)，學者始終無法賦與這些概念一個共同的意義內涵。因此，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政治機會結構的國家中心論是否為一種合理的預設？以國家為核心的分析途徑到底能夠提供我們什麼樣的幫助？從長期的歷史觀點來看，Tilly 指出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本身就是充滿衝突的，而在其形成之後，更進一步形塑了抗爭政治的可能性。在政治的全國化 (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的趨勢下，國家即是一國之內政治資源分配的中心點，不同群體的抗爭政治總是涉及了國家權力的分配問題。在此，筆者贊成國家中心論分析取向，其理由是方法論的，而不是涉及了政治的實質定義。筆者認為執政者與反對者的持續互動乃是社會運動研究中重要的一環，需要一種獨立的分析架構來處理。

進一步來說，這種國家中心論的分析至少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政治機會

⁹ 在此，Tarrow (1994: 85) 在某個段落將政治機會結構概念描述為「外在的資源」。儘管如此，這種描述仍容易造成機會與資源的混淆。



與運動資源的概念差異。誠如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2-33) 所指出的，在晚近許多作品中，政治機會結構這個概念已經被十分浮濫的使用，主要的原因在於研究者忽略國家中心論的根本預設，把許多應該歸類為運動資源的東西稱為政治機會。舉例而言，在一篇研究中美洲農民運動的作品中，研究者將農民的「民怨」也視為政治機會之一 (Brockett 1991: 335)。十分類似地，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and Giugni (1995: 3-25) 也將國內政治勢力的分歧結構 (cleavage structure) 視為政治機會結構的變項之一。這些例子都混淆了機會與資源的概念，使得政治機會的概念顯得過於鬆散，甚至不再具有分析效力。

有些研究者則是意圖擴大政治機會結構的指涉範圍，他們認為國家中心論是一種結構主義偏見，無法分析社會運動所實際面臨的過程。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Gamson and Meyer (1996: 279-283, 287-288) 進一步指出，政治機會除了制度的面向，仍有文化的面向。因此，他們將社運組織的媒體進路 (media access) 也視為一種政治機會。基於同樣的文化觀點，Jenson (1995: 115) 認為社運團體的「自我命名」(self-naming)，也該被視為一種「製造機會」。有些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的研究者認為，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應該擴展，納入非正式領域中的性別關係、女性的社會地位等 (Ferreer and Roth 1998; McCammon, Campbell, Granberg and Mowery 2001; Noonan 1995; Wald, Button and Rienzo 1996)。

在此，筆者雖然同意文化與性別關係對於社會運動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將政治機會寬鬆詮釋，將會使得這個概念過度負擔 (overloaded)，變得無法進一步處理細緻的分析。再且，如果這些研究者的企圖是合理的，那麼所有過去被視為運動資源的元素，全部都可以掛上機會的名義出現。因此，社運組織所具有的財力資源可以被視為「財力機會」，所能動員的參與者亦可以視為「動員機會」等等。如此一來，除了增添分析上的困難度以外，等於是什麼都沒有說。就上述的例子而言，女性專業者的多寡與大學的數量應該是屬於資源的範疇，而不是政治機會，因為這些要素的存在與否，與國家部門並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將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限定於國家部



門之內，具有研究方法上的聚焦作用，避免與資源相互混淆。

其次，國家中心論的政治機會結構觀，也有助於釐清新政治與舊政治的差異。新社會運動理論學者發現了晚近進步政治的結構變遷，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運動是訴求日常生活的民主化，而不是爭取某種政治資源。然而，到底新社會運動是否自成一格 (*sui generis*)，是否需要另一種的分析方法，則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對於許多人而言，新、舊社會運動的差別可以表述為認同／權力、文化／政治、承認／重分配等對立。但是這種簡化說法不容易站得住腳。

的確，新政治帶來了不同於以往的議題與參與方式，相當程度地擴充了社會運動的範圍。儘管如此，這一類的新興社會運動或多或少仍是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因此能夠適用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在此，可以採用 Giddens 對於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 的探討，來理解這些新興社會運動。在 Giddens (1991: 209–217) 看來，晚期現代性導致了傳統與自然的消失，「自我」日益被當事者作為反思的對象，需要透過行動者時時刻刻加以定義。生活政治提出了倫理學的問題，亦即是我們要如何選擇自己的生活，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面向都可以被反思與批判。相對地，傳統的解放政治 (*emancipatory politics*) 關切的是正義、平等和參與的問題，因而可以落實在具體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上。簡單地說，生活政治關切生活風格 (*life style*) 的選擇，而解放政治則是涉及生命機會 (*life chance*) 的分配。Giddens 的提法承認新政治的創新性格，同時避免了過度簡化的二元論。更重要的，他認為生活政治與解放政治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抉擇，兩者之間其實可以透過若干形式進行接軌。Giddens 強調，儘管生活政治在當代的重要性十分顯著，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解放政治的消失。一方面解放政治提供自由的政治環境，使得生活政治的議題可以公開討論，另一方面，生活政治也涉及了公民權的制度化，而不只是純粹的文化事件 (*ibid.*: 226)。因此，就這個共通性而言，攸關性傾向、生物科技、環境倫理等議題的社會運動，也是某種政治過程，可以用政治機會結構加以分析。生命政治同樣也涉及了公共政策與公民權的意涵，因此國家中心論的基本預設仍是有效的。



不過，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常面臨被濫用的危機，為了杜絕概念被過度擴張，一個可能的作法即是事先詳述其主要的內容。上述的 Kitschelt (1986) 與 Tarrow (1989a, 1989b, 1994, 1996a) 即是採取這種策略。McAdam (1982) 的早期作品並沒有明確提出政治機會結構的內涵，但是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的作品中 (McAdam 1996a: 27; Marks and McAdam 1999: 99)，他開始列舉政治機會結構的主要面向，包括：(A1) 政治體制的開放性與封閉性；(A2) 菁英體制的穩定性；(A3) 菁英聯盟者的存在與否；(A4) 國家鎮壓的能力與傾向。十分類似地，Tarrow 也認為政治機會結構主要包含下列的核心：(B1) 政治管道的存在；(B2) 不穩定的政治聯盟；(B3) 有影響力的盟友；(B4) 菁英的分裂（見第五節）。這兩份列舉重疊性很高，大致上有基本的共識，但仍有若干面向值得討論。首先，McAdam 的 (A1) 政治體制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其實是涉及了整個政治機會結構的總合結果，而不是要素之一。因此，比較合適的說法是 Tarrow 的 (B1) 政治管道的存在。其次，兩人的 (2) (3) 都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部分。至於 Tarrow 所提到的 (B4) 菁英的分裂，筆者則是認為與其 (B2)(B3) 具有邏輯意涵關係，嚴格來說並不是獨立的。因此，總結上述的討論，政治機會結構的核心組成元素應該包括如下：

- (C1) 政治管道的存在。
- (C2) 菁英體制的穩定性。
- (C3) 政治聯盟者的存在。
- (C4) 國家鎮壓的能力與傾向。

在此，筆者認為這份清單具有參考價值，因為這是概念性的整理，而不是經驗上的變項列舉。在經驗層次上，永遠無法列出所有可能的政治機會變項，即使列出一份完整的變項名單是可能的，對於實際研究的助益也不大，因為並非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同時涉及政治機會結構的所有面向。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1) 曾指出，政治機會結構很難被妥善定義。如果定義得太廣泛，這個概念就顯得毫無意義¹⁰；反之，如果採取太狹義

¹⁰ 舉例而言，Brockett (1994) 指出，政府鎮壓有可能導致抗爭的退潮，有時卻會激發更大的反彈。他認為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可以解答鎮壓的不同後果：在政治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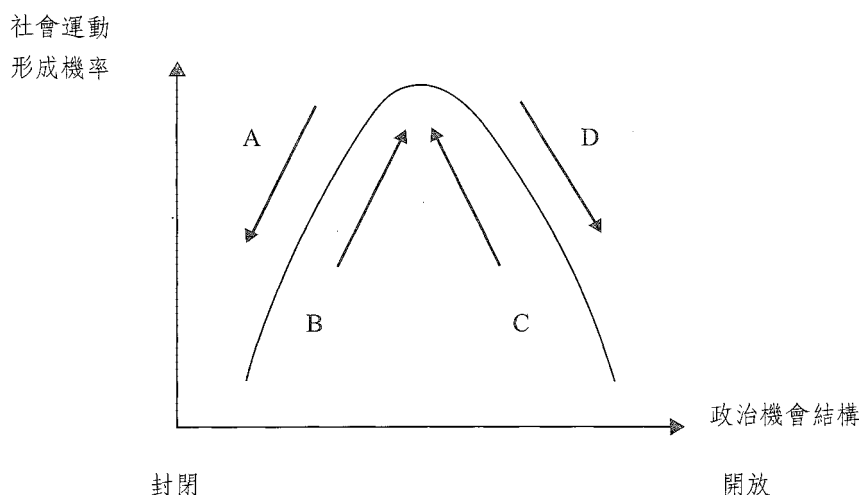
的定義，那麼就很難解釋任何一個社會運動的興起。事實上，Goodwin and Jasper 所指出的兩難情境是不存在的。筆者認為，認真地對待國家中心論的核心預設，並且小心地釐清政治機會與運動資源的差異，就可以避免廣泛而漫無邊際的概念使用。此外，既然沒有必要詳列所有的政治機會結構變項清單，就不太可能面臨定義太狹隘的危險。誠如 Meyer (2004: 134) 所指出的，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應該提出更廣泛的概念性思考，而不是任意地列舉與個案有關的變項。因此，國家中心論即是提供了政治機會結構研究者概念性思考的基礎。

套用一句理性選擇學派常用的語言，國家中心論的預設是「方法論的，而不是形上學的」。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者願意承認社會運動的多種風貌，涉及不同類型的議題、參與方式、價值理念，但是這並不否定國家權力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社會運動的目標有可能是追求某一種的自主性文化，反對政府的規訓與常態化，但是運動的成敗仍是受制於更廣大的政治氣候所影響。就這一點而言，國家中心論提供了設定研究議程、聚焦研究問題的作用，換言之，它是一套共同的分析語言，而不是已預設好的結論。

(三)開放性與封閉性

從一開始，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就是圍繞在開放性與封閉性問題上。在此，開放性是指政治體制容許集體利益追求的範圍與程度。Eisinger (1973) 宣稱只有在開放性中等的政治機會結構下，社會運動才會產生，而過於開放或封閉的體制都不利於社會運動。另一方面，Tarrow (1989a) 與 McAdam (1982) 則是認為社會運動的抗議週期是始於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而結束於其封閉。初看之下，兩種宣稱似乎存在不一致之處，需要進一步地說明。

會結構有利的時候，鎮壓是沒有效果的；但是在不利的情境下，鎮壓則會產生抑制參與的作用。但是難道鎮壓的強弱不正是政治機會結構的一環？這樣的解釋反而陷入同義反覆。



說明：A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半開放到完全封閉，B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封閉到半開放，C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完全開放到半開放，D 趨勢為政治機會結構從半開放到完全開放。

圖 5-2 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形成的機率

圖 5-2 是將 Eisinger (1973) 的曲線理論圖像化，根據他的說法，只有當政治機會結構產生 B 或 C 方向的變動時，社會運動才有存在的空間。A 方向的變動會使得社會運動的動員成本太高，而無法進行，相對地，D 方向的變動則將所代表的社會利益重新吸收進入體制內，也同樣使得社會運動消失。很明顯地，大部分的抗議週期研究者都是處理 A 與 B 方向的變動，因此，他們宣稱政治機會結構的開啟引發抗議風潮，而其收縮則是使得抗議衰退。用圖 5-2 的方式來表達 Tarrow (1989a) 與 McAdam (1982)，六〇年代義大利新左派運動與 1961-1965 年間的美國民權運動是處於 B 趨勢，而七〇年代的義大利與 1966-1970 年間的美國是處於 A 趨勢。

在研究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抗議之作品 (Chu 1992; Ekiert and Kubik 1999; Hipsher 1998a, 1998b; Kubik 1998;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Oxhorn 1991, 1994, 2001; Pérez-Díaz 1993; 張茂桂 1989; 張茂桂、朱雲漢、黃德福、許宗力 1992)，學者也經常運用圖 5-2 的 A 與 B 趨勢來解釋抗議風潮的興衰。儘管並非所有的政治轉型研究者都使用政治機會結構這個術語，



但是他們通常認為，(1)政治高壓的鬆綁或說是自由化（即 B 趨勢），促成了抗議政治的浮現，刺激更多的社會運動出現；(2)政治民主化的建立或說是民主鞏固（即 A 趨勢），使得抗議動員的幅度減少，社會運動呈現衰退的狀態。

對於 Eisinger 所指認的曲線理論之另一半邊（即 C 與 D 趨勢），研究者的注意力似乎比較少。先就 D 趨勢而言（即政治機會結構從半開放轉變為完全開放），所造成的效果即是將社會運動吸收進入體制，成為 Tilly 所謂的「政體成員」。Gamson (1975: 29) 曾指出四種社會運動有可能的後果，即完全回應（抗議團體獲得了承認與利益）、先發制人（preemption，抗議團體只獲得利益，但是缺乏承認）、收編（co-optation，抗議團體只獲得了承認，但是缺乏利益）、與瓦解（抗議團體沒有獲得承認與利益）。從上述的分析來看，所謂的完全回應、先發制人與收編都可以算是 D 趨勢的表現，相對地，在瓦解的結局中，A 趨勢顯然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進一步而言，D 趨勢將使得社運組織朝向更體制化的方向轉化，通常是成為利益遊說團體或是政黨。從社會運動轉向為利益遊說團體的例子包括了七〇年代的美國主流環境保育團體 (Dunlap and Mertig 1992)、八〇年代的美國反核武運動 (Meyer 1993)。另一方面，形成政黨也可能是 D 趨勢的另一種結果，例子包括了八〇年代興起的巴西工人黨 (Keck 1986-7)、歐洲新左派政黨 (Kitschelt 1989; Redding and Vitterna 1999)、義大利的民粹主義政黨 (Diani 1996)。

至於 C 趨勢（即從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轉變為半開放的），通常是符合反制運動 (countermovement) 的出現條件。根據 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 1638-1639) 的分析，反制運動通常是出現於若干群體的利益面臨威脅，但是又仍未完全喪失既有的特權之時刻。用圖 5-2 的方式來表示，也就是 C 方向的變動，從體制內的優勢群體轉向體制外的抗爭群體。

(四)從決定論到互動論

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6-41) 提出另一項批判，亦即是政治機會結



構的概念採取了過度客觀主義的預設，甚至形成了某種隱藏的結構決定論。Rootes (1997) 也提出類似的批評，在他看來，政治機會結構一詞容易排除偶發性的政治事件，而過度預設政治條件的一貫性。Gamson and Meyer (1996: 283) 更進一步強調，任何機會的存在是涉及了當事者的詮釋過程，因此，「沒有被察覺的機會根本不是機會」。從這些批判的標準來看，早期的研究作品的確存在決定論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是 Skocpol (1979) 與 Kitschelt (1986)，兩者都是以國家組織形態來預測革命或社會運動的產生。同樣地，在一份研究臺灣環境運動起源的作品中，學者指出，外在政治因素不足以解釋八〇年代的自力救濟風潮，因為「外部控制力鬆動或不見了，社會內部的力量也不見得會自發地萌生」（李丁讚、林文源 2000: 141）。在此的問題即是，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是否有可能避免陷入決定論的危險，卻不需要完全拋棄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在常態的情況下，政治機會的總合是呈現相對地穩定狀態，不同的政治條件彼此是相互關連，並且形成一個具有內部結構的整體。在最低限度之內，國家組織內部維持相當的一致性，而不太可能存在劇烈的不協調。因此，在既定的條件之下，社會運動所面臨的政治機會結構是呈現相對一致的，可以總括地使用開放性或封閉性來加以描述。儘管如此，要回應結構決定論的批判聲音，下列的思考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區分長期結構趨勢與短期事件的影響。Goodwin and Jasper (1999)、Rootes (1997)、Gamson and Meyer (1996) 都建議對於短期事件應多加關注。事實上，並不是所有政治機會結構學者都排斥對於偶發性事件的討論。就以 McAdam (1982: 185, 200) 為例，他特別注意到 1968 年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遭暗殺事件所造成的運動派系傾軋惡化與政府鎮壓強化。儘管如此，McAdam (1982)、Tarrow (1989a) 的研究企圖都是要建立一種抗議的週期性變遷模型，直接反映了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與收縮。在他們的作品中，個別事件只是長期趨勢中的代表性指標，其本身並不具有獨立的因果作用力。



Sewell (1994, 1996) 有可能是集體行動研究領域中對於時間議題最敏銳的學者，他很早就批判 Tilly 的「目的論時間觀」(teleological temporality) 與 Skocpol 的「實驗性時間觀」(experimental temporality)，兩者都是企圖複製自然科學的律則觀，認為普遍性的因果律則可以解釋某些類型的事件。Sewell 提倡一種以事件為中心的時間觀，強調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的特殊影響力。到了晚近，這種以事件為中心的時間觀點更進而影響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學者開始探討所謂的「轉化性事件」(transformative event) 對於政治機會結構的衝擊 (McAdam and Sewell 2001: 101–112)。轉化性事件即是運動過程中的轉捩點，透過群眾抗爭所帶來的擾亂與不確定性，舊有的政治環境被強力扭轉過來，新社會的圖像就是預先展示在這個時刻之中。另一方面，學者也重新詮釋了所謂的「突如其來的民怨」(suddenly imposed grievance) (Walsh 1981)，並且將這個概念重新帶入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在他們看來，這些偶發性的事件經常具有重新形塑政治環境的作用力，並且驅動新一波的抗爭動力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201–204)。因此，政治機會結構並不一定必然排斥短期事件的討論，越是在晚近作品中，學者越有意識地平衡以往長期性或週期性的分析取向，轉而更注意偶發性的、未預期性的政治機會面向。

第二，掌握機會與製造機會。在以往，學者為了強調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經常將政治機會結構當成具有因果解釋效力的自變項，社會運動的形成、成敗、策略取向等因素則是被解釋的依變項。Kitschelt (1986) 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其分析中，歐洲反核運動的策略與影響程度完全是受限於既有的政治機會結構。如此一來，彷彿社會運動只能夠消極地等待時勢，至多只能在關鍵時刻掌握機會，而缺乏主動性的製造機會或改變機會的能力。因此，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很容易就被認為是「政治決定論」、「政治化約論」，而忽略了社運部門的自主性 (張茂桂 1994: 46–47)。在晚近民主化的研究中，Collier (1999) 指出，工人階級的抗爭經常在關鍵時刻扮演重要的角色。廣泛的階級抗爭往往迫使威權統治者讓步，採取更開放的改革措施。



晚近學者也開始強調另一個面向，亦即是社會運動如何製造機會 (Tarrow 1994: 96–99; McAdam 1996a: 35–37)。更進一步來說，製造機會的方式存在下列的多種可能：首先，社運組織有可能故意誘使對手犯錯，喚起第三者的關心，使得原本不利的局勢獲得扭轉。McAdam (1983: 749) 就指出，民權團體特意選定在南方白人警察最殘暴統治的城市發動抗爭，以促使聯邦政府推動民權法案。其次，菁英分裂雖然常被認為是有利於社會運動的出現，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菁英之間的不協調與意見對立也有可能是運動的後果。舉例而言，Jenkins and Brents (1989) 指出，美國三〇年代的工人抗爭迫使資本家陣營分裂，出現一派改革取向的企業家，有助於 1935 年社會安全法案通過。同樣地，Piven and Cloward (1977: 60–64) 強調，三〇年代的失業工人抗議使得地方官員面臨極大的挑戰，轉而向聯邦政府施壓，要求更多的社會救濟措施。最後，成功的社會運動展現了對手的弱點，其本身就是形塑政治機會結構的原因之一。就其直接的影響而言，先行的社會運動將會降低後續的動員成本，使得統治者更難採取壓制的手段。在探討臺灣八〇年代社會抗議的作品中，研究者即發現這種「掩護效果」或「擴散作用」(吳介民 1989: 102–103; 何明修 2003a)。在臺灣教育改革的研究方面，學者也發現反對團體可以巧妙地運用國家結構內部的矛盾，運用民意代表的力量來形成所謂的「政治槓桿」，迫使官僚體制接受其改革訴求 (熊瑞梅、紀金山 2002: 230–231)。

另一方面，就其間接的影響而言，先前的社運也有可能在未曾意圖的情況下產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為後來的社運開拓新的機會。舉例而言，七〇年代美國婦女運動者成功地打入政府部門，也為八〇年代新興的反核武運動提供了不少協助 (Meyer and Whittier 1994: 292)。因此，政治機會結構不應被視為不可改變的前提，在若干條件的配合下，社會運動有可能成功地塑造機會，而不只是被動地反應或等待機會。

第三，從普遍律則到因果機制。在此，另一個困擾的問題在於，許多研究者期待找出某種的普遍性宣稱，明白地指出某個政治機會將會帶來何種程度的作用。Skocpol (1979) 顯然是遵循這套方法論的原則，她試圖證明：



革命局勢只有可能產生於進行現代化過程中的農業官僚帝國。然而，在政治機會結構的批判者看來，這種普遍律則的企圖通常是徒勞無功的。舉例而言，選舉的舉行到底是增加了抗爭者的運作籌碼，還是產生了抑制體制外行動的壓力？在這一點，政治機會的作用方向是不明確的。另一方面，批判者更指出，若干的抗議活動並不是政治機會結構的開啟所導致，反而是由於威脅與危險，才引發參與者的熱情 (Jasper 1997: 37–38) ⑩。

晚近以來，幾位主要的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拒絕這種普遍律則的思考方式。他們強調，集體行動的研究應該放置於互動層次的分析，從不同的個案中尋找中間層次的因果機制，而不是某一種涵蓋式的命題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24–27, 46–47)。從這個觀點來看，某項政治條件之所以發揮作用，並不是由於它符合了某種因果律則，而是透過了一種涉及抗議者與被抗議者互動的機制。在解釋特定的運動過程時，研究者的任務應是在於分析其中的結構歸屬 (attribution) 與行動者佔用 (appropriation) 之互動，而不是假定某一種政治因素是具有一致性的作用力方向。因此，光是指出某一種政治條件是有益於抗爭出現是不充分的，研究者仍需要進一步指認出其影響的途徑與管道，亦即其因果作用的機制。

更進一步來說，一旦我們拒絕了決定論式的普遍律則，那麼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到底如何促成抗議產生，則是需加以說明的過程，而不是某種假定的自然反應。事實上，開放的政治機會可以帶來某種的參與管道，同

⑩ 在其他文章，Goodwin and Jasper (1999: 39) 更誇張地說，由於威脅 (threat) 能夠發揮強大的動員效果，因此可以說在某些個案中，正是由於政治機會結構封閉，社會運動才產生。在此，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缺乏意義的，因為威脅是強化了參與者的參與意願，用 Snow and Benford (1988: 202) 的話來說，即一種「動機框架」(motivational frame)，但是並非指涉任何政治條件的改變。簡單地說，Jasper 等人在此的批評是混淆了心理的與政治的層面。同樣是過度誇大威脅效果的例子，見 Gould (2001: 146–148)。1986 年美國最高法院的 Bowers v. Hardwick 判決，否定了同性戀者基於雙方同意的、私底下的性行為權利，激發出新一波的同志抗爭。這個判決的確帶來心理上的威脅感，但是同志從事社會抗議的空間並沒有縮小，因此並不是政治機會結構的封閉。



時也是排除了某一種的社運動員可能性。在美國八〇年代的凍結核彈 (Nuclear Freeze) 運動中, Meyer (1990: 246) 指出, 美國政黨政治的可穿透性使得某些反核彈運動者被吸納進入在野的民主黨陣營, 導致整體運動部門的去動員化。吳介民 (2002) 認為, 臺灣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之一, 也是由於民進黨人士的高度介入。在反核運動的歷程中, 政治菁英的支持也有可能造成運動部門的資源依賴 (何明修 2003b; Ho 2003a)。因此, 一旦拒絕了決定論式的思考模式, 政治機會結構的分析需要進入更為中程層次 (middle-range) 的機制討論, 仔細地區辨出每一項政治機會所帶來的各種可能作用。

總之, 對於政治機會結構可行的分析策略, 在於重視短期突發事件、政治機會的製造及因果機制的解釋。粗糙的決定論預設受到質疑, 一種新的互動論分析成為新的主流意見。在九〇年代後期以來, 這些修正觀點逐漸成為主要學者的共識。

七、結論：政治機會結構與「小思考的策略」

在一份經典性的研究作品中, Gamson (1975: 38–54) 比較不同社會運動的策略運用。他發現單一議題的社運組織較有可能獲得成功, 而追求廣大目標、多重議題的社會運動往往很難有所斬獲。Gamson 將這種贏的祕訣稱為「小思考的策略」(strategy of thinking small)。同樣地, 關於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 筆者認為其所面臨的困境並不是來自於國家中心論的基本預設, 相反地, 正是由於這些基本預設沒有被釐清, 才導致了諸多的誤解與誤用。因此, 要解決理論的困境, 關鍵並不一定在於放棄原先的預設。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而言, 「小思考的策略」也是有啟發性的, 因為一個好的理論並不一定要能夠處理所有的問題, 而是在特定的脈絡中能夠發揮該有的分析作用。政治機會結構的優點在於能夠更精緻地處理社會運動與國家部門的關係, 使得政治面向的議題能夠獲得重視。但是除此之外, 這套觀點並沒有預設某種社會運動的單一本質, 也沒有否認各種社會運動的多樣



性。作為一種經驗分析的工具，它不需要去定義社會運動的本質或其意義，也因此，種種的反制運動也可以被納入其分析的對象。

在本章中，筆者回顧了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發展歷程，整理這種分析觀點如何從不同的領域中逐漸匯流而成。最晚到了八〇年代，一個主流的共識開始成形。政治體制是有選擇性的開放，導致若干集體利益的追求必得要採取抗議的形式。國家是當代政治生活的中心，社會運動所抗爭的焦點是涉及國家權力的實行與不實行。即使是所謂的新社會運動也是處於舊政治的脈絡中，政黨、民主、國家組織等因素同樣地具有影響力。資源與機會需要在概念上更進一步釐清，前者泛指能夠協助社運動員、而能夠被社運組織所擁有的因素；而後者則是特指政體的開放性程度。基於這些觀點，政治機會結構的理論儼然成形，並且成為一種極具潛力的分析途徑。

然而到了九〇年代，一方面由於政治機會結構概念的濫用，另一方面由於其他學者的質疑，這一類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挑戰。針對這一點，本章的第二個意圖即是重新釐清政治機會結構的概念內容與適用範圍。綜合上述的整理，筆者提出下列的建議：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涉及了互動關係與國家權力的問題，因此，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也有其政治過程。政治機會結構強調一種國家中心論的預設，如此可以有助於分辨資源與機會之差異。要避免政治機會一詞的浮濫使用，重點並不是在於列舉所有可能被稱為機會的清單，而是必須更重視國家中心論的基本立場。開放性與封閉性是相對說法，Eisinger 所指認出的曲線關係之另一半（即從半開放性到完全開放性）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討。研究者應該放棄決定論的立場，改採互動論的觀點，並且更注重短期事件、機會製造與中層因果機制的分析。總之，筆者相信，釐清這些關鍵性的議題，能夠將社會運動的政治分析放置於更穩固的方法論基礎上。

第六章

構框：

社會運動的意義創造。





一、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

在晚近，社會運動研究者的注意力開始轉向文化層次的分析。學者注意到這個事實，社會運動不僅是挑戰既有的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方式，同時也在宣傳一套嶄新的文化訊息，要求實踐某種社會生活的可能性。換言之，社會運動不只是訴求生命機會 (life chance) (例如財富、健康、名聲等) 的重新分配，而是涉及另類生活風格 (life style) (例如性取向) 的承認。社會運動是有創意與想像力的，它要求改造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是關於我們如何看待自我。同時，隨著各種傳播媒體的發展，文化符碼的生產與消費急速成長，也使得意義本身具有高度的反思性格。意義越來越是人造的，而不是自然的，也因此開啟了文化政治的多樣可能性，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捲入這種關於意義的集體形塑過程中。正如 Touraine (1977: 48) 所指出，一旦我們拋棄傳統的先驗概念，例如上帝、民族、天性等等，社會的自我生產 (self-reproduction of society) 就成為一種具有高度反思性的過程，社會運動很難不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除了外部環境的變動，學術研究發展的趨勢也是一項原因，社會運動轉向文化研究也是受到整個社會學典範移轉的影響。Jasper (2003) 指出，社會學的發展經常是圍繞著一組對立的概念，八〇年代是理性選擇學派的崛起時期，文化的關注也是同時期另一項可觀的發展。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如果說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大致上是依循著理性選擇學派的基本預設，亦即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有組織與目標的集體行動，那麼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也就成為另一種既互補又相互競爭的取向。誠如 Alexander (1998: 30-32) 所強調的，文化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構想即是「認真看待意義」(taking meaning seriously)，承認意義是具有相當的運作自主性，而不能只被當成組織、利益、策略的附屬品。在任何的社會生活中，我們是透過意義來組織我們的世界觀，包括了我們是如何理解與評價外在事物，而不是直接面對

● 本章改寫自〈文化、構框與社會運動〉，《台灣社會學刊》(何明修 2004d)。



未經過詮釋的事實，用 Gusfield (1981: 51) 的話來說，我們總是處於「符號森林」中。文化社會學強調這些符號的可塑性與歷史性，社會運動則是實際展現了文化如何在集體挑戰中被創造出來。

要說明的是，重視文化的自主性並不意味著接受某種觀念論的立場，認為理念元素總是獨立地發揮其因果作用力，決定其他社會領域的發展。事實上，意義的問題總是附著在組織、利益與策略之上。分析文化元素與非文化元素的互動，而不是將其中一方化約為另一方，則是研究者的重要任務。或者換一種方式來說，文化的建構性固然容許了行動者的主動性格，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毫無限制的自由。在社會運動提出文化訴求之前，集體行動者即是面對了一連串的歷史傳統、集體記憶、政治文化的前提，而且這些素材並不是他們所選擇的。用文學的術語來說，社會運動的文化創造並不是「無中生有」(ex nihilo)，而是「從事物之中開始」(in medias res)。因此，「認真看待意義」並不意味著「只認真看待意義」；承認文化的相對自主性，也不代表視其為一套封閉的、獨立自足的領域。

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審視社會運動，首先會面臨的問題即是我們擁有太多的分析概念，它們之間是彼此高度關聯，但是卻又源自於不同的理論傳統。從古典的意識型態、階級意識、個人魅力、文化霸權，到後現代主義者偏好的論述、符碼等概念，都提供了相當的洞見，能夠用來剖析文化與權力的糾葛。另一方面，由於社會運動研究越來越成熟，研究者也創造或引用了新的概念，包括了抗議劇碼 (protest repertoire)、認同 (identity)、工具箱 (tool-kit)、共識動員 (consensus mobilization)、以及本文所要討論的構框 (framing)。

所謂的框架 (frame) 一詞，是指「一種簡化與濃縮『外在世界』的詮釋架構 (interpretative schemata)，其方式是強化與符碼化個人環境中的對象、情境、事件、經驗與行動順序，無論是過去的或當前的」(Snow and Benford 1992: 137)。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運動的核心工作之一即是提出一套重新認知世界的參考座標，以喚起參與者的熱情與信念。這套理論預設了一點：任何被壓迫者並不是直接地經驗了被壓迫的事實，能夠單獨地將其指認出，



framing theory

並且視之為不義的，從而採取批評的與反抗的態度。如果沒有新的詮釋，改變既有的集體認知，社會運動就很難產生。在此，構框 (framing) 一詞是泛指這種建立集體行動框架的過程，而所謂的框架設定 (frame alignment) 則是特指連結個體與社運組織認知框架的行動 (Snow, Rochford, Worden and Benford 1986: 464)，因此是涉及了人際層次的互動。本章採用構框理論 (framing theory) 的名稱，以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建構是一種動態的過程 (相對於框架)，而且不只涉及了內部支持者的動員 (相對於框架設定)。

構框理論的靈感是來自於 Goffman 的《框架分析》。Goffman 將框架視為一種組織日常經驗的原則，提供諸多的情境定義類型，以協助人們處理各種互動情境 (Goffman 1974: 10-11)。在八〇年代中期，構框的概念被 Snow、Benford 等人引進社會運動的領域，後來陸續被其他學者所借用，成為了當前研究必備的學術字彙之一。大量的集體行動構框研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社會運動與文化的多樣關係，不過，在這個擴散過程中，概念原先的嚴謹性與精確性被稀釋了，不少研究作品都夾帶了一些原先所不存在的理論元素。因此，學者對於構框概念的分析價值出現了歧異的看法。Benford and Snow (2000) 的文獻整理與批判雖然初步釐清了一些概念上的問題，但是仍無法完全解決若干關鍵性的爭議。

本章採取理論歸納的途徑，以釐清這些概念性的爭議，亦即是從既有的研究文獻中，整理出共同的經驗發現，進而區辨出構框理論所能分析的議題與層次。更具體而言，目標在於：(1)說明 Snow、Benford 等人的互動論取向的構框理論；(2)探討構框的策略性意涵，以及過度志願論的危險；(3)釐清組織間的構框過程。基本上，筆者認為構框理論的發展潛力仍未被窮盡，如果能夠有系統地處理當前研究的一些歧異，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將會更有累積性。

在此，有必要說明構框與其他相關概念的關係。對於實際的經驗研究者而言，諸多的分析概念固然提供了選擇方便性，可以針對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量身打造一套分析架構。然而，由於不同概念之間的微妙差異，如果缺乏批判性的使用，就容易造成研究作品之間無法對話或累積，社會運動



的文化研究也變得零碎化。在此，本章不打算處理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以外的概念，因為它們已經越來越少在晚近的研究作品中使用。儘管如此，在進入構框理論的討論之前，筆者仍要簡單地處理這些相關的概念，以避免誤解。

首先，根據 Tilly (1978: 151) 的定義，抗議劇碼是反對者所能採用的抗議形式之總合。劇碼的組成是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在任何一個時空脈絡中，能夠容許的劇碼必定是有限的，因此現代人往往無法理解傳統的抗議形式。劇碼的概念預設了一種以互動關係為核心的分析途徑，抗議者是選擇性地出招，以呈現他們的不滿。劇碼的概念強調了社會生活中的表演特性，抗議活動實際上是一種角色扮演，也因此可以用來進一步分析社會運動的戲劇學面向 (Benford 1992)。

其次，認同的概念強調了社會運動中的自我問題。認同是一種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連結。在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參與者學會了一種重新看待自我與他人關係的方式。對於新社會運動理論而言，認同的形塑並不是社會運動的副產物或是手段，相反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觀本身即是具有社會運動的目的 (Cohen 1985; Melucci 1996)。對於其他學者而言，認同是內在於所有的社會運動，它只是社會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之一 (Calhoun 1993)。無論如何，認同的概念凸顯了社會行動的價值面向，換言之，利益一致性並不必然會導致社會運動，要促成集體行動的產生，規範的引導也是必要的。

人們總是在遇到問題時，才會想到去翻工具箱，設法從其中找到最適用的零件；將文化視為一種工具箱即是意味著一種行動取向的觀點，文化並不是由外而內 (outside in) 決定了行動的軌跡，而是行動者用來解決問題的方式 (Swidler 1986, 1995)。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運動即是人們解決現實問題的方式之一，而且是拼湊了各式各樣的零件而成的。因此，即使是面對相同的民怨，同樣一套文化工具箱也可能產生相異的社會運動。

最後，為了將資源動員論的分析擴展至社會心理學層面，學者創造了共識動員的概念。根據 Klandermans (1988, 1992) 的說法，行動動員是指匯



集外在資源的過程，而共識動員則是為了建立參與者之間的共享意義。如果沒有共識動員的過程，同一群被壓迫者也不會有參與集體行動的動機，也不可能有後續的行動動員產生。共識動員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是需要被經營出來的，而不是某種事先就存在的事物。

劇碼、認同、工具箱、共識動員的概念都強調意義的建構性質，而不是直接反映了某種既存的文化或本質。社會運動具有創生的 (emergent) 特性，應該被視為新社會誕生的預兆，而不是舊社會瓦解的後果。此外，這些概念也共同預設了社會運動的意圖性，參與者是有意識地創造運動中的文化。總體來說，這些概念的提出是反映了七〇年代以後的主流研究趨勢，亦即是以行動、而非結構的觀念來探討社會運動 (Klandermans, Kriesi and Tarrow 1988)。

乍看之下，這些眾多的分析概念的確令人眼花撩亂，但是事實上，它們分別側重社會運動不同的文化面向，其指涉內容並不是完全地重疊，更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構框對於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有下列的意義。構框強調看事物的方式是人為建構的結果，而不是自然而然的。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夠挑戰既有的體制，原因之一即是在於它提出了某種新穎的觀點，能夠使以往被習以為常的壓迫變成一種問題，而且有可能被改變。就這一點而言，構框蘊涵了其他相近的概念，運動認同可以被視為成功構框的產物，共識動員的概念幾乎完全可以被構框所取代。其次，這個概念在晚近的研究作品中大量使用，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因為構框概念的高涵蓋性與普遍地被運用，本章將探討這套理論的分析方式與價值。

二、Snow 等人的構框理論：互動論的基本預設

在社會運動研究中，構框的概念總是與 David Snow 連結在一起。在將近二十年的學術生涯中，Snow 與其同事共同發展了這套理論，並且運用於各種的社會運動研究中。本章將回溯 Snow 等人的理論發展，並尋找當若干爭議的源頭。起初，Snow 等人是關心人際互動情境下的意義建構問



題。用他們的話來說，構框理論一開始即是要處理微觀動員 (micromobilization)，亦即人際網絡中的運動動員過程。有三個理由可以解釋構框理論為何是以微觀研究前提作為出發點。

首先，Snow 本人在轉向社會運動研究之前，主要的學術興趣是在新興宗教運動。新興宗教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是為何某些人會拋棄原先的想法，改信某一種宗教學說。事實上，研究信徒的改宗 (conversion) 是與研究社會運動的招募 (recruitment) 十分接近，同樣是重視人際網絡對於個體內心世界的影響。更重要的，很少人是為了獲得實際物質利益而轉變信仰，大部分的情況是為了某種意義的追求。也因此當有宗教研究背景的 Snow 轉入社會運動的研究，他適時地掌握了學界對於資源動員論的不滿氣氛，成功地將人際網絡與意義的問題導入。

其次，在正式提出構框理論之前，Snow 就開始質疑以前社會運動研究的兩點預設，亦即個體主義與功利主義。

根據個體主義的預設，要探討社會運動參與的問題，必須從個體的決策出發。在 Olson 的個體經濟學模型下，參與問題被簡化為個體的成本效益分析，決策當事者是獨立進行判斷的，而沒有他人的介入。另一方面，從傳統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參與的問題則是被化約成為個體心理狀態的探討。在 Snow 等人看來，這一類的分析方式都是忽略了社會網絡的重要性，試圖從個體的稟性 (individual disposition) 來探討所謂的結構可及性 (structural availability) (Snow, 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 792-794)。在實際的研究中，他們發現，社會運動的招募依循著各種微觀結構管道 (microstructural avenues)，包括朋友、親人、同學、同事等關係。事實上，一旦將研究焦點放在無所不在的社會網絡，就可以同時避開先前研究的雙重困境：經濟學模型設定理性個體，結果集體行動不容易產生；社會心理學分析則是將參與貶為病態心理的後果。從社會網絡的觀點出發，Snow 等人強調，促成運動招募的元素是與「參與志願組織、救助行為、看醫生、找工作等」相類似 (Snow, 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3: 118)。

早期資源動員論，從個體理性計算來思考運動參與的問題，這即是一



種功利主義的預設 (Fireman and Gamson 1979; Hirschman 1982)。Snow 等人強調，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參與者都是被邀請而來的，人們很少單獨地自願加入某個團體。因此，參與動機並不是事前存在的，而是某種社會互動的後果。就這個觀點而言，分析社會運動的參與應該是問「如何」(how)，而不是「為何」(why) 的問題 (Snow, Zurcher and Eklund-Olson 1980: 795, 799)。換言之，正是在社會網絡所提供的互動情境下，社會運動參與的動機才能被激發出來。因此，動機並不一定是早於參與，更不是社會運動的前提，事實上，參與的動機即是在社會互動中所建構出來的。只不過，在正式轉向構框理論之前，Snow 等人一直無法更詳盡地說明社會網絡所提供的實質作用。

第三個使得構框理論高度依賴互動論預設的理由，是 Goffman 本人的研究興趣。Goffman (1974) 的探討問題焦點是直接源自於 W. I. Thomas, William James, Alfred Schutz 及 Harold Garfinkel 的微觀社會學，亦即行動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出諸多層次而又秩序井然的情境定義。Goffman 指出，正是由於各種框架的存在，日常生活才成為可以理解的。功能論者主張，文化系統具有某種的因果優越性，能夠決定行動者的意圖，相對地，Goffman 認為框架並不是由外而內地加諸於個體之上，行動者在各種情境中不斷協商、甚至是顛覆框架。同樣一句話可以用來描述、諷刺、嘲笑、欺騙等不同的作用，這顯示了框架的彈性，可以用來處理諸多層次的日常互動，更是展現了行動者的意義創造能力。因此，微觀社會學展現了行動者本身所具有的主動性，他們不應視為某種 Garfinkel 所謂的文化白痴 (cultural dope)。

儘管如此，Goffman 顯然缺乏對於互動秩序 (interaction order) 以外的理論關懷，他拒絕討論框架與鉅觀層次的社會過程之關係。有些持同情立場的評論者強調，Goffman 的研究是有系統性的，可以進一步整合其他社會結構的討論，但是這並非 Goffman 本人的興趣 (Giddens 1987: 109–139; Collins 1982)。在構框理論中，Goffman 十分謹慎地將研究範圍設定在日常經驗的構成，或者所謂「經驗的組織」(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而不是

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他更宣稱，社會結構的研究可以完全不用提到框架本身 (Goffman 1974: 13)。Goffman 所沒有處理的即是「經驗的組織」與「社會的組織」的關係。如此一來，面對面互動層次以上的構框過程即是被忽略，而這一點正是社會運動研究者所經常面對的。可以如此設想，在支配情境中，被支配者所擁有的「經驗的組織」是呼應了外在的「社會的組織」；在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反對者試圖提出一套新的「經驗的組織」以挑戰既有的「社會的組織」^❶。因此，社會運動的研究關切正好是兩種組織方式的辯證互動。

因此，由於先前的研究旨趣與 Goffman 的理論取向相近，Snow 等人所提出的構框理論一開始就是以面對面情境下的微觀動員為探討對象，不少的概念設計也是以此為目的。在 Snow, Rochford, Worden 及 Benford (1986) 的文章中，主要探討的問題在於如何將民怨重新帶入微觀動員的討論之中。他們強調，民怨本身是需要被詮釋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因此，重點並不是客觀情境的改變，而是觀看情境的方式之改變。所謂的框架設定作為一種連結個體與社運組織的方式，即是為了要說服潛在參與者接受某種觀看的方式。因此，建立分享的意義是運動參與的必要條件，而共同的框架則是人際互動的產物 (ibid.: 467)。

Snow 等人進一步豐富化構框理論的意涵。他們指出，能夠促成參與的構框，需要指認出問題、提出解決方法、並且鼓舞士氣。因此，集體行動的框架有三項核心的元素，亦即是診斷框架 (diagnostic frame)、預測框架 (prognostic frame)、與動機框架 (motivational frame)。診斷框架指認問題之所在，並且分析其原因或責任；預測框架指出解決方案與其相應的策略、

❶ 馬克思曾指出，握有物質生產工具的階級也控制了精神的生產工具。換言之，在既定的統治秩序下，被統治者是以一種符合統治者利益的方式來認知外在世界與他們自己。被統治者可能認為自己的不幸處境是「命中註定的」，統治者的特權則是「天經地義的」。在這種情況下，「經驗的組織」是呼應了某一種「社會的組織」，理所當然，只有當被統治者「經驗的組織」改變了，他們獲得了認同與自信，不公正「社會的組織」才能被挑戰。



對象；動機框架提出行動的終極理由，並且以道德呼籲的方式來召喚參與者的熱情 (Snow and Benford 1988: 199–202)。

光是三種元素的存在並不一定保證動員的效果，好的構框仍是需要滿足其他條件。任何的社會運動構框都面臨了兩難情境，要強調問題嚴重性，還是鼓勵參與：如果不強化問題的急迫性，聽眾無法被喚起熱情，如果問題的後果被描述為過於恐怖的、無法招架的，那麼則會導致宿命論的態度 (ibid.: 203–204)。更重要的，構框能成功發揮動員效果的關鍵，即在於能夠引發聽眾共鳴 (resonance) ③。

構框理論既然是處理社運組織內部的微觀動員，因此，構框的概念很容易就與認同連結在一起。理所當然的，如果某一個框架能夠成功地招募到支持者，他們之間也會形成某種關於自身、運動、對手的集體認知，並且劃定我群與他群的界線。在構框理論學者看來，認同形塑亦是構框過程中必要的一環。相對於其他解釋集體認同起源的研究途徑，構框理論認為微觀層次的互動才是關鍵，反對將認同視為某種個體稟性或集體結構的產物 (Benford 1993a; Hunt and Benford 1994; Hunt, Snow and Benford 1994; Snow and McAdam 2000)。

構框理論的起初關切在於社會運動的召募問題，很顯然，這是繼承 Goffman 的微觀社會學旨趣。到後來，Snow 等人轉而處理更廣大的社會運動議題，並提出兩個處理組織層次的構框概念，亦即框架爭議 (frame disputes) 與主導框架 (master frame)。在以往，社會運動聯盟中的路線歧異通常是以組織利益或意識型態來解釋；相對地，框架爭議的概念則指出，路

③ 判定某個框架的共鳴效果可以有外部的與內部的標準。所謂的外部判準是指框架與外在的信仰體系之間的關係，包括了核心性、廣度與關連性。如果框架越能符合既有的價值觀，被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成功框架的內部條件包括：框架與歷史事件的連結（經驗可信度 (empirical credibility)），與一般生活經驗相符合（生活經驗的可共量性 [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以及是否符合通行的敘事方式（敘事傳真性 [narrative fidelity]） (ibid.: 205–210)。此外，Benford (1993b: 692) 則是另外添加了一項框架共鳴的判準，即其一致性。



線的爭議也可能是來自於構框形式的差異，例如溫和派與激進派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來詮釋問題，而不是反映了策略評估的差異 (Benford 1993b)。

主導框架的概念可以用來解釋這種現象：在某個時期，不同部門的社會運動組織具有某種程度的共識，以十分相近的方式來詮釋不同領域的不滿。Snow 等人指出，相對於個別社運組織所採用的特定框架，主導框架是同時存在於多種的社運組織或社運議題。Snow 等人採用了一個科學哲學的比喻：主導框架是全面性的、根本性的典範，而特定框架則是派生出來的理論 (Snow and Benford 1992: 138)。就如同某些特定框架比較能喚起共鳴，引發聽眾的支持與同情，主導框架也有彈性與僵化的分別，彈性的框架容許多種延伸的可能，連結起更廣大的抗爭議題，例如權利訴求作為一種主導框架，在美國六〇年代的種族、性別、反戰運動中廣泛運用 (ibid.: 139-140)。

除了解釋不同社會運動組織的框架親近性，主導框架也能夠與 Tarrow (1989) 的抗爭週期理論連結在一起。在 Snow 等人看來，抗爭週期的開啟是與某種創新的主導框架出現有關，使得運動戰術有可能創新，新的社運組織得以成形。抗爭週期早期出現的框架固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動員助益，但是對於後期出現的集體行動者而言，卻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舉例而言，美國黑人運動早期是以民權作為主要訴求，但是這個主導框架就對於六〇年代後期更激進的黑權 (Black Power) 訴求產生了壓制的作用 (Snow and Benford 1992: 145)。最後，在抗爭週期的末期，主導框架的動員潛力也面臨了枯竭的窘境，它越來越不具有說服力，不再能夠喚起共鳴。一旦它被成功地駁斥與推翻了，社會運動的動員也隨之衰退 (ibid.: 150)。

簡而言之，構框理論的提出原先是為了解釋社會網絡的動員效果，亦即民怨議題如何在微觀動員的脈絡下被重新詮釋。但是到了後來，Snow 等人的理論化企圖心則更龐大，轉而探討其他運動面向的議題，構框的概念也被賦予更多的分析效用。然而，難道互動論的預設能夠承載如此多樣的解釋功能，而不產生理論上的衝突？Goffman 的作品能夠解釋相對穩定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維繫的，但是移植到充滿權謀與衝突的社會運動領域，是



否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事實上，隨著構框概念的普及化，其他不採取互動論觀點的學者也開始使用這個詞彙，如此就產生了一些混淆與爭議。在此，本章試圖處理(1)構框與策略的問題及(2)構框與組織的問題。

關於(1)策略的問題，自從資源動員論興起以來，大多數學者都承認社會運動的意圖性，在其中參與者追求其集體目標。早期資源動員論學者為了強調策略理性的面向，甚至過度輕忽了意義與動機的重要性，針對這一點，構框理論適時提出了修正意見。儘管如此，Snow 等人仍未妥善處理構框的策略性意涵^④。對於 Goffman 而言，策略性行動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形態，而不是全部。他所關切的問題在於，何種日常經驗的組織使得這一類型的行動能夠產生，而不是試圖以策略性行動來解釋社會的秩序或衝突。但是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者而言，策略的問題卻需要被認真對待。社會運動不是為了提出新觀點而構框，相反地，構框是為了改變世界。

事實上，即使是純粹為了形塑運動團體內部的共識，構框過程也是涉及了策略性的成分，充滿了各種隱藏、偽裝、佔有的權力運作。然而，正是由於 Snow 等人對於策略的探討不足，才引發後續的爭議。在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中，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5-6) 提出了策略性構框 (strategic framing) 的概念。他們認為構框可以被定義為「一群人有意識的、策略性的嘗試，形成關於世界與他們自己的共同理解，以正當化與鼓舞集體行動」。很顯然，對於 McAdam 等人而言，構框的意義在於其策略性作用，而不只是純粹為了溝通或建立共識^⑤。

④ 舉例而言，在 2000 年文獻回顧中，Snow 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卻沒有試圖提出解決方案。他們只是將策略視為框架形成中的一個過程，其他還包括了論述過程與競爭過程。如此，策略是被貶為構框的面向之一，而不是最根本的前提 (Benford and Snow 2000: 623-627)。

⑤ 然而，問題卻出在於 McAdam 等人沒有發覺策略性的探討是與 Snow 等人的互動論預設有所抵觸，他們居然宣稱自己是要「回歸 David Snow 的原初構想」。關於這一點，Goodwin and Jasper (1999: 47-49) 逮到了借題發揮的機會，他們指控 McAdam 等人涉嫌不實篡改，將 Snow 等人的構框理論賦與太多的策略性想像。基本上，Jasper (1997: 77) 主張應該回到構框理論的原始意圖，只討論社會運動組



在此，筆者贊同 McAdam 等人的主張，策略應該被視為構框的核心要素。然而，要提出一套完備的策略性構框理論之前，互動論的理論預設需要被徹底檢討。更重要的，構框概念要能夠用來解釋運動招募以外的社會運動現象，而不是只侷限於 Snow 等人所處理過的範圍。本文第三節將探討策略性構框的若干問題。

關於(2)組織的問題，資源動員論的另一項貢獻，即是將社會運動視為有組織的政治行動，而不只是某種群眾行為。因此，社會運動的研究應該以社運組織為中心，探討其與其他組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在 Snow 等人一開始提出構框理論的時候，焦點是放在微觀動員，因此，構框的作用被認為是透過人際網絡形塑出共享的意義。到了後來，Snow 等人將構框放在更廣大的組織過程中來思考，提出了框架爭議與主導框架的理論。簡單地說，構框理論是從微觀動員發展到組織過程，但是在晚近，許多評論者認為 Snow 等人的構框理論缺乏足夠的經驗證據支持，而且若干概念顯得過於抽象 (Steinberg 1998: 847; Swart 1995: 468; Youngman 2003: 524)。舉例而言，在 Snow 等人看來，主導框架的分析作用是類似政治機會結構，可以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抗爭週期變化。但是這樣的解釋容易流於某種形式的決定論，亦即社會運動的發展是受制於某個主導框架的動員潛力，而不涉及組織過程。

在此，筆者同意構框理論應該多處理微觀動員以外的議題，分析社運組織與其他組織的互動 (Cornfield and Fletcher 1998: 1306)。事實上，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這種取向的經驗研究作品十分豐富。在本章中，筆者將回顧這些作品，以梳理出共同的結論。

三、策略性構框

除了形塑出參與者的共識以外，構框仍有其他策略性的作用。用組織內部的溝通過程，避免使用這個概念來探討社會運動組織以外的文化現象，如此才能免於概念的過度負載，反而喪失了分析上的精確性。



Williams (1995) 的話來說，策略性構框的概念，意味著將文化視為一種運動資源，可以被有意圖地操弄，以達成運動的目標。大致上來說，回顧既有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發現三種策略性構框的主要作用，亦即(1)利用政治輿論、(2)維持參與士氣、(3)減少反對阻力。簡單地說，這三種作用都是為了正當化運動的訴求。就這一點而言，Snow 等人所重視的框架共鳴並不是唯一的判準，因為共鳴的效果主要是針對支持者或是潛在支持者，而策略性構框卻不一定只是針對這些群體。

關於(1)利用政治輿論，從策略性構框的角度來看，政治機會結構不只是構成一組限制或促成集體行動的物質條件，同時也是帶來某種的輿論氣候，使得某一些類型的訴求容易被接受，而另一些類型的訴求被忽略或壓制。因此，面對變動中的政治局勢，社會運動的領導者也順應趨勢，以不同的方式來包裝自己的訴求。

晚近以來，這一類的作品不在少數。Cornfield and Fletcher (1998) 探討美國勞工聯盟 (AFL) 的框架轉移時指出，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工人運動是反對國家介入勞資爭議；但是隨著三〇年代新政 (New Deal) 的出現，國家開始積極推行各種管制措施，因此，工人運動開始利用這種政治氣候的轉變，要求各種的社會福利政策。Diani (1996) 解釋義大利北部的民粹主義政黨之所以壯大，是因為他們提出的框架是符合九〇年代政治輿論的反體制聲浪。這些新右翼政治勢力成功地利用當時民眾的不滿，尤其是對於羅馬政府的無效率與主流政黨的腐敗。Schneider (1997) 分析紐約市的波多黎各裔社區運動，發現社運組織的框架選擇具有高度的策略考量。因此，在波多黎各裔居多的社區，運動者強調族群的訴求；在種族混合的社區中，運動者則是提出階級或民權的訴求。Noonan (1995) 解釋智利婦女運動的框架轉移，發現運動者靈活運用威權統治與民主化時期的政治輿論，以不同方式呈現婦女的主張。在威權時期，婦女運動者要求國家立法保護女性的母職身分；在民主化時期，女性的政治參與則是主要的訴求。同樣地，Hobson (1999) 的研究指出，瑞典婦女運動也策略性地佔有、利用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口號，以要求更多的婦女權利保障。



這些例子都顯示，社會運動的構框並不一定直接反映了當事者的想法。在許多情況，某種訴求的提出是帶有機會主義的味道，純粹是為了利用某種政治風向。

關於(2)維持參與士氣，很少社會運動能夠在短期間內實現目標，通常的情況是在最終勝利之前，運動參與者會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因此如何在每次的挫敗之後，重新整理隊伍、維持參與士氣也成為運動領導者的工作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構框的功能不只是將旁觀者轉化成為支持者、支持者轉化為參與者，另一項重要的作用也是在於維繫參與者的使命感，避免失敗所導致的軍心渙散。Einwohner (2002) 與 Voss (1996, 1998) 的研究關切社會運動如何處理失敗的問題。他們指出，如果社運組織要維持成員長期的參與，避免失敗所帶來的悲觀主義與無力感，一個可行的方式即是發展某種「壯膽的迷思」(fortifying myth)，以強烈的意識型態確認成員對於原有動機框架的效忠。很顯然的，這種壯膽的迷思即是一種維持參與士氣的框架，使得參與者相信失敗只是暫時的，下一次的參與是有可能成功的。

關於(3)減少反對阻力，社會運動的成功不只是寄望支持者的有效動員，也要避免敵對陣營的強力抵擋。社會運動的訴求是透過高度的文化符碼包裝，而不是參與者的意識型態、世界觀之直接表現。事實上，越是背離社會主流共識的社會運動主張，越是需要這種策略性構框。否則，即使社運組織能提出吸引支持者的框架，促成他們走上街頭，更強大的民意反彈仍會使他們徒勞無功。換言之，發揮正當化作用的框架並不一定是鼓勵參與的框架 (Kubal 1998; Youngman 2003: 548)。

在許多保守派的反制運動中，這種情況特別明顯，反墮胎人士為了因應女權運動所揭櫫的權利論述，創造出所謂的胚胎權 (right of fetus)，即是著名的例子。同樣地，九〇年代的美國種族隔離主義者表面上也不再宣稱優越論、仇視與暴力，而是借用多元文化主義的論述，來組織反對有色人種的白人 (Berbrier 1998)。在同時，加拿大的保守宗教領導者也放棄傳統的神學與道德論述，而改用高度世俗化的文化權利論述，要求政府資助教會



學校 (Davies 1999)。在八〇年代末期聲名狼藉的反墮胎拯救行動 (Operation Rescue)，以暴力阻撓婦女向墮胎診所就醫，經常發動群眾包圍，甚至以炸彈攻擊診所。這一群極右翼的暴力份子宣稱自己是「八〇年代的民權運動」，言下之意即是他們的手段是符合主流的政治價值 (Johnson 1999: 248)。在



圖 6-1 1992 年紐約的反墮胎拯救行動，參加的群眾手持各種標語。

六〇年代，要求社區能夠控制學校的主張是黑人民權團體訴求之一，但是到了九〇年代，保守的衛道人士則用同樣的框架試圖干預學校課程與圖書館藏書 (Naples 2002)。這些例子都顯示，隨著社會日益世俗化與平等化，保守派的構框需要利用自由派的修辭，而無法直接套用原先的傳統主義價值訴求。

另一方面，處於保守的年代，進步性的社會運動有時也採取這種形式的策略性構框，以避免招致更大的反對。在美國爭取幼兒托育運動中，Reese (1996: 571, 575) 指出婦女團體採取了母職主義的 (maternalist) 框架，強調已婚婦女並不是不願意承擔原有的家庭角色，她們被迫要工作，因此需要政府協調托育。這種母職主義的論述沒有挑戰傳統的性別文化，因而減弱了父權主義的反彈。同樣地，在臺灣八〇年代中期爭取墮胎權合法化的運動中，婦女團體也將「人工流產」的議題構框為「保護不幸少女」，而不是「婦女的身體自主權」。根據顧燕翎 (1995: 162) 的分析，其原因在於解嚴前不利的政治機會結構，迫使婦運領導者「以規避女性意識的迂迴方式，而能使極為敏感的墮胎議題獲得合法化」。

因此，就利用政治輿論、維持參與士氣、減少反對阻力等作用而言，框架並不是為了指認出某種不義，進而喚起原先不存在的參與熱情。相對地，這些構框往往帶有高度的策略性，在其中運動者的真實意圖被隱藏起來，表面上所呈現的是某種修飾過後的版本。



四、組織間的構框過程

Snow 等人原先分析微觀動員的機制，他們高度借用 Goffman 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的分析，因此他們所重視的是人際層次的構框。但是後續研究者所重視的策略性構框則通常是以社運組織為主體，而且涉及了不同性質組織之間的互動。在這一節中，本文將回顧這些文獻，以釐清組織間的構框過程。在此，可以根據 Klandermans (1992: 95) 的建議，將社會運動的組織互動分為聯盟系統與衝突系統，因此，組織間的構框也可以分為(A)聯盟性的構框與(B)衝突性的構框。

關於(A)聯盟性的構框，社會運動的聯盟不只是一種物質資源的結合，不同的社運組織之間需要建立一套共同接受的訴求與詮釋觀點，以協調彼此的行動。Gerhards (1995) 指出，聯盟性的構框需要包含下列五種面向：(1)尋找議題，並且將其定義為某種社會問題；(2)找尋形成問題的原因；(3)詮釋目標以及成功的機會；(4)標籤化抗議的對象；(5)將其自身正當化。任何進行聯盟運動的社運組織都需要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取得共識，否則將無法採取一致的行動策略。在 Gerhards 看來，如果這五個面向越能緊密連結，那麼所發揮的動員能量將會發揮越大。

在許多聯盟性的運動中，為了容納更多的組織參與，構框的策略往往是尋找最大公約數，只能包括所有組織都同意的抽象原則，而不是具體事項。舉例而言，1994 年的四一〇教育改革大遊行提出要求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教育現代化、訂定教育基本法。由於這次盛大的遊行名義上是由 210 個社團所參加（薛曉華 1995: 268），因此為了協調出可以運作的共識，工運團體放棄了工農子女學費補助的訴求，而教師團體同樣也不提出懲戒權的要求^⑥。

事實上，在建構聯盟性的框架過程中，個別組織所擁有的資源與權力不盡相同，這些因素也會影響了構框的方向。在聯盟運動中，資源豐富的

⑥ 訪談記錄，前反高學費運動成員，2004/1/31。



社運組織較能影響構框的過程，他們能夠將自己的意識型態、世界觀、運動路線加諸聯盟團體，進而主導了整體的運動走向 (Croteau and Hicks 2003)。面對沒有抗爭經驗的社區居民，外來的社會運動組織有可能獲得主導權，因而改變了原有的動員框架 (Futrell 2003)。透過聯盟過程，原先性質不同的社運組織有可能相互刺激，形塑出新的動員框架。在此，一個十分適切的例子即是美國九〇年代環境運動所常用的「環境正義」框架，這種構框方式基本上是結合了民權運動的權利框架與環境關切，共同對抗環境種族歧視 (environmental racism) (Capek 1993)。透過環境正義的觀點，環境運動者不再只是以單純的保育或審美來看待環境問題，而民權運動者也注意到了環境風險的不平等分配。

關於(B)衝突性的構框，除了聯盟系統以外，社運組織所處的衝突系統也會影響構框的內容。誠如 Evans (1997) 所指出，大部分的研究作品都認為構框是為了社會運動的支持者與同情者設計，很少注意到構框也有可能是針對敵手的訴求。在此，敵手有可能是政府部門，或是社會運動要挑戰的對象，也包括反制運動。Noakes (2000) 指出，政府單位也有可能對於挑戰者進行有意識的構框，甚至是蓄意的抹黑與醜化。

從衝突系統的觀點來看，不只是社運組織在進行構框，其對立者也從事反制構框，這就形成了一種相互競爭與對抗的論述情境 (McCaffrey and Keys 2000)。舉例而言，十九世紀末美國資本家為了反制工會組織也採取了一系列的論述策略，例如將工會抹黑成為不守法的暴民，工會組織侵犯管理權，也不符合美國文化等，以試圖摧毀工會運動的正當性 (Haydu 1999)。事實上，一旦某個集體行動框架被成功地駁斥了，後續的社會運動就很難再採取相同的框架，被迫要尋找新的動員框架。根據 Adair (1996) 的分析，美國七〇年代反核運動繼承了六〇年代的非暴力直接行動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傳統，採取激進的抗爭策略。但是由於核電工業強力的輿論動員，使得直接行動的框架被等同於「不負責的嬉皮運動」與「無政府主義者」。後續的八〇年代反核運動者被迫採取較為溫和的運動策略，不斷宣稱是代表美國主流派 (the middle America) 的立場，是一股理性穩健的中道力



量。

最後，則是關於主導框架的理論。在 Snow 等人的架構下，主導框架是用來解釋抗爭週期的關鍵變項。在建構其理論過程中，Snow 等人是參考了 Tarrow 的政治過程論，因此，主導框架即是取代了政治機會結構的位置，抗爭的週期變化也被視為主導框架的後果。然而，這種主導框架的概念化容易產生問題。在此，筆者認為，Snow 等人的理論另一項缺點在於忽略了組織動態的考察。由於直接借用政治機會結構的解釋模型，一旦忽略了運動擴散的中介機制，很容易落入文化決定論的陷阱，無法處理社運組織如何成為主導框架的創造者、繼承者，甚至是挑戰者。舉例而言，Snow and Benford (1992: 145) 強調先行的主導框架對於後續的抗爭產生了限制作用，阻礙其創新的可能性。但是在臺灣的環境運動研究中，研究者卻發現先行的反核運動提出了政治化的動員框架，但是卻不妨礙後續運動者提出嶄新的社區化框架（何明修 2003b）。

在此，筆者建議將主導框架視為組織層次的互動。因此，某個動員框架之所以是主導框架，其原因在於許多不同性質社運組織在同一時間採取了相同的認知架構，而不是源自於某種觀念性元素的內在力量。從組織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某種框架的普及化是涉及了組織之間的學習與人員的流動。McAdam (1988: 161-185) 的研究就指出，參與自由之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將民權運動的抗爭訴求帶進校園，以權利的論述來組織學生運動。六〇年代的學運世代在大學畢業後，繼續參與各種新左派運動，因此也將權利的術語帶入環境、女權運動 (Meyer and Whittier 1994)、甚至是殘障者運動 (Groch 2001: 89-91)。同樣地，分析美國工會運動為何在九〇年代重新復甦，Voss and Sherman (2000: 327-333) 指出關鍵性的原因之一在於具有社區運動、民權運動背景的成員加入，他們傾向於將工會視為社會運動組織，而不是經濟利益團體。這些跨越不同社運組織的份子可以稱為「連結性運動者」(bridge activists)，他們的存在反映了一個相互重疊的社會運動社群，也因此能有助於動員框架的學習與擴散 (Issac and Christiansen 2002: 727)。



從這些例子可以知道，主導框架之所以普及化，原因在於不同社運組織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模仿，從而採取了一致的詮釋方式。因此，不應將主導框架視為某種無形的時代精神 (zeitgeist)，而忽略了更為基層的組織性因素。

五、策略理性的限制：過度志願論的危險

在承認策略性構框的同時，也要注意到策略理性的限制。拒絕文化決定論的結果並非必得接受某種形式的文化工具論。簡單地說，文化可以作為運動的資源，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社會運動者可以將其任意使喚，隨意形塑成為自己想要的模樣。在最低限度上，文化因素具有其內部的邏輯，任何人都要遵照其規則，才能靈活使用。這種情形就像是修辭學與文法的關係，修辭是用語言來說服聽眾的藝術，但是這種藝術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語言的規則性之上，換言之，唯有精通某一種語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出現具有說服力的演講。

其次，運動者本身也是受制於一系列歷史的、生命歷程的、情境的限制，而不是隨心所欲地憑空捏造框架。任何的社會行動者都承繼了既定的歷史背景、社會位置，他們也與其他同時代的人分享一些未明言的、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預設。當集體行動者精心設計某種動員框架時，他們往往是將一些背景知識視為不需懷疑的前提，而專注於經營某些較局部性的文化元素。舉例而言，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當道下的美國，個人選擇被視為一個神聖而具有說服力的價值，因此，身體自主性的女權運動試圖將墮胎詮釋為婦女的個人選擇。同樣地，在八〇年代之後，美國新保守派人士試圖透過教育券 (education voucher) 的政策來推動教育私有化，他們所訴求的價值也是基於所謂的家長選擇 (parental choice) (Dougherty and Sostre 1992)。儘管女權運動與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南轅北轍，這兩個例子顯示了動員框架背後更廣大的文化背景，這些元素通常並不是行動者所能控制的。



基於這些理由，聰明有可能反被聰明誤，理性的行動往往導致非意圖的後果。晚近以來，不少評論者指出策略性構框研究所面臨的困境。Hart (1996: 95) 認為，某些研究作品帶有過度志願論 (excessive voluntarism) 的色彩，彷彿文化是可以由運動份子任意創造的。一種可能發生的危險即是，忽略一般民眾所共有的常識，將其誤認為社運組織有意識經營的框架 (Moodie 2002: 57)。Goodwin and Jasper (1999: 49) 更指出這種工具論思考的貧困，如果說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是「使用」基督教教義來動員教徒的參與，那麼也可以說，他「故意」用英文演講來喚起美國人的同情。

很顯然，構框的研究需要避免無謂的過度志願論，適度地賦予策略理性應有的位置。在此，本文主張策略性構框的研究應注意下列的三種條件：(1)行動者本身的限制、(2)文化脈絡性的限制、(3)失敗的策略性構框。

關於(1)行動者本身的限制，誠如 Jasper (2002) 所指出，社會運動中的策略是涉及了文化、生命歷程、學習等諸多元素。個體永遠是處於既有的社會脈絡，當事者不可能具有全面性的知識，理性也必然是受限制的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因此，運動幹部所處的社會位置以及他們所擁有的社會經驗都會影響其構框的可能範圍。在一項關於美國農場工人運動的研究中，Ganz (2000) 比較了在地草根社區工作者 Caesar Chavez 與美國勞聯產總 (AFL-CIO) 的動員策略。前者能夠針對移民農工的宗教文化特性，設計出具有說服力並且引發同情的框架，例如將移民社區的宗教節慶與抗議行動結合在一起。相對地，勞聯產總以往一向是專屬於白人勞工的組織，不理解移民勞工的文化特性。因此，他們採取了習以為常的官僚組織方式，以至於無法深入社區生活。在臺灣八〇年代的環境運動興起過程中，早期生態學者所提出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並沒有引發出草根層次的運動。一直到地方人士結合了鄉土認同，提出「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社區動員框架之後，名副其實的本土環境運動才真正誕生 (何明修 2001a)。

Mansbridge (1986) 關於七〇年代平權修正案 (Equal Right Amendment) 爭議的經典研究則是呈現了另一種情況。平權修正案原本只是某種抽象性的原則宣示，並不一定會直接導致實質的、立即的改變。但是由於女權團



體的參與者多半是職業婦女，她們直接經歷了工作領域的性別壓迫，因此傾向於將平權修正案詮釋為改變婦女經濟地位的關鍵 (ibid.: 44)。如此，反而加深了保守派婦女的恐懼，認為更獨立的女性地位即是意味著喪失了種種的法律保護。舉例而言，在離婚官司中，法院有可能引用兩性平等的理由，在贍養費與子女監護權方面，給與婦女較不利的判定。一連串的反制動員最終使得這項改革功虧一簣。這些例子都顯示，策略性構框都是受制於行動者的生命經驗。當事者認為合理的動員策略並不一定能達成效果，原因在於他們往往誤認聽眾的處境是與他們一致的，因此應該會產生相同的共鳴作用。這並不是說社會運動份子較不理性，或是缺乏資源，因為即使是有意識地進行構框，實際的狀況也與工具理性的理念類型有一大段落差。

根據蕭阿勤 (2003) 分析，七〇年代臺灣黨外運動份子強調本土的歷史與認同，但是他們的論述仍沒有脫離國民黨政權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敘事模式。針對這個現象，蕭阿勤 (2003: 241-242) 反對採取純粹策略性與工具性的解釋，認為那只不過是因為政治環境的不利，使得黨外人士不敢暢所欲言。他特別強調，黨外份子的成長是受到戰後政治文化局勢的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將國民黨的論述內化了 (ibid.: 220-225)。在此，雖然蕭阿勤著重政治運動的政治敘事與認同，與本章的構框研究在理論取向上略有不同。但是他的分析則是很細膩地指出，構框的策略理性是受限制的。

關於(2)文化脈絡性的限制，任何的社會運動都是處於一定政治文化脈絡之下，這種更廣大的政治文化形成了某種認知性與規範性的預設 (Joppke 1992: 315)。相對於物質性的資源，觀念性的元素通常彼此相互連結，構成一個更廣大的意義之網，很難被切割與拆解使用。更進一步來說，在任何一个政治文化脈絡中，所能容許的構框種類是有限的，社會運動組織並不是享有無限的自由度。在既定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人們所共同承認的正面價值是有限的，任何政治勢力為了正當化其主張，都要爭奪這些意義符碼。

因此，既有的文化可以被視為若干「構框劇碼」(framing repertoire) 的



集合，社運組織在其中進行策略性的選擇 (Haydu 1999; Williams 1995)。構框劇碼的概念十分類似 Gamson (1992: 135–136) 所說的「主題」(theme)，亦即是社會運動所訴求的價值。在分析美國核能爭議的作品中，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發現，進步、民主、成本、能源自主等主題是反核人士與擁核人士所爭議的重點。從這個角度來看，社運組織的構框並不是在毫無限制的條件下所進行的，他們的抉擇是有限的，但是這也不排除其他有創意的構框方式。同樣地，美國主流的女性主義採取政治動員方式來追求性別平權，這是符合更廣泛的政治文化，亦即是平等個人主義。相對地，其他強調女性特殊需要的主張，例如育嬰假、托兒、生產自主性，就容易被主流團體所忽略 (Costain 1992: 137–138)。

關於(3)失敗的策略性構框，在既有的文獻中，研究成功的策略性構框遠多於失敗的個案，很顯然成功的例子比較容易用來論證構框的重要性。儘管如此，失敗的構框仍是具有啟發性，能夠指出策略理性的限制，以避免過度志願論的危險。根據 Babb (1996) 的研究，美國十九世紀中葉的紙幣主義運動 (greenbackism) 主張政府大量發行紙鈔，故意造成通貨膨脹的後果，使得向銀行貸款的小商人得以從中獲利，以貶值後的幣值償還債務。紙幣主義運動的主要社會基礎是中西部的工商業者，但是他們也試圖動員工人群眾，強調其階級利益與資本家一致，都是屬於生產者，而不是不勞而獲的東岸金融寡頭。但是由於工人們在日常經驗中所感受到的是階級對立而非和諧，因此，這種主張很快就被主流工人運動所揚棄了。在臺灣，亦有十分類似的情況，民進黨在九〇年代初期曾經試圖以老人年金等社會福利議題來進行選票動員，但是由於議題的區隔性不明顯，動員效果有限，一般選民並不能判別不同政黨的福利政策立場。因此，到了 1996 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又重新提出國家認同的訴求，放棄了先前的福利議題 (傅立葉 2000)。從這些構框失敗的研究可以看出，運動者所精心選定的框架並不一定能發揮作用，策略性的思考也會遇到未曾意圖的結果。

此外，研究失敗構框的作品之所以遠少於研究成功的個案，原因不難理解。在構框理論剛提出的最初，學者為了證明這個概念的解釋效力，傾



向於選擇成功的社會運動例子，並且將成功的關鍵歸諸於構框的過程。這種研究設計固然能夠彰顯集體行動的意義面向，但是卻無法更精確地告訴我們，到底文化元素所能夠扮演的角色何在。因此，重視失敗的個案不但是否定了文化的重要，相對地，反而由於側重構框的限制，才能使我們更「認真看待意義」。換言之，重視社會運動的意義面向，並不意味著文化工具論（文化符碼可以被任意操弄）或文化決定論（文化元素事先決定了社會運動的過程）。

總合以上的說明，在 Snow 等人原有的互動論架構下，構框的策略性成分並沒有被特意強調。後續的研究者傾向將構框放在策略性行動的觀點下來考察，這種概念性的突破的確更能豐富化構框理論的適用範圍，能夠達成分析利用政治輿論、維持參與士氣、減少反對阻力等策略性目的。因此，應該採取一種比較平衡的觀點來看待政治文化，即文化能提供集體行動一定程度的助益 (enabling)，同時也具有某種的限制 (constraint)。這種較持平的觀點可以避免過度志願論與過度決定論的雙重危險，也才能進一步擴展構框理論的研究。

六、結 論

相對於其他導致社會變遷的力量，社會運動並不是在無聲無息中默默地產生其作用，而是喧嘩地帶來一套理解世界的新方式。如果不是透過集體行動的努力，性騷擾、家庭暴力、剝削、歧視等字眼不會成為我們的日常用語。社會運動的研究者需要重視這種文化的建構過程，分析形形色色的社運組織如何形塑我們對於日常生活的理解，如何質疑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並且揭發虛假共識背後所隱藏的權力支配。在此，構框理論提供了一套十分可行的分析策略，原因在於這個理論將社會運動視為意義生產的主體，並且重視意義的傳播、抗衡、詮釋等過程。透過構框理論的視野，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何社會運動成為當代文化創新的重要源頭之一。

這一章回顧了構框理論所面臨的問題。首先，在 Snow 等人的原初設



想中，構框是指涉微觀動員過程的共識形塑。構框概念的引用解決了 Snow 等人先前關於新興宗教的改宗與社會運動召募的一個研究困境，亦即到底社會網絡是如何產生作用的。構框過程指涉的是互動情境中的意義建構，使得參與者獲得了對於某個外在事物與自身的共同理解。然而，由於 Snow 等人是以互動論的立場來思考構框理論，框架的主要作用被視為是透過人際網絡形塑運動共識，如此一來使得構框的策略性與組織性面向沒有被充分討論。後續的研究者多半側重策略性構框與組織過程中的構框，但是卻忽略了 Snow 等人的互動論預設。

筆者贊同構框理論應該擴展其研究範圍，納入策略與組織的考量。因此，構框除了形塑參與者的動機以外，其策略性運用更可以用來(1)利用政治輿論、(2)維持參與士氣、(3)減少反對阻力。這些作用並不是為了鼓勵運動參與，而是試圖正當化社會運動的訴求。從這個角度來看，策略性構框的概念強調文化的可塑性，容許多種的使用可能。然而，這並不是意味某種形式的文化工具論，認為觀念元素可以被任意操弄。合理的策略性構框研究應該避免這種過度的志願論立場，不應賦予策略理性過度誇大的作用。社會運動的理性是高度受限的，受制於當事者的生命歷程背景、政治文化、構框劇碼等條件。最後，相對於 Snow 等人對於微觀情境的研究，後續的研究者採取更廣大的視野，拓展了組織構框的研究。從組織互動的角度來看，構框可以是構成聯盟性運動成立的前提，另一方面，在對抗性的情境中，構框也有可能是不同組織之間爭執的焦點。此外，組織互動也可以解釋主導框架的運作，而不需要假設觀念本身的因果作用力。

本章強調構框理論應該多納入策略性與組織過程的研究，實質上也等於是主張構框理論與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進一步整合，而不是拋棄後者的研究成果，另外開拓一種創新的、但是無法與原有理論典範對話的分析途徑。換言之，重視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並不意味著採取某種的文化主義 (culturalist) 立場，認為觀念性元素具有封閉性，形成一個獨立自足的領域。文化具有相對自主性，有其特殊的運作邏輯，但是這個事實並不排除這種可能，即文化符碼可以策略性地運用，也可以成為組織協商中的籌碼。



社會運動研究者應該「認真對待意義」，但是這也不代表利益、組織的探討就應該被拋諸腦後。事實上，正因為現實生活總是摻雜了各種元素，分析文化元素與非文化元素的互動也才成為社會學最具挑戰性的工作之一。

最後，Polleta and Amenta (2001) 曾指出，社會運動的研究發展有一種不幸趨勢，各種新理論的提出往往被過度誇大，形成獨特的學派。如此一來，各種分析概念的定義不但是太過鬆散，無所不包，而且與原有的研究文獻也無法進行整合。在他們看來，資源、政治機會結構、組織、網絡，乃至於晚近興起的情緒等概念，都面臨這種困境。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的研究其實不見得是如此分崩離析、各自為政的。舉例而言，資源動員論從早期對於個體層次的利益、誘因討論，逐漸轉向人際層次的動員網絡，因而開啟了與其他研究途徑對話的可能。同樣地，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早期帶有強烈的政治決定論色彩，到了後來也開始重視行動與結構之間的互動。基於同樣的理由，本文相信構框理論也經歷了相同的演變，隨著策略與組織議題的導入，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將會與其他途徑的研究形成一種互補、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

第七章

情緒、儀式、宗教與
社會運動。





一、社會運動的「常態化」之後

在五、六〇年代，歐美主流的社會學家通常將社會抗議視為不理性的偏差行為。社會學家的任務只是在於說明在什麼社會條件下，這種不符合常規的現象會產生。常見的解釋可能包括了社會解組、整合不足、急遽工業化與都市化等，換句話說，集體行為是現代化過程中的病態副作用。

隨著六〇年代各式各樣的新左派運動出現，這種將社會運動視為常規以外的觀點越來越難以被接受。這種保守的說法被有系統的挑戰，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將社會運動視為有組織、理性的、具有實際影響的說法。從七〇年代初，社會學家開始以資源動員論的名號來稱呼這種新觀點。到了八〇年代，新典範的基本立論點已經成為主流教科書的說法，雖然資源動員論的名稱並不一定被全面採用，而是以政治過程論、理性選擇論、議價理論等標籤出現。大致而言，這一套觀點反對將社會運動視為違反常規的不理性行為，其基本概念是組織、動員、資源、交換、策略、利益等。用這些概念來說，社會運動即是理性的動員過程，在其中，社運組織擬訂策略，以獲取支持者的資源，並且將這些資源與對手、權力菁英進行交換，而其最終的目標在於實現某種的集體利益。

同樣地，在六〇年代以降的社會史研究中，也可以發現類似的典範轉移趨勢。這些史學家強調，以往歷史上的群眾暴動、盜匪、破壞機械、搶糧風潮等現象並不是盲目的，參與者是具有正當的反抗理由。史學家將這些抗爭視為不理性的，原因在於他們毫無批判地接受了統治者的觀點，忽略了這些暴力行為是當時低層民眾唯一能夠採取的形式 (Hobsbawm 1999, 2000; Hobsbawm and Rudé 1969; Rudé 1964; Thompson 1971; Wasserstrom 1987)。因此，到了八〇年代，一套將社會運動重新納入常規的典範已經宣稱成熟，並在各種研究領域中取得優勢的主導地位，相對地，傳統的集體

① 本章改寫自〈集體行動中的情緒、儀式與宗教：一個涂爾幹社會學的分析〉，《社會學理論學報》(何明修 2004c)。



行為理論則是慢慢地被研究社群所淡忘。舉例而言，儘管面臨諸多的批判意見，Zald (1991) 仍強調資源動員論核心命題的正確性，可以繼續擴充，以納入更多面向的討論。批評者質疑資源動員論不夠重視文化因素，那麼就可以將文化視為一種有助於動員的資源，重新帶入分析中，而不需要徹底翻修基礎的分析架構。

儘管如此，到了九〇年代，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不滿意資源動員論的社會運動圖像。Piven and Cloward (1992) 提出了十分嚴厲的批判，他們認為資源動員論是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為了證明社會運動不是無組織的群眾行為，資源動員論過於強調組織化的面向，因此，社會運動是起於事先存在的動員網絡，抗議的過程是涉及組織領導與分工。同樣地，為了反駁將社會運動視為違背常態政治的指控，資源動員論所設想的社會運動是遵循利益政治的遊戲規則，試圖擴大政治聯盟，與政府部門談判協商。因此，在他們看來，資源動員論的關鍵問題在於將「集體抗議常態化」(normalizing collective protest)，而忽略了任何社會運動都具有破壞性與不可預期性。事實上，正是由於社會運動違背主流政治期望的策略，社會運動才獲得政治菁英的重視與讓步，而達成了所追求的目標 (Piven and Cloward 1977: 23-32)。

在此，本章順著 Piven and Cloward (1992) 的批判，試圖將常態政治以外的元素帶進社會運動的分析。越來越多研究者發現，集體行動是涉及情緒、儀式與宗教這三個面向，而不只是單純的利益行動。簡單地說，集體行動不只是冷靜的利益計算，同時也包括了激昂的情緒抒發。社會抗議不只是一種議價的手段，同時也是儀式性的表演。最後，對於參與者而言，社會運動所追求的目標與價值也往往具有宗教的神聖性。從九〇年代中期以來，不少的研究作品試圖探討這些非常態性元素如何在集體行動中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換言之，情緒、儀式與宗教是被壓抑的，因為它們的意義一直沒有獲得適度的注意。因此，本章的任務在於文獻回顧，試圖整理晚近的研究發現。

簡而言之，本章的目的在於，整理當前關於情緒、儀式、宗教與集體



行動的研究作品。在章節安排上，第二節是探討資源動員論的預設與集體行動的模型，探討為何「非常態的」元素在其中被視而未見。第三節則關於情緒、儀式、宗教在晚近集體行動研究中的討論。最後，本章也展望了未來的集體研究前景。

二、常態政治及其不滿

廣義而言，資源動員論是泛指一種普遍存在的研究預設，將社會運動視為另類政治參與的形式。社會運動與體制內的政治遊說都是為了某一種的集體利益，也同樣是涉及了組織的協調工作；但與一般政治參與不同的是，社會運動是由弱勢者所發動，因為他們缺乏體制內的政治資源，只能透過抗議來實現目標。大致上來說，廣義的資源動員論可以區分為政治的與文化的兩種支流。強調政治面向的研究作品通常被稱為政治過程論，亦即是將社會運動定義為一種抗議團體與政治菁英持續互動的分析途徑。政治過程論的核心概念是政治機會結構，亦即是政治體制對於集體行動者的開放性程度。這一派學者主張，社會運動的興衰成敗可以視為一種政治過程，受到轉變中的政治機會結構所影響（見第五章）。

另一方面，廣義的資源動員論另一派支流不滿意過度唯物論取向的資源觀，試圖將文化的面向重新納進來，他們要求將文化同樣視為一種有助於社會運動的資源 (Klandermans 1984)。相對於人力、金錢等物質資源的匯流，這一派學者強調社運組織需要建構一套文化論述，以說服支持者的參與，並且形塑出共同的價值觀。這種文化的過程被稱為「共識動員」、或者是「微觀動員」。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運動是涉及新意義的生產與傳播。要產生實際的社會影響力，社運組織需要正當化其訴求，獲得公共輿論的同情與支持。因此，文化資源的重要性並不下於物質資源（見第六章）。

無論是政治的或文化的支流，資源動員論都無法妥當地處理情緒、儀式、宗教議題，反而壓抑這些干擾性的因素，使其無法在所設想的社會運動圖像中存在。更進一步來說，資源動員論之所以無法有效處理這些議題，



原因在於下列的三個相互關連的預設：

(A1) 社會運動是理性的行動，因此不涉及情緒的過程。

(B1) 現代的社會抗議形式是由策略所決定，因此缺乏儀式性的表演。

(C1) 社會運動所追求的是世俗的目標，因此與宗教的神聖性無關。

關於 (A1)：傳統的集體行為理論過度借用有問題的社會心理學預設，個體的負面心理狀態被假定成為集體行為的導火線。為了對抗這種心理學的偏見，後續的資源動員論就完全拋棄了心理學的討論，改採工具理性的行動預設。McCarthy and Zald (1987a: 17–18) 指出，認為民怨 (grievance) 或信念導致集體行動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民怨是無所不在的，但是卻沒有必然引發抗爭。事實上，所謂的不滿與民怨都是可以透過社運組織來定義、創造與操作的。早期資源動員論拋棄民怨概念的激進作法並沒有獲得普遍的支持，Marx and Wood (1975: 387) 就指出以「超級理性主義的 (super-rationalistic) 模式取代非理性模型」的危險。同樣地，Jenkins (1983: 535) 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無法解答運動參與和價值的問題。

後續的資源動員論學者則是採取了新的途徑，民怨不再被視為既定的或不重要的，而是可以透過認知方式的轉移而改變。McAdam (1982: 34, 48–51) 指出，人們敢從事抗議，就是因為出現了一種樂觀的前景，可以克服行動的風險與畏懼。產生這種有能力的感覺 (sense of efficacy) 即是所謂的認知解放 (cognitive liberation)，人們開始對於情境採取不正義的定義，並且認為自己可以加以改變。同樣地，構框理論學者也強調社會情境是需要被詮釋的，意義並不是本身就存在的。只有在特定的集體行動框架之下，人們才會發現現實的不合理性，也才會相信可以改變現狀。能夠發揮動員力量的框架是能夠與聽眾共鳴，從而發揮說服的效果。換言之，政治過程論與構框理論都認為民怨是引發抗爭的重要媒介，但是兩種理論都接受了建構論式的民怨觀，而不是採取客觀主義的立場。

如果說早期資源動員論是以運動領導者的工具理性來取代群眾的心理狀態，那麼晚近的理論則是以認知理性來取代支配所引發的心理反應，不符合工具理性的、也不屬於認知理性的情緒還是未受到重視。因此，社會



運動的參與被設想為一種不帶感情的過程，參與者只是在理智上被說服接受某一種故事版本，而不是被激起某種鼓勵參與的情感。

事實上，有些學者注意到認知理性與情緒兩者之間的潛在衝突。Snow and Benford (1988: 203–204) 強調，集體行動的框架必然包括了所謂的動機框架 (motivational frame)，亦即訴求聽眾的道德良知，將認知效果轉化為成為實際參與的動力。然而，Snow and Benford 卻發現這樣的構框兩難：如果問題被描述為後果太嚴重的、無能為力的，那麼會導致宿命論式的認命；反之，如果問題被描述為太技術性與專業性，公眾是無從參與的。在此，構框的困境其實反映出認知作用與情緒抒發的對立，如果只有純粹的認知功能，根本無法引燃參與的熱情。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 McAdam 所謂的認知解放，如果這個機制的確能夠促進參與，那麼更應該注意其所附帶的情緒性作用。McAdam (1982: 50) 將有利於黑人的法院判定等重大事件視為某種的認知線索 (cognitive cuing)，使得被壓迫群體產生對於未來的樂觀評估。事實上如果這些事件能夠產生動員效果，其原因也是在於所喚起的熱情與信心克服了恐懼感，積極性的情感獲得了發洩的機會。

簡而言之，由於過度理性主義的設定，資源動員論所提出的分析工具並不能掌握情緒的動態。一旦社會運動被視為是工具理性的行動，參與是認知與啟發的後果，那麼豐富的情緒面向就無法獲得完整的重視。

關於 (B1)：現代的社會抗議形式是由策略所決定，因此缺乏儀式性的表演。

Geertz (1973: 113–114) 將宗教定義為一套文化意義系統，在這個觀點下，儀式即是一種文化表演。透過高度符碼化的演出，儀式參與者不只是表達，更實現了他們的共同信仰。換言之，儀式行動是具有戲劇學式的 (dramaturgical) 色彩，重點在於表演與其象徵性的意義。因此，如果擺在「手段一目的」的工具理性思考邏輯之下，儀式本身就缺乏意義，或者說是不理性的。資源動員論的另一個理論盲點即是過於依賴策略行動的參考架構，排除了儀式所具有的豐富意涵。

從很早以來，Lipsky (1968) 就提出了資源動員論對於抗議活動的典型



看法。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抗議是什麼樣的活動？為什麼弱勢團體經常使用抗議來表達意願與爭取福祉？他的回答後來被資源動員論學者一致接受，抗議即是弱勢團體所使用的資源，目的在於取得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回報。由於弱勢團體缺乏體制內的政治資源，他們不得不訴諸於這種非傳統 (un-conventional) 的資源。Lipsky (1968: 1145–1147) 強調，抗議具有雙重的性格，一方面使用負面誘因而迫使政府讓步，釋出其所冀求的物質利益，另一方面則是使用正面誘因而獲得參考公眾 (reference public) 的同情，製造間接的壓力。因此，抗議活動的本質即是用群眾的參與來換取對手的讓步，亦即是一種議價過程。

McAdam (1983) 是從社會運動與對手的互動來討論戰術創新 (tactical innovation) 的問題。他指出，每一波的戰術創新都能夠帶來新的抗爭風潮，然而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對手也學會了化解新戰術的衝擊，使其喪失動員的效果。換言之，整個運動動態即是一種戰術創新與戰術適應的相互辯證過程。另一方面，McAdam (1982: 178, 1983: 749) 與 Marx and McAdam (1994: 106) 也注意到了民權運動所使用的抗議活動具有高度的表演性格。一個常舉的例子即是 Martin Luther King 在 1963 年特意選定在 Birmingham 發動反對種族隔離的遊行，誘使殘暴的警長「蠻牛」O'Connor 以暴力鎮壓。結果在媒體報導下，民權運動的非暴力和平主義與種族主義者的水



圖 7-1 黑人入權領袖金恩博士 (前排右六) 領導的大遊行。美國國會在 1964 年通過民權法案，黑人因此漸漸享有與白人平等的權利。

龍、警棍、警犬呈現了巨大的對比，也使得民權運動獲得了全國性的支持。在詮釋這個事件時，McAdam 強調其有意識的策略面向，血腥衝突是事先規劃好的劇本，用他的話來說，這即是一種策略性戲劇表演 (strategic dramaturgy) (McAdam 1996b: 348–349)。

因此，資源動員論將抗議視



為純粹策略考量的結果，儀式在其中是沒有重要性的。即使是在一些具有高度表演性質的抗議活動中，參與者也只是被策略性的意圖所驅動，而不是為了呈現其文化意義。另一方面，在社會抗爭的歷史研究中，學者也發現儀式的元素是隨著社會現代化而逐步消失，最後只成為遙遠的回憶。

Hobsbawm (1999) 探討的問題即在於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 (archaic forms)，他企圖尋找並且指認出現代性初期的抗爭風格。在他看來，十九世紀的政治團體充滿了神祕主義與宗教的色彩，一系列的入會式、暗語、誓言等儀式行動，使得這些團體看起來比較像是祕密結社，而非當代的社運組織。Hobsbawm (1999: 280) 指出，複雜而神祕的儀式代表了「革命組織之早期的、不成熟的形式」，換言之，社會運動的成熟就是表現在去儀式化。同樣地，Tilly 關切社會抗爭的長期演進過程，他創造了「集體行動的劇碼」(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 這個概念以掌握不同時期抗爭形式的可能。在他看來，任何一個時期中，抗爭者所能採取的抗爭形式總是有限的，因此，理解這些劇碼的演變就提供了一道歷史解答的線索 (Tilly 1978: 151-159, 1999: 696-707)。在現代性初期，抗爭是高度依附地方的風俗習慣，傾向於在公眾節慶時刻進行，而且是受到地方達官貴人 (notables) 的默許。在現代化的遊行、示威、靜坐出現之前，歐洲各地常見的喧鬧 (charivari) 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群眾用粗俗不堪的喧嚷迫使違背團體道德的人讓步。一旦 charivari 從通行的劇碼中消失，現代人則無法理解這種高度儀式化抗爭的意義。Tilly 強調，造成集體行動劇碼演進的根本動力在於權力與資本的集中化，在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體制下，人民抗爭的形式出現了標準化的相應轉變。用他的話來說，亦即從「局部的」(parochial)、「特殊的」(particular)、「分裂的」(bifurcated) 轉變為「普遍的」(cosmopolitan)、「模組的」(modular)、「自主的」(autonomous) (Tilly 1998: 12-3)。理所當然，這種演進也意味著儀式元素的消失。

總合來說，資源動員論是以策略的角度來思考社會抗議的問題，Hobsbawm 與 Tilly 的研究則提供了歷史的證明。如果說抗爭本身也具有一種韋伯所謂的去除魔咒 (disenchantment) 的過程，那麼在儀式元素退位之後，



人們就只能以單純的工具理性來審視他們的抗議活動。

關於 (C1)：社會運動所追求的是世俗的目標，因此與宗教的神聖性無關。

在前現代的社群中，宗教觀念是維繫道德整合的重要媒介。一旦社群開始採取自我防衛，對抗外來的威脅，宗教不只是成為了鼓勵參與的精神武器，也定義了我群與他群的差異。在現代的民族主義與群眾意識型態興起之前，宗教往往界定了社群的邊界。Geertz (1973: 27-125) 指出，宗教信仰即是一種意義體系，它使得某種特定的世界觀成為可能，也因此，各種的偶發事件可以被賦予意義和獲得理解。然而，資源動員論很顯然是接受某種的世俗化理論預設，將社會運動視為是現代的，而宗教則是前現代的，因此忽略兩者的關連性。另外，Smith (1996: 2-5) 也提出若干理由，以說明為何社會運動研究與宗教研究缺乏交流，包括世俗化理論的流行、宗教功能論的主導、學術研究過度分工、六〇年代的社會運動多與宗教無關等。

不過，筆者認為更根本的關鍵在於資源動員論的僵化預設，無法將宗教作為一種意義體系來處理。一般流行的觀點是，宗教本身的出世性格會阻礙世俗政治參與 (Marx 1967)。即是在分析若干宗教發動的社會運動中，研究者也傾向於將宗教視為某種的物質資源，而忽略了其文化面向。

首先，在 Olson (1965) 將集體行動的目標定義為公共財 (public goods) 之後，資源動員論就以唯物論的、世俗的標準來定義社會運動的性質。因此，Freeman (1975: 171-173) 主張，社會運動即是一種重分配的政治，是涉及抗議者如何取得更多的資源與權力。因此，她在研究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時，判定社會運動實際作用的關鍵即是政策影響。

在民權運動的研究中，黑人教會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資源動員論的問題設定之下，宗教的因素經常被狹化成為純粹的資源。McAdam (1982: 43-48, 98-100) 指出，在長期的種族隔離制度之下，教會是少數非洲裔美人所能掌握的自主組織 (indigenous organization) 之一。透過教會的組織網絡，民權運動者可以找到現有的參與群眾，理念的傳播也會更有效果。同時，教會領袖也成為了動員與號召的有力資源。不過，這種工具觀忽略



了宗教所具有的複雜意義，將宗教貶為運動者所操弄的手段。Morris (1996: 31-32) 就強調，黑人牧師的個人魅力 (charisma) 是由教會傳統所賦予的，正是這種對於神奇力量的信仰與忠誠，才激發出強烈的動員力道。同樣地，Pattillo-McCoy (1998: 768-769) 也指出，非裔美人的宗教傳統是由一系列情緒高亢的儀式所組成，這些宗教性元素進一步影響了他們所認定的集體行動。換言之，在許多情況下，宗教並不只是外在於運動的資源，它有可能本身已設定了運動的目標。

另一方面，這種工具觀也存在於文化取向的資源動員論。儘管承認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這些學者仍是強調宗教理念本身的可塑性，可以充當動員的號召。Tarrow (1994: 134) 強調，構框是一種有意圖的策略行動，而不是源自於更廣大的政治文化。因此，波蘭的天主教與美國南方的基督教都已經有相當的歷史，但是卻一直沒有促成激進政治的產生。到了團結工聯與民權運動的份子介入之後，宗教才成為社會運動的助力。然而，這種看法過度低估了宗教傳統的內在限制，過度的志願論預設將宗教視為一組可以任意挪用的文化資源 (Hart 1996)。

總之，在資源動員論的預設下，情緒、儀式、宗教的問題並沒有獲得妥善的探討。資源動員論不是將這些問題視為無關緊要的、過時的，便是將其貶為資源，而缺乏意義層面的理解。也因此，在九〇年代以來，越來越多集體行動研究採取另類的研究途徑，試圖將這些非常態的元素重新帶進來。基於這些理由，本章將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列舉出下列的理論命題：

- (1)動員的任務在於改變或者延伸原有的感覺規則，以激發情感 (A2)。
- (2)社運組織的維繫是有賴於成員的情感依附 (A3)。
- (3)儀式是維持參與士氣與情感依附的重要媒介 (B2)。
- (4)抗議活動所傳達的訊息是透過儀式性表演所達成的 (B3)。
- (5)宗教社群界限越是符合了政治分歧的軸線，宗教越可能涉入抗爭 (C2)。
- (6)社會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神聖化的集體經驗 (C3)。



三、情緒、儀式、宗教與集體行動的關係

制度化的政治生活是充滿官僚氣息的，一切都是按照規章行事，不帶有情感的好惡。但是在抗議現場，群眾的情緒總是高亢的，他們相信人多就是力量。抗爭群眾經常將他們責怪的對象具象化，並且透過各種方式表現出他們的不滿，因此，燒國旗與燒徵兵卡就像是傳統部落的驅魔儀式，唱抗議歌曲、呼口號看起來像是印第安人的宣戰。的確，多彩多姿的運動文化並沒有辦法在資源動員論概念的緊身衣之下獲得應有的重視。在這一節中，筆者將要分別處理晚近研究中的情緒、儀式與宗教。

(一)熱情的社會運動參與

從很早以來，情緒社會學家就反對素樸的理性／感性的二元論。這種簡化的觀點將理性設想為有規則的、可預測的、社會的，而情緒則是其對立面。更重要的，理性的態度並不意味著缺乏情緒，而是以某種的情緒狀態來面對自我與外在世界。當人們理智上接受了某一套的看法，他們也是充滿了信心、熱忱與期待。誠如 Stryker, Owens and White (2000: 3) 所指出，資源動員論所預設的理性人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心理學範疇。因此，要探討運動的參與問題，除認知解放以外，更要將情緒解放一併帶進來討論。Hochschild (1979: 567-578) 提到，社會結構不只是根據位置分配了不同的權力，也在於安排了不同的感覺規則 (feeling rule)。這也就是說，處於相異結構位置的行動者被要求不同的情感表達方式。因此，任何劇烈的社會變遷也就意味著原先的感覺規則被拋棄，行動者被迫學習一種新的情緒處理方式。

任何一種支配都是對人類尊嚴的傷害，支配者的趾高氣昂是以被支配者的屈辱為代價的。正如 Scott (1990: 37) 所指出的，「沒有支配體制不產生對於人類尊嚴的例行侮辱與傷害——勞動成果的佔有、公開的羞辱、鞭打、強暴、巴掌、猜疑、鄙視、儀式性污衊與其他」。因此，在承平時期的被支



配者學會如何在這種殘酷的體制中生存，他們將其不滿隱藏起來，外表卻表現出一副恭順的樣子。因此，要使公開的反對成為可能，首要的條件即是被支配者將他們壓抑的情緒公開地表達出來。

婦女運動的研究者就指出，情緒宣洩不一定不利於運動的產生，事實上，對於情緒的貶低與理性的頌揚往往是強化婦女從屬地位的方式 (Ferree 1992: 42)。女性主義的研究強調，與其說婦女運動的集體認同是基於某種價值觀，不如說是共同的情感。婦女團體的功能是提供了某種的運動文化，使得以往被隱藏的情緒可以獲得自由表達的空間 (Taylor and Whittier 1992, 1995)。同樣地，殘障者也要克服心理障礙，從自悲自憐提升為正面的自我印象，集體行動才能夠產生 (Johnson 1999: 35)。研究同性戀運動的學者也指出，污名化認定是阻礙集體行動的原因之一。因此，運動的出現通常是伴隨著情緒的轉變，從羞恥轉變為驕傲、孤獨轉為團結、恐懼轉為憤慨、悲哀轉為憤怒 (Britt and Heise 2000; Gould 2002)。換言之，這即是一種改變感覺規則的集體努力。如果說以往的規則帶來無力感，改造後的規則就是帶來一種解放的感覺。事實上，許多運動團體的動員工作並不是在告訴受害者「真實」的世界到底是如何，反而是告訴他們如何大膽地表達被壓抑的情緒。所謂的「意識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並不是在於提供一套正確意識，彷彿動員的對象原本完全不了解他們所處的世界，相對地，他們被提升的意識其實是被壓迫的情緒。

從這個角度來看，運動領導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地說服人們參與社會運動，關鍵在於情緒的動員 (Aminzade and McAdam 2001: 33)。在反核與動物權運動的研究中，Jasper and Poulsen (1995: 496) 與 Jasper (1999: 69) 指出，構框所帶來的認知作用經常是附著於事先存在的網絡，因此，只能動員到同質性高的成員。要召募完全陌生的群體，只能透過道德震撼 (moral shock)，亦即是某種景象的強烈呈現，迫使觀看者的道德判準受到衝擊，從而激發出參與的熱情。舉例而言，當動物權團體將實驗動物比擬成為一般美國人家居生活的寵物，不舒服的感覺就油然而生。同樣地，當環境人士用死亡的景象來描述酸雨的影響，例如森林「死亡」，或者是巴特農神殿的



被酸雨破壞，他們即是要喚起強烈的情緒反應，以普及化科學研究的結論 (Hannigan 1995: 132–133)。因此，情緒動員的方式之一即是擴展感覺規則的適用範圍。可以得到這樣的命題 (A2)：激發情緒是社會運動參與的原因之一，因此動員者的任務在於改變或者延伸原有的感覺規則。

其次，誠如 Hirschman (1977: 126) 所指出的，利益曾經是被視為用來馴服激情的手段，然而一個未預料的悖論在於，越是利益所主導的世界，越能驅使激情以強烈的方式爆發出來。政治參與亦是如此，隨著制度化的政治生活（選舉、演講、辯論）越來越不帶有感性的，要求個人將時間與金錢花費在社會運動這種體制外的活動，則更需要情緒的投入，同樣的道理可以推論到社運組織的運動文化。Goodwin (1997: 55) 認為，只憑利益的共享，社運組織的維繫將會是薄弱的。除非能夠將運動成員之間的關係轉化為同理心、友誼、同志情誼等所謂的**感情連帶** (affectual ties)，社運組織才能夠持續。另一方面，既然社運組織的存活是有賴於個人的忠誠，對於參與者而言，也等於要求一定程度的情緒管理。Hercus (1999: 41–46) 指出，維持女性主義的認同是一件要付出代價的事，因為主流社會對於激進性別認同的嘲諷與歧視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女性主義者被迫要自我克制，或採取強硬的態度來面對這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也因此，運動者之間的交流聚會成為不可或缺的週期性強心劑。

同樣地，在許多抗爭場合，鼓勵參與者挺身而出的心理因素經常是對於不正義的憤怒，然而這種情緒的過度宣洩卻是有害的。在一項探討支持墮胎權運動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社運組織內部需要發展出適當的憤怒管理機制，因為如果沒有憤怒就沒有參與，但是過度的憤怒則是會傷害到運動本身，使其被貼上暴力的負面標籤 (Dilorio and Nusbaumer 1993)。一份研究反墮胎的拯救行動 (Operation Rescue) ② 的作品也指出相同的情緒機制。當一項抗爭行動無法獲得媒體、政治人物與旁觀者的支持時，抗議的口號開始轉向內部團結，而不再是對外的控訴。受到敵意包圍的群眾開始退縮到其歸屬的運動文化，透過心理的認同來維持群體的邊界 (Youngman

② 即是以暴力方式阻止懷孕婦女進行墮胎的組織。



2003)。

對於社運組織的參與成員而言，他們需要花費個人的機會成本，包括了時間、金錢與生涯。有時他們更須面臨社會的不諒解與敵視。面對未知的結果以及漫長的等待，光靠純粹的理智並無法支持持續性的參與。Gramsci 經常提到的格言，「意志上的樂觀主義、理智上的悲觀主義」即是表達了相近的意涵；革命行動的現實分析需是冷靜的，但是革命者的信念卻是火熱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命題 (A3)：社運組織的維繫也有賴於成員的情感依附。

(二)作為儀式表演的集體行動

要使得情緒能夠有助於社會運動，儀式性的表演是一個重要的媒介。在一般的故事中，好人／壞人、英雄／惡棍、受害者／加害者是經常出現的構成元素。因此，要說服人民參與社會運動，複雜的現實需要被敘事化，重新被演出來。

Perry (2002) 就曾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擊敗國民黨，原因之一即是前者能夠成功地動員民眾的情緒。在她的分析中，共產黨是透過一系列的政治儀式來掌握人民的情緒，包括「訴苦」、「控訴」、「整風」、「思想改造」、「自我批評」等。這些儀式使得參與者克服「溫情主義」的障礙，將怨恨與憤怒毫不保留地展現出來。此外，共產黨常使用的「批鬥大會」也是充滿儀式色彩的集體行動方式。Sutton (1995: 164) 就認為，批鬥大會可以被設想為多重的通過儀式 (rite of passage)，其中不同參與者需要扮演相應的角色，無論他們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壞份子」被迫要戴高帽登場，他們被憤怒的群眾咒罵與擱掌，最後是被囚禁或是打入「牛棚」。地主與反革命份子不只要戴高帽，還要遊街示眾，他們的懲罰儀式是更為嚴苛的，通常被毒打一頓之後立即處決，身後財產也被奪取而重分配。很顯然，在中國的抗爭文化中，儀式是用來煽動群眾仇恨的武器。

在其他的抗爭現場中，儀式性的表演也能帶來不同的情緒作用。例如在臺灣的政治發展中，1979 年高雄事件的鎮壓是反對運動的重大挫折。然



而在隔年的民意代表選舉中，美麗島受刑人的家屬紛紛「代夫出征」，她們在「人山人海的政見會臺上，以如泣如訴的感性音色，敘說高雄事件後的政治氣氛……，尤其以無奈又哀傷的口氣，敘述普遍受社會同情的二二八林家滅門血案，使得政見會場更加感性。無數男女民眾聽了忍不住傷感落淚」（李筱峰 1987: 167）。很顯然，黨外運動份子也是透過儀式性的訴苦，從而激發同情與悲憫的情緒。到了八〇年代末期，反對黨開始轉向公然的民族主義立場，因此，演講會場上的儀式也有所不同，不再是訴說悲情，而是強化光榮的認同感。演講者開始使用臺語，而非官方的「國語」，並且使用大量臺語的俚語、歌謠、故事來強化民族意識（王甫昌 1996: 185）。

同樣地，社運組織的感情連帶也需要透過例行的儀式來維持。在一份關於二十世紀初的國際婦女運動研究中，學者發現為了要克服國籍、種族與距離的障礙，婦女運動者發展出一套和解的儀式 (rituals of conciliation)，以強化跨國的集體認同。在國際會議上，來自交戰國的婦女相互贈花、握手、擁抱，她們強調戰爭是男人的事，女人是支持和平的 (Taylor and Rupp 2002: 145-147)。另一方面，儀式所帶來的情緒作用也存在於所謂的私領域。研究二十世紀中葉芝加哥女性知識份子的學者指出，婦女的書信往來也有可能成為強化小團體認同的工具。Deegan (1996) 指出，這些充滿思慕、鼓勵與關懷之情的書信即是一種愛的儀式。盧蕙馨 (1991) 觀察臺灣婦女團體的「談心聚會」，亦即是喪偶與離婚婦女如何以小團體分享的活動，撫平內心的創傷。共同的情緒抒發是有助於女性走出悲情，培養自信。對於工人階級而言，日常生活提供了許多建構團體情感的儀式素材。在一項美國工廠女工的研究中，學者發現，女工們經由慶生會、嬰兒出生慶祝會 (baby shower)、交換自製糕點等活動聯絡感情，



圖 7-2 1979 年 12 月 10 日，美麗島雜誌社舉行人權大會遊行，結果政府出動鎮暴部隊、催淚瓦斯予以鎮壓。（中時，王敏攝）



因而跨越了族群背景的差異。換言之，這即是一種將她們在家庭生活中的照顧者角色帶到工廠廠房的策略 (Lamphere 1985)。在筆者的臺灣石化業工人研究中，工廠休息室中的「泡茶開講」也是一種日常的儀式，能夠維繫「有福同享、有難共當」的階級兄弟義氣 (何明修 2003c)。

總之，儀式性的表演可以激發出仇恨、同情、自尊、關懷、團結感等多種的情緒。因此，這個命題 (B2) 是可以接受的：儀式是維持參與士氣與情感依附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儀式的功能不只是對於內部的情緒性支持，也在於對外的公共宣稱。文化取向的資源動員論強調，社會運動不只是涉及到有形的權力分配，無形的價值與意義的爭奪更是必要的環節。然而，文化的鬥爭並不只存在於文字論述的層次，同時也涉及了非語言化的 (non-verbalized)、實行的 (performative) 儀式場域。對於低下階級而言，由於文化資本的缺乏，他們很難透過言談辯論達成彼此團結。全世界的知識份子有可能因為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產生共鳴，轉而接受左派的政治世界觀，但是這種情形很難發生在工人階級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儀式能夠取代言談的作用，形塑出參與的熱忱。誠如 Kertzer (1988: 66) 所指出的，儀式的神奇效果之一，即在於「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形下製造團結」。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理解為何八〇年代中期的臺灣工運一開始就充滿了男性交往的儀式，例如工會幹部彼此交換「兄弟帖」，不同工會的聯合運動也被理解為「工會與工會換帖」(Chu 1996: 505-506)。很顯然，在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治意識型態支持下，這一群工人只能透過他們熟悉的日常儀式，來建構彼此一致的團結感。

就中國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而言，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1994) 十分具有說服力地指出，學生抗議其實是一場精湛的政治劇場 (political theater)，充滿了各種的儀式表演元素。既然 1919 年的五四運動是共產黨所推崇的，1989 年的學生也試圖扮演愛國知識份子的角色，絕食抗議、寫遺書、要求官員表態等動作都是儀式的組成要素。很顯然，如果政府的正當性是來自於七十年前的學生運動，那麼學生就可以先發制人地佔有了道德上的正當性。類似的儀式佔有可以在臺灣的一場爭取幼教券運動 (1998-2000)



中發現。私立幼教業者發起幼教券運動，目的是為了取得政府的幼教資源，避免公立幼稚園排擠他們的經營機會。為了要掩飾自利的動機，儀式的模仿與學習成為必要的。幼教業者模仿四年前的「四一〇為教育而走」的遊行，在 1998 年舉行一場「一〇一八為幼兒教育而走」遊行，同樣是使用天真無邪的學童與女教師來當先導隊伍。如此一來，發行幼教券的訴求也獲得了改革的正當性，成為教育改革運動的延伸（何明修 2004b）。

Tilly (2002: 120) 指出，在許多的抗爭活動中，主事者必得要證明他們的訴求是「有價值的」(worthiness)、「團結的」(unity)、「人數眾多的」(number)、「專心致力的」(commitment)。在此，儀式的作用也是在呈現這四個特點，更重要的是，儀式的表現方式是眾所皆知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為了爭取民族解放，阿爾及利亞婦女重新穿戴起回教律法規定的面紗，當面挑戰現代性的與世俗的法國殖民政權 (Fantasia and Hirsch 1995)。同樣地，阿根廷著名的「五月廣場母親」(*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 也是有名的例子。為了抗議軍事獨裁者的濫捕與祕密綁架，受害者的母親公開地表達她們思念子女之情，每週例行的追悼儀式也就成為對於政府最嚴厲的道德控訴 (Navarro 1989: 251)。儀式的語言是需要加以解讀的，因為它所傳達的意義是被外顯的儀式動作所符碼化，也因此，儀式化的抗議經常帶有保護被支配者的功能。在 1983 年，波蘭政府宣稱戒嚴並且取締團結工聯的支持者時，Lodz 市民就發動一場十分奇特的「抗議」。每當政府控制的媒體播放電視新聞，市民就開始在街頭「散步」，並且「不約而同」地將他們的帽子反戴 (Scott 1990: 140)。

上述的例子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多半是非西方與非男性的社會運動。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儀式化的抗議只存在於前現代的類型中，而現代化代表儀式的消失。事實上，正由於跨文化與歷史取向的研究觀察，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到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元素，發現其中的儀式成分。即便如此，在任何當代的遊行、示威、請願、罷工等抗爭劇碼中，領導者也要設法將群眾組織化，使得他們的訊息可以被公眾與政府重視。不可避免地，這種抗議的組織化充滿了儀式性表演的色彩，因為文化的意義只能透過這樣的



包裝才能夠被解讀。因此我們可以導出這個命題 (B3): 抗議活動所傳達的訊息, 也是透過儀式性表演所達成的。

(三) 社會運動中的神聖性

宗教與社會運動之間有雙重的關係, 第一, 宗教信仰並不一定帶來保守的政治結論。在許多個案中, 宗教反倒是驅使個人參與社會運動的動力。第二, 涂爾幹宗教社會學所探討神聖性是可以帶進社會運動的分析中, 許多運動文化即是呈現這種強烈的非世俗取向。

根據 Tirykian (1988: 45–46) 的說法, 發生於七、八〇年代之交的伊朗、尼加拉瓜、波蘭政治革命具有深厚的社會學意義, 因為這些政治事件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宗教與政治的關連性。如果說, 宗教不能被簡單地視為麻痺人民的鴉片煙, 那麼它會是令人亢奮的安非他命嗎? 很顯然, 兩種簡化的看法都無助於我們理解兩者複雜的可能組合。事實上, 許多宗教的教義都具有多重的詮釋可能, 可能分別導致不同的政治後果 (Smith 1996: 13)。《新約聖經》中的「愛你的鄰人」可以解釋為激進社會參與, 同樣地, 「上帝的歸上帝, 凱撒的歸凱撒」也有政治消極主義的意味。因此, 要探討宗教信仰的本質到底是保守的或是批判的, 恐怕不是最關鍵性的問題; 對於社會學研究來說, 更重要的是探討信仰如何被宗教領導人所詮釋與定義。

一個解答的線索在於, Tirykian (1988: 45) 所謂的宗教去分化 (dedifferentiation) 過程, 使得原本處於分離狀態的個體意識獲得重新整合。個體重新發現了他者, 並且共同認知到彼此是處於一個相同情境中。在這個意義下, 去分化即是神聖化 (sacralization), 亦即是將原先世俗的事物視為具有約束力的與崇高的。在波蘭的例子中, Osa (1996) 強調早在團結工聯的政治動員之前, 天主教教會早就成為抵抗共產黨獨裁的重要障地。面對蘇聯扶持的無神論政權, 波蘭人長期的天主教信仰更構成一種神學民族主義 (theological nationalism)。早在五〇年代, 一種將教會視同為波蘭人民代表的觀點就浮現, 宗教成為了高度對抗性的「我群/他群」認知框架^③。因此,

^③ 相較之下, 歐洲新社會運動理論的代表之一 Touraine, 則是抱持左派傳統的理性



可以這樣說，如果宗教社群的邊界越是符合抵抗社群的邊界，那麼宗教的團結作用越有可能形成社會運動。

在研究農民宗教信仰的作品中，Scott (1977a, 1977b) 指出，鄉民社會的信仰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都市統治菁英，但是卻形成一種截然不同的小傳統 (little tradition)。農民並沒有認同統治階層的宗教意識型態，他們的小傳統充滿了各種異端，在其中菁英所傳播的價值觀被嘲弄與顛覆。對於 Scott 而言，這種宗教的褻瀆 (profanation) 即是農民的隱藏抗議。順著 Scott 論證來看，一旦異端的小傳統被宗教領袖所煽動，被支配者的隱藏抗議就有可能轉化為公然的造反。至少，在中美洲的解放神學運動 (Nepstad 1995) 與菲律賓的農民起義 (Nadeau 2002)，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激進的宗教力量。

同樣地，在華人社會信仰的研究中，學者也越來越注意民間宗教 (popular religion) 作為底層人民抵抗國家權力的重要場域 (Gates and Weller 1987; Teiser 1995; Weller 1982, 1985)。在晚清的中國，許多農民起義事件就是與民間宗教有關，例如白蓮教、捻亂、太平天國、天地會等。也因此，統治者一向對於民間信仰抱持著猜疑與不信任的態度，深怕宗教所激發出來的造反力量。在民國初期，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時期，政府經常發動反迷信、反宗教的運動，企圖打擊民間宗教的力量，也借機奪取龐大的教產 (Duara 1991)。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反對五〇年代土地改革的農村暴力行動也往往帶有宗教色彩，迫使共產黨政府採取打壓的行動 (Perry 1985)。

在臺灣，國家對於民間宗教的控制與監督一直是以前威權主義的特徵。從三〇年代皇民化運動開始，殖民政府就開始有系統限制臺灣人民的宗教自由，強迫人民改信日本的神道教。祭祀活動被要求停辦，神像被強制沒收，許多廟宇也被迫改為神道教的神社或是警察的派出所 (Feuchtwang 1974: 283; Weller 1987: 30)。戰後的國民政府也是以消除迷信、經濟儲蓄的表面理由，強力限制民間宗教的活動 (Jordan 1994: 150–151; Gates 1996:

主義，反對將教會視為被支配的波蘭社會之象徵 (Touraine, Dubet, Wieviorka and Strzelecki 1983: 46–47)。



231-236)。實際上，政治控制、省籍歧視等因素也能解釋外來政權對於本土宗教的迫害。但是即使處於不利的威權控制局勢下，臺灣的民間信仰仍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對抗性格。在一份著名的研究中，學者指出臺灣農民將被政府禁止的「殺豬公」儀式重新包裝，改以農會養豬比賽的名義進行。農民將「參賽」的豬公插上國旗，表面上是尊重法令，但是實際上卻是嘲笑外省人所主導的政府 (Ahren 1981)。學者將這種隱藏的抗議稱為儀式性的偽裝 (ritual disguise) (Weller 1987)，亦即是用宗教包裝起來的政治異議。另一方面，這個事實也顯示臺灣民間宗教的韌性，能夠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仍保有局部的自主結社空間。因此，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各地的反污染環境抗爭中，都可以看到強烈的宗教儀式色彩 (蕭新煌 1988: 133; Ho forthcoming-1; Weller 1999: 115-121)。基於同樣的理由，當東埔社布農族人在八〇年代中期面臨部落生存的經濟危機時，他們發動了一系列集體禱告的「新宗教」運動。根據黃應貴 (1991: 26-27) 的解釋，一旦教會取代了原有的社會整合機制，成為整個東埔社的象徵，切身的經濟問題就被視為是宗教問題，「教會自然被賦予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

從波蘭的團結工聯到臺灣的環境運動與原住民運動，可以看到宗教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角色。然而，這並非代表宗教本身帶有強烈的政治批判，能自動導致抗爭的出現。相對地，上述例子共同指出一點，信仰的力量可以建構出強大的主體性，即一個緊密整合的我群，以支撐社會運動的參與。因此，用更抽象的語言來說，(C2) 命題主張，一旦宗教社群的界限符合了政治分歧的軸線，宗教就有可能成為抗爭的精神武器。

其次，神聖性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社會運動的文化層面。從 Olson (1965) 的功利主義角度來看，運動參與是個人的權利，是由個人的成本效益分析所決定。但是在許多社會運動中，個人並沒有不參與的權利，相對地，參與者的熱情是建立在他們的責任感上，認為自己有義務要為集體目標貢獻。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 (Taylor 1989)，學者探討了一小群美國婦女運動者如何透過緊密連結的運動社群共同度過戰後的保守氣氛，並且在六〇年



代重新喚起新一波的抗爭行動。Taylor 強調，所謂的「暫緩結構」(structure of abeyance) 是可以避免不利的政治機會之影響，維持參與者的認同感。但是進一步來看，暫緩結構不外乎是一種神聖性的建構，包括了神話（以往的運動回憶）、卡理斯瑪（全國婦女黨黨主席 Alice Paul）、儀式場所（華府的 Alva Belmont House）等元素。因此，可以說這一群婦運人士是依靠近似宗教的信念，來維持運動參與。

事實上，越是處於有敵意的環境中，運動文化越是需要這種神聖性的氣氛。Voss (1996, 1998) 比較十九世紀美國與英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命運，她發現美國勞工騎士 (Knights of Labor) 缺乏一種「壯膽的迷思」(fortifying myth)，面對國家的打壓與運動的挫折，無法提出適合的解釋。相對地，英國工會運動雖然也受制於不利的環境，但是其領導者卻有能力提出有力的論述，例如宣稱道德上的勝利、強調失敗只是暫時性的、重申勝利必然會到來、檢討失敗原因作為未來的教訓。事實上，所謂壯膽的迷思不外乎是關於神聖性的信仰。韋伯學派學者也得到相近的結論：社會主義者相信歷史的必然性，這種信念也是基於某種的「卡理斯瑪式的理性」(charismatic reason) (Roth 1979: 148–152)。在 1964 年的自由之夏運動中，美國北方大學生參與協助非裔美人的選民登記，面對白人種族主義者隨時隨地的暴力威脅，參與者之間形成一種生死與共「親愛共同體」(beloved community)。McAdam (1988: 93–96) 指出，在這種非尋常的氣氛中，性愛關係揚棄了傳統拘謹的束縛，將恐懼與刺激的情緒都混雜在一起。

在激烈參與的社會運動經驗中，世俗與神聖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Aminzade and Perry 2001: 169)。世俗性的運動目標被賦予神聖性的期待，個體有時更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實現一個超越個體的理念。正是由於這種高度的情緒動員，才使得許多社會運動的參與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即使是一些相對上比較和平的社會運動中，參與者也將他們所要維護的對象賦予某種特定的價值。舉例而言，在一場加州反核電廠的運動中，反對者透過唱歌、跳舞、露營等儀式化的工地佔領 (site occupation)，阻止能源公司的開發計劃。這些儀式表演也透露出一個訊息，預定地 Diablo Canyon 是神聖



的地方，是不容許世俗的經濟利益入侵的 (Jasper 1997: 183–184)。同樣地，在黃金麟 (Hwang 1995) 的研究中，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一種重新塑造神聖性的論述行動，他們一方面攻訐傳統的儒教文化，另一方面則是提出白話文、科學、民主等新的價值理念。

誠如涂爾幹所指出的，宗教現象不只是神聖性與世俗性的劃分，更是要求後者對於前者的無條件服從。同樣地，如果說社會運動所揭櫫的價值與理想是神聖性的話，那麼參與者的個體性是世俗性的。在這個意義上，(C3) 命題是可以成立的：社會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神聖化的集體經驗。

四、結 論

長期以來，資源動員論主導了社會運動的研究進程。基本上，資源動員論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有組織的、利益導向的、運用策略的集體行動。組織、利益與策略的核心預設也存在於一些其他的研究途徑，儘管這些理論並不一定採取資源動員論的名稱，例如政治過程論、構框理論、行動動員論等。無論是那一種版本的資源動員論，一個明顯的理論化意圖即是將社會運動視為常態政治的延伸，亦即是弱勢者「另類從事政治的方式」(politics by other means)。由於這種理論性突破，社會運動不再被解釋為一種偏差行為，而獨立發展成為一個研究領域，專門探討這種充滿抗爭的政治現象。

然而，也由於矯枉過正，資源動員論所呈現的社會運動模型是過於常態的，缺乏激情的面向。任何經常參與社會運動的人都知道，許多遊行被裝扮成為嘉年華會，有意識地顛倒日常秩序，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嘲弄當權者，也因此遊行者的的心情是高亢而激昂的。遊行帶來快感是因為遊行者能夠佔領原先不屬於他們的街頭，公然表達他們積鬱許久的不滿。因此，路人的側目與警方的武力展現不但無法澆熄抗議的熱情，反而激發出更強烈的動機。抗議現場總是充滿了受害者的悲情控訴，憤憤不平的群眾也往往是領導者所無法控制的。要推動成功的抗議，運動領導者要能挑起群眾的情緒，但是領導者的無能或不負責也有可能造成情緒失控的結果，反而傷



害了運動本身。同樣地，許多運動積極份子將他們自己理念落實在日常生活，他們建構一套個人政治，他們的言語、衣著、交友、休閒、求職、擇偶、教養下一代等活動都構成了實踐場域。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大堆「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 的禁忌。在 1998 年電影《電子情書》(You've Got Mail) 中，Meg Ryan 飾演的女主角與前任男友分手的原因之一，即是她沒有後者的自由派政治狂熱。例如她因為去美容院修指甲，錯過了紐約市長選舉。當她的親近長輩宣稱與西班牙獨裁者法朗哥談過戀愛，她認為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而沒有譴責法西斯主義。同樣地，在政治正確的規訓下，臺灣最早居民必須被稱為原住民，而不是「山胞」，這個道理就如同將美國黑人稱為非洲裔美國人一樣。遵守這些日常戒規是作為社會運動者的基本條件，就像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遵守教訓，定時上教堂禱告。

資源動員論將研究的焦點放在理性的與有組織的面向，對於這些非常態的元素視而不見，形成了一種有學問的無知 (learned ignorance)。資源動員論學者拒絕承認這些面向有任何的重要性，他們似乎深怕萬一撤守了這道防線，集體行為理論的幽靈就會復活。更進一步來說，資源動員論主張，(1)社會運動是工具理性的行動、(2)社會抗議是由策略所決定、(3)社會運動追求的是世俗的目標。因此，情緒、儀式、宗教三個面向是無法在這個狹窄的分析架構下處理。

相對於此，更晚近的研究指出了情緒、儀式與宗教的重要性。成功的社會動員不只是需要提出可行的策略方針，更需要改變原有的感覺規則，以激發參與的情感。持續的運動除了需要足夠的物質資源，更有賴於成員的情感依附。在抗爭現場中，運動的訊息是透過儀式性表演所傳遞的，因此，抗議活動不一定只有策略性的考量。此外，儀式性的聚會也有助於運動社群的維繫。在宗教方面，如果說信仰社群界限越是符合了政治分歧的軸線，宗教越可能涉入抗爭，而激發出強大的動員能量。用涂爾幹的語言來說，強烈認同的社會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神聖化的集體經驗。筆者相信，隨著經驗研究的累積，越來越多的研究命題會出現，更豐富化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非理性面向理解。

第八章

社會運動的後果





一、從社會抗爭到政治改革

社會學家承認造成社會變遷的因素是多元的。經濟體制的現代化塑造了新的階級結構；科技的進步帶來新型態的人際溝通模型，同時也導致當代社會的生態危機；人權理念的普世化引發了全世界各地的民主風潮。這些社會變遷的力量大都是非人為的，而其所產生的後果往往是間接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舉例而言，有誰料想得到由於行動電話、網際網路的普及化，會使得家長對於青少年的控制力大幅減弱？一旦人際溝通方式可以個體化與去空間化，不再受到既有網絡的限制，家庭權威也會受到衝擊，青少年也因此獲得自主的空間，以及不可否認地，更加危險與複雜的成長環境。

相對於社會的自然演變，社會運動代表一種有意識的人為介入，由某一群人試圖推動或者是阻撓某一種形式的社會變遷。事實上，越是晚近以來，上述種種促成社會變遷的結構性因素，越來越不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作用，而是透過各種行動者的中介，彼此對抗、協商所形成的後果。就以科技發展而言，眾所皆知複製人、代理孕母、基因食品、幹細胞研究等技術，會帶來人類生活型態的重大改變，也挑戰了原有的倫理觀念與社會關係。這些新科技引發了政治爭議，成為各種社會力量競逐角力的場域，也激發許許多多支持的或抵抗的運動。就這一點而言，社會運動其實是當前社會變遷的核心，各種結構趨勢也是要透過社會運動的中介才能產生影響。基於這些理由，Touraine (1977) 認為社會運動的研究並不只是社會學的次領域，而是直接指向社會自我生產 (self-reproduction of society) 的核心。

恩格斯曾宣稱，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的確，作為一種最極端的集體行動形式，革命行動具有明顯的成功指標，包括舊政權的崩潰、革命敵人的清算、新國家的建立、人民的重新宣誓效忠等等，都可以用來標誌新時代的到來。革命行動是一種你死我活的生存遊戲，不是舊統治階級遭到推翻，就是革命組織的瓦解。因此，要判定某種革命行動的成敗並非難事；



相對地，社會運動的後果卻不是那麼清楚的，一方面，即使社會運動獲得了若干的成效，其結果往往只是一種妥協，到底在什麼程度上可以說是成功，或多或少都有人為的標準界定；另一方面，社會運動組織通常是互動賽局中的一方，如何適切將戰果歸諸於他們的影響力，而不是統治菁英、第三者或反制運動，則需要進一步的說明。正是由於社會運動的實際後果不明確，這個研究議題才具有知識上的挑戰性（林國明、蕭新煌 2000: 21-22; Giugni 1998: 373）。

本章將要探討社會運動的後果，尤其是側重於它對政治體系的衝擊，其具體表現在於公共政策的移轉，以及政治權力的釋出。第二節處理決定社會運動後果的若干因素，包括社會動員的形式及其政治條件。這些因素的總合，共同決定了社會抗議者所能獲得的實際成效。第三節則是以社運組織與執政菁英的互動為討論核心，分析政府部門的種種可能回應方式。第四節處理社會運動與反制運動的互動。簡單地說，反制運動是為了抵制某一種社會運動的集體行動。由於反制運動的出現，從社會動員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也更為崎嶇難行。在結尾部分，本章將處理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社會運動不只是要求權力分配，同時也挑戰我們既有的價值觀、生活方式與人際關係。然而，探討社會運動的文化衝擊，遠比探討其政策影響更為困難；很顯然，文化領域的變遷是更不容易觀察的，也是比較難以捉摸的。

二、社會動員與政治中介

社會運動能夠召喚參與者的熱情，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相信另一種社會型態是有可能的，他們所信仰的願景是有機會實現的。然而，體制外的集體行動真的能夠達成目的，滿足參與者的需要嗎？或者說，投入這種非常態政治的人們真的了解他們所追求的企圖，而不是本身受制於若干非理性的、潛意識的因素，從而獻身於盲目的信條嗎？

在七〇年代以前的研究作品，學者多半傾向於抱持後者的看法。群眾的傳染性、心理的不安全感、疏離感、相對剝奪感等觀點，常被用來解釋



社會運動的起源。同時，這意味著集體行動本身是一種偏差行為，一旦違背了社會的常規，這些作為通常只是短暫的失序現象，它們不可能對於整個社會體制產生重大的影響。Hoffer (1951) 認為，群眾運動的參與者根本不在意運動的目的與意識形態，他們只是為了尋找心理緊張的發洩管道。因此，參與法西斯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或猶太復國主義，只是純然的運氣與機運的問題。因此，一旦社會運動被視為某種心理現象，其政治作用則是可以被忽略的議題。

除了集體行為理論以外，二十世紀中期流行的多元主義政治觀雖然沒有直接處理社會運動，但是其理論預設也強化了這種認知。簡單地說，在 Dahl (1971) 所謂的多元政體 (polyarchy) 之下，權力是平均分散的，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群體可以單獨壟斷政治資源的分配，也因此沒有任何一個群體會永遠被排除在外。體制內的政治參與是透過協商、聯盟、妥協等手段，對於所有群體都是開放的。多元主義者宣稱，多元政體是常態民主的真實寫照，既然體制內的管道是暢通的，採取社會運動的手段就是不理性的舉動。簡單地說，如果說我們的民意代表能夠完全反映民意，政府官員也是依據民意施政，那麼又有誰會走上街頭拉白布條？

社會學的群眾行為理論與政治學的多元主義形成一種相互呼應的互補：體制內的政治參與是目標取向的，公共政策的決定是取向於不同團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體制外的社會運動只是情緒表達，並不會導致實際的社會變遷。很顯然，這種觀點傾向於將社會運動視為一個必須被解釋的依變項，而不是一個可以用來理解社會變遷的自變項。在此，保守主義的偏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一旦體制內的政治與體制外的政治區分被如此認定，那麼不遵守規則的抗議活動就缺乏理性的基礎。

因此在這種學術氛圍下，七〇年代之後的政治學菁英論與社會學資源動員論的興起，具有特殊的意義。菁英論者挑戰了多元主義自得意滿的假定，他們強調社會不平等的普遍性以及權力核心的封閉性，因此，體制內的參與往往是受到高度限制的（見第五章）。另一方面，資源動員論強調社會運動的工具理性性格，動員的目標在於追求共同的利益。透過這種觀念



上的革命，社會運動的政治後果成為可以被合理地提問的議題，成為重要的研究議程之一。換言之，社會運動研究者接受了社會運動參與者的說法，團結即是力量，而自由更不是免費的 (freedom is not free)。誠如 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 280) 指出，「權力擁有者絕對不會在沒有壓力之下就賦予權利」，也因此，新出現的挑戰者必得「為自己的權利奮戰；他們經常違背法律，經常採取暴力」。

在接下來的部分將要處理影響社會運動後果的三個因素，亦即是社會動員、改革機會與執政者回應。在此的區分是符合 Amenta 等人的看法 (Amenta, Carruthers and Zylan 1992; Amenta, Halfmann, and Young 1999)，研究社會運動的政策後果，基本上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途徑。「社會動員模型」是從社會運動的組織性質出發，探討不同形式、強度的動員如何分別產生相異的影響，這即是所謂的社會動員模型。另一種觀點為「政治中介模型」，認為「如果政體缺乏有利的條件，運動就無法取得新的福利與承認」(ibid.: 335)。換言之，政治面向成為主要的分析焦點，研究者應該重視統治菁英的回應策略與其他政治體制的條件。

首先，先就社會動員而言，一旦承認了強而有力的社會抗議有可能導致所追求的變遷結果，接下來呼之欲出的問題即是「該怎麼做」(what is to be done) 的策略問題。換言之，到底是哪一種的社會運動形式比較能夠有效地達到目標？在以往，一種經常採取的研究設計即是試圖從社會運動的內部變項來尋找政策改變的關鍵。Gamson (1975) 的重要研究就是沿著這條軸線來提問。他比較美國歷史上 53 個挑戰團體的發展過程，歸納出運動的成功是與若干組織變項有顯著的相關性。舉例而言，科層化、集中化、使用選擇性誘因與使用暴力的團體，比較容易取得追求的利益，或是被賦予政治承認。相反地，被暴力對待、目標可轉移、派系傾軋的團體，失敗的機會也較高。對於 Gamson 而言，這些組織變項是運動策略的延伸，運動經營者可以積極選擇要怎麼做，這也意味著，運動的成敗是掌握於主事者的策略運用。

另一方面，同樣是根據美國社會運動的例子，Piven and Cloward (1977)



則是得到不同的看法。在一系列美國窮人運動的研究中（包括民權運動、失業工人運動、福利運動等等），他們發現，來自於草根民眾的自發性造反，而不是高度組織化的抗議團體，才會對統治菁英造成最大的衝擊。只有當統治者的地位被嚴重地威脅時，他們才會願意讓步，著手進行改革。他們強調，「思考抗議效果最有用的方式，就是檢視不同形式的群眾抗命 (mass defiance)，如何產生對於制度的擾亂作用 (disruptive effect)」(ibid.: 24)。罷工、靜坐、示威遊行等常見的抗議活動，都破壞了例行化的日常生活，造成社會秩序的危機。相對地，科層化的組織忙於累積內部資源，與政府部門討價還價，消滅了群眾抗爭的能量，從而導致運動風潮的退卻。一旦運動者忙著處理法律條文與政府公文，他們就與群眾脫節了，無法再迫使執政者認真面對社會運動的訴求。

大致上而言，Gamson (1975) 的研究結論是肯定 McCarthy and Zald (1987b) 的看法。社會運動的專業化趨勢，包括專業人士的領導、組織的形式化、群眾活動的減少等等，是有助於運動目標的達成。相對地，Piven and Cloward (1977) 則主張，群眾抗爭所帶來的立即壓力才會促成官員讓步，因此社會運動的專業化即是喪失了這項政治籌碼，使得統治者更容易忽略其訴求，而將其消解。換言之，這即是菁英論與群眾論的歷史辯論（何明修 2001a: 107-116），最早可以



圖 8-1 冷戰時列寧在俄國的宣傳圖片。

追溯到列寧 (Vladimir Lenin) 與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在第二國際時期的辯論，前者主張革命必須仰賴有組織與紀律的先鋒隊，而後者則重視人民的自發性力量，階級革命可以透過政治性罷工來達成。因此，在某個意義下，這個學術研究的辯論反映了社會運動實踐的困境，因此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議題 (Barkan 1979)。



上述的運動策略討論似乎預設了某種過度理想化的社會情境，在其中集體行動者可以超然而獨立地選擇不同的運動路線。實際的社會現實並不是如此，激進派的出現，有可能使得原先的運動路線看起來反而像是溫和派。換言之，運動路線的爭議是附著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其差別是被定義出來的，而不是事先就存在的選擇 (Haines 1984: 33)。Clemens (1996) 指出，策略選擇具有歷史性與文化性，是取決於社運組織所處的時空情境，以及當事者所具有的文化知識。因此，她指出，十九世紀美國工人運動曾經採取過兄弟會、軍隊的組織模型，最後則是轉向比較符合主流政治文化的職業工會路線。另一方面，Clemens (1997) 分析二十世紀美國的農民與婦女運動。她發現這些團體能夠成功地取得政治部門的正面回應，原因是在於他們巧妙地學習原先專屬於特權階級的議會遊說藝術，而不是堅持先前的群眾動員路線。這些例子顯示，動員形式是附著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下，成功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守某種正確的路線，真正的關鍵很可能在於他們採取了某種能夠配合環境要求的策略。

其次，關於政治中介方面，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社會動員形式的差異不能完全解釋其產生的後果。社會運動所處的政治環境需要被納入考量，這些環境因素包括了政治機會、政治制度以及統治者的策略。

在一篇對 Gamson (1975) 重新「次級分析」的文章中，Goldstone (1980) 發現，一旦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Gamson 原先所宣稱的組織變項與運動成功與否，其實只是虛假相關，這也就是說，單從社運組織的策略不能預測其成敗機率。事實上，Goldstone 指出，在危機時期（例如戰爭），因為政府需要團結民心，社會運動的訴求較容易被接受，無論他們的組織特性或運動策略為何 (ibid.: 1040)。在此強調外部環境因素的重要性，就是指出了只從運動的內部條件討論社會運動是不充分的。

需要說明的是，在 Gamson (1975: 110–129) 的研究中，他其實也有注意到「挑戰的歷史脈絡」。他發現，在危機時期，政府比較沒有能力來進行社會控制，挑戰團體比較容易伸張其訴求。同樣地，Piven and Cloward (1977: 15–18) 也提到了美國選舉代議體制的重要性，選舉的競爭、不穩定的執政



聯盟等因素，有可能使得政治菁英試圖討好抗議者，因而帶來若干的改革契機。在他們看來，六〇年代美國民主黨政府面臨南方傳統白人支持者的流失，因此他們才願意推動民權與其他福利方案，以爭取都會地區的少數族群支持 (Piven and Cloward 1971: 250–256)。換言之，政治機會的要素不只影響了社會動員的強弱與形式，也左右了統治菁英的可能回應。

政治制度也影響了社會運動實現其目標的過程與難易程度。在強大而自主的國家裡，政府比較可以忽略民間社會的要求，逕行設定政策目標，因此社會運動不容易迫使政治菁英改變心態，採納新的主張。然而，一旦運動者成功地說服政治菁英，無論其他支配階級與部門如何再三反對，運動的成果仍可被有效地執行 (Jenkins 1995: 24)。誠如 Kriesi (1995: 172) 所指出的，「強國家（即強大的國家能力）也許有能力為運動要求採取行動，但是他們也有能力來抵抗這種改革的誘惑」。Kitschelt (1986: 63–64) 將政治體系貫徹其決策的能力，視為決定社會運動影響程度的一個重要變項。相對地，弱勢國家雖然容易被社會運動所攻克，但是卻沒有足夠能力來實現所承諾的事項。Lowi (1969) 的深刻分析指出了這種國家權威弱化下的困窘局面。他指出，美國的利益團體自由主義 (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 容許各種社會部門進入體制、分享權力，但是其結果卻導致政府規劃、協調能力的喪失，因而無法完成所宣稱的政策目標。同樣地，在政黨輪替之後的臺灣，國家的自主性明顯地降低。一方面，環境運動者進入了體制，獲得更多的發言機會，另一方面，資本家的政治影響力也獲得提升，更能夠左右政策的取向。因此，國家部門的政策回應也是充滿了不一致與矛盾。一方面，政府宣稱環境保護的終極價值，2002 年通過的環境保護基本法突破了以往模糊的「兼籌並顧」宣示，強調生態環境對於經濟發展的優位性；然而，為了幫助企業界根留臺灣，許多環境管制被簡化，新政府提出的新十大建設政策 (Ho forthcoming-2)。

此外，在中央集權與聯邦制兩種不同的國家制度下，社會運動的發展也呈現不同風貌。在中央集權國家，政治權力的集中迫使社會運動者必須將抗爭目標鎖定於中央政府，因為即使取得地方的執政權，仍無法從事有



意義的改革。在九〇年代的臺灣，環境運動者曾經與若干地方政府建立合作關係，推動更嚴格的環境保護。但是由於地方政府的有限權限，環境運動的實質進展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的政策回應（何明修 2002c）。在聯邦制國家，如德國、美國，許多先進的社會立法都是起源於地方政府，而後才成為全國性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運動將呈現多重中心的樣態，發展出各種因地制宜的策略取向（Koopmans 1995: 55–58）。

三、社會運動與執政者的互動

絕大部分的社會運動訴求，是要求國家權力的施行或不施行，即使某些社會運動並非以國家部門為抗議對象，他們也往往要求國家部門的介入，以取得較有利的談判籌碼。在公害糾紛、勞資爭議、族群關係等議題上，經常可看到 Quadagno (1992) 所提出的以國家為槓桿 (leveraging the state) 的運動策略。因此，社會運動與執政者的互動屢見不鮮，值得進一步分析。

首先，政府的壓制 (repression) 是對社會運動常見的回應方式之一。壓制的具體形式有許多種，包括拘捕運動成員、武力鎮壓、暗殺異議人士、口頭警告等，其目的不外乎是增加集體行動的成本 (Tilly 1978: 100)。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 285) 對十九世紀歐洲社會抗爭的研究指出，壓制可將社會抗議的衝擊抑制在某種程度內，阻止更多人參與體制外的行動，有時的確能發揮成效。研究美國工人運動的學者指出，要解釋美國為何沒有出現類似歐洲的社會主義風潮與激進工會運動，不能忽略十九世紀末以降，政府對工運一連串的武力鎮壓，迫使工會領導採取較保守的策略路線 (Friedman 1988; Laurie 1997: 208–210)。同樣地，在 1989–1992 年時期的臺灣，由於資本家的壓力，國家部門開始強力取締工運份子，鎮壓罷工風潮，使得新興的工人運動面臨了十分嚴峻的考驗（王振寰、方孝鼎 1992；趙剛 1998: 1–34）。這段期間壓制的後果之一，即是後來的臺灣鮮少出現八〇年代末期激烈的「集體休假」抗爭，有組織的工人被迫以更溫和的手段來進行勞資爭議。



另一方面，執政者的壓制雖然能使社會動員更加困難，但是有時也會產生不一致，或是意想不到的效果。Aminzade (1993b) 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紀中葉法國政府對於異議份子的整肅，在各個城市有不同的影響，因而產生了各種取向的工人運動。在某些城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聯合支持共和主義；在其他城市，工人階級則是轉向社會主義，與共和派相對抗。此外，警方與情治單位的武力壓制，有時也會激化若干社會運動組織，使得他們轉向更危險的恐怖主義活動。七〇年代的德國與義大利都出現了極左派組織，從事一連串的綁架、暗殺、破壞等行動。這些社會運動的活動與國家部門的壓制形成一種不斷攀升的暴力循環，導致社會秩序更加不安定 (della Porta 1995)。最後，Goodwin (2001: 245) 針對二十世紀各種革命的比較研究發現，威權統治者不分青紅皂白的暴力壓制，常使得溫和的反對派不容易立足，更造成革命顛覆活動難以根除。因此，那些缺乏社會支持、只能依靠鎮壓來維持統治的政權，是最容易被革命所推翻的。就這個意義而言，革命是一種「沒有其他出路下的結局」(no other way out)，統治者的全面性壓制，反而排除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其次，在介於壓制與接受之間，存在著一大塊的灰色地帶，能夠讓執政者化解社會抗議所帶來的衝擊。Lipsky (1968) 指出，社會抗議的作用是間接的，抗議者必得取得旁觀者的同情與信賴，官員才會承受到的回應壓力。這種本身與抗議主題無關，但是卻能夠影響抗議結果的參考公眾 (reference public)，是抗議者與官員之間重要的第三者。同樣地，政府也可以採取一連串的象徵性手段來消弭公眾的關切，例如公開承認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卻不採取立即的解決措施。官員也可以凸顯政府能力是有限的，使得抗議者的目標看起來像是強人所難，根本無法實際運作。另外，官員通常有良好的媒體與公民團體關係，他們可以故意透露、偽造一些負面的訊息，以減低抗議者的公信力。最後，官員有可能故意延宕付諸行動的時程，迫使組織不穩定的抗議團體難以持續性地發動有力的挑戰。簡單地說，政府有能力在不採取壓制的前提下，消除了媒體與公眾對社會運動議題的關注，使得抗議者的宣稱投訴無門。



第三，執政者也有可能疏導社會抗議的風潮，將其轉移至威脅性較小的訴求。六〇年代初期，美國民權運動開始採取非暴力直接行動的策略，在南方各都市以靜坐方式要求立即取消種族隔離制度。面對逐步升高的種族對峙局勢，民主黨政府試圖以釋出政治資源的方式，誘使民權團體轉向選民登記的方向，放棄以直接行動挑戰白人的種族統治。對於民主黨而言，更多的黑人選民可以彌補流失的南方白人選票，也降低了動用聯邦政府權力介入地方種族爭議的政治風險 (Morris 1984: 231–236)。另一方面，面對某些無法完全壓制的社會抗議，執政者也有可能設立新制度，尋求低成本與低風險的體制內手段，疏導醞釀中的衝突。例如國民黨政府在 1992 年重新推動擱置許久的公害糾紛處理法草案，並迅速在立法院完成正式的三讀程序，其目的即是在緩和當時層出不窮的公害求償運動，避免更嚴重的政治外溢效果 (何明修 2002b)。

最後，即使執政者願意讓步，他們對於抗議者的回應也是具有高度的選擇性與條件性。Gamson (1975: 28–29) 指出，政府對於社會運動的處理可以由兩個獨立的項目來加以衡量，亦即是接納 (acceptance) 與利益 (advantage)。接納是指官方對於某個挑戰團體的正式認可，承認他們是某一種利益的有效代言人，也同意他們所呈現的社會問題之重要性；利益則是涉及了團體成員是否能真正得到新的物質報酬，亦即是政府部門是否願意拿出資源，讓抗議參與者獲得回報。理論上，社會運動會試圖同時追求接納與利益，但是實際上，這種完美的結局並不是那麼常見。有可能出現的情況還包括收編 (co-optation)，亦即是社會運動獲得了接納，但是卻沒有利益；或是先發制人 (pre-emption)，即政府釋出物質資源，但是卻不承認社會運動的正當性。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在學界或是運動界，收編的概念總是充滿了各種的爭議。舉例而言，Miller (1999: 305) 視收編為「運動領導者獲得個人晉升的好處，而忽略了運動的集體目標」。這個定義無疑是較為通俗的，也反映了一般運動界的負面觀點。相對地，Gamson 的定義是比較中性的，只是將收編當成運動後果的一種可能劇本，而不帶有任何道德或政治意涵的指



責。此外，有些學者則主張不需把社會運動是否獲得接納當成判準，因為利益的賦予才是最實質的，而接納本身「並沒有幫助任何人，而且有可能導致受益團體被出賣」(Amenta and Young 1999: 40)。

在此，筆者認為，沒有必要採取這樣狹義的唯物論立場，只重視社會運動的物質回報，而忽略其象徵層面的正當性。社會運動能否獲得政府部門的承認仍然是相當重要的，原因在於，接納往往是社運組織真正立足的關鍵，有可能在日後帶來更深遠的運動影響。舉例而言，美國甘迺迪政府在 1961 年設立了總統婦女地位委員會 (President's Commission of Women's Status)，邀請許多代表參與研商婦女權益的問題。這個委員會本身並沒有帶給婦女立即而直接的利益，儘管如此，由於這個組織匯集了以往分散的運動份子，等於是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動員網絡。在 1966 年，日後成為美國婦運主要代言人的全國婦女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正式成立，其創始成員即是來自委員會的成員，而且是在其第三屆全國婦女地位大會期間運作決議的 (Freeman 1975: 52-55)。同樣的道理，八〇年代的美國是政治保守主義當道的時期，然而學者也指出，華盛頓特區的婦女團體能夠善用其體制內的地位，透過遊說、參與聽證會、草擬法案、公眾教育等方式，以溫和的手段來實現激進政治的目標 (Spalter-Roth and Schreiber 1995)。換言之，承認往往帶來其他方面的助益，有助於持續推動社會運動的動員，延伸其影響力。

此外，否定承認的重要性，也就是預設將 Gamson 所謂的先發制人視為運動的成功。然而問題在於，缺乏社會正當性與政府肯定的物質回報，通常是有限的與暫時的。更重要的是，社會運動如果只追求量的增加，而沒有挑戰既有的社會關係，能發揮的影響是值得懷疑的。眾所皆知，國家與資本家寧願花費少許的金錢擺平勞資爭議或公害糾紛，以拒絕工人參與公司的經營，或是讓社區居民參與環境監測。事實上，不批判社會關係、只求物質回報是相當危險的，容易讓運動者解除武裝，出乎意料之外地遭致反制運動的反擊。Ehrenreich (1987: 190-191) 就指出，六〇年代的自由派忙著為弱勢族群爭取更多的福利，但是卻沒有批判造成他們邊緣化的社會



機制。由於缺乏另類的願景與意識型態支撐，他們很快就心滿意足，結果被後來崛起的新右派嚴酷擊垮。因此，對於社會運動而言，沒有必要將利益當成唯一判準，爭取政府官員與社會的承認也同樣重要。

綜合以上的說法，政府對於社會運動的回應模式存在著壓制、忽略、疏導、接受等等種種的可能。到底執政菁英要採取那一種姿態，與議題的衝擊性、動員強度、輿論壓力、政治聯盟等一系列的環境變項有關。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執政者是理性的，那麼他們應該衡量壓制的成本與接受的成本兩項因素。如果壓制的成本明顯地小於接受的成本，執政者會選擇壓制，反之，如果接受的成本小於壓制的成本，執政者會選擇接受。如果兩項成本是接近的，或者都太巨大，那麼忽略與疏導則是比較可能的回應策略。在此，對於政府回應的功利計算是十分簡化的說明，至多只是啟發性的工具 (heuristic device)。在現實的情況下，政府內部總是會有強硬派與溫和派的對立，最後的回應常取決於兩派的政治鬥爭結果。

從社會動員的角度來看，社運組織與執政者的互動可以被設想為一種集體議價過程 (Burstein 1991, 1998; Burstein, Einwohner and Hollander 1995)。根據 Burstein 等人的看法，就爭取政府部門的政策回應而言，社會運動與其他利益團體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為了維持或提升其集體利益而進行動員，以改變當前的政策施行。議價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社運組織如何與政治菁英建立一套可行的聯盟方式，並且改變了他們原先的利益計算，願意以新的政策來換取社運組織的支持，或是停止抗爭行動。

舉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從九〇年代末期開始，臺灣的私立幼稚園業者為了抵制未立案業者低價競爭，以及公立幼稚園吸走客源，發動了一場爭取幼兒教育券的運動。他們主張教育券只能適用於已立案的私立幼教機構，因此可以排除地下幼稚園的競爭，也能夠拉近與公立幼稚園的收費差距，相當符合這一群業者的經濟利益。在 1998 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前，幼教業者開始宣稱自己是教育改革運動的一環，發動了一場盛大的「為幼兒教育而走」遊行，並且成功地爭取到近百位跨黨派立委的連署支持。第二波的運動則在 1999 年底展開，幼教業者改變策略，越過立法與行政機構，



直接與忙於總統選舉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協商。他們表明願意積極為國民黨輔選拉票，以換取總統候選人連戰在選舉前一個月正式宣布幼教券政策。比較兩波的幼教券動員，可發現有兩種現象。首先，對於執政菁英而言，總統大選比立法委員選舉更為重要，前者的失敗會直接導致變天與下臺，使得他們產生較高的議價意願，因此以選票換幼教券的訴求，在總統大選時更具吸引力。其次，在第二個階段中，幼教業者改變了他們原先跨黨派的中立立場，而單獨只找上執政黨談判。換言之，他們將自己的政治忠誠拿來作為交換的籌碼。對於國民黨而言，幼教業者不只是變得更可以信賴，交換的條件也變得更吸引人（何明修 2004b）。

最後，即使社會運動透過了成功的政治議價，取得了執政者的承認與利益，並不是意味著社會運動就能夠發揮原先所預想的影響力。在實際上，獲得執政者的接受，不一定會帶來新的制度法規。即使有進步性的立法，由於執行層面的問題，也可能無法引起實質的變遷。舉例而言，臺灣的勞工退休金受到勞動基準法保障，但是勞工通常面臨的情況卻是「看得到、吃不到」。臺灣的種種環境保護標準也經常是「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對於污染的廠商網開一面。因此，分析社會運動的政策作用，必須要注意到其影響是有很多層次的，至少包括了程序的與實質的兩個面向差異（Rochon and Mazmanian 1993）。簡單地說，社會運動即使取得了程序上的勝利，例如通過某項有利的法律，也不一定能帶來實質的變遷。很顯然，要取得實質的成果，社會運動需要提出更強大的壓力，克服官僚體制的怠忽、反對者的阻礙等因素。

四、社會運動與反制運動

反制運動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同樣需要透過組織動員、議題構框、利用機會等手段，來達成集體目標。然而，反制運動最主要的特色在於，他們不是自動自發的，而是針對另一項的社會運動而來，試圖抵銷後者可能即將取得的運動成果，或者是推翻某一項源自於社會運動的改革措施。反



制運動是一種試圖維持現狀 (pro-status quo) 的集體行動，無論在此所謂的現狀是否已經是名存實亡，或者才開始面臨質疑與挑戰。反制運動的出現，複雜化了上一節所分析的社會運動與執政菁英之互動，成為社會運動—政府—反制運動的三方角力，也使得原先社會運動實現其集體目標過程更加艱困。

反制運動出現總是晚於他們所要對抗的社會運動，就時機而言，有下列的幾種可能。首先，反制動員最容易被激發的時機之一即是在於，社會運動「展現成功的徵兆，無論是將他們的議題置入公共議程或是影響了公共政策」(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 1635)。換言之，促成反制運動的關鍵在於另一項社會運動的初步勝利，引發了反對派的恐懼。在這種情況下，某項籌劃中的改革被視為威脅，也是反對派最有效的動員號召。而且也由於在這個階段，社會運動只有初步的成果，反對派評估仍有轉圜與抵抗的空間。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社會運動的勝利是迅速而且全面性的，那麼反制運動將很難有立足的機會 (Zald and Useem 1987: 254)。

在 1954 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布朗控告教育委員會案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裁決之後，學校的種族隔離制被宣告為非法，這個劃時代的判決是民權運動的重大象徵性勝利。然而，根據 Morris (1984: 26–35) 的分析，在整個五〇年代中葉，南方的白人種族主義份子開始更密集的動員，透過私刑、縱火、炸彈等暴力手段威嚇，或是以法院傳票、警察臨檢、查稅等合法手段騷擾。因此，在這一段時期內，促成布朗案判決的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南方會員反而大量流失，許多分會甚至因而被迫關閉。同樣地，七〇年代的美國核電工業飽受環境運動的威脅。由於反核人士的動員，美國政府開始採取更嚴格的核能管制措施，籌劃中的核電廠也受到居民與地方政府的反對。在這個情況下，核能業者才開始動員電廠員工進行反制動員，以繁榮地方的名義，向環境人士宣戰 (Useem and Zald 1982)。這兩個例子都說明了為何反制運動總是在某項社會運動獲致成果後出現。

其次，政局不穩、菁英分裂等政治機會結構因素，可能促成社會運動



興起，也同樣有利於反制動員。事實上，缺乏穩定政治支持的執政者更容易受制於反對勢力，弱勢的國家本身即是招引反制運動的重要訊號。在政黨輪替之後的臺灣，弱化國家成為反環境動員的大好時機。自從民進黨政府成立之後，許多環保署的政策受到相關利益部門的激烈抵抗，舉例而言，電動機車業者抗議環保署將刪除原有的補助、養豬業者反對五大河流域的離牧政策、二仁溪畔的非法廢五金工廠反對遷移計劃、塑膠袋業者與勞工反對限用塑膠袋政策等等。這些反制運動使得環境政策的研擬過程更為曲折，充滿更多的妥協與讓步 (Ho 2005)。

如果保守派能夠獲得政府部門的奧援，他們所推動的反制動員也將更有影響力。從八〇年代以來，美國長期由保守派共和黨執政，福音派基督教勢力 (evangelic Christians) 便受到很大的鼓舞。對於激進的反墮胎團體而言，雷根、老布希兩位總統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實質協助。兩任總統都任命持反墮胎立場的官員與最高法院，以及頒布全國生命神聖日等舉動，都促成了一個有利於反墮胎運動的輿論氣候 (Johnson 1999: 254–255)。同樣地，在二〇年代的德國威瑪共和時期，儘管政權民主化了，貴族與反民主的勢力仍是盤據在法院、軍隊與大學體制中。因此，當法西斯主義運動興起時，受到了法官、軍官的恩庇保護，暗中協助其推翻民主的顛覆活動 (Gerschekron 1989; Moore 1978)。

一般來說，社會抗議是專屬於社會弱勢者使用的策略，因為他們沒有體制內的管道，只能用這種非常態的方式要求新的承認與利益。如果說連原先的優勢份子都開始使用抗議的手段，那麼情況很有可能是，抗議作為一種爭取政治資源的方式已被公認是有效的，或者說，以往優勢份子的特權被侵蝕了，因此，他們不得不低聲下氣，學習一種他們原先所不熟悉的集體參與。無論是那一種情形，這都反映了社會的民主化，迫使優勢份子向弱勢份子學習相同的政治語言。Tilly (forthcoming: 14) 曾指出，如果政治體制的管道越平等分布，不同群體的社會抗議劇碼會越接近。顯而易見的，臺灣在民進黨執政之後，社會運動也出現了政黨輪替的現象。晚近以來的政治抗議多是由泛藍陣營所發動，參與者也通常是以往被黨國體制所眷顧



的部門，例如榮民、公務人員、教師等。

因此，反制運動的出現或多或少透露出身分與地位的平等化。這個道理可以解釋這樣的奇特現象，美國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產物，強調機會開放與自由競爭，另一方面它的歷史充滿了許多極端反動的反制運動，例如仇視移民、白人優越論、麥卡錫主義，一直到晚近的右翼基督教運動等。Lipset (1979: 84-86) 指出，最早從十九世紀初開始，美國的保守派就認知到他們必得要面對一個信仰革命平等主義的社會，因此，保守派的運動需要使用群眾能夠了解的語言，保守主義也帶有民粹主義的成分，更容易形成反制運動。Hofstadter (1962) 分析美國反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 的歷史起源，他強調美國主流文化對於學院知識份子的不信任，帶有反菁英主義的色彩。越是在一個身分平等的社會中，人民越是不能接受知識份子扮演祭司貴族的角色，也越容易接受極右翼的反制言論。

反制運動另一個引發知識上興趣的問題即是，即便運動的領導者是有意識地操弄資訊，掩飾他們的階級利益，為何這些訴求仍能夠獲得相當程度的群眾支持，形成一股具有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自從八〇年代以來，美國藍領階級選民支持共和黨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一個奇特的現象即是，為何工人選民要投票給一個要削減社會福利與富人所得稅的政黨，這樣不是會傷害自己的階級利益嗎？同樣地，美國的反墮胎運動、反兩性平權運動都是有龐大的家庭主婦支持。女性為何要反對女性地位的提升，為何要如此堅定地擁護性別不平等的體制？要解釋這些「錯誤意識」的現象，必得要承認利益的社會文化建構性格，而不是只以單純的功利主義為判準。簡單地說，研究者應該注重社會運動的象徵面向，因為集體行動所涉及的抗爭對象不只是物質性的利益分配，也涉及聲望、品味、尊敬等文化價值的鬥爭。

關於此，有兩個關於保守婦女運動的研究十分值得參考。Mansbridge (1986: 90-117) 分析反對平權修正案的婦女動員，發現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沒有大學學位的家庭主婦。這些家庭主婦積極參加反對性別平權的運動，因為她們認為平權只是有利於在意同工同酬的職業婦女，卻不利於需要家



庭保障的婦女。在保守派的強力動員下，這一群家庭主婦相信，女性主義反對她們畢生奉獻的家庭與婚姻，所謂的性別平等即是意味著離婚後沒有贍養費、婦女也要被徵召入伍、公共場所的廁所將不分性別等。由於保守派婦女的強力動員，平權修正案在 1982 年過了法定簽署期限，正式宣告胎死腹中。

Luker (1984: 192–215) 對於反墮胎運動的研究也指向相近的結論。她強調，美國家庭主婦之所以被成功地動員加入支持生命權 (pro-life, 反墮胎) 的陣營，原因在於她們試圖維繫母職 (motherhood) 的社會與道德意義。對她們而言，墮胎在文化上常代表著外遇的性愛，也貶低了婦女生育能力的價值。如果說連脆弱的人類胚胎都不受到法律的保護，那麼像她們這樣弱勢者的存在價值也等於受到否定。在她們看來，爭取墮胎合法的職業婦女是為了自己的生涯利益，讓自己能夠像男人一樣，不必為了生育問題而犧牲工作。因此，墮胎的合法化意味著母職的貶值，然而母職卻恰好是家庭主婦所唯一擁有的社會資源。

這些反制運動員展現的是一種道德抗議，反對平權修正案與反墮胎，都是為了捍衛家庭與婚姻所代表的價值。自由派、高學歷的職業婦女與保守派、低學歷的家庭主婦之對立，並不是女性主義者所樂見的現象，但是這項嚴重分歧卻反映了社會變遷所帶來差異化效果。很顯然，抵抗社會現代化的趨勢不只是舊統治者的特權，同時也是許多弱勢者的心聲。Moore (1970: 152–153) 曾指出，許多歷史上的反制運動即是源自於這種「小人物的憤怒」(anger of little man)：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辛苦掙獲的微薄地位受到了質疑與嘲弄，他們憎恨那些批評現狀的舉動，因此願意投身於任何捍衛現狀的集體行動，儘管他們也心知肚明，現狀對於他們是不公平的。不難理解的，社會變遷的步調越是不均衡，這種不滿越容易累積，這些小人物的受害意識也更為劇烈。一項關於美國基督教右派的研究指出 (Stein 2001)，保守的低下階級成員認為自己被都會主流文化所拋棄了，內心深處藏著不為人知的羞恥感。因此，右派教會之所以成功，原因在於他們將這種情緒轉化為能夠引發集體行動的憤怒。



此外，反制運動的群眾基礎也反映了社會運動組織的有限穿透力。就這一點而言，美國家庭主婦支持父權制度的道理，就如同威瑪共和時期德國失業工人支持納粹黨一樣，兩者都不是進步運動組織（婦運組織、工會）所能觸及的範圍。一旦脫離了社會運動的動員網絡，他們就容易受到教會等保守組織的影響，成為反制運動的急先鋒。就如同 Tilly (1976) 關於法國反革命運動研究所指出的，法國西部都市化與市場化的發展遲緩，農民只能接觸到貴族地主與教士，因此，他們願意加入捍衛封建特權的戰爭，而不是投身於革命的陣營。

簡而言之，就形式要件而言，反制運動與正常的社會運動沒有什麼兩樣，同樣需要召喚參與者的熱情，組織動員網絡，建立政治聯盟。但是就出現的時機、與社會變遷的關係而言，反制運動卻恰恰是其他社會運動的倒影。無疑地，強而有力的反制運動的出現，使得社會運動發揮影響的過程更為複雜糾葛，也使得研究社會運動後果的工作更具有知識上的吸引力。

五、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

上述的整理著重於政治性較高的社會運動，而且也是針對政策面向的影響。事實上，如此侷限討論的範圍是特意的，原因在於社會運動導致的政治權力重分配是比較顯而易見的，能夠在有方法論依據的前提下確認現象、分析因果關係、梳理影響機制、比較個案。不可否認地，社會運動不只要求改變既有的權力關係，也提出了 Melucci (1985) 所謂的「象徵性挑戰」，追求一套更具有自主性的生活方式。此外，即使是純粹追求政治目標的社會運動也可能有諸多的文化外溢效果：在動員過程中，被支配者破除了以往的無力感，獲得了正面的自我認同；在抗爭過程中，空間的威權控制被打破了，人民的力量佔領了街頭；在宣傳訴求的過程中，公眾的冷漠、偽善與無知被徹底揭露出來。因此，不管是那一種取向的社會運動，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文化衝擊。然而，問題正是在於要如何測量這個領域的變遷，並且適切地將它歸諸於集體行動者的功勞，則是十分困難的問題。



舉例而言，美國的保守評論家抱持著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觀點，即好萊塢已經被左翼份子徹底滲透，因此主流電影工業已淪為宣傳自由派價值的傳聲筒。近幾年來，好萊塢出產了幾部熱門的環保電影，例如 1999 年的《法網邊緣》(A Civil Action)、2000 年的《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2004 年的《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這幾部電影都深刻地描寫了工業污染使得地球環境與人類健康付出慘痛代價，對於環境運動而言，無疑是最好的大眾宣傳。然而，為何好萊塢電影工業突然變得如此具有環境意識，甚至是坐實了保守派的指控？顯而易見，自由派操控的陰謀論解釋太過於牽強。比較可能的解答即是，環境人士幾十年來的公眾教育獲得顯著的成效，甚至連大眾文化產業都接受了他們的觀點。也許有人會懷疑環境運動者的能耐，寧願相信一個更為平庸的答案，即晚近以來的生態災難實在太頻繁了，成為電影題材並不令人意外。然而，這種說法卻忽略了一點，所謂的生態災難也是被人為定義的，能夠指認出全球暖化的現象，就等於是接受了環境運動者界定問題的方式 (Hannigan 1995: 109-145)。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環境運動的確對社會產生了深遠的文化影響，甚至改變了一般大眾觀看問題的方式。

但是以上同樣的例子，也點出了研究的困境。環境人士沒有針對好萊塢施展動員、遊說、施壓等運動策略，也沒有社會運動團體想要組織電影工業從事人員。在缺乏明顯證據的情況下，我們要如何斷定行動者與行動結果的連結？很顯然，分析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這也說明了為何大部分的研究者沒有探討這個問題 (Giugni 1999: xxiii)。也因此，這一節只能提供幾種探討這個議題的途徑，而不是有共識的解答。

首先，文化可以被視為一些專門生產意義的社會制度，例如教育、宗教與藝術等。社會運動對於文化制度的衝擊，即是改變了其意義的生產方式。Lipset (1968: 31-63) 曾寫過一篇詮釋性的文章，認為美國與加拿大的文化差異，可以歸諸於革命與反革命的歷史遺產。美國是民主革命的產物，平等的個人主義有史以來首度在此獲得政治肯定；相對地，加拿大則曾經長期尊奉英國皇室，試圖維持傳統的文化價值，拒絕美國革命精神的影響。



在 Lipset 看來，革命的傳統使得美國人重視實用性與技術性的教育，對於公共權威與法律缺乏敬意，宗教信仰也是呈現多元化與教派競逐的格局。加拿大的教育則是偏向人文主義，政府比較具有領導權威，宗教生活是由建制化的教會所主導。從這個角度來看，成功的革命不只具有立即的政治作用，同時也形塑了深層的價值觀，展現在各種文化制度的安排。

只要能夠激發出一股動員風潮，和平的社會運動一樣會產生深遠的文化制度影響。不可否認的，大部分的宗教是保守的，信仰使人重視內在的修養與虔誠，卻也往往忽略了外在不利的社會條件。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著名的〈伯明翰監獄來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中，批判主流教會對於種族壓迫的漠不關心，淪落為現狀的擁護者 (King 2000: 188–204)。儘管如此，六〇年代全球的抗爭風潮仍對宗教產生了嚴重衝擊。在拉丁美洲，一股結合馬克思主義與天主教的趨勢，導致了解放神學的出現。解放神學的實踐是將教會與草根社區結合起來，共同挑戰軍事獨裁政權 (Smith 1991)。在歐洲，經歷了新左派運動的洗禮，許多教會也積極動員他們的信徒，參加反戰的和平運動 (Tarrow 1988a)。在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經歷了與國民黨政府長期的對抗，長老教會發展出一種鼓勵社會參與的宗教態度。在八〇年代以降的臺獨運動、反核運動、原住民運動裡，都可以看到長老教會的著力 (林本炫 1990)。

此外，在六〇年代，美國高等教育體制受到學生運動嚴厲的挑戰，也改變了後來學術界的生態。當時學生批判學院的知識生產是為了服務當權者，學校以家父長的權威來管制學生的生活，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經歷了學運的衝擊，校園內部的師生關係也產生變化，彼此的地位差距拉近許多。學生抗議也影響了學術社群的自我認同。在以往，科學家只關切專業領域內的發展，後來逐漸地有些科學家開始具有更廣闊的社會關懷，他們組織政治性團體，積極介入各種公眾利益的議題 (Moore 1996; 1999)。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方面，美國大學陸續設立了婦女研究、西班牙裔、非洲裔等研究單位與課程，也是反映了這些群體的動員結果。

事實上，就社會運動的研究而言，社會運動的風潮也刺激了這個領域



的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前學運參與者進入學院體制，以往保守的集體行為理論被推翻了，由更激進的資源動員論、新社會運動理論、政治過程論所取代。舉一個實際例子來說明，在六〇年代末期，實際參與婦女運動的 Jo Freeman，在芝加哥大學撰寫有關婦運的博士論文，當時她就被校方明確暗示過，研究婦運的下場有可能是找不到工作。一直到她找到教職之後，仍被迫要不斷地釐清自己專業的教學研究與運動參與是兩回事，不會相互混淆 (Freeman 1995: 397-399)^①。在如今，性別研究成為當紅的顯學，研究者公開宣稱自己的研究是為了女性，而不是基於某種男性所定義的價值中立。相較之下，可以發現婦女運動已經十分深刻地改造了學術研究的風貌。

在臺灣，八〇年代中期興起的學生動員，也對高等教育體制種下變遷的種籽。自由派的大學教授開始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向教育部要求廢除共同必修課程、校長選舉、學術研究自由等校園自主的政策 (賀德芬 1990)。澄社 (1989 年)、台灣教授協會 (1990 年) 的成立，代表知識份子社會參與的制度化，他們開始走出象牙塔，關切更廣大的政治社會議題。在 1991 年反對刑法一百條、爭取言論自由的運動中，就有許多大學教授的介入，使運動具有明顯的知識份子色彩 (林逢慶 1993)。成立於 1987 年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在早期也有不少教授參與，試圖將草根與知識的力量結合起來，改造生態環境。至於 1993 年成立的台灣女性學學會，以及更早的婦女新知基金會，也都是女性主義學者的社會參與管道。

除了知識份子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就學術研究而言，近二十年來的各種社會抗議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此之前，由於缺乏社會運動的風潮，臺灣的社會學家根本沒有社會運動案例可以研究。臺灣有一本介紹社會運動的早期著作，其中所舉的例子是「國父領導國民革命」。直到 1988 年，臺灣學界首次在清華大學舉行了社會運動的研討會，很顯然是回應當時風起雲湧的抗爭事件 (徐正光、宋文里 1989)。也是由於各種抗爭議題的浮

① 順便一提，筆者曾在應徵大學教職時遇到類似狀況。在面試過程中，該單位的主管開宗明義地提問了，「你是研究社會運動的，會不會在我們學校搞社會運動？」



現，「省籍問題、族群政治、階級研究、社會運動等等，這些『禁忌』問題在八〇年代後期開放了討論的空間」（蕭新煌 2002: 8）。

社會運動也帶來了大眾娛樂與藝術的變遷。在西方，搖滾樂很早就與新左派青年文化連結在一起，代表著自由解放的叛逆精神。六〇年代的運動風潮也促成音樂藝術形式的創新，當時的民歌復興運動，促成了民歌搖滾 (folk rock) 的出現，即是明顯的例子 (Eyerman and Jamison 1998: 118–124)。在近幾十年來，許多搖滾藝人創作具有社會關懷的音樂，舉行公益性質的音樂會，試圖喚起世人對於愛滋病、第三世界貧窮、環境污染、人權等議題的重視 (張鐵志 2004)。在臺灣，七〇年代的民歌創作開始走向社會關懷，但是受到環境的限制，並沒有與運動實踐結合在一起。八〇年代中期興起的黨外運動，也只是借用既有的臺語歌謠，來激發聽眾的悲情與認同。直到八〇年代末期，由於黑名單工作室、豬頭皮 (朱約信) 等人的政治抗議歌曲，音樂創造才真正與社會運動結合。到了晚近，本土搖滾樂的發展更是觸及了許多社會運動議題，例如交工樂團對於農民、反水庫運動、外籍新娘的關注，黑手那卡西對於工人運動的投入等等，都是明顯的例子。另一方面，臺灣的社運團體也發現了音樂所具有的宣傳效果，因此，台灣勞工陣線推出了〈勞工搖籃曲〉(2000年)，台灣人權協會也出版了〈美麗之島〉(2001年)，來宣達社會運動的理念。

除了制度化的文化生產，社會運動也影響我們日常生活層次的互動，包括穿著打扮與言談方式。六〇年代的反抗文化運動帶來更為解放的、隨興的生活方式，自由性愛、毒品、嬉皮文化是其特徵 (McAdam 1994: 51)。在 1983 年，德國綠黨首度獲得進入國會的機會，當時這一群穿著牛仔褲的議員，在聯邦議會引發一陣騷動。對於保守而拘謹的歐洲政壇而言，牛仔褲帶有許多顛覆性的意義，一方面代表美國文化的入侵，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六〇年代的憤怒大學生。

婦女運動的興起也帶來女性打扮風格改變。在早期，婦女運動者為了挑戰傳統界定女性美麗特徵的標準，鼓吹不穿胸罩、不刮腿毛、不化濃妝。經過了長期的宣傳與動員，過於女性化的打扮會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



許多女性上班族則是以留短髮、穿褲子等中性的穿著方式，在公領域中呈現自己。另一方面，一些激進的女同志女性主義者則是刻意採取傳統上與娼妓有關的服飾，例如迷你裙、低胸上衣、網狀絲襪等，以挑戰傳統的性別角色認定 (Taylor and Whittier 1992: 121)。

綜合以上的整理，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教育、宗教信仰、流行文化、穿著打扮，從而帶來文化領域的變遷。就某個意義而言，這些文化生活的改變並不是社會運動份子有意識造成的，至多它們只是運動的附帶產品，或者說是某種未意圖結果。要確切理解這些文化影響的起源是很困難的工作，所幸，McAdam (1988: 136-145) 透過對於 1964 年自由之夏運動 (Freedom Summer) 的深入分析，使我們有機會理解文化創新與傳播的過程。McAdam 指出，由於北方大學生深入南方社區從事黑人選民登記的工作，彼此必須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避免種族主義者的暴力攻擊。熱血的理想主義與危險的運動場域，共同激發出一種實踐信念，即破除中產階級偽善而體面的生活方式，因此，個人的解放即是一種社會革命。在民權運動中，他們學習過公社的共同生活，進行公開的團體性愛。為了接近人民，他們的穿著打扮變得隨興化，語言也混雜了原先被視為低俗的辭彙，以圖建構一種更真誠的族群互動關係。自由之夏的運動受到美國媒體的重視，後來成為激進六〇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運動結束之後，自由之夏的參與者回到校園，更進一步將他們在南方所學習的個人解放運用於其他運動議題，形成了日後的反抗文化運動。換言之，McAdam 的研究呈現了一點，運動參與者所構成的網絡是新文化的搖籃，有可能創造出日後新社會生活的雛形。

六、結 論

社會運動之所以引發研究者的興趣，一部分原因在於集體行動往往帶來社會的變遷。昨日的異端邪說成為今日的主流共識，歷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可說。在西方，起源於十八世紀啟蒙哲學的人權與平等的思想，從原本



的離經叛道，到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語言與現實，經歷了兩個世紀的革命與反動。在近十年來的臺灣，從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到「歷史教材、核電、母語教學、漢字羅馬拼音、教改等爭議」通通被保守份子污蔑為所謂的「民粹主義」（吳介民 2003）。但是儘管面臨這些阻力，臺灣的政治社會改革還是一樣向前邁進。因此，社會學家有理由注意當前的社會抗議，即使他們再如何地違背我們習以為常的想法，仍有可能預先召告下一個社會的形態。

對於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而言，能夠說服他們願意冒著各種風險與代價挺身而出的理由，不外乎是更美好生活的願景。社會運動的存在目的即是為了改變社會，達成集體所追求的目標。這一章整理了社會學家如何探討社會運動後果的幾種問題與分析途徑。首先，社會動員與政治條件通常是用來解釋社會運動政策影響的兩個主要方向。到底哪一種動員策略是比較有效的？應該是採取溫和路線還是激進路線？要組織專業團體，抑或是依賴群眾抗爭？學界與運動界都有不同的見解。在政治條件方面，國家的自主性高低、政府的組織形態都會影響社會運動的收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運動的後果是取決於執政者與社運組織的互動。面對社會抗議的挑戰，統治菁英可以選擇鎮壓、忽略、疏導與接受等回應方式。需要說明的是，政府的回應具有多向度的判準，承認運動的正當性並不意味著必然賦予新的物質利益，反之亦然。即使運動實際產生了新的法律規章與制度，程序性的影響也不見得帶來結構性的作用。此外，除了統治菁英的不情願以外，反制運動是另一項社會運動的阻力，通常造成通往改革的道路更加崎嶇難行。最後，社會運動除了帶來政治革新，也會有文化領域的衝擊。更自主的多元生活方式，更具有包容性價值觀，往往是從一小撮社會運動份子擴散至整個社會。



圖片出處：

圖 3-1, 4-1：AFP；

圖 6-1：Getty Images；

圖 7-1：Hulton Archive；

圖 7-2：中國時報資料照片，王敏攝；

圖 4-2：邱毓斌提供。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志弘 (2004) 〈秩序、效率與文明素養：都市治理下的『排隊運動』〉。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新竹：清華大學。
- 王甫昌 (1996) 〈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 129-209。
- (1999) 〈社會運動〉。見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501-536。臺北：巨流出版社。
- 王明輝 (1989) 《反公害集體抗議行動過程之探討：以後勁反五輕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振寰、方孝鼎 (1992) 〈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 1-29。
- 王雅各 (1999) 《台灣婦女運動解放史》。臺北：巨流出版社。
- 何明修 (2001a) 〈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與草根 (1980-1986)〉。《台灣社會學》2: 97-162。
- (2001b) 〈溝動行動理論與市民社會〉。《社會理論學報》4: 147-176。
- (2002a) 〈為何民進黨政府的廢核政策失敗？社會動員、改革機會與政治策略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6: 86-137。
- (2002b) 〈衝突的制度化？公害糾紛處理法與環境抗爭〉。《教育與社會研究》3: 35-64。
- (2002c) 〈地方政權與社會運動：綠色執政下的綠色運動 (1989-1998)〉。《宜蘭文獻雜誌》56: 3-32。
- (2003a) 〈民間社會與民主轉型：環境運動在台灣的興起與持續〉。見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 29-68。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 (2003b) 〈自主與依賴：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模式〉。《台灣社會學刊》30: 1-49。
- (2003c) 〈工廠內的階級團結：連結石化工人的工作現場與集體行動〉。《台灣社會學》6: 1-59。
- (2004a) 〈地位階層化與台灣的國營事業工人運動〉。見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堉和黃紹倫編，《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社會階級變遷》頁 203-235。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2004b) 〈台灣幼兒教育券的政治邏輯：政策、選票與集體行動〉。見林本炫、鄒川雄編，《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頁 81-113。嘉義大林：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2004c) 〈集體行動中的情緒、儀式與宗教：一個涂爾幹社會學的分析〉。《社會學理論學報》7: 41-87。

—— (2004d) 〈文化、構框與社會運動〉。《台灣社會學刊》33: 175-200。

—— (2004e) 〈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刊》37: 1-50。

何榮幸 (2001) 《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臺北：時報出版社。

吳介民 (1989) 《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 1980 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2) 〈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 159-198。

—— (2003) 〈解除『民粹』的魔咒〉。《南方電子報》，見 http://www.esouth.org/scid/south/south_2003/2/0.htm, 11/18。

呂欣怡 (1992) 《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丁讚、林文源 (2000) 〈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19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 133-206。

—— (2003) 〈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2: 57-120。

李筱峰 (1987) 《台灣民主運動四〇年》。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周碧娥、姜蘭虹 (1990) 〈現階段台灣婦女運動的經驗〉。見徐正光、宋文里主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79-101。臺北：巨流出版社。

林本炫 (1990) 《台灣的政教衝突》。臺北：稻鄉出版社。

林國明、蕭新煌 (2000) 〈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導論〉。見林國明、蕭新煌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頁 1-31。臺北：巨流出版社。

林逢慶 (1993) 《知識份子與反對運動》。臺北：前衛出版社。

林瑩秋 (1995) 〈在勞工運動的路上，有兩條鮮明的平行線〉。《新新聞》411: 70-72。

林鶴玲、鄭陸霖 (2001) 〈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一個探索性的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5: 111-156。

邱毓斌 (2004) 〈威權統治遺產下的台灣工運：1988 年到 2004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論文，新竹：清華大學。

范雲 (2003a) 〈連結運動者與變動的政治機會結構：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台灣民主轉



- 型過程中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個案研究)。見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 137-174。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 (2003b) 〈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以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 133-194。
- 徐正光、宋文里(編)(1989)《台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出版社。
- 高清波(1997)〈李長榮化工公害事件〉。《竹塹文獻》3: 45-58。
- 張茂桂(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國策中心。
- (1994)〈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志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 33-66。
- 張茂桂、朱雲漢、黃德福、許宗力(1992)《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自力救濟」事件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 張鐵志(2004a)《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臺北：商周出版社。
- (2004b)〈繼續前進〉。《聯合報》，11/27。
- 傅立葉(2000)〈老年年金、政黨競爭與選舉〉。見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頁 232-256。臺北：巨流出版社。
- 賀端蕃(1993)〈台灣社會運動的反思：一個社運義工的「偏見」〉。《新潮流》3: 2-5。
- 賀德芬(1990)《大學之再生：學術自由？校園民主?》。臺北：時報出版社。
- 黃應貴(1991)〈東埔社布農人的新宗教運動：兼論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的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 1-31。
- 楊弘任(1996)《另類社會運動：一貫道的聖凡兼修渡人成全》。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熊瑞梅、紀金山(2002)〈「師資培育法」形成的政策範疇影響力機制〉。《台灣社會學》4: 199-246。
- 趙彥寧(2001)《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臺北：巨流出版社。
- 趙剛(1995)〈1987年的台灣工會、國家與工運：以遠化工會的個案為例〉。見蕭新煌、徐正光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頁 115-150。臺北：東大出版社。
- (1998)《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臺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鄭淑麗(1995)《社會運動與地方社區變遷：以貢寮鄉反核四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鄧丕雲(1993)《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
- 盧蕙馨(1991)〈兩個婦女團體的「談心」聚會：挑戰男性霸權的儀式表演〉。《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72: 183-222。
-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



5: 195–250。

- 蕭新煌 (1988) 《七〇年代反污染自力救濟的結構與過程分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報告。
- (1997) 《一個緊張的共生關係：環保行政機關與民間團體的合作關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報告。
- (1999) 《台灣的民間基金會：組織與趨勢》。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 (2002) 《台灣社會文化典範的轉移》。臺北：立緒出版社。
- 薛曉華 (1995) 《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臺北：前衛出版社。
- 顧忠華 (2003) 〈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兼論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見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頁 1–28。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 顧忠華、陳惠馨 (2002) 〈修改人民團體法，刻不容緩〉。《澄社》未出版評論，見 <http://ts.yam.org.tw/critical/chku007.htm>。
- 顧燕翎 (1995) 〈婦女運動與公共政策的互動：墮胎合法化和平等工作權策略分析〉。見蕭新煌、徐正光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頁 151–174。臺北：東大出版社。
- Hobsbawm, Eric J. (1999) 《原始的叛亂》，楊德睿譯。臺北：麥田。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94) 《文化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陳璋津譯。臺北：遠流出版社。
- Marx, Karl (1975) 《資本論》，三卷。北京：人民。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北京：人民。
- Mills, C. Wright (1996) 《社會學的想像》，張君玫、劉鈞佑譯。臺北：巨流出版社。
- Parsons, Talcott (1991) 《社會的演化》，章英華譯。臺北：遠流。
- Tilly, Charles (1999) 《法國人民抗爭史》，劉絮愷譯。臺北：麥田。
-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91) 《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
- (1994) 《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香港：牛津大學。

二、英文書目

- Adair, Stephan (1996) “Overcoming a Collective Action Frame in the Remaking of an Antinuclear Opposition,” *Sociological Forum* 11: 347–375.
- Ahren, Emily Martin (1981) “The Thai Ti Kong Festival,” pp. 397–425,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eds. by Emily Martin Ahern and Hill G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beroni, Francesco (1984) *Movement and Institution*, trans. by Patricia C. Arden Delmor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Jeffrey C. (1998) “The Computer as Sacred and Profane,” pp. 29–46, in *The*



- New American Cultural Sociology*, ed. by Philip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enta, Edwin and Michael P. Young (1999) "Making an Impact: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llective Goods Criterion," pp. 22–41, in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eds. by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menta, Edwin, Bruce G. Carruthers and Yvonne Zylan (1992) "A Hero for the Aged? The Townsend Movement, the Political Meditation Model and the U.S. Old Age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11–28.
- Amenta, Edwin, Drew Halfman, and Michael P. Young (1999) "The Strategies and Context of Social Protest: Political Medi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Townsend Movement in California," *Mobilization* 4: 1–23.
- Aminzade, Ron and Doug McAdam (2001) "Emotion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pp. 14–51,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by Ronald R.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inzade, R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2001) "The Scared, Religious, and Secular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Blurring Boundaries," pp. 155–178,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by Ronald R.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inzade, Ronald (1993a) *Ballots and Barricad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b)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lass Form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A Comparative Local Study of Mid-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8: 79–106.
- Babb, Sarah (1996) "'A True American System of Finance': Frame Resonance in the U.S. Labor Movement, 1866 to 188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033–1052.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S.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947–952.
- Barkan, Steven E. (1979) "Strategic, Tac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Dilemmas of the Protest Movement Against Nuclear Power," *Social Problems* 27: 19–37.
- Beetham, David (1985)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Oxford: Polity Press.
- Bell, Daniel (1960)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ndix, Reinhard (1964)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Garden City, NY: Anchor.
- (1988) *Embattled Reason*, Vol. 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Benford, Robert D. (1992) “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ower,” *Sociological Inquiry* 62: 36–55.
- (1993a) “You Could Be the Hundredth Monkey: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95–216.
- (1993b)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al Forces* 71: 677–701.
- Benford, Robert D. and Davi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erbrier, Mitch (1998) “‘Half the Battle’: Cultural Resonance, Framing Processes, and Ethnic Affectation in Contemporary White Separatist Rhetoric,” *Social Problems* 45: 431–450.
- Boudon, Raymond (2003) “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1–21.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9) *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Cultur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itt, Lory and David Heise (2000) “From Shame to Pride in Identity Politics,” pp. 239–251, in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Sheldon Stryker, Timothy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roadbent, Jeffrey (2003) “Movement in Context: Thick Networks and Japanese Environmental Protest,” pp. 204–229,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eds. by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ckett, Charles (1991)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253–274.
- (1994) “A Protest-Cycle Resolution of the Repression/Popular Paradox,” pp. 117–144, in *Repertoire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ed. by Mark Traugot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urstein, Paul (1991) "Policy Domain: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Policy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327–350.
- (1998) "Social Movement and Public Policy," pp. 3–21, in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eds. Macr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urstein, Paul, Rachel L. Einwohner and Jocelyn A. Hollander (1995) "The Success of Political Movement: A Bargaining Perspective," pp. 275–295,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Calhoun, Craig (1982)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s: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3)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 385–427.
-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pek, Stella M. (1993)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Frame: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and an Application," *Social Problems* 40: 5–24.
- Chu, Yan-han (1992)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 Chu, Yin-wah (1996) "Democracy and Organized Labor in Taiwan: The 1986 Transition," *Asian Survey* 36: 495–510.
- Clemens, Elizabeth (1996) "Organizational Form as Fram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880–1920," pp. 205–226,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The People's Lobb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hen, Jean L. (1982) "Between Crisis Management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Plac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elos* 52: 21–40.
- (1983)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28: 97–113.
-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663–716.



- Cohen, Jean L. and Andrew Arato (199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llier, Ruth Berines (1999) *Path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andall (1982) *Sociological Ins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nolly, William E. (1983)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Oxford: M. Robertson.
- (1991)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 Cornfield, Daniel and Bill Fletcher (1998)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Social Movement ‘Frame Extension’: Shifts in the Legislative Agenda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881–1955,” *Social Forces* 76: 1305–1321.
- Costain, Anne N. (1992)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A Political Proce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roteau, David and Lyndsi Hicks (2003) “Coalition Framing and the Challenge of a Constant Frame Pyramid: The Case of a Collaborative Response to Homelessness,” *Social Problems* 50: 251–272.
- Dahl, Robert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 J. (1994)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Western Europ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Strategies of Partisan Influence: West European Environmental Groups,” pp. 296–323, in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Davies, James C. (1962)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5–19.
- Davies, Scott (1999) “From Moral Duty to Cultural Right: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Framing in Edu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2: 1–21.
- Deegan, Mary Jo (1996) “‘Dear Love, Dear Love’ Feminist Pragmatism and the Chicago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Gender and Society* 10: 590–607.
- della Porta, Donatella (1988) “Recruitment Process in Clandestin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talian Left-wing Terrorism,” pp. 155–169,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



- 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Dieter Rucht (1995) “Left-libertarian Movements in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Italy and West Germany,” pp. 229–272,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Diani, Mario (1996) “Linking Mobilization Frame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sights from Regional Populism in Ita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053–1069.
- Diani, Mario and Giovanni Lodi (1988) “Three in One: Currents in the Milan Ecology Movement,” pp. 103–124,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Dilorio, Judith and Michael R. Nusbaumer (1993) “Securing Our Sanity: Anger Management Among Abortion Escor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411–438.
- Dougherty, Kevin J. and Lizabeth Sostre (1992) “Minerva and the Market: The Sources of the Movement for School Choice,” pp. 24–45, in *The Choice Controversy*, eds. by Peter W. Crookson, Jr.. Newbury Park, CA: Corwin.
- Duara, Prasenjit (1991)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67–83.
- Dunlap, Riley E. and Angela G. Mertig (1992)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from 1970 to 1990: An Overview,” pp. 1–10,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eds. by Riley E. Dunlap and Angela G. Mertig.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 Durkheim, Emile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 by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 Free Press.
- (1951)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by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Free Press.
- (1958)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 trans. by Charlotte Sattler. Yellow Spring, OH: Antioch Press.



- (1961) *Moral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rans. by Everett K. Wilson and Herman Schnurer.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3) *Emile Durkheim on Morality and Society*, ed. by Robert N. Bella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2)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nd Selected Texts on Sociology and Its Method*, ed. by Steven Lukes, trans. by W. D. Halls. New York: Free Press.
- Eder, Donina, Suzanne Staggenborg and Lori Sudderth (1995) “The National Women’s Music Festival: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a Lesbian-Feminist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485–515.
- Eder, Klaus (1982) “A New Social Movement?” *Telos* 52: 5–20.
- Ehrenreich, Barbara (1987) “The New Right Attack on Social Welfare,” pp. 161–195, in *The Mean Season: The Attack on the Welfare State*, by Fred Block et 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Einwohner, Rachel L. (2002) “Motivational Framing and Efficacy Maintenance: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Use of Four Fortifying Strate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 509–526.
- (2003) “Opportunity, Honor and Action in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of 194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650–675.
- Eisinger, Peter K. (1971) “Protest Behavio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Pol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33: 980–1007.
-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1–28.
- (1974) “Racial Difference in Protes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592–606.
- Eitzen, Stanley D. (1970)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Wallace Supporters in a Midwestern City,” *Social Forces* 48: 493–498.
- Ekiert, Grzegorz and Jan Kubik (1999) “Protest Event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oland, 1989–1993,” pp. 317–348, in *Acts of Dissent: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Protest*, eds. by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rich Neidhardt.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Escherick, Joseph W.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1994)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pp. 21–70,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 in Modern China*, eds. by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Boulder, CO: Westview.
- Evans, John H. (1997)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Frame Content: The Religious Pro-Choice Move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67: 451-469.
- Eyerman, Ron and Andrew Jamison (1998) *Music and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ing Tradi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ntasia, Rick and Eric L. Hirsch (1995) "Culture in Rebellion: The Appropr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Veil in the Algerian Revolution," pp. 144-159,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eds.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erree, Myra Marx (1992)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Rationalit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p. 29-53,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s.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erree, Myra Marx and Silke Roth (1998) "Gender, Clas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 Strike of West Berlin Day Care Workers," *Gender and Society* 12: 626-648.
- Feuchtwang, Stephan (1974) "City Temples in Taipei Under Three Regimes," pp. 263-302, in *The Chinese Cities Between Two Worlds*, eds. by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reman, Bruce and William A. Gamson (1979)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pp. 8-44,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Cambridge, MA: Winthrop Publishers.
- Foweraker, Joe (1997)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ollective Action," pp. 64-77,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ollective Action*, eds. by Ricca Edmondson. London: Routledge.
- Franzen, Trisha (1993) "Differences and Identities: Feminism and the Albuquerque Lesbian Community," *Signs* 18: 891-906.
- Fraser, Nancy (2001) "Recognition without Ethic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8: 21-42.
- Freeman, Jo (1973) "The Origins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merican Jour-*



- nal of Sociology* 78: 792–811.
- (1975)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 (1979)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trategy: A Model for Analyzi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Actions," pp. 167–189,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Cambridge, MA: Winthrop.
- (1995) "From Seed to Harvest: Transformations of Feminist Organization and Scholarship," pp. 397–408,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eds.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Debra and Doug McAdam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 Networks, Choice 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 pp. 156–173,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s.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Gerald (1988) "The State and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4," *Theory and Society* 17: 403–430.
- Furet, François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trell, Robert (2003) "Framing Processes, Cognitive Liberation, and NIMBY Protest in the U.S. Chemical-Weapons Disposal Conflict," *Sociological Inquiry* 73: 359–386.
- Gamson, Joshua (1989) "Silence, Death and the Invisible Enemy: AIDS Activism and Social Movement 'Newness'," *Social Problems* 36: 351–367.
- (1995) "Must Identity Movements Self-Destruct: A Queer Dilemma," *Social Problems* 42: 390–407.
- (1997) "Messages of Exclusion: Gender, Movement, and Symbolic Boundaries," *Gender and Society* 11: 178–199.
- Gamson, William A.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 (1985) "Goffman's Legacy to Polit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14: 605–622.
-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and Andre Modigliani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37.



- Gamson, William A. and David S. Meyer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pp. 275–29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nz, Marshall (2000) "Resources and Resourcefulness: Strategic Capacity in the Unionization of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959–196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5: 1003–1062.
-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ates, Hill (1996) *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retty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ates, Hill and Robert P. Weller (1987) "Hegemony and Folk Ideologies," *Modern China* 13: 3–16.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 Gerhards, Jürgen (1995) "Framing Dimensions and Framing Strategies: Contrasting Ideal and Real-Type Fram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 225–248.
- Gerhards, Jürgen and Dieter Rucht (1992) "Mesomobilization: Organizing and Framing in Two Protest Campaigns in West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555–595.
- Gerlach, Luther P. (199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Its Opponents," pp. 85–98, in *Wav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Sixties*, eds. by Jo Freeman and Victoria Johns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89)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6)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Oxford: Polity Press.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7)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Giugni, Marcos (1998) “Was It Worth the Effort? The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8: 371–393.
- (1999) “Introduction: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Past Research, Present Problems, Future Development,” pp. xiii–xxxiii, in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eds. by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Row.
- Goldberg, Chad Alan (2003) “Haunted by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the Demise of Workers Alliance of America,” *Theory and Society* 32: 725–773.
- Goldstone, Jack (1980) “Theories of Revolution; The Third Generation,” *World Politics* 32: 425–453.
- Goldstone, Jack A. and Charles Tilly (2001) “Threat (and Opportunity): Popular Action and State Response in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us Action,” pp. 179–194, in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s. by Ronald A.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win, Jeff (1997) “The Libidinal Constitution of a High-Risk Social Movement: Affective Ties and Solidarity in the Huk Rebellion, 1946 to 195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53–69.
- (2001)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win, Jeff and James M. Jasper (1999) “Caught in a Winding, Snarling Vine: 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 27–55.
- Goodwin, Jeff,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2001)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orz, André (1982) *Far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by Michael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
- Gould, Deborah (2001) “Rock the Boat, Don’t Rock the Boat, Baby: Ambival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Militant AIDS Activism,” pp. 133–157, in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 Pollett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2002) “Life During Wartime: Emo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T UP,” *Mobilization* 7: 177–200.
- Gould, Roger V. (1993) “Trade Cohesion, Class Unity, and Urban Insurrection: Artisanal Activism in the Paris Commu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721–754.
-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96) “Patron-Client Ties, State Centralization, and the Whiskey Rebell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400–429.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420–1443.
- Groch, Sharon (2001) “Free Spaces: Creating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pp. 65–98, in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Subjectiv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eds. by Jane Mansbridge and Aldon Morri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usfield, Joseph R. (1963) *Symbolic Crusade: Status Politics and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81) *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trans.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ines, Herbert H. (1984) “Black Radicalization and the Funding of Civil Rights: 1957–1970,” *Social Problems* 32: 31–43.
- Hannigan, John A. (1995)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 Hardin, Garre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243–1248.
- Hardin, Russell (1995) *One for All: The Logic of Group Confli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rt, Stephen (1996)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vement: A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nd Literature Review,” *Sociology of Religion* 57: 87–90.



- Harvey, David (1993) "Class Relation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p. 41–66, in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s. by Micheal Keith and Steve Pile. London: Routledge.
- Havel, Václav (1988) "Anti-political Politics," pp. 381–398,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Th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ed. by John Keane. London: Verso.
- Haydu, Jeffrey (1999) "Counter Action Frames: Employer Repertoire and the Union Mena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Problems* 46: 313–331.
- Hercus, Cheryl (1999) "Identity, Emotion, and Feminist Collective Action," *Gender and Society* 13: 34–55.
- Hipsher, Patricia L. (1998a)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 Outcomes: The Chilean Shantytown Dwellers' Mo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49–168, in *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 eds. by Marco G.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1998b)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s Protest Cycle: 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in Democratizing Latin America," pp. 153–172, 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eds. by David S.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Hirschman, Albert O. (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1)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 Ming-sho (2003a) "The Politics of Anti-Nuclear Protest in Taiwan: A Case of Party-Dependent Movement (1980–2000),"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683–708.
- (forthcoming-1) "Protest as Community Revival: Folk Religion and Emotion in a Taiwanese Anti-Pollution Movement,"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3).
- (2005) "Weakened State and Social Movement: The Paradox of Taiwanes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fter the Power Transf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339–352.
- forthcoming-2 "Taiwan's State and Social Movements under the DPP Government (2000–2004),"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 Hobsbawm, Eric J. (2000) *Bandits*. New York: New Press.
- Hobsbawm, Eric J. and George Rudé (1969) *Capitan Swing*. London: Penguin.
- Hobson, Barbara (1999) "Women's Collective Agency, Power Resources, and Framing of



- Citizenship Rights,” pp. 149–178, in *Exte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eds. by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Till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1979)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551–575.
- Hoffer, Eric (1951) *True Believer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
- Hofstadter, Richard (1962)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onneth, Axel (1995)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unt, Lynn (1984) “Charles Tilly’s Collective Action,” pp. 244–275,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s.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Sacre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25–43, in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eds. by Jeffrey C. Alexa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 Scott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4) “Identity Talk in Peace and Justice Mov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488–517.
- Hunt, Scott A.,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4) “Identity Field: Framing Proce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vement Identity,” pp. 185–208,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eds. by Enrique Laraña,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Hwang, Jinlin L. (1995) “Contesting the Sacred: A Discourse-Centered Approach to the May Fourth Culture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8: 193–242.
- Issac, Larry and Lars Christiansen (2002) “How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Revitalized Labor Milita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722–746.
- Jasper, James, M.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99) “Recruiting Intimates, Recruiting Strangers: Building the Contemporary Animal Rights Movement,” pp. 65–82, in *Wav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Sixties*, eds. by Jo Freeman and Victoria Johns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2)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Looking for Agency in Social-Movement Dilemmas,”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 (2003) “Globalization and Agency: Compatible Terms? The Dilemma of Futurism in Social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July 2–3,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 Jasper, James M. and Jane D. Poulsen (1995) “Recruiting Strangers and Friends: Moral Shocks and Social Network in Animal Rights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 *Social Problems* 42: 493–512.
- Jenkins, Craig J.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527–553.
-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pp. 14–35,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Jenkins, Craig J. and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 Movement (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249–268.
- Jenkins, J. Craig and Barbara G. Brents (1989) “Social Protest,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ocial Reform: A Political Strugg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891–909.
- Jenkins, J. Craig and Craig M. Eckert (1986) “Channeling Black Insurgency: Elite Patronage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ack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812–829.
- Jenson, Jane (1995) “What Is in a Name? Nationalist Movements and Public Discourse,” pp. 107–126,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eds.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66) *Revolutionary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Johnson, Roberta Ann (1999) “Mobilizing the Disabled,” pp. 25–46, in *Wav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Sixties*, eds. by Jo Freeman and Victoria Johns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Johnson, Victoria (1999) “The Strategic Determinants of a Countermovement: The Emergence and Impact of Operation Rescue Blockades,” pp. 241–266, in *Wav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Sixties*, eds. by Jo Freeman and Victoria John-



- s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Johnston, Hank and Bert Klandermans (1995)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pp. 3–24,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eds.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Johnston, Hank, Enrique Laraña and Joseph R. Gusfield (1994) "Identities, Grievances,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3–35,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eds. by Enrique Laraña,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Joppke, Christian (1992) "Explain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of Two Anti-Nuclear Movements: A Political Process Perspective," *Sociology* 26: 311–331.
- Jordan, David (1994) "Changes in Postwar Taiwa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Popular Practice of Religion," pp. 137–160, in *Cultural Changes in Postwar Taiwan*, eds. by 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ü-chieh. New York: Westview.
- Katzenstein, Mary Fainsod (1990) "Feminism with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Unobtrusive Mobilization in the 1980s," *Signs* 16: 27–54.
- Katznelson, Ira (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nstructing Cases and Comparison," pp. 3–41,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s. by Ira Katznelson and Arsi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ane, John (1984) "Introduction," pp. 11–34, in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by Claus Off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ck, Margaret (1986–1987) "Democratization and Dissens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Politics and Society* 15: 67–95.
- Kertzer, David I. (199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iecolt, K. Jill (2000) "Self-Change in Social Movements," pp. 110–131, in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Sheldon Stryker, Timothy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ing, Martin Luther, Jr. (2000)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London: Abacus.
- Kitschelt, Herbert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57–85.



- (1989) *The Logic of Party Formation: Ecological Politics in Belgium and West German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0)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Organization,” pp. 179–208,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s.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1991)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 Critique,” pp. 323–347,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eds. by Dieter Ruc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landermans, Bert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Expansion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83–600.
- (1988) “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 pp. 173–196,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0) “Linking the ‘Old’ and the ‘New’: Movement Networks in the Netherlands,” pp. 122–137, in *Challenging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s.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199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otest and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pp. 77–103,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s.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landermans, Bert,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1988)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Klosko, George, Edward N. Mueller and Karl Dieter Opp (1987)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 Revisit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557–564.
- Koopmans, Ruud (1995) *Democracy from Below: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West German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1999)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Some Splitting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 93–106.
- Kornhauser, 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1988a)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Some Reflec-



- tion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pp. 349–368,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88b) “Local Mobilization for the People’s Petition of the Dutch Peace Movement,” pp. 41–82,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5)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ts Impact on Their Mobilization,” pp. 167–198,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eds.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1999) “Movements of the Left, Movements of the Right: Putting the Mobilization of Two New Types of Social Movements into Political Context,” pp. 317–345,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eds. by Herbert Kitschelt, Peter Lange, Gary Marks and J. D. Step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co G. Giugni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ubal, Timothy (1998) “The Presentation of Political Self: Cultural Reson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 539–554.
- Kubik, Jan (1998)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d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Central Europe.” pp. 131–152 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eds. by David S.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Laclau, Ernesto (1994) “Introduction,” pp. 1–8, in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ed. by Ernesto Laclau. London: Verso.
- Lamphere (1985) “Bringing the Family to Work: Women’s Culture on the Shop Floor,” *Feminist Studies* 11: 519–540.
- Laurie, Bruce (1997) *Artisan into Workers: Lab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efebvre, Henri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by 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Lenski, Gerhard E. (1954) “Status Crystallization: A Non-vertical Dimensions of Social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405–413.



- Lichbach, Mark I. (1994) "Rethinking Rationality and Rebelli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Problems of Collective Dissen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 8–39.
- Lichbach, Mark I. and Alan S. Zuckerman (1997) "Research Traditions and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pp. 3–16,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eds. by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chterman, Paul (1996)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American Activists Reinventing Commi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2) "Introduction," pp. 15–39, in *Political Parties*, by Robert Michel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8)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Social Struc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9)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Norton.
-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Earl Raab (1978)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80–197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psky, Michael (1968) "Protest as Political Resou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144–1158.
- Lowi, Theodore (1969) *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 New York: Norton.
- Luker, Kristin (1984)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ynch, Daniel (2002–2003)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as Socialization to Global Culture," *Pacific Affairs* 75: 557–574.
- Lyotard, Jean 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ffesoli, Michel (1996) *The Times of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London: Sage.
- Maguire, Diarmuid (1995) "Opposition Movement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Equal Partners or Dependent Relations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Reform," pp. 199–228, in



-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 Craig Jenkins and Bert Klandermans. London: UCL Press.
- Mainwaring, Scott and Eduardo Viola (1984) "New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Brazil and Argentina in the 1980s," *Telos* 61: 17–52.
- Mannheim, Karl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 New York: Harcourt.
- Mansbridge, Jane (1986) *Why We Lost the ER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arks, Gary and Doug McAdam (1999)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o the Form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 97–111,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eds.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Hanspeter Kriesi and David Rucht. London: Macmillan.
- Marx, Gary T. (1967) "Religion: Opiate or Inspiration of Civil Right Militancy Among Negro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64–72.
- Marx, Gary T. and Douglas McAdam (1994)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cess and Struc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Marx, Gary T. and James L. Wood (1975) "Strand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ollective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 363–428.
- Marx, Gary T. and Michael Useem (1971) "Majority Involvement in Minority Movements: Civil Rights, Abolition and Untouchabil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7: 81–104.
- Mayer, Margit (1991)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nd Social Movement Practice: The U.S. Pattern," pp. 47–120,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eds. by Dieter Ruc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83)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735–754.
- (1988) *Freedom Summ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Bi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744–760.
- (1994) "Culture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36–57,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eds. by Enrique Laraña,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6a)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pp. 23–4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b) “The Framing Function of Movement Tactics: Strategic Dramaturgy in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 338–355,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Beyond Structural Analysis: Toward a More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ovements,” pp. 281–298,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eds. by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and Ronnelle Paulsen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640–667.
- McAdam, Doug and Sidney Tarrow (2000) “Nonviolence as Contentious Interacti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3: 149–154.
- McAdam, Doug and William H. Sewell (2001) “It’s about Time: Temporality in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pp. 89–125, in *Silence and Voices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s. by Ronald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996) “Introduction: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Framing Process: 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p. 1–2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1996) “To Map Content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 1: 17–34.
- (1997) “Toward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pp. 143–173,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eds. by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ffrey, Dawn and Jennifer Keys (2000) “Competitive Framing Processes in the Abortion Debate: Polarization-Vilification, Frame Saving, and Frame Debunking,” *Soci-*



- ological Quarterly* 41: 41–61.
- McCammon, Holly J., Karen E. Campbell, Ellen M. Granberg and Christine Mowery (2001) “How Movements Win: Gendered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U. S.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s, 1866 to 191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49–70.
- McCarthy, John D. (1987) “Pro-Life and Pro-Choice Mo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Deficits and New Technologies,” pp. 49–66,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87a)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A Partial Theory,” pp. 15–42,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1987b)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p. 337–391,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Melucci, Alberto (1985) “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789–816.
- (1988)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pp. 245–260, in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ed. by John Keane. London: Verso.
-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A Strange Kind of Newness: What’s ‘New’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pp. 101–130,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eds. by Enrique Laraña,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David S. (1990) *A Winter of Discontent: The Nuclear Freeze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 (1993) “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 T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the End of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8: 157–179.
-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125–145.

- Meyer, David S. and Nancy Whittier (1994) “Social Movement Spillover,” *Social Problems* 41: 277–298.
- Meyer, David S. and Sidney Tarrow (1998) “A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pp. 1–28, 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eds. by David S. Meyer and Sidney Tarrow.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Meyer, David S. and Suzanne Staggenborg (1996) “Movements, Countermovements,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628–1660.
- Meyer, John W. and Phillip E. Hammond (1971) “Forms of Status Inconsistency,” *Social Forces* 50: 91–101.
- Michels, Robert (1962) *Political Parties*, trans. by Eden and Cedar Paul. New York: Free Press.
- Miller, Frederick D. (1999) “The End of SDS and the Emergence of Weatherman: Demise through Success,” pp. 303–324, in *Wav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Sixties*, eds. by Jo Freeman and Victoria Johns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Mills, C. Wright (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nkoff, Debra C. (1994) “From Service Provision to Institutional Advocacy: The Shifting Legitimacy of Organizational Forms,” *Social Forces* 72: 943–969.
- Montgomery, David (1993) *Citizen Wo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die, T. Dundar (2002) “Mobilization on the South African Gold Mines,” pp. 47–65, in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s. by David S. Meyer, Nancy Whittier and Belinda Robne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Barrington Jr. (1970) *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of Human Misery and Upon Certain Proposals to Eliminate Them*.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8)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London: Macmillan.
- Moore, Kelly (1996) “Organizing Integrity: American Sci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1955–197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592–1627.
- (1999) “Political Protes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Anti-Vietnam War Movement and American Science,” pp. 97–115, in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eds.



- by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orris, Aldon D.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New York: Free Press.
- (1996) “The Black Church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SCLC as Decentralized, Radical Arm of the Black Church,” pp. 29–46, in *Disruptive Religion: The Force of Faith in Social-Movement Activism*, ed. by Christian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Muller, Edward N. and Karl-Dieter Opp (1986) “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71–488.
- Nadeau, Kathy (2002) “Peasant Resistance and Religious Protest in Early Philippine Society: Turing Friars Against the Grai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1: 75–85.
- Naples, Nancy A. (2002) “Materialist Feminist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ext for ‘Community Control,’” pp. 226–246, in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s. by David S. Meyer, Nancy Whittier and Belinda Robne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varro, Marysa (1989)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Las Madres de Plaza Mayo,” pp. 241–258, in *Power and Popular Protest: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Susan Eckstei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epstad, Sharon Erickson (1995) “Popular Religion, Protest, and Revolt: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Insurgency in the Nicaraguan and Salvadoran Churches of the 1960s–80s,” pp. 105–124, in *Disruptive Religion: The Force of Faith in Social-Movement Activism*, ed. by Christian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Nettl, J. P. (1968)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 559–592.
- Nisbet, Robert A. (1966)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Noakes, John A. (2000) “Official Frame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e FBI, HUAC, and the Communist Threat in Hollywoo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 657–680.
- Noonan, Rita K. (1995) “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ological Forum* 10: 81–111.
- Oberschall, Anthony (1993) *Social Movements: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ed. by John Kea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0) "Reflec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Self-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Politics: A Tentative Stage Model," pp. 232–250,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eds.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Offe, Clause and Helmut Wiesenthal (1980) "Two Log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oretical Notes on Social Clas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 67–115.
- Oliver, Pamela (1984) "'If You Don't Do it, Nobody Else Will': Active and Token Contribution to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601–610.
- Olson, Mancur J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pp, Karl-Dieter (1986) "Soft Incentiv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87–112.
- Opp, Karl-Dieter and Christian Gern (1993) "Dissent Groups, Personal Networks, and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The East German Revolution of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659–680.
- Osa, Maryjane (1996) "Pastoral Mobilization and Contention: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in Poland," pp. 67–86, in *Disruptive Religion: The Force of Faith in Social-Movement Activism*, ed. by Christian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Oxhorn, Philip (1991) "The Popular Sector Response to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hantytown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Military Coup,"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8: 66–91.
- (1994) "Where Did All the Protesters Go? Popular Mobil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Chil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1: 49–68.
- (2001) "From Human Rights to Citizenship?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6: 136–182.
- Ozouf, Mona (1988)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kin, Frank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 tock.
- (1982) *Max Weber*. London: Tavistock.
- Parsons, Talcott (1954)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sons, Talcott and Gerald M. Platt (1970) "Ag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3: 1–37.
- Passey, Florence (2003) "Social Networks Matter. But How?" pp. 21–48,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eds. by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ttillo-McCoy, Mary (1998) "Church Culture as a Strategy of Ac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 767–784.
- Pérez-Díaz, Víctor M. (1993)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ow, Charles (1979) "The Sixties Observed," pp. 192–211,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Cambridge, MA: Winthrop.
- Perry, Elizabeth (1985) "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103: 414–440.
- (1994) "Casting a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 Roles of Students, Workers, and Entrepreneurs," pp. 74–92,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eds. by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Boulder, CO: Westview.
- (2001)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Popular Protest in Moder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3: 163–180.
- (2002) "Moving the Mas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 111–128.
-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 Phelan, Shane (1993) "(Be)Coming Out: Lesbian Identity and Politics," *Signs* 18: 756–790.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1)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92) “Normalizing Collective Protest,” pp. 301–325, in *Frontiers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s.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izzorno, Alessandro (1978) “Political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Industrial Conflict,” pp. 277–298, in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Vol. 2, eds. by Colin Crouch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Poggi, Gianfranco (1972) *Images of Society: Essays on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Tocqueville, Marx and Durkhei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lletta, Francesca (1999) “‘Free Spaces’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8: 1–38.
- Polletta, Francesca and Edwin Amenta (2001) “Conclusion: Second That Emotion? Lessons from Once-Novel Concept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pp. 303–316, in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Polletta, Francesca and James M. Jasper (2001)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283–305.
- Przeworski, Adam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Class, Production and Politics: Reply to Burawoy,” pp. 167–190, in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eds. by Terrell Carver and Paul Thoma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and John Sprague (1986) *Paper Ston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Quadagno, Jill (1992) “Social Movements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Labor Unions and Racial Conflict in the War On Pover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616–634.
- Redding, Kent and Jocelyn S. Vitterna (1999) “Political Demand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Explaining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Left-Libertarian Parties,” *Social Forces* 78: 491–510.
- Reese, Ellen (1996) “Materna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How California’s Postwar Child Care Campaign Was Won,” *Gender and Society* 10: 566–589.
- Robnett, Belinda (2002) “External Political Change,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Participation



- in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pp. 266–307, in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s. by David S. Meyer, Nancy Whittier and Belinda Robne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chon, Thomas R. (1990) “The West European Peace Movement and the Theory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pp. 105–121, in *Challenging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s.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Rochon, Thomas R. and Daniel A. Mazmanian (1993)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 75–87.
- Rootes, Chris (1997) “Shaping Collective Action: Structure, Contingency and Knowledge,” pp. 81–104,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ollective Action*, ed. by Ricca Edmondson. London: Routledge.
- Roth, Guenther (1979) “Religion and Revolutionary Beliefs,” pp. 144–165, in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by 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Berkeley, CA: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 Rucht, David (1988) “Themes, Logics, and Arenas of Social Movements: A Structural Approaches,” pp. 305–328,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0) “The Strategies and Action Repertoires of New Movements,” pp. 156–175, in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eds.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Oxford: Polity Press.
- (ed.) (1991a)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1991b) “Sociological Theory as a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 A Critique of Alain Touraine,” pp. 355–384,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ed. by David Ruc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1995) “Ecological Protest as Calculated Law-breaking: Greenpeace and Earth Firs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66–89, in *Green Politics Three*, ed. by Wolfgang Rüdi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Rudé, George (1964) *The Crowd in History, 1730–1848*.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Rush, Gary B. (1967)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Right-wing Extrem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86–92.
- Ryan, Barbara (1989) "Ideological Purity and Feminism: The U.S. Women's Movement from 1966–1975," *Gender and Society* 3: 239–257.
- Sassoon, Donald (1996)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Scaff, Lawrence A. and Thomas Clay Arnold (1985) "Class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Marx on France and Weber on Russia," pp. 190–214, in *A Weber-Marx Dialogue*, eds. by Robert J. Antonio and Ronald M. Glassman. Lawrence, KA: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 Schattschneider, E. E.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Schneider, Cathy (1997) "Framing Puerto Rican Identity: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Organizing in New York City," *Mobilization* 2: 227–245.
- Schonfeld, Clay A. Robert F. Meier and Robert J. Griffin (1979) "Constructing a Social Problem: The Press and the Environment," *Social Problems* 27: 38–61.
- Schultz, Alfred and Thomas Luckmann (1973)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trans. by R. Zaner and H. T. Engelhardt, J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77a) "Protest and Profanation: Agrarian R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part I," *Theory and Society* 4: 1–38.
- (1977b) "Protest and Profanation: Agrarian R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part II," *Theory and Society* 4: 211–246.
-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Wilbur J. (1985)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as Status Politics," *Social Forces* 64: 499–506.
- Sewell, William H.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pp.



- 169–198, in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pp. 245–280, in *The Historical Turn of Human Sciences*, eds. by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pp. 3–37,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s.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elser, Neil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Christian (1991) *The Emergence of Liberation Theology: Radical Religion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96) “Correcting a Curious Neglect, or Bringing Religion Back In,” pp. 1–25, in *Disruptive Religion: The Force of Faith in Social-Movement Activism*, ed. by Christian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Snow, David A. and Doug McAdam (2000) “Identity Work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ovements: Clarifying the Identity/Movement Nexus,” pp. 41–67, in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Sheldon Stryker, Timothy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pp. 197–218,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2) “Maser Frame and Cycles of Protest,” pp. 133–155,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s.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481.



- Snow, David, Louis A. Zurcher Jr. and Sheldon Ekalnd-Olson (1980)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rc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787–801.
- (1983) "Further Thoughts on Social Networks and Movement Recruitment," *Sociology* 17: 112–120.
- Spalter-Roth, Roberta and Ronnee Schreiber (1995) "Outsider Issues and Insider Tactics: Strategic Tensions in the Women's Policy Network during the 1980s," pp. 105–127, in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eds. by Myra Marx Ferree and Patricia Yancey Marti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taggenborg, Suzanne (1986) "Coalition Work in the Pro-choice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Social Problems* 33: 374–390.
- (1989) "The Consequenc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Formalization in the Pro-choice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585–606.
- (1998)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The Emergence and Maintenance of a Local Women's Movement," *Social Problems* 45: 180–204.
- Stein, Arlene (2001) "Revenge of the Shamed: The Christian Right's Emotional Culture War," pp. 115–131, in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Steinberg, Marc W. (1998) "Tilting the Frame: Considerations on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from a Discursive Turn," *Theory and Society* 27: 845–872.
- Stepan-Norris, Judith (1997) "The Making of Union Democracy," *Social Forces* 76: 475–510.
- Stepan-Norris, Judith and Maurice Zeitlin (1996) "Insurgency, Radicalism,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s Industrial Unionism," *Social Forces* 75: 1–32.
- Stoecker, Randy (1993) "The Federated Frontage Structure and Localized Soci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Cedar-Riverside Neighborhood Movemen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4: 169–184.
- Stryker, Sheldon, Timonth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2000) "Introduction: Soci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Movement," pp. 1–20, in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Sheldon Stryker, Timothy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utton, Donald S. (1995) "Consuming Counterrevolution: The Ritual and Culture of Cannibalism in Wuxuan, Guanxi, China, May to July 1968,"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 136–172.
- Swart, William J. (1995)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Irish Question: Master Frames, Cycles of Protest, and 'Master Frame Alignmen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 465–481.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73–286.
- (1995) "Cultural Power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85–106, in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e*, eds.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zasz, Andrew (1994)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arrow, Sidney (1988a) "Old Movement in New Cycles of Protest: The Career of an Italian Religious Community," pp. 281–304,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88b)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421–440.
- (1989a)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9b) *Struggle, Politics, and Reform: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ycles of Protest*. Western Societ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No. 2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 (1994)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a)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 pp. 41–61,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b) "Social Movement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A Review Artic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874–883.
- Taylor, Verta (1989) "Social Movement Continui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 Abey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761–775.
- Taylor, Verta and Leila J. Rupp (1993) "Women's Culture and Lesbian Feminist Activism: A Reconsideration of Cultural Feminism," *Signs* 19: 32–61.
- (2002) "Loving Internationalism: The Emotional Culture of Transnational Women's Organizations, 1888–1945," *Mobilization* 7: 141–158.
- Taylor, Verta and Nancy E. Whittier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 Lesbian Feminist Mobilization," pp. 104–129,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s.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Movement Culture: The Cul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pp. 163–187, in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e*, eds.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eiser, Stephan (1995) "Popular Reli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378–395.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nguin.
-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50: 76–136.
- (1974) "Patrician Society, Plebian Cultur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382–405.
- Tierney, Kathleen J. (1982) "The Battered Women Move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Wife Beating Problem," *Social Problems* 29: 207–220.
- Tilly, Charles (1975a)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pp. 3–83, in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s. by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5b)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pp. 380–455, in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s. by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6) *The Vende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1981)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pp. 297–317,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pp. 169–191, in



-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s.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7)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Theory and Society* 26: 245–273.
- (1998) “Political Identities,” pp. 3–16, in *Challenging Authority: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s. by Michael Hanagan, Leslie Page Moch and Wayne Te Brak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02)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86–2004*. Boulder, CO: Paradigm.
- (forthcoming) “Regime and Contention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eds. by Thomas Janosk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ryakian, Edward A. (1988) “From Durkheim to Managua: Revolutions as Religious Revivals,” pp. 44–65, in *Durkheimian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eds. by Jeffrey C. Alexa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77) *The Self-Production of Society*, trans. by Derek Coltm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85)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pp. 77–92, in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 ed. by Orlando Fals Borda. London: Sage.
- (1986) “Union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pp. 77–92, in *Union in Transition: Entering the Second Century*, ed.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San Francisco, C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 (1988) *Return of the Acto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9) “Neo-Modern Ecology,”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16: 49–51.
- Touraine, Alain, Franç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and Jan Strzelecki (1983)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Bryan S. (1988) *Statu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Bryan S. and Chris Rojek (2001) *Society and Culture: Principles of Scarcity and Solidarity*. London: Sage.
- Turner, Ralph H. and Lewis M. Killian (1957)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NJ: Pren-



tice-Hall Inc.

- Useem, Bert (1980) "Solidarity Model, Breakdown Model, and the Boston Anti-busing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357–369.
- Useem, Bert and Mayer N. Zald (1982) "From Pressure Group to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Dilemma of the Effort to Promote Nuclear Power," *Social Problems* 30: 144–156.
- Vinciguerra, Thomas (2005) "The Revolution Will Be Colorized," *New York Times* 3/13, p. wk12.
- Voss, Kim (1996) "The Collapse of a Social Movement: The Interplay of Mobilizing Structures, Framing,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the Knights of Labor," pp. 227–258,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eds.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Claim Making and the Framing of Defea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ss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Labor Activists," pp. 136–148, in *Challenging Authority: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s. by Michael Hanagan, Leslie Page Moch and Wayne Te Brak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Voss, Kim and Rachel Sherman (2000) "Breaking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Union Revit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303–349.
- Waddington, P. A. J. (1998) "Controlling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17–140, in *Policing the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s. by Donatella dell Porta and Herbert Reiter. Minneapolis, M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Wagner, Peter (1994)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their Social Contexts: Society and Polity in Western Europe before and after 1970," pp. 27–33, in *States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s*, ed. by Helena Fla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Wald, Kenneth, James W. Button, and Barbara A. Rienzo (1996) "The Politics of Gay Right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Explaining Anti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and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1152–1178.
- Walder, Andrew G. and Gong Xiaoxia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1–29.
- Walsh, Edward J. (1981)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Citizen Protest in Communities



- around Three Mile Island,” *Social Problems* 26: 1–21.
- Walzer, Michael (1968)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 of Radical Politics*. New York: Atheneum.
- Wasserstrom, Jeffrey (1987)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Boxers and Luddites as Hero and Villains,” *Theory and Society* 16: 675–707.
- Weber, Max (1948)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s.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London: Routledge.
- (1978a) *Economy and Society*, eds.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8b)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ed. by W. G. Runci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rans. by R. I. Frank. London: Verso.
- (1989) “The National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 pp. 188–209, in *Reading Weber*, eds. by Keith Tribe. London: Routledge.
- (1995) *The Russian Revolutions*, trans. and eds. by Gordon C. Wells and Peter Baehr. Oxford: Polity Press.
- Weller, Robert P. (1982) “Sectaria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8: 463–483.
- (1985) “Bandits, Beggars, and Ghosts: The Failure of State Control over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in Taiwan,” *American Ethnologist* 12: 46–61.
- (1987) “The Politics of Ritual Disguise: Repression and Response in Taiwanese Popular Religion,” *Modern China* 13: 17–39.
- (1999) *Alternativ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 White, Lori G. (2001) “Divided Consciousness: The Impact of Black Elite Consciousness on the 1966 Chicago Freedom Movement,” pp. 170–203, in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Subjectiv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eds. by Jane Mansbridge and Aldon Morri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Whittier, Nancy (1997) “Political Generation, Micro-Cohor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760–778.
- Williams, Rhys H. (1995)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Good: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ocial Problems* 42: 124–144.



- Wilson, James Q. (1961) "The Strategy of Protest: Problems of Negro Civic 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 291–303.
- Wiltfang, Gregory L. and Doug McAdam (1991) "The Costs and Risks of Social Activism: A Study of Sanctuary Movement Activism," *Social Forces* 69: 987–1010.
- Wright, Erik Olin (1995) "What Is Analytical Marxism?" pp. 11–30, in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eds. by Terrell Carver and Paul Thoma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Terence (1999) "Student Mobilization in Taiwan: Civil Society and Its Discontents," *Asian Survey* 39: 986–1008.
-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oungman, Nicole (2003) "When Frame Extension Fails: Operation Rescue and the 'Triple Gates of Hell' in Orland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521–554.
- Zald, Mayer N. (1991) "The Continuing Vitalit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pp. 348–354,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eds. by Dieter Ruc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Zald, Mayer N. and Bert Useem (1987) "Movement and Countermovement Interaction: Mobilizations, Tactics, and State Involvement," pp. 247–272,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Zald, Mayer N. and John D. McCarthy (1975) "Organizational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ticism of Society," *Social Service Review* 50: 344–362.
- (1987) "Social Movement Industries: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Among SMOs," pp. 161–180,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Zald, Mayer N. and Roberta Ash Garner (1987)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Growth, Decay and Change," pp. 121–141, in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ds.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Zhao, Dingxin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493–1529.

索引



英數字

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84-85

二劃

人口生態學 94
人本教育基金會 102
人際網絡 14, 80, 89, 93, 104-107,
109, 114, 155, 161, 173
人民團體法 102

三劃

三月學運 88
三哩島 (Three Mile Island) 84
千禧年運動 26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 74, 79
小傳統 193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96
工地佔領 195
工具性 5-6, 68-69, 76, 108-109, 134,
170
工具箱 151, 153-154

四劃

中程層次 147
中層 107, 148
中層動員 96
互動秩序 156
五月廣場母親 (*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 191

五輕案 81, 110
公民權 26, 63, 138
公民權運動 132
公共財 50, 183
分裂的 80, 182
分離但是平等 74
分類鬥爭 78
反右運動 4
反抗文化 134, 221-222
反制運動 15, 74, 142, 148, 163, 166,
201, 210, 212-217, 223
反思性 9, 43, 56, 72, 77, 150
反威權 59, 62
反理性 15
反智主義 215
巴斯底 (Bastille) 46
文化主義 173
文化價值 29, 47, 54, 61, 80, 128, 215,
218
方法論 18, 29-30, 35, 87, 107, 117,
136, 140, 145, 148, 217
日常抵抗 12-13, 46-47

五劃

北京學生運動 80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102
主導框架 158-159, 161, 167-168, 173
去除魔咒 182
可支配時間 81, 101



可支配資源 124
 可攜式社會資本 101
 台灣人權協會 221
 台灣女性學學會 220
 台灣教授協會 220
 台灣勞工陣線 221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220
 古典模型 20, 24, 127
 史賓塞 39
 囚犯兩難 51-52
 失範型自殺 31
 平民文化 9
 平等化 20, 28, 35, 37, 164, 215
 平權修正案 169-170, 215-216
 正當性危機 59
 母職 162, 216
 母職主義 164
 民間宗教 193-194
 民歌搖滾 221
 《永不妥協》 218
 生命歷程 14, 67, 69-70, 78, 81-90,
 168-169, 173
 生命權 216
 目的論時間觀 144

六 劃

「在己」階級 22
 先發制人 142, 190, 209-210
 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213
 全國婦女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99, 210

共有地的悲劇 49
 共識動員 151, 153-154, 178
 刑法一百條 220
 列寧 (Vladimir Lenin) 4, 204
 地位不一致論 29
 地位保衛 29
 地位結晶化 29
 地球第一! (Earth First!) 95
 多元文化主義 73, 163
 多元政體 202
 多重主權 120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19,
 20, 35-38, 136
 收編 110, 142, 209
 自由之夏 (Freedom Summer) 82-83,
 87, 167, 195, 222
 自有的資源 104
 自我設限的激進主義 63
 自發性 62, 106, 114, 204

七 劃

形上學 140
 利己主義 49
 利益政治 120, 132-133, 177
 利益團體自由主義 206
 壯膽的迷思 163, 195
 李長榮化工 81
 志願論 121, 152, 168-169, 171-173,
 184
 我群意識 77
 抗爭政治 121, 135-136
 抗議的諄論 117-118
 抗議劇碼 151, 153, 214



良心擁護者 98

言談倫理學 78

八 劃

恆定狀態 38

恆定的模式 128

和解之友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100

宗教去分化 192

承認政治 69, 75, 77

柬埔寨布農族 194

社會工程改造 13

社會不均衡狀態 42

社會本體論 18

社會存在 18, 54

社會封閉 28

社會動員模型 203

社會現象學 43

社會盜匪 26

社會運動共同體 104

社會運動家族 104

社會運動產業 94-95

社會運動部門 94, 124

社會運動劇碼 8-9

社會團結 31-33, 48, 113

社會戲劇學 43, 47

社會鑲嵌性 107

表現性運動 47

非干擾式的動員 87

非決策 119

非暴力直接行動 70, 95, 166, 209

九 劃

「為己」階級 22

俗民方法論 43

前臺 46

南方會議教育基金 (Southern Council
Education Fund) 100

哈維爾 (Václav Havel) 106

後公民權運動 133-134, 136

後臺 46

拯救行動 164, 187

挑戰者 118, 122, 126, 130, 132-133,
166-167, 203

政治中介模型 203

政治全國化 36

政治列寧主義 106

政治過程論 64, 127-128, 150, 167,
173, 176, 178-179, 196, 220

政治管道 116, 130-131, 139

政治劇場 190

政治機會結構 14, 114-117, 123-148,
161-162, 164, 167, 174, 178, 213

政策網絡 107

政體中心論 121-122, 124

政體成員 122, 142

政體模型 122-124

相對剝奪感 29, 31, 50, 201

美國勞聯產總 169

《美麗之島》 221

《美麗島》 102, 188-189

胚胎權 163

十 劃

個體主義 18, 49, 55, 88, 92, 155

原子化 40, 92, 105, 114



容克貴族 25
 韋伯 19-20, 24-29, 39, 47, 49, 65, 182, 195
 涂爾幹 19-20, 30-34, 39, 41, 49, 65, 176, 192, 195, 197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102
 《夏潮》 102
 恐慌 5
 凍結核彈 147
 核四案 6
 框架爭議 158, 161
 框架設定 152, 157
 殺豬公 193
 被殖民化 61
 破壞性實驗 44-45
 神聖化 6, 34, 184, 192, 196-197
 紙幣主義運動(Greenbackism) 171
 缺乏結構的暴虐 100
 訊號 132, 214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143, 169, 181, 219
 馬克思(Karl Marx) 2-3, 19-22, 24, 37, 44, 49, 58, 64, 157
 馬克思主義(Marxism) 19, 22-24, 28, 34, 41-42, 57, 72-73, 120, 219
 高地人民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 100

————— 十一劃 —————

偏差的動員 119
 動員結構 91, 93, 114, 128
 動機框架 146, 157-158, 163, 180
 參考公眾 181, 208

國家中心論 25, 36, 121, 136-138, 140, 147-148
 國家自主性 25, 136
 國家建立 26, 120
 基督教城鄉宣道會 101
 培根 8
 強聯繫 108-109, 111, 113
 《婦女新知》 83, 102, 220
 情境定義 43, 46, 152, 156
 情緒共同體 32
 接納 75, 209-210
 教育券 168, 211
 敘事傳真性 158
 深層生態學 71
 現象學個體主義 79
 符號互動論 43, 45
 符號化 46
 細心算計的違法行動 95
 軟性誘因 55
 連結性運動者 167
 部落格 112-113

————— 十二劃 —————

《勞工搖籃曲》 221
 勞工騎士(Knights of Labor) 195
 勞動黨 96
 喧鬧 182
 斯湯達爾(Henri-Marie Beyle Stendhal) 88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4
 稀缺性 48
 等級國家 35
 策略性構框 128, 160-165, 168-171,



173
 策略性戲劇表演 181
 結構功能論 19, 24, 31-32, 38-45, 57,
 120
 結構可及性 155
 結構歸屬 146
 診斷框架 157
 集團招募 105
 集體行動的劇碼 182
 集體抗議常態化 177
 集體宣稱 8-9
 集體挑戰 2-4, 6, 9, 11, 134, 151
 集體情緒 32
 集體亢奮 32
 黑權 70, 159

十三劃

慈林社會發展研修班 101
 慈林教育基金會 101
 微觀動員 46, 96, 155, 157-159, 161,
 165, 173, 178
 微觀結構管道 155
 意義之網 18, 170
 意識提升 186
 感情連帶 187, 189
 感覺規則 184-186, 197
 搭便車 51-52, 56, 92, 105, 108
 搶糧暴動 10
 新政 162, 206
 新政治 59-64, 128-130, 138
 新興宗教運動 4, 155
 新興規範論 45, 48
 新環境基金會 102

新環境雜誌社 102
 經驗可信度 158
 經驗的組織 156-157, 160
 群眾抗命 204
 群眾社會 40
 群體代議 74
 解放政治 138
 解組模型 30
 資源動員模型 127
 資源動員論 19, 22, 30, 42, 57, 63-64,
 76-77, 81-82, 93-94, 97-98, 114,
 117-118, 123-128, 133, 150, 153, 155,
 160-161, 173-174, 176-185, 190,
 196-197, 202, 220
 運動中途之家 100-101
 運動認同 69, 75-82, 87, 89, 106, 111,
 154

道德經濟 10
 道德震撼 186
 預測框架 157

十四劃

團結誘因 54, 108
 團結模型 30
 團體規模 50, 51
 寡頭鐵律 27, 97-98
 實在論 18
 實踐知識 13
 實驗性時間觀 144
 對抗性的策略 129
 構框理論 64, 77, 152-161, 171-174,
 179, 196
 構框過程 128, 152, 157-158, 160,



165, 173
 構框劇碼 170-171, 173
 福音派基督教 214
 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95
 網絡 14, 30, 70, 76, 78-79, 86, 91, 93,
 96, 99, 101, 104-114, 126, 129, 155-
 156, 159, 173-174, 177, 183, 186, 200,
 210, 217, 222
 蓋亞理論 71
 《臺灣政論》 102
 語言戲局 72
 認同 3, 7, 9-10, 14, 19, 23, 34, 48, 54,
 63-64, 69-90, 94, 97, 105, 108-109,
 111, 114, 133-135, 138, 151, 153-154,
 157-158, 169-171, 185, 187, 189,
 193-194, 197, 217, 219, 221
 認同取向 134
 認同政治 69-75, 78, 89
 認知不協調 29
 認知心理學 119, 120
 認知解放 107, 127-128, 179-180, 185
 認知線索 180
 誘因 55, 98, 118, 132, 174, 181
 酷兒族 71

十五劃

儀式性的偽裝 193
 價值的普遍化 39
 嬉皮 88, 166, 221
 澄社 220
 暫緩結構 194
 模組的 182
 潛在團體 53

範網 105
 範疇 61, 69, 103, 105, 137, 185
 談心聚會 189

十六劃

戰術創新 181
 整合 20, 30-32, 38-40, 42, 48, 54, 64,
 96, 99, 108, 111, 114, 122, 128, 156,
 173-174, 176, 182, 184, 192, 194
 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204
 親愛共同體 195
 選擇性誘因 53, 203
 錯誤意識 22, 215

十七劃

壓制 3, 85-86, 97, 100, 104, 106, 114,
 145, 159, 162, 207-209, 211
 嬰兒潮世代 82
 戲劇學式的 180
 環節的 99
 環境種族歧視 166
 總統婦女地位委員會 (President's Com-
 mission of Women's Status) 210
 總意志 33
 褻瀆 193
 賽局理論 51
 隱藏腳本 46

十八劃

擾亂作用 204
 糧食暴動 121
 職業利他者 124
 轉化性事件 144



鎮壓 8, 14, 122, 126, 131, 139-140,
143, 181, 188-189, 207-208, 223

雙重政治 76

雙重策略 133

————— 二十劃 —————

競爭性 121

議價 14, 53, 118, 126, 176-177, 181,
211-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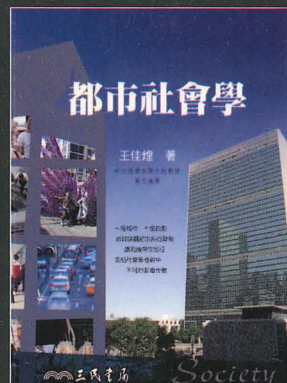
議題企業家 94, 123

————— 二十二劃 —————

權力取向 134

————— 二十四劃 —————

觀念論 78, 79, 151



都市社會學

王佳煌 著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達，現代都市不斷地興起和蔓延。都市生活的問題、議題與各種驚人的統計數字，在在引發都市社會學的想像。本書除了理論的介紹外，還著重解讀臺灣的各種都市社會現象，更以不同的社會學觀點遊覽都市的種種風貌——從現代城市出發，遊歷資本城市、權力城市與對抗城市後，在文化城市中小憩，再前往數位城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與行動城市，最後棲息於永續城市之中。作者的生花妙筆，不但帶領我們見識了一幕幕精彩的都市社會學景致、遍覽城市的各種風貌，也為現代都市下了最動人的註解。



思想的激盪與交流
文化的傳承與開創

從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到2005年的醫療改革大遊行，當我們將這些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視為稀鬆平常時，你是否真的理解所謂的社會運動？作為一種有意識去改造社會的集體力量，社會運動參與者是堅決的反宿命論者，他們熱切地相信自己的行動會帶來有意義的改變，愈來愈多研究者亦開始從社會運動的觀點勾勒臺灣近幾十年來的變遷。社會運動本身即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因此作者不預設社會運動的本質，從各種經驗現象出發，導入諸多理論觀點，容納更豐富的議題討論，一同描繪出社會運動的萬千風貌。此外，本書更以本土經驗與外國理論對話，援引臺灣社會運動的研究成果，讓抽象的概念與理論，也能融入本土的參照點！

Society

ISBN 957-14-4304-2

(541)



NT. 330



9 789571 443041